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风雨故人情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夏衍(1900年10月31日 - 1995年2月6日)原名沈端轩。浙江杭州人。1914年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1919年编辑《新浙江潮》。1920年以公费留学日本，进福冈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1927年归国，7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执行委员。抗战期间，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编《救亡日报》、《华商报》、《南侨日报》和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译有高尔基《母亲》等；写有报告文学《包身工》；话剧剧本《赛金花》、《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心防》、《愁城记》、《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编写电影剧本《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和《祝福》、《林家铺子》、《我的一家》、《考验》等。还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和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等。

总 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入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扶，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膺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既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膀，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 编

1996年夏于沪西

风雨故人情

巨星永放光芒——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周年

今年三月五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诞辰八十周年。在今天，正当华主席率领我们开始新的长征，正当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协胜利举行的时刻，要是他能和我们在一起，这将是多么高兴的事啊！他离开我们两年了，可是，当我们看到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一件件鼓舞人心的喜事的时候，我耳边仿佛听到我们总理爽朗的笑声。

凝视着周总理的遗像，心事如潮，想起了几十年的往事。

早在二十年代，我就熟悉和仰慕周恩来这个响亮而伟大的名字，可是得到机会能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则是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那时，上海快沦陷了，我正打算留在那个当时被叫做孤岛的城市，可是总理给我的任务却是到广州去办报。他说：“你的工作是办报和做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我在上海十年，主要是搞文艺和电影，对这两项新的任务，不自禁地面有难色。总理笑了，“你开始搞电影的时候，不也是外行么？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会了。”当时，我参加革命虽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竟是那样的幼稚无知，连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也不很了解。总理耐心地给我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指示我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党要求你去做宣传和统战这两项重要的工作。困难不要怕，困难会使你得到锻炼。

一九三八年初，我到广州复刊了《救亡日报》，在当时的环境下，工作中经常会碰到许多难于掌握的问题。四月下旬，我带了许多自己认为很难处理的问题，到武汉去向周总理请示。在一个初夏的闷热的下午，总理和我谈了近四个小时，他详细地问了报社的情况，报纸的销数，以及读者、文化界和国民党方面对这张报纸的看法和态度之后，问我：“你们的报销八千份，占广州各报总销数的百分之几？”我一时答不上来。他说，当然，问题不单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和欢不欢喜看你们的报。你不是说和国民党有点关系的人不肯给你们写文章么？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得像《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适。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欢喜看的报纸。你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事隔四十年了，但这一段话我是毕生难忘的教诲。

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工作了四年。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翌年四月我到了重庆。当我向总理汇报了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的情况后，他特别关心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的安全和健康。当他知道了邹韬奋已经决定要去华东解放区时，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当然我们不能勉强他，可是我还是希望他能留在国统区工作的。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特别尖锐而复杂。身负南方局、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重责的周总理的辛劳，是不难想象的。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和民主党派人士或国际友人谈话到午夜甚至黎明，不会抽烟的

他，有时也点上一支烟来振作精神。尽管这样，他还是挤出时间和文化、艺术、新闻、教育界的朋友保持经常的联系。当时，到曾家岩和红岩来和总理见面是有困难的，对有些人甚至是有危险的，为此，总理常常在天官府郭沫若同志的家里邀请一些党和非党的朋友举行茶会或便餐，参加这种集会的人，少则三五人，多则二十余人，名单都是总理亲自拟定的。有一次，总理到郭宅的时候，发现漏邀了一个人，便对我和另一个负责通知的人进行了批评：你们该知道中国的一句古话，“一人向隅，举坐为之不欢”吧，在你们，可能认为这只是无意的疏忽，是件小事，可是在对方，也许会认为这是对他的有意的疏远，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政治斗争微妙复杂的时候。说完，他就派车去把这位朋友接来，并亲自对他表示了歉意。总理待人接物的周到细致，事无大小，坚决而正确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样的例子是多不胜举的。特别使我永志不忘的是，有一次重庆民主党派和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反共，调动军队进攻边区，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这件事是民盟和无党派人士发起，总理同意的。一天晚上，当负责协助这一签名运动的党内干部向总理汇报的时候，对一个平时和我们很接近的人表示不愿签名，讲了一些不满和带讥俏性的话。总理严肃地站起来说，这样讲不对，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主观，首先要替对方想一想，你以为签一个名很简单，在对方看来可能是一件关系到他的职业、生活和安全的的大事。要求别人表态，一定要替对方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强加于人不行，人家不愿而加以嘲讽，那就是思想、作风上的错误。接着，总理又耐心地对“设身处地”这四个字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任何一件事，都要先想一想对方的处境。你能做到的，他不一定能做到，你能勉强他吗？强加于人，就只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推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他着重指出：不能以党员的标准去要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又有各种不同的处境。毛主席要求我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这是党的基本政策。当然，在原则问题上，在关系到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是一丝一毫也不能迁就的。对中间势力的错误思想，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批评和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和批评也不同于党内的斗争和批评，要以净友的身份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这次汇报本来是预计一小时可以谈完的，但结果是继续了两个多小时，总理的态度很严肃，批评很尖锐，但在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受到启发，像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总理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举党皆知、举世皆知的。可是，在路线问题上，原则问题上，他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有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九四六年在南京，当国共谈判濒于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背着中央代表团、背着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向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极端不利于我党我军的所谓“调处”方案。当局总理看了这个“民主人士”交来的文件之后，平时总是春风满面的总理，在他浓眉下的那双锐眼发出了忿怒的光芒，指着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大声他说：“过去人家说你是伪君子，今天我说你是真小人！”这时，总理不仅生气了，而且可以说是暴怒了。他说，你们爱怎么做，那是你们的自由，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受骗的。可是，当这个人响响地承认了错误，和另一个年迈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匆忙地赶到马歇尔总部去撤回这个“方案”时，人们看到总理的眼眶里是带着激动的泪水的。这是他个人的一时的激怒吗？不，这是他坚决执行毛主席以斗争求团结这一伟大策略的具体表现。正因为这一怒而保持了我党和

民主党派的团结，正因为这一怒而使民主党派内部的正气得到了伸张。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力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壮大自己，孤立敌人；而要团结，就必须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总理是最善于团结人的，他团结了干部，团结了民主党派，团结了知识分子，团结了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团结了世界五大洲的许多朋友。任何和总理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感到总理对他们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他又很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及时地对他们进行善意的批评。这是一种真正的为了达到更好的团结而进行的批评。

万恶的“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对毛主席亲自制定而由周总理忠实执行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千方百计地进行诬蔑、打击和破坏。他们残酷地迫害革命干部、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国外归侨……可是我们的党是强大的。在他们恶贯满盈、天怒人怨的时候，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这批不齿于人类的叛徒、特务永远地、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三月五日这个为八亿人民衷心牢记的纪念日，正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协胜利召开，全国各族人民喜气洋洋的日子，周总理为之尽瘁一生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重新得到了贯彻执行。

两年前的，在总理离开我们的时候，不少外国报刊都用了“巨星陨落”这一类标题。但是我认为这颗巨星是永远不会陨落的。如日月经天，他将继续发出光芒，指引和鼓舞八亿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万众一心，向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78年3月

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关于演剧队的一些史实

今年三月五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在这时候，所有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来的人，谁都会心潮澎湃，追想起总理对我们这些人的亲切关怀和细致而又严格的教育。前几天，从电视中看了北京电影学院演出的《最后一幕》，很受感动，抗敌演剧队的建成、壮大，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斗争的历史，正和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和抚育青年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光辉的范例。

抗敌演剧队在国民党统治区艰苦奋斗了十多年，可是他们却被万恶的“四人帮”诬陷迫害了十多年，不少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在迫害中牺牲了，不少队员和他们的家属都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摧残。但是，这一长达十年的冤案，终于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得到了昭雪。是非黑白，是不容混淆的，我认为有必要说明一下周总理领导和关怀抗战演剧队的一些史实。

抗敌演剧队是怎样成长和战斗过来的呢？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之前，上海文化艺术界和广大的爱国青年纷纷要求组织演剧队、歌咏队、服务队等，到前线去参加抗日宣传工作。经过党组织讨论，同年九月，得到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同意，组织了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它的全名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是在“西安事变”后开始筹备，到一九三七年夏郭沫若同志回到上海后正式成立的一个文化艺术界的统一战线组织。由于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因此这个协会有一些国民党和与国民党有关的人参加，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是党领导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民主同盟的前身救国会领导下的爱国青年。我参加了这些演剧队的筹备、建队的讨论，并和一些演剧队的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但由于当时我已经担任了以郭沫若同志为社长的《救亡日报》的工作，因此具体的筹备建队工作主要由原左翼戏剧界联盟党团负责人于伶同志负责。这十二个队从十月开始就陆续离开上海，奔赴前线。

上海沦陷后，我于一九三七年底奉命离开上海到广州，进行《救亡日报》的复刊工作。这些演剧队在江、浙、皖、鄂一带工作，到一九三八年，陆续到达武汉。在这一段时间内，这些演剧队都是通过留在上海的于伶同志与上海党组织保持联系的。

我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到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第二天，总理约我在昙花林第三厅谈话，问起救亡演剧队组成前后的情况，并说这些演剧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办会组织的民间团体，所以，在国民党区域活动不仅经费上有困难，在演出上也遇到不少麻烦。有一个队因为唱了一首反“摩擦”的歌，就几乎被迫解散。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厅，所以我和郭沫若等同志商量后，打算把这些演剧队改组为第三厅直属的抗敌演剧队。总理说，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国共两党都有庄严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对抗敌宣传消极怠工，那么这分工作只能由我们担负起来了。让这些演剧队有一块“政治部第三厅”的招牌，用他们的钱，演我们的戏，唱我们的歌，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接着，我又从杜国库、冯乃超等同志了解到，这些演剧队从上海到武汉的途中，又吸收了许多新的成员，各队队长也有了改动（原来的队长中，一

些人已经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一些人已经去了解放区)。各队的队长绝大多数是党员，由非党员担任队长的队里面，也有党员参加，各队都已建立了秘密的党的支部或者小组。我离开武汉的时候，周总理要我和到广东工作的各队保持联系，同年九月，八路军广州办事处通知我，这些救亡演剧队已正式列入三厅的编制，改名为“抗敌演剧队”。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我和《救亡日报》同人在战火纷飞口离开广州，于同年十一月到达桂林，筹办《救亡日报》桂林版复刊。当时郭沫若同志和第三厅已经转移到长沙，我就于十一月十日从桂林到长沙，向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请示《救亡日报》今后的工作方针。当时长沙的情况已经极端混乱，十一日我向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汇报了广州失守后《救亡日报》的情况。由于协两天，岳阳失守，长沙震动，周总理工作很忙，约我第二天下午四时到水风井第三厅再谈。可是这一天，就是长沙大火的日子，因此我到水风井的时候，总理就来不及谈《救亡日报》的事了。指示说，《救亡日报》的事，到桂林后再给你联系，现在先交你两个任务：第一，给你一辆汽车，由你和孙师毅、马彦祥护送于立群等同志到桂林，然后，立即自筹经费，赶快恢复《救亡日报》，建立宣传据点；第二，目前战事紧张，散在各地的演剧队不可能和三厅保持联系了，在桂林的《救亡日报》是一个公开合法的报纸，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由你和各演剧队保持联系，我已通知各演剧队，有必要时到桂林和你联系，你能解决的就帮他们解决，不能解决的，通过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向南方局请示。这时第三厅已经开始撤退，临别时，总理再一次和我说，这两件事归你负责。下午六时左右，我在暮色膝眈中匆忙地离开长沙。当晚，汽车到下摄司的时候，长沙就发生了大火。当时，沿途车辆、伤兵，难民拥挤。我们好不容易到十八（或十九）日才到达衡阳，这时候才知道周恩来同志已经从衡山赶回长沙，并指定由洪深同志率领各演剧队日夜兼程赶回长沙，担任大火后的救护和善后工作。事后洪深同志告诉我，在长沙大火之后，演剧队的一切活动都由周总理亲自领导，从方针政策、具体行动、对国民党人员的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策略，一直到队员们的生活细节，总理都作了细致周密的指示，并逐日进行了检查、汇报。

一九二九年秋，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各地的演剧队都受到了严重的压迫，许多队有被迫加入国民党的危险。大队队长吕复曾于九、十月间到桂林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请示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李克农同志，李克农同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听取了吕复同志的情况汇报，并对吕复同志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主要内容是演剧队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长期隐蔽，保全实力，团结一切要求进步和爱国的人，反对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各地情况不同，必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国民党内也有不同派别，余汉谋与张发奎不同，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应该利用这些矛盾保全自己。要广交朋友，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但一定要坚持原则，不演一出反共戏，不唱一支反共歌，又要谨慎小心，不要冲动急躁，不要自己戴上红帽子。如有遇到被强迫入党时，可拖则拖，拖不下去的时候，可以集体加入，但有三点必须注意：一、必须向全队讲清楚，使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取得队内的意见一致；二、个别队员坚决不愿参加和已被国民党监视有危险的人，应设法保护他们安全离队；三、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弄假成真”。之后，我从吕复同志详细了解了各队情况，并要他想方设法让各队队长了解南方局的指示。此后，在这一年冬，李克农同志曾和我说，周恩来同志曾两次电询过东南各

省的演剧队的情况。我也曾通过各种途径和在湖南、广西、广东的演剧队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并把这些情况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因为桂系的白崇禧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主谋者之一，因此在桂林也掀起了反共高潮。这时，在《救亡日报》因为拒登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诬陷新四军的消息而遭到了当天报纸全部被扣的事件之后，周总理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通知我立即离开桂林赴香港，和从重庆撤退的文化工作者合作，建立对外宣传据点。我离开桂林时，请李克农同志电告周总理，我离开桂林以后如何与各演剧队联系，请予指示。我到香港后不久，就接到周总理的回电，内容是今后在白区的演剧队，可与重庆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冯乃超同志联系，假如有人到香港的话，也可与他们接触，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得演剧八队的刘斐章同志曾到香港和我联系过一次。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经过澳门、台山回到桂林。在桂林，又向新中国剧社的杜宣、严恭等同志了解了一下大后方各演剧队的情况。一九四二年四月间，我到了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文化界人士由廖承志同志领导下，分途撤出的情况以后，又把我在桂林了解到的演剧队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对各演剧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不演一个反动戏，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表示非常高兴。接着，当于伶、宋之的等同志从香港回到重庆之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指示，要组织一个话剧团，使在重庆的话剧工作者有演出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吸收一些到重庆的演剧队的成员参加。

从一九四二年到抗战胜利的三年时间内，周总理还是继续通过文化工作委员会和散处各地的演剧队保持联系，并不止一次地亲自接见到重庆来请示的演剧队同志。甚至当我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奉命赴上海恢复《救亡日报》时，在临行前的深夜，周总理还派专人带口信给我，指示我到上海后立即告知刘晓、刘长胜同志，要他们迅速通知东南各地的演剧队：抗战胜利了，但斗争还没有结束，要求他们不要忙于“复员”，一定要坚持下来，等候党中央的统一安排。

以上事实说明，从救亡演剧队到抗敌演剧队一直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和战斗过来的。他们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地区内坚持战斗，宣传党的团结、抗日、进步的方针的轻骑队，是党在国统区的一支重要的战斗队伍，而绝不是“四人帮”诬蔑的所谓“反革命别动队”。我对演剧队的工作做过一段时期的联系工作（主要是在东南地区），因此，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深感到根据亲身经历的史实，说明事实真相，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是我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

永远难忘的教诲

周恩来同志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今年3月5日是他91岁冥诞。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传身教，却一直牢记在我的心头。

从1937年到1966年，我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三十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做的主要是新闻和统战工作。建国初期和1955年以后，我先后在华东局和文化部工作，分管的是电影和外事。由于我在香港和重庆曾和廖承志、乔冠华等同志参与过一些涉外工作，开国初期，我曾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但因陈毅同志不同意我离开上海，我一直没有到任，所以我从事外事工作主要是在文化部的十年。我记得很清楚，就在1955年7月，我到文化部报到前夕，恩来同志约我到西华厅他的办公室谈话。他对我说：电影你干过多年了，我没有大多的意见要说，只希望你团结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电影工作者，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多拍一些好的影片。但外事工作，你就得从头学起，不能掉以轻心。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三勤”——勤学、勤业、勤交朋友。工作的范围扩大了，要学的东西更多了，要懂的业务更广了，要交的朋友更多、也更复杂了，要学一点外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要严守外事纪律，同时要学一点外交艺术。从广义上说，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不能忘记内外有别。第二是外事工作“授权不多”，不能越权，更不能越轨。你开始做外事工作，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对外活动中，脱口而出讲错一句话，考虑不周而做错一件小事，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一次谈了三个多小时，给我上了启蒙的一课，也是终生难忘的教诲。临别的时候，他又说：你先了解一下文化部有没有胜任的翻译力量，要有俄、英、日三种能口译和笔译的人才。在文化部当翻译，单懂生活语言是不够的，还要懂文化方面的专业用语，假如力量不足，给国务院打报告，尽可能给你们补充。他说，沈部长（雁冰）懂英语，胡愈之副部长懂法语，请你转告他们，假如翻译译错了，或者翻译得不恰当，要立即纠正。我们有许多同志不懂外语，常常因为翻译出差错而闹笑话，这看来像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可是技术性的差错会造成政治上的失误，这一点一定要抓紧。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政治、军事、文化、思想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他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延伸到外交领域，创建了一种以独立自主为基本立场，顺应新的国际形势，以和平共处为目标的，崭新的总体外交政策。他从新中国的国情出发，对战后世界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如对战争与和平，对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对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政府外交与民间交往，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主动与被动，对必然与偶然，等等，总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评估，经过审慎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切实可行的决策。立足本国，纵观世界，立足今天，展望未来，又不能割断历史，不考虑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已建交的国家要以政府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对未建交的国家，则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一切外交活动即要坚持原则，在适当时机又要当机立断，灵活运用。

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用现在的流行话来说，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总体外交政策。以1950年的朝鲜战争为例。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强国，是国际宪兵。它还纠集了十几个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气势汹

汹地冲破三八线，直逼我们边境。而我们则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上百孔千疮，百废待举。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应该说我们是被迫应战的，国是弱国，兵是疲兵（一方面又是哀兵）。可是美国军队已经打到鸭绿江边，还在东北投了细菌弹。我们先是提出警告：“不能置之不理”，警告无效，“退避三舍”到了东北边境，那就只能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了。我们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这是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可以说这一举是完全出于美国的意料之外的。我们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终于在上甘岭战役之后，把美军赶过三八线，迫使他们要求停战谈判。我记得李克农、乔冠华同志到板门店去谈判之前，恩来同志对他们作了全面的指示之后，引用了一句古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前一句话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反顾，后一句的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周总理指出：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是周总理在外交上的一贯思想。我还记得日内瓦会议之后，恩来同志在外交口作过一次报告，会后在少数人的交谈中，恩来同志颇有感慨他说：日内瓦会议本来可以不必花这么多的时间的。相持不下，问题在于美苏两国外交部长的思想僵化。莫洛托夫对什么问题都用一个“不”字来对付，美国人提一个方案，他说“不”，英国人出来打圆场，他也说“不”。一切都不，那就没有会谈和对话的必要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建国初期，日本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尽管1952年帆足计和高良富等来华，开始了民间贸易，但是障碍很多，进展不大。当时恩来同志教导我们，对日本既要正视六十年但也要考虑两千年。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侵略我们达六十年，中国受到了无可估计的损害。但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日本人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和影响。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和日本打交道，太迁就不行，太勉强也不行。太迁就他，中国老百姓不答应，太勉强了，日本政府也办不到。所以周恩来同志提出了“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方针，就是先从文化，体育，贸易做起，开辟和扩大各种民间渠道，广交朋友，以民促官，汇细流成江河，一旦瓜熟蒂落，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到建交的目的。

恩来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则，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顽强地采取反共、反苏和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反华政策，我们被迫“一边倒”了一段时期。当时的政务院和各部都请来了许多苏联顾问，绝大部分顾问也帮助我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恩来同志当时指示我们，要尊重外国顾问，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懂业务，不一定了解中国的实际，所以在原则问题上还是要独立自主。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前，总理就对我说，据说文化部的年度工作计划，上报国务院的文件等都要先经总顾问的审签，这是不合适的。我们没有经验，可以请顾问提意见，但不能由他们作主，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问题。后来中国戏剧学院的一位顾问主张改革京剧，反对脸谱和挂髯口，发生了所谓挂胡子还是贴胡子的问题，京剧界意见很大，总理知道后就纠正了这种做法。他说，这位专家是搞活剧的，他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说来提高我们的话剧水平，我

们应该听他的，但他对京剧不了解，不应该让外国的外行来“改造”我们的传统艺术。

1956—1957年文化部接待了许多苏联、东欧各国和日本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演出团队。按惯例，我们总是事先拟好一份接待计划，向总理办公室报告，有时还提出希望总理接见。这是例行公事，我认为总理日理万机，不可能亲自批阅的。可是完全出乎意外，恩来同志不止一次对我们的接待计划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有时亲笔在接待计划上一条一条地批注，提出他要了解的问题；有时甚至深夜打电话要我和接待单位的负责人（如文联各协会）向他当面汇报。记得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第一次访华，对于我们上报的接待计划，恩来同志就要我和阳翰笙去谈了两个多小时。恩来同志第一句就说，你们要我会见，那就得让我知道这个代表团的具体情况。你们这个计划也未免写得太简略了，团长只写了职务和年龄，过去的经历、专业，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有没有到过中国？哪一县市的人？全是空白。中国文艺界有京派、海派，日本也有关西、关东学派之分。你们随便写一个报告，很轻松，你们主动，使我这个要会见他们的人就陷于被动了。他指着那份划了红铅笔和问号的文件说，“团员皆文化界知名人士”，太笼统了。团员一共几位？是美术家还是音乐家？中日还没有建交，得不到使领馆的帮助，你们可能也不了解，那么，为什么不问问廖承志、孙平化呢？为什么不问问西园寺公一呢？这是1956年的事，对我说来既是受了一次批评，又是受了一次教育。会见过恩来同志的外宾都说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除了他的才华和丰富的经验之外，也和他在会见之前有针对性的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恩来同志会见外宾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政治思想倾向，还会问到对方的籍贯、健康、家庭情况，乃至个人的性格和趣味。在会见中岛健藏的时候，廖承志说了一句他是日本有名的集邮家，会后恩来同志就对我说，你不是也欢喜集邮吗，你可以把你的邮集请他看看，再送他一套新中国的邮票，这比送什么礼品都会更让他高兴的。这样的事例多不胜举。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在田中角荣访华的宴会上，恩来同志让乐队演奏了一首田中家乡的民谣，田中感动得几乎流了眼泪。这就是恩来同志的外交艺术。

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人对外宾讲话就常常只讲成绩不讲困难。当时有过一个宣传口径，叫“桃李不言，下自成溪”，恩来同志对一个出国代表团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要你们对外国人讲真话，要谦虚，不要夸大已取得的成绩，更不要讲空话大话。成绩要讲，缺点错误和困难也要讲。中国还很穷，很落后，这一点你们不讲，外国人也会知道，可能他们知道得比我们还要多，所以“不言”就太消极了。一问三不知不行，简单地用“无可奉告”来回答也不对。和外宾谈话一要坦率，二要实事求是，三要沉得住气——就是听到不入耳之言，或者挖苦我们的话也不要生气。文化代表团不同于党政代表团，文化艺术界的对外来往，主要目的是广交朋友，增进理解。他说，我在你们的接待计划或报告中经常看到某某来宾思想进步，对华友好，或者某某来宾思想保守，有反共情绪之类的话，这种非此即彼，不是红的就是白的，不是进步的就是反动的划分是不科学的。人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不这样简单，而且是可以变的，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进步的可以变为进步，对我不友好的可以变成友好；工作做得不好，伤了他们的感情，就是对我们友好的人，也会变得不友好。从总体来看，真正亲华的和真正反华的总是少数，大多数是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而想到

中国来看一看的中间派。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诉外国朋友，增进理解，解除疑虑。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待人以诚，不说空话假话，更不该板起面孔教训别人。

恩来同志还一直教导我们，和外宾打交道，一不要强加于人，二不要把话说死。有一次我们接待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根据日方提议，日程中安排了要在某地“参拜”一个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万人坑遗址。可是到了那一天，有几位客人一早就说要逛市场，没有去“参拜”。于是我们在总结报告中就说这几个人不按双方商定的日程行事，显然是有意避开，不承认中日战争是侵略战争，还对这几个人定性，说其中一个人在侵华战争中当过“随军记者”等等。恩来同志看了之后，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对此作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评价一个人的一言一行，先得设身处地想一想对方的经历和处境，一个代表团中，每个人的阅历、思想感情都不一样，这个人愿意的，另一个人可能不愿意，多数人欢喜的，也可能有少数人不欢喜，这种情况，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像参观万人坑这样的事，除了政治思想之外，还有一个感情上接受得了和接受不了的问题。不去参观万人坑。不讲“谢罪”或者“反省”，也不能断定他就是军国主义分子。要知道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的征兵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可能比国民党的“拉壮丁”还要厉害，至于作家和新闻记者当随军记者，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则是被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能用这个来划线。在战争时期，我们不是强调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吗？这个方针在对外交往中也可以通用。他们不去访问台湾，而来访问新中国，总该算是中间派吧，对中间派就是要团结、要争取，先要交朋友，然后才能做思想工作。先期定性，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革命派就是反动派，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他一再讲要求同存异，大同中有小异，在大异中有小同，连一点小异也不让人家存，那就不可能有对话，有外交了。

恩来同志一再告诫我们，在外事活动中，不要一叶障目，看形势不要一成不变。国际形势和外国的政局是经常起变化的，人的思想也会有波动的。天下没有一条笔直的道路，曲折和波动是难免的，要看大局，要看大趋势。把形势估计错了，把话讲死了，那就没有转弯的余地了。六十年代初，经过冈崎嘉平大和松村谦三的访华，中日民间贸易有了发展，在恩来同志主持下，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订了中日民间综合贸易协定（廖高贸易备忘录）。可是不久，大概是1964年吧，池田内阁为了安抚台湾，发生了所谓“吉田书简”事件，一项早已经日本政府批准了的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的协议被取消，一项造船生产合同也被撕毁。对这件事，连一向被日本人认为“知日派”的廖承志也被激怒了，可是恩来同志却依旧镇定自若。他说，中国建设要从日本引进设备和技术，日本是工业产品出口国，不会也不可能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中日贸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加上日本财界——特别是中小企业需要和中国做买卖，这是一个大趋势，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在，看来免不了要争论、要吵架了，但是你们不要把这个窗口堵死，不要把话讲绝。这是高瞻远瞩的预见。事实证明，池田去世之后，出现了亲台的佐藤内阁，但是中日民间贸易这一渠道并没有堵塞，还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以民间促政府，终于在1972年实现了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

“文革”之后，我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协会工作了几年。我遇到的外国朋友，不论是政界、工商界、文化界，凡是和恩来同志有过交

往的人，都以一种敬佩之情，众口一词地称赞周恩来总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且有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亲切动人的魅力。有一位冈崎嘉平太先生和我谈起初次会见恩来同志的情景。他说：我虽则搞过多年的外贸工作，但对新中国的情况不了解，我最初以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世界上的共产党都是一个模样的，可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惊奇地发现他和日本共产党完全不一样，他是那样的坦率、真诚、机智而又潇洒，我对新中国的看法一下子就变了。当然，有同样感受的外国朋友很多。宇都宫德马说，我和周恩来总理初次见面，谈了几分钟，就觉得他是我的朋友，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森德拉尔也对我说过，要是世界上多几个周恩来那样的政治家，那么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至于在美国，敬佩他的人就更多了，斯诺、史沫特莱、索尔兹伯里，还有尼克松、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之前，恩来同志在接见一个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一个长发披肩名叫库恩的美国大学生突然袭击：“请问总理先生，您对美国的嬉皮士有什么看法？”这一意外的提问，使美国的领队惊呆了。可是恩来同志却和蔼地对他说：“青年人对现状不满，为了寻找真理，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会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年轻时也试探过各种各样的出路……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之后，觉得不对了，那就会改变的，你说是吗？”这几句话折服了这位年轻人，他友好而诚恳地笑了。

恩来同志为祖国、为人民、为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地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他看到了林彪的折戟沉沙，却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和新长征的开始，可是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如日月经天，春风拂地，教育和滋润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沿着他走过的足迹而奋勇前进。

1989年

怀 念

浪荡江湖，历五十年，忙忙碌碌，不知老之已至。

五十多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条艰险而曲折的道路。雨雨风风，千山万水，在坎坷的长途中，有人落荒，有人迷路，而大多数人还是揩干了身上的血迹，跋涉前行，终于盼到了旭日在东方升起。路是人走出来的，披荆斩棘，靠的是理想和勇气，而要让年轻并缺乏经验的人们走上正路，则必须要有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

今天是 1985 年的除夕，广播中传来了《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这首流传了两百年的歌，还是那样激动人心，我想起了几十年来共过患难、共过欢乐的战友，更想起了一位几十年来教育我们、领导我们的伟大人物——周恩来同志。想起他，我们的心感到温暖，感到振奋，想起了 1 月 8 日这个黑暗的日子，我们的心感到酸痛。岁月流逝，他离开我们已经整十年了。

我关上了收音机，闭上眼，陷入沉思。想起 1937 年 7 月和他第一次见面，想起了长沙大火前夕他那种指挥若定的情景，想起了香港沦陷前夕他从重庆发来的几封急电，想起了 1962 年他在广州对科学家和戏剧家所作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当然，我永远忘记不了雾都重庆的曾家岩、化龙桥。如仰高山、如沐春雨，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一种广博深挚的爱，爱真理、爱祖国、爱人民、爱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演员，爱有一技之长的小人物。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要和那些“刺头”和爱顶撞的人交朋友，责备和训斥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只有交上了朋友，人家才能和你说真话。……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崇高的品质，用这种力量和品质，他团结了千千万万可以为革命和建设尽力的人。

我——我们这一代人永远忘记不了 1976 年 1 月 8 日这一天，永远忘记不了在刺骨的寒风中排立在十里长街向他告别的那一情景。这是亿万人民对他的哀悼，亿万人民对他的出自衷心的爱，这种衷心的爱化成一场烈火，这就是真正的“化悲痛为力量”。烈火燎原，封建法西斯的妖魔鬼怪的末日就到来。

他给我们党——也可以说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了一个榜样，留下了一份取之不尽的精神财产。

我想，怀念他，最重要的是向他学习，即使学习到一点一滴，他也会在九泉下向你含笑。

1985 年除夕之夜

追念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同志在福建长汀就义，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可是他的声音笑貌，他的一言一行，却还像昨天的事情一样，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和秋白同志发生工作关系，记得是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夏之交，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我介绍的同志并没有说出他的真实姓名，可是几次谈话之后，彼此心领神会，就知道他是《赤都心史》的作者了。大家都能回想得起，一九三一年前后正是狂风暴雨的时代，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在这样一个时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出乎意外的安详。态度很舒坦，布置工作很细致，这恰恰和同一个时期的某些同志的激昂、焦躁、乃至若干轻率的态度，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同时，大家也都能回想得起，秋白同志来参加文化工作的领导，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正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汽和仇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他从来不谈个人的事，不谈过去的事，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之下，他永远是那样的爽朗、愉快，丝毫没有感情上的阴影。他的这种高度的党性，高贵的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那种旺盛的斗志，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在对敌斗争中的高度警惕性，是在许多日常琐事中可以体会得到的。“一·二八”战争前后，环境险恶，他搬了几次家，很难有一个安定的写作时间，可是他不仅翻译了大部的著作，写了许多指导性的论文，并且还利用一小时半小时的时间，写了许多配合当前斗争的杂文、山歌和“小调”，记得有一次他到爱文义路普益里的我的寓所来接洽工作，我不在家，他就利用等我的半小时时间，写了一首通俗的山歌。当我回来的时候，他指着当天报上的一条社会新闻很愉快地和我说：“这是每天在报上都可以看到的很普。通的新闻，可是，只要改几个字，安排一下，就是一篇控诉性的文艺作品。”

开会的时候，听旁人发言的时候，他常在小本子上或者纸片上写上一些奇怪的文字。最初我以为他写的是俄文，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一贯主张的汉字拉丁化拼音。他说：“这有两种好处，其一是记得快，其二是包打听不认识。”说着，他禁不住笑了。他笑得那样的悠闲，那样的天真！

“一·二八”战争之后，一家电影公司约我、阿英和郑伯奇三人去当编剧，我把这个问题提到会议上讨论。有几位同志不赞成，他也迟疑了好久。他问：“就是你们三个？”我说，他们还打算请几个年青的话剧演员。他忽然想到另一个问题，说：“我们自己真应该有电影，可是现在还有困难。将来一定要有。”

最后他做了结论：“好吧，不妨试一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停顿了一下之后，他讲了一句意义深长、使我永远不忘的话：“但是，你们要当心。”

这就是说，要我们提高警惕。

电影是阶级斗争中最犀利的思想武器，敌人决不会让我们轻易地夺取

的，因此，我们的“困难是很多的”。同时，从他的话中，我们也体会到，当时的所谓电影界，情况是非常复杂的，除出官僚资本已经插手进去之外，还有商人、流氓以及对我们没有社会经验的新文艺工作者说来是十分危险的腐化堕落势力。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当心谨慎地开始了夺取电影阵地的工作，第二年，一九三三年，组成了党在电影界的第一个小组。

从仪表，从谈吐，乃至从他日常生活来看，秋白同志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常常穿一件灰色的哗叽袍子，平顶头，举止斯文得很，善于欣赏各种美好的东西，读到一篇好的文章他会反复背诵，逢人介绍，可是，当接触到工作，接触到理论斗争，他就一变而为一个淬厉无前的勇猛的斗士。他的文章辛辣锐利，又是娓娓动人而富于说服力的逻辑性。他有几篇短文用化名在杂志上发表，许多读者都认为是鲁迅的作品。

秋白同志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旺盛的斗争性和高度的责任感。在反对所谓“第三种人”的斗争中，对于胡秋原、苏位这一类人的“理论”，秋白同志采取了完全“不在话下”的蔑视鄙视的态度，对他们作了无情的、极其尖锐的揭露与批评，可是同时，对于这种在当时也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动理论在群众中可能发生的影响，却作了足够的估计。他的文章理路清楚，例证确切，通俗易懂，就是为了让大多数理论水平不高的读者与能够看懂。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来解释、宣传和鼓动，我以为这就是秋白同志的文风的特点。

秋白同志就义已经二十年了，但正如杨之华同志所说，秋白同志并没有死。纪念他，学习他，继承他的事业，从他的遗著中得到鼓舞和滋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粉碎思想界、文艺界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责任。

1955年

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解放了，被叫做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解放了。

我们是五月二十六日从丹阳急行军赶到沪西的。在交通大学被蚊子咬了一夜以后，第二天清晨，乘坐市内派来的公共汽车进入市区。在沪西一带，我们看到工厂、民房都没有受到破坏，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发起进攻之前，陈毅同志曾不止一次下过命令：部队行进，不得践踏庄稼，进攻的时候，要克服一切困难，不得破坏工厂、民房，乃至教会、庙宇。

我早已听过不少关于陈毅同志的故事。在抗战时期，在香港、广州，不少同志和我谈过他在赣南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在重庆，王若飞同志和我谈过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上海，许多从新四军出来的朋友和我谈了数不清的他们那位敬爱的陈军长的佳话和逸事。但是，我还是在上海解放的前三天，才在丹阳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因此，不论是开会，或是向他汇报工作，我总是问一答一，问二答二，难免有些拘束。上海解放后一、二天，有一次上午，我到他办公室去，他正拍着桌子对一位军官大发脾气。他说：入城前的政策教育都忘记了吗？对待俘虏和起义人员的政策忘完了？当了这么多年兵，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忘记了？他重重地拍着桌子，大声地叫：两条，立刻办。一是写书面检讨，二是向那个被你打的旧警察赔礼道歉，等那位军官退出之后，他才坐下来和我谈话。他说：你们这批文化人，也要进行一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学习，当然，你们不会拿人家的东西，打人骂人，但是你们这支“文管会”的队伍中，也有一些第一次进入上海的乡巴佬，因此，特别要教育他们讲话要和气。上海是一个花花城市，要教育他们“不准调戏妇女”。这一下，紧张的气氛就消散了。

有一次，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后，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服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说：西服也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这段话不仅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而且使我对他的拘束也完全消失了。

大概是六月一日或二日，他要我、姚滨、于伶、黄源和另外几个人去开会，主要是要我们筹备尽快召开一次全上海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他说：这个会本来应该在和资本家谈话之前召开的，但也还不大迟。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人多一点不要紧。我准备跟他们谈谈党的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解放区来的党员和地下党的党员的团结，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的团结，你们这些过去在上海作工作的老地下党，和解放前在上海工作的新地下党也要团结。在不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因此特别要注意。“团结”这两个字，要体现在你们开的那张名单上。第二天，我们商定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他逐行逐业地问，我们遗漏了的，他都一一加上，名单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人。

经过朋友们的协助，我找到了一份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的《解放日报》，对于这次会议有一条简单的报道。当我看了这条消息中参加者的名单的时候，感慨万千。因为其中不少人今天已经和我们不在一起了。为此，我想花费一点篇幅，把这条消息抄录一下：

“上海市政府于五日下午二时假基督教青年会邀集文化界举行座谈会，这是上海解放后文化界第一次盛大集会，也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多年盼望的一天，到会的有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游艺等各界代表吴有训、周仁、陈望道、周谷城、潘震亚、罗宗洛、陈鹤琴、茅以升、钟伟成、杨铭功、冯德培、涂羽卿、曹未风、金仲华、陈石英、徐森玉、周予同、蔡尚思、张孟闻、杨卫玉、冯亦代、杨刚、李平心、谢仁冰、张大伟、赵超构、浦熙修、王德鹏、张明养、冯雪峰、巴金、郭绍虞、梅兰芳、周信芳、黄佐临、陈白尘、熊佛西、陈鲤庭、吴蔚云、赵丹、蓝马、石挥、黄宗英、秦怡、袁雪芬、刘开渠、庞薰琴、张乐平、陈烟桥、陈秋草、周小燕、谭抒真、沈知白、董天民等一百六十二人。……陈毅市长即在热烈掌声中起立讲话。陈市长首先对在反动统治下坚持正义斗争的文化界，致以亲切的慰问。继分析目前革命形势及上海解放的重大历史意义，最后对共产党的文化教育等各种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在这次会上，陈市长一口气讲了四个钟头，他的话是那样的深刻、具体而又幽默、风趣。有人说，听了这次报告之后，上海的文化界就成了“陈毅迷”，我想这不是假话。陈毅市长讲话之后，有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讲了话，例如去年逝世的吴有训院长，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三番要把他送到台湾去，而他终于巧妙地拒绝了的故事。据说还有一位第一流的外科医生，就是因为听了这一次陈毅市长的报告而下了争取入党的决心。

上海，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据地，国民党也在这个地方经营了几十年之久。因此，尽管我们对于接管上海文教界已经有了具体的政策，而且由于地下党同志向我们提供的材料，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也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但是接触到具体人事问题）那就的确是很难以处理的。上海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在政治界，有清末民初的政客，有日汪时期脚踏两头船或三头船的人物；在学术界，既有学有专长、专心做学问的学者，也有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闻人”，因此，当你接管一个学校、一个报馆……的时候，就有很多很难处理的问题。为了这些问题，有一天，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和文化局的人，主要是“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同志，去向陈市长请示。他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就说：你们提的这些认为难以处理的人，我听说都是有名人物，“知名之士”嘛。这些人，一不限蒋介石到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就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有爱国心，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而且还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这件事对我们说来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也就是凭着这个指示，我们才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上海的接管工作。

接管上海文教工作中，文艺团体和游乐场所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上海本来是一个消费城市，有几十家戏院、电影院、书场、游乐场所，而这些单位在当时可以说都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党内外都有

不同意见。有的主张禁一些戏，有的主张把美国电影院一起没收，还有人主张“杀鸡给猴子看”，在游艺界抓几个明显的反动分子。在这个问题，陈市长有过一段极其精辟的指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估计真正做到符合工农兵的要求，需要十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三十万人没有饭吃，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那时候你再跟人家谈工农兵，人家就会打破你的脑壳。把什么都反掉，批评几句，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逐步地改，就不容易。”我们按照他的指示，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办法。当时有人问，曲艺界还有少数有血债的人，也还有一些有可疑的现行活动的人，该怎么办？陈市长很快他说：你们把这些材料如实地写出来交给我，交政法部门处理。

“五四”运动以后，陈毅同志就在北平领导文化工作，又到过法国。他对话剧、电影、西乐有兴趣。因此，有些他参加的晚会上，我们很少安排戏曲、民族音乐和杂技等节目。他有一次特别对我们说：你们管文艺领导的人，一定要心怀宽阔一些，趣味广博一些。譬如，我是四川人，对川剧有兴趣，但我不能在上海单提倡川剧。这方面你们不要有成见、偏见、个人爱好，要有群众观点。上海有这么多人欢喜评弹、越剧，你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并对他们进行帮助。他还不止一次主动提出邀请上海著名的民族音乐家沈知白、卫仲乐等同志个别谈话，或听他们的演奏。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人，要对各个剧种均无偏见，这确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为着贯彻他的这个指示，我曾不止一次进行过剧烈的自我思想斗争。

陈毅同志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元帅，但他又是知识分子真正的贴心人。他懂得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知道他们对国家、民族所起的作用。他敢于为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的知识分子鸣不平。一九五二年广州会议，他讲了“脱帽加冕”的话，就有不少人反对，一在外办开会后，他对我说：我把在广州讲的话原原本本地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有人不乐意，可能你讲话中某些地方走了火吧。他很高兴他说：这个问题我不怕。

在上海解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像我这样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近二十年的人，对于他的回忆是一时写不完的，他对我们的教导和启发也是一时讲下完的。有一次，我在医院碰到他，他问我：你看什么病？我说：老年性冠状动脉硬化。他笑着说：恭喜恭喜，我也有心脏病，这是最好的一种病。马克思一叫，坐上直升飞机就走，是没有苦痛的病。患上癌症之类的病那就麻烦了。不幸的是，他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我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一篇论文，说癌的发展和扩散，和患者的心情大有关系。我想，假如没有林彪、“四人帮”等搞的所谓“二月逆流”和“外交部夺权”之类的事，那么，他决不会在一九七二年就离开我们的。那时，我还没有恢复自由，连抚棺一恸的机会也没有，实在是太可悲了。

在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新长征日子里，要是我们的好市长还能和我们在一起，还能领导我们前进，那该多么地高兴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该多么地高兴啊！

1979年5月

纪念潘汉年

二十六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情况下，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原始资料，核对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记载、来往电报和大量的人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党中央于今年9月1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志《All》和主编了《幻洲》。

1928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

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二十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一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正和这之后一大段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

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宝山路三德里All号，所以他们就用“All”作为刊物的名字。

祖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

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联”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从1929年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笙、冯乃超等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

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况下出生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冯乃超、沈叶沉等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出版了许多进步杂志。由于他的机智精干，受到领导上的重视，从1930年起，他还担负了“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过，所以他有許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有一次他去找杨杏佛，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笑着说：“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民大会，十五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之后，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书记职务。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者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前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

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哲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关于这件事，1978年8月我写了一篇《杨度同志二三事》（见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其中有几句话：“到上海后，他（杨）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

二十年代他在创造社时，干的是捆书籍、跑印刷厂、邮政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叫他“小伙计”。到三十年代，他已经可以和杨杏佛、杨度这样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个人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叫“小开”。“小开”上海话是小老板的意思。

这之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协定。1934年底他参加了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领导同志化装经上海、海参崴去苏联。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派他回国，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整个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与尊严，谈判未成，他回返延安。

1936年“西安事变”后，再次由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我再一次遇见他，是在“七七”和“八一三”之间的1937年7月中旬。当时，文艺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已成尾声，但是，由于1933年到1935年这二年中的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上海和大江南北的党组织遭到了连续不断的破坏，以致中央机关、电台、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等保存下来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战的党员，由于他的到来，才得到联系和团结。他熟悉上海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经他和李克农同志建议，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党员与必须长期隐蔽的地下组织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开始的时机，和“救国会”、“各界救亡协会”等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人合作，放手组织公开合法的救亡队伍（如“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转入内地和前线工作。同时，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大约是1937年9月下旬，潘汉年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这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出一张小报，国民党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最后，还是汉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会谈，勉强强决定了国共双方各出开办费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

“八一三”抗战开始时，陈诚、张发奎、罗卓英是淞沪前线二个兵团的指挥。

机关报《救亡日报》。这一段时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个月（他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这时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同时，他还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亲密真诚的“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这句话，是沈钧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刘少文同志说的）。

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两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由于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那两年时间，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民盟、民革、民进……等民主党派都要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刘长胜、刘宁一同志要在香港培训工会干部；东北解放区领导机关不断派人和来电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单就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三百五十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上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从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除了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地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

刘少文，当时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

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入选。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于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像“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不一一细说了。请问：在这样一个两军对阵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险拚死，为了哪一边？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实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时间内，向解放区送走了上百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能是“内奸”干的事吗？假若是“内奸”，那么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风，整个事情不就完全变样了么？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没有儿女，但是他有无数个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为党、为人民工作过来的战友。“潘案”发生，受株连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当然，在那个时期，在“左”风全盛的时候，不仅“下情不能上达”，连有关部门也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重审的。但是“潘案”的复查，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五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从1951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六年。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是属于早已过去的事了，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他冒过无数次危险，他见过许多大场面，他的“案子”来得那样突然，问题又那样严重，于是一这些年来，爱讲闲话的人就给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凡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还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个“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现在，真相大白，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他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来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

（“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现在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党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记住过去的教训，引为鉴戒，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这就是产生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的保证。

1982年11月23日

克农同志二三事

二月十日上午，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开会前夕，我正在开罗中国驻阿联大使馆和陈家康大使谈话，秘书送来一份当天的新华社英文电稿，“李克农将军九日在北京逝世”这条消息，顿时使我们怔住了。这真像是一个恶梦，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家康同志还向我问起他的健康情况，我们三个人——杜宣、家康和我，还谈了抗日战争时期在他领导下经历过来的许许多多惊险而有趣的故事，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他离开了我们，相隔万里，我们连抚棺一恸的机会也失去了。

我就在大使办公桌上写了一个唁电，但是在发出之前，我还下意识地踌躇了一阵，大突然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一星期前，我还在北京和他谈过话，——那一天他才理过发，气色很好，我握着手和他说：

“克公，开完会出去休息一下，近来身体……”

他挺起胸脯做了一个姿势，笑着说：

“身体健康，你看。”

“可不能大意啊，我看见你天天在开会，天天在小本本上写笔记。”

他敛了笑容说：“不这样行吗？这个会……”

我懂得他的脾气，把话岔开，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可是，有人要贴你的大字报呢，不听医生的话，三多，讲话多，看文件多……”

他发出响亮的笑声，抢着说：

“酒不喝了，也不能喝了。”

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从今而后，再也看不到他，再也听不到他亲切而严肃的声音了。

自从一九五七年那次重病之后，克农同志已经和死神搏斗了五年多了。那一次重病的恢复，连最有经验的医生也认为是奇迹。出院之后不久我去看他，他要我坐在他身边，第一句就是：

“老夏，马克思又把我打发回来了。”

——话依旧是那么诙谐，声音依旧是那么爽朗。我不相信他会死，可是他就这样的突然死去，不再回来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几年时间我们同在上海工作。在顾顺章叛变之后的那一段紧张的日子里，不止一位同志讲起过他的沉着、机智和勇敢，但是我和他没有见过面。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三七年夏，在半公开的中共上海办事处。最初我有点拘束，可是不知不觉之间，我被他平易近人的态度和风趣机智的谈话感染了。最使我惊奇的是他对文艺界情况竟是这样的熟悉，某人是哪一省人，某人在狱里用了什么假名，某人在上海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可以暂时隐蔽起来等等。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做向南京政府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工作，对每一个人，他都已经做了极其细致的调查研究了。

临走的时候，他要我等一等，同时对另一位同志做了一个手势。我以为他给我叫车，连忙说：

“不用，我离这儿很近，”

“不，先去看一看，弄堂外有没有‘狗’。”停了一下，加重了语气，和我说：“听说你是福将，在上海没有被捕过。但是，愈是这样，愈要当心。”

不要以为蒋介石会发善心。一边在放，一边在捉，即使国共合作了也还要格外当心。”

这是他对我的第一次教导，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由于没有被捕过，由于快要抗战，一种自满和麻痹的思想已经在我心里萌动了。

从一九三八年冬到皖南事变后，大约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我们都在桂林，这是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得最久的一段时期。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守，我和林林同志等《救亡日报》全体工作人员二十余人，突围经三水、肇庆到了桂林。不久，武汉沦陷，又有一批文化界人士撤退到广西。在当时，由于桂系军阀和蒋介石政府之间还有不少矛盾，于是，《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新华日报桂林办事处等进步文化机构，相继在桂林建立了据点。这样，当时还只有六七万人口的桂林，就成了西南大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尽管事隔二十几年，一闭上眼，我还能鲜明地回想起设立在桂北路二六号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全部情景。和重庆的“曾家岩五十号”一样，“桂北路二六号”是我党建立在敌人内部、被敌人严密包围着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这又是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后方联络中心，我党和华东、华南、乃至香港、海外的交通枢纽，和西南革命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前沿指挥所。克农同志坐镇在这个地方，十分紧张而又非常从容地领导着繁重的工作，并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当时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要求团结抗战的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甚至各种救亡团体内部的左中右之间，都有复杂微妙而又随时变化的矛盾。而我们这一群没有实际斗争经验而又主观偏执的知识分子，对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接触面不广，又自命清高，不愿意去和那些话不投机的上层人物来往。我们刊物的言论又只懂得直说自己的主张，而下善于利用各方面的矛盾。他就一再和我说：“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份。”他又说：“把腿放勤快些，把耳朵放长一些，多跑、多听，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怕脏……”然后纵声大笑起来，一边说：“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这些话直到今天，还回荡在我的脑际。

克农同志和我们相处的时期，总是有说有笑，和家人子弟一样，可是一碰到政治原则问题，他就坚持到底，没有丝毫的随和和妥协。有一次，《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对国际时事分析有政治性错误的文章，他跑到编辑部来，和我长谈了四五个钟头。这个时候，在他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严厉的）神色，在我的经验中是罕见的。

“不能把这张报纸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也不能把它估计得大小。《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西南、东南乃至香港，都把这张报纸看做党的外围，代表党讲话。那么你想想，把这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起多么坏的影响！”他耐性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了错误所在，然后正襟危坐地问：“怎么办？”

“明天再写一篇社论，纠正过来。”

“怎么写法？来，大家凑一凑。”

把社论搞好，已经很晚了。我透了一口气说：

“很好，我学会了不少东西。”

他看了看表，一本正经他说：“学会了东西，能不付学费么？快八点了，阳春面也不请一碗？”他站起来说：“好，我请。”

这样一讲，气氛立刻变了。我从心底里感到温暖，严师、益友和亲密的同志这几种概念，浑然一致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调查研究的重要，大家知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对于调查研究的态度、方法，对于调查得来的材料的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的核对，我觉得克农同志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我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在他的教导下，我开始“不怕脏”了，对话不投机的人，也渐渐可以谈得拢了。有一次，我和他谈起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和我的谈话，主要是这个军官对时局的看法。他仔细地听，用铅笔在拍纸本上记，听完了之后，想了一阵，然后问：

“你们之间……”

“现在，可以无话不说了。以前，只是泛泛之交，只听我的，不讲他的。后来，我对他很坦率，渐渐的熟脱了……”

“熟脱到……”

“连他家庭生活中的苦闷也和我讲了……”

“这很好，算是交上朋友了……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态度……”

“先很随便，后来越讲越激昂了。”

“在哪里谈的？”

“在报馆，我的办公室。”

“没有旁人？”

“没有。”

“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随身带了一瓶酒，一包花生和叉烧。”

“讲这些话的时候，喝醉了没有？”

“没有吧，他平常能喝一瓶白兰地。”

他想了一下：“假如喝醉了讲的，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酒醉吐真言’，另一种是借酒装疯，有意讲给你听。今后要注意这种情况，同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况下讲，可以有不同的涵义的。”

他讲的，是调查研究工作中核对材料真实性、可靠性的认真不苟的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对我来说，是教益很大的。我当时也在写写剧本，他的这些提问，我觉得对于真实地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对于描写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行为、声容笑貌，都是有很大的启发的。

就在我们在桂林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内，蒋介石反动派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爆发了新四军事件。一月十六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同地，强迫《救亡日报》发表这条反动命令和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在克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和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我跑到桂林新闻检查处去，和那位平时很客气地叫我“乡长”的姓周的处长办交涉，用“让不让登是你的特权，愿不愿登是我的权利”这个理由，一直磨菇到清晨三时。另一方面叫印刷所提前打好纸版，坚决拒登了这条“命令”和消息。这样，《救亡日报》的命运是决定了。我们烧毁了一些文件，草拟了一个《为被迫停刊告国人书》，在如磐夜气中，等候着暴风雨的来到。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报馆的客厅里和几位同志打乒乓，克农同

志悠然地进来了。我吃惊地停下来，问：

“怎么的，你跑出来了？”

“你们倒很悠闲哪！”他说，“打完了没有？找个地方聊聊。”

在我卧室坐定之后，我匆忙地问：

“办事处被包围了，你怎么能出来？”

他还是那样愉快而平静地笑着：“×××用汽车把我接出来的，大摇大摆，利用大鬼压小鬼呀。”

然后，他把门关上，放低了声音说：

“周副主席有电报来，要你立即撤退，还有长江他们。行营已经接到了白崇禧下的捕人命令。”

我愣住了。

“反动派的步骤已经定了，先取消桂林办事处，封闭《救亡日报》，然后再在重庆、西安动手。”他看见我有点犹豫，望着我说：“怎么，舍不得桂林的风景？”

“去哪里？”

“香港。重庆的进步文化人也已经开始疏散了。”

“报馆呢？”

“留下来，等到贴封条那一天。”

我沉默了。

“你放心，留下张尔华和林林料理后事，你还不放心么？桂系内部的意见还不一致，有人主张留一手，不做绝，就是好来好往，让你们走。”

“怎么走法？”

“坐飞机。”他在小纸条上写了一个人的电话号码：“先打个电话给他，然后直接去找黄××。你就说‘好来好往，后会有期’，就行了。一切给你布置好了。”

我按计而行，一切顺利，很快地就买到了机票。不多几天，我和韬奋、长江等同志就在香港会合了。

这件事，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是在我记忆中却还是异常的鲜明，他的声音笑貌——那种安详的态度，周到的安排，亲切的声音，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克农同志对自己十分严格，生活朴素，平等待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人传统道德中的最优良的品质。按习惯的说法，对他年高的父母，他是一个孝子。对赵瑛同志，他是一个最好的丈夫。对他的子女，他是一个既严格又慈爱的父亲……超乎这一切之上，他最大的特点是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的忠诚，和对同志及党外朋友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注，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如接春风，如沐甘雨，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他会和你辩论，他会给你批评，他决不是世俗的好好先生，他也会骂人，有时甚至骂得相当锋利，可是我接触过许许多多在他领导下工作过来的人，就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记住这些。提到他·总的印象是与人为善，和蔼可亲。——这是他的人德，这是他的党性。

克农同志去世了，他对革命的功勋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生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忆老友承志——《廖承志诗文钞》代序

一大叠《廖承志诗文钞》的清样，摆在我案头已经很久。廖茗（笃笃）要我替这本书写一篇序，催过我也不止一次了。可是翻阅他的每一篇诗文，都使我感到哀伤，他走得太早了！承志比我小八岁。假如他今天还在，正好是八十岁，但他离开我们已经整五年了。

提起笔来，数不尽的往事就浮映在我的心头。

1927年4月，我在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工作。当时在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李人一介绍给我一个刚从广东到东京的青年人，一身和服，穿着一双高高的木履，显得更瘦长了。他向总支部报到，自我介绍说，他是1925年在广州岭南大学入党的，还谈了一些国内情况，我给他登了记。直到他走了之后，李人一才告诉我，他就是仲悄先生的公子。那是“四·一二”事件之后不久，在东京的国民党发生了分裂，西山会议派砸了总支部的机关，我被警视厅传讯，接着就被迫回到上海，下一年5月，发生了济南事变，承志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组织留学生上街示威，被捕后也就被驱逐出境。

我和他第二次见面，是1928年8、9月间，在上海虹口吴淞路有恒路口蔡叔厚办的绍敦电机公司。这表面上是一家销售和修理家用电器的商店，实际上则是中共闸北区委书记的联络站。蔡叔厚是我的中学同学，留学过日本的电机工程师。青年时代就是杨贤江、胡愈之的同乡好友，所以他1927年入党之后，这家公司就成了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上海来的革命党人的掩护所和联络点。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住在这个地方。由于蔡叔厚当时没有政治色彩，又是一个“老板”，所以从日本回来的共产党人都把这家公司当作安全的落脚点。当时任闸北区委书记的郑汉先（陈德辉），也经常在这里约人见面和开会，廖承志到绍敦公司来找我，就是郑汉先带他来的。这时他已经西装革履，很神气了，所以我打量了他一下之后就对他说，“为什么不穿和服了？到这儿来，穿和服最保险，因为这一带的巡捕最怕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几乎每星期都到这儿来，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他还带些日本点心、寿司之类来请客，渐渐熟了，我和他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时他才二十岁，才华横溢，爱开玩笑，搞逗人的小动作，但显然还缺乏社会经验，不懂得旧社会的人情世故。他知道日本的事情比知道中国的还要多。所以蔡叔厚一再“传授”他防止特务盯梢的办法，和搞地下工作的技巧，我也对他说，碰到外国巡捕，你最好讲日本话，冒充日本人。他在上海呆了不久，就飘然到欧洲去了。直到1932年又回到上海，依；日在绍敦公司见面。这时他老练多了，但是爱开玩笑的脾气没有变，爱吃寿司和日本酱萝卜的习惯也没有变。

1933年3月底，蔡叔厚从特科得到消息，说廖承志和罗登贤被捕了，押在老闸捕房，宋庆龄和柳亚子正在设法营救，请了一位叫唐鸣时的大律师给他辩护。开庭那一天，特科还派人去旁听。据说在法庭上他很潇洒，还对法官做了鬼脸。关了不久，由于宋庆龄的营救，和他母亲何香凝逼着吴铁城给蒋介石打电话，就保释了。这之后无影无踪，后来才知道他到苏区去了。关于他的被捕和保释，《诗文钞》中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一篇是1933年8月他给柳亚子的信；一篇是他1981年为悼念宋庆龄而写的《我的回忆之二》。

抗战开始，上海沦陷。

1937年底，我和潘汉年一起到香港。大约是1938年1月，我们到跑马

地何香凝先生寓所见到了他。这时他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一方面协助宋庆龄、何香凝主持保卫中国同盟，向港澳及海外侨胞筹措经费，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及东江纵队，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共南方分局的负责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分局和香港工作委员会的全面工作。他是名副其实的华侨世家，仲恺、香凝先生在海外有巨大影响。他又在德国、荷兰做过海员工作。所以在五十年代后期猛吹“左”风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公言：“我这个人有千丝万缕的、切不断的海外关系。”从这时候起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四年。我们在广州、桂林办《救亡日报》，在香港办《华商报》，乃至在东南亚、北美办华文报刊，可以说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他支持和领导下办起来的。在这一段时期，他做了两件永远难忘的、也是任何人难以做到的大事：一是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为解放区军民募集了大量的资金、器材和医疗用品，动员和组织了数以万计爱国青年和文化工作者到解放区去学习和工作；二是在香港沦陷之后，在万分危急的环境下，和东江纵队紧密合作，舍死忘生地救出了四五百位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不但营救了中国人，也救出了大批国际友人（据《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统计》，救出了英国人二十名，美国人八名，印度人五十四名，丹麦、挪威、苏联、菲律宾人共七名）。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多的时间内，无一伤亡地进行了这一场“秘密大营救”，真是惊心动魄的创举。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是终身难忘的。

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之后，1942年4月，因叛徒告密，他在广东乐昌被捕，在军统集中营里关了四年。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二年，1946年1月，才获释放。同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时，我问他：“你一共被捕过几次？”他说：“数不清了，东京一次，德国一次，荷兰一次，这都是在海外。加上被国民党逮捕了两次，长征中被张国焘关了一次。”他扳着指头数算了一下，笑着说：“看来我这个人命中注定是要蹲监牢的。”关于长征中遭到张国焘迫害的事，他在悼念恩来同志的文章中只说被“监禁”，但当时和他一起被捕的朱光（五十年代曾任广州市市长）则对我说过：有一段时期承志是带着镣铐行军的。朱光说，要不是廖承志能画宣传画，能办墙报，张国焘少不了他，否则，早就和胡迪、曾中生一起被“收拾”掉了。

写到这里，又把《诗文钞》读了一遍。第一辑是诗词。他多才多艺，能画漫画，能演戏，能写没有八股味的文章，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一直不知道他还能写诗，写很不错的格律诗。他的诗从来没有发表过，也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因此我读了之后真的吃了一惊。他欢喜画人像漫画，开会听报告的时候也画。1961年“秀才”们在钓鱼台写反修文章时，他还把出席莫斯科会议时画的十几幅各国大人物的画像作了“内部展览”，他会演戏，在德国演过，在苏区也演过。我问他演什么角色？他很得意他说：“最拿手的是演反面人物，特别是丑角，假如要我演南霸天，肯定可以和陈强比高低。”他写了这么多诗，为什么一首也不发表呢？这是一个谜。读了他的诗，我深深地为他1942年在集中营中写的《沁园春·有感》和“文革”时期写的《六十生日自嘲》、《无题》和《一月十一日——三十年纪念也》所感动。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坎坷征途中他是一个顶天立地、无畏无私的战士，他爽朗、洒脱，爱开玩笑，不搞小动作，这是每一个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深知的，但是他对父母的敬爱，对姐姐、妻子和儿女的柔情——像一股幽兰似的清芬，那是只有读到他的诗词和书信，才能体会到的。

全国解放之后，他除当了一个时期的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之外，主要是在恩来、陈毅同志领导下做侨务和外事工作。这都是政策性很强、头绪纷繁，而又是“授权不多”的工作。可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干得游刃有余，非常出色。

从孙中山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起，经过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设，千万华侨对祖国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是我们党和民主力量对外宣传和争取外援的唯一通道。五十年代，侨汇还是新中国能够得到的最可靠的硬通货收入，可是到1957年刮起了“左”风，侨务工作——团结华侨和保护华侨、侨眷利益，就成了他不能不做而又十分难做的工作。这一段时期，他的心情也有点焦急和不安，可是他还是顶住了干扰，埋头苦干。

1960年冬，有一次他请香港新闻界吃饭，席间有人发牢骚，说搞侨务工作像走钢丝，在香港办报，对三年困难说真话不准，说假话又觉得对不住良心。廖做了个手势，压低了声音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前几天我们向陈老总汇报工作，也有人诉苦，陈老总火了，拍着桌子说，不尊重华侨，不保护华侨利益，只能说我们共产党人忘恩负义。”然后举起酒杯来说：“你们放心，出了问题，统统由我廖承志负责。”快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对我还是记忆犹新。

他出生在日本，在东京度过了不平凡的童年。日本人说他是“知日派”，有人说他“亲日派”他也不加否认。也正由于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本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缔交而拒不和新中国接触的时刻，他就成了沟通中日关系的最适当的人选。惟也不会忘记，中日民间来往，是从他和高崎达之助商定民间友好贸易协议开始的，中日文化交流，也是郭沫若和他与中岛健藏商定的。通过民间友好贸易打开一个缺口，通过民间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滴水穿石，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一条奔腾澎湃的洪流。在中日恢复邦交的时候，恩来同志讲了两句语重心长的话：一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希望日本政府和人民认真地从惨痛的“前事”中吸取教训；二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希望两国人民不要忘记为了建设这座友好大厦而辛勤奋斗了几十年的先行者。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协定缔结十周年，遗憾的是这位掘井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承志在侨务和外事战线上鞠躬尽瘁地工作了数十年，于公于私，他有数不尽、切不断的“海外关系”，他是一个知亲好友遍天下的人，上至国家领导人、党魁、部长、学者、艺术家，下至贩夫走卒，他的“友谊覆盖面”是宽阔无比的。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恩来同志要邹韬奋、范长江和我到香港建立对外宣传据点。韬奋为了找不到一个在香港有身份的“督印人”而发愁了很久，可是我们办《华商报》，承志却早已经安排好了由当时任华比银行帮办的邓文田当督印人和他的兄弟邓文钊当经理。原来，这两位邓先生是他的表亲。有一次承志和我在皇后道散步，一路上不断有人和他打招呼，而且都很亲热，短短的几十分钟，认识他的就不计其数。一问，不是他的表姐，就是他的堂兄。我当时不相信，以为他在唬人，直到后来读了他写的《我的母亲和她的画》，才知道他讲的一点也不假。这篇文章中说，“我母亲有十二个姊妹兄弟，她排行第九，即三个兄弟，九个姊妹，正是人丁兴旺。”解放后我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纳德，他递给我一张小条子：“请阁下笔下留情，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是我的表妹，人总是有两面性的。”

我讲了他的“友谊覆盖面”，讲了他的亲戚朋友遍及全世界，为的是想告诉读者一些可能是谁也察觉不到的事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卷起了一阵“出国热”，官员、干部、专家、学者、企业家、文化文艺工作者……想出国的人太多了，出国成了“美差”，成了“政治待遇”。成千上万人挤在一条窄路上，就免不了有争抢和推挤。在这股热浪中，高干子女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可是，直到他去世那一年，承志的儿女一个也没有出过国，不仅是他的儿女，连梦醒的女儿李湄，乃至李湄的儿女，也没有一个例外。他长期分管外事和侨务，他有权，他的权还相当大，他又平易宽厚，助人为乐，可是在原则问题上，”他是极其严格的——甚至可以说严格到了难以令人置信。

再过一个星期，6月10日，是承志逝世五周年的忌日。在坎坷的征程上跋涉了七十五年，为国家民族建了功，在一代乃至几代人中留下了深深的爱，他可以安息了。“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哀哉，我放下了笔。

1988年6月3日

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奠基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这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和一位缔交半个多世纪的良师益友诀别，悲痛之情是难以尽述的。

一九二三年，我作为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到博多去访问他，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豪放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九二六年他通过许甦魂同志寄给我一张戎装的照片，我知道他投笔从戎，成了北伐战争前线的英勇战士。一九二六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我从东京回到上海，经子渊先生从一本线装书中取出一张登载着《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雄文的报纸，当我看到：“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打倒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的时候，我清楚地认识到，他已经不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者，而已经是站在党的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痛击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这篇文章的力量和影响，不是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估量的。当时，蒋介石还有很大的欺骗作用，正是这一篇文章打中了蒋介石、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的要害，同时也擦亮了千万知识青年的眼睛。也正因为如此，在上海的刽子手陈群、杨虎，就千方百计地要置郭沫若于死地而后快。同年冬，他被迫亡命日本，过了艰苦的流亡生活，但是，他没有悲观，没有消极，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进一步攻读马列主义著作，他决不像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所宣传的那样钻进了甲骨文、青铜器和线装书的故纸堆，而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古代历史。有人说，这时期他过了十年的“书斋生活”，事实完全相反，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不仅和国内的革命斗争有经常的联系，同时还团结和培育了许多留日革命青年，创办了《留东新闻》，支持了“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部出版的《质文》等革命刊物。他曾计划全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但由于国内没有一家书店敢冒这个风险而未能实现。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克服了种种困难，毅然子身回到上海。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住所，当我们问他还有什么行李时，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的确，他一到上海，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和我几次到浦东、闵行去劳军，写下了《轰炸中来去》、《东西线归来》等激动人心的报告、速写。他创办了《救亡日报》，亲任社长。他团结了广大的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在他主持下，组织了三个战地服务队和十个救亡演剧队，到前线 and 后方去作宣传、服务工作。在这一段时期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出自内心的敬爱。有一次他对我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周恩来同志指示的正确。他说，周恩来同志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样，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是一个胜利。接着，他又回忆了一九三六年在东京的往事，他说，当林林同志第一次和我谈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时候，我是很难接受的。过了几天，当我看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后，我就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这，就是郭老坚定不移的党性。

上海沦陷，沫若同志决定离开上海，经香港赴武汉，组织上还决定我把《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复刊，在他临行前夕，我向他请示今后的办报方针，他毫不迟疑他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这是郭老高贵品质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我不能忘记长沙大火前夕的一段往事：广州失守后，我和《救亡日报》同人撤退到桂林，立即到长沙去向郭老汇报，可是赶到长沙，正碰到长沙大火的前夕，我到水风井，他正忙着第三厅的撤退工作，连坐下来谈话的时间也没有。第二天我去见周恩来同志，一见面他就说：你来得不巧，没有细谈的时间，可是，也来得正好，沫若同志离不开三厅，就请你护送于立群同志去桂林吧。当天傍晚，当我和于立群同志等离开长沙的时候，我满以为可以和郭老一见的，可是，真的是公尔忘私，他连送别的时间也没有。

皖南事变之后，《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把在重庆和桂林的文化界人士撤退到香港，而郭老却岿然不动，和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到香港后不久，收到他一封署名鼎堂的来信，他庆幸我们平安脱险，要我妥善地安排同人的生活和工作，他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很明白，“租界”指的是文化工作委员会，大树，指的是周恩来同志。

一九四二年四月，香港沦陷后我间道回到重庆，恰巧这一天晚上是《屈原》演出的最后一场，他兴奋地陪着我去看了戏，并一起到后台去看望了阔别多年的朋友。几天之后，周恩来同志在天官府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席间，对我们刚从香港回来的人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几十年的往事是说不尽的，全国解放后，郭沫若同志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在文学、艺术、科学、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是说不尽的。在缅怀他的功绩的时候，我还想沉痛地说，使郭老过早离开我们，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诽谤和迫害，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九七七年，在阔别了十多年之后去探望他，那时他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可是他还是那样亲切、高兴。当我们谈到全国人民为粉碎“四人帮”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一再表示了对华主席、党中央的爱戴和感激。大家知道，一九六四年江青一方面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同时又纠缠着他，妄想拉他当“梁效某顾问”式的角色，他毅然顶住了恶浪，可是愤想和忧郁使他身心交瘁了。于立群同志说：他病情恶化，正是一九七四年开始的。

“知公此去无遗恨，又见征途万马奔”。这是赵朴初同志《郭沫若同志挽诗》的最后两句，这两句诗，很好地表达了我们这些后死者的心情。他奋斗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留下了不朽的功绩，和病魔搏斗中，他终于亲眼看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覆灭，他唱出了“大快人心事”的壮歌，他又看到了科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一九二七年他在《哀时》诗中的预言：“神州原来是赤县，会看赤帜满神州”，已经实现了，万马奔腾的新的长征，已经开始了，他，可以毫无遗恨地安息了。

1978年6月

韬奋精神永留人间

我们亲爱的战友，伟大的爱国者韬奋同志，和我们永别，转眼已十年了，韬奋同志的病逝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七个年头，如果不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折磨迫害，韬奋同志就不会染上不治的癌症，因此他实际上是像李公朴、闻一多等烈士一样，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的。

韬奋同志逝世的时候才不过四十多岁，他实在死得太早了，假如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对伟大的和平民主事业，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有更光辉的贡献，他的病逝，实是中国人民一个巨大的损失。

但是韬奋同志是不朽的，他发的光和热，是长留在人间的。

人所共知韬奋同志短短的一生“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引自韬奋最后的著作《对国事的呼吁》）到了他逝世的前年，他到苏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他“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而“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直至病势很严重的时候，韬奋同志还是“心怀祖国，倦念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以上引号中语均引自《对国事的呼吁》）韬奋同志对于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这样子忠心耿耿，真如毛主席悼词所说的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地步。韬奋同志所呕的心血，绝不是白费的，在他逝世五年以后，他的心血和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人民英雄的鲜血所灌溉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花朵，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爱护培养下，“新中国光明的未来”已经成为现实，我们的伟大祖国已经成为真正独立、民主的、强大的国家，我们的伟大人民，已享受着高度的民主自由，现在我们正进一步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解放五年以来，每年逢今天，我和韬奋同志生前战友们到韬奋同志长眠的所在虹桥公墓去祭扫，我们带到墓前来的，不只是花环和花束，而且还用韬奋同志所热爱的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所获得的一年比一年辉煌的胜利喜讯，来向韬奋同志告慰。今天，当这个伟大爱国者逝世满十周年的时候，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第一部人民宪法草案已经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中国人民的民主生活将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假如韬奋同志今天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欢欣鼓舞，感到最大的满足的。如所公认，这部人民宪法草案是无数的革命烈士和人民英雄用鲜血写成的，而这里面就有韬奋同志一份在内，当我们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这件大喜事而欢呼的时候，我们更不能不记起韬奋同志的光辉业绩和不朽的精神。

韬奋同志的生平有许多令人敬仰和值得学习的地方，除了他的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之外，特别值得我们知识分子学习的，是他的永远而经常地联系人民、联系读者和勇于为人民讲话的精神。韬奋同志曾经说过：“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引自《经历》）由于韬奋同志永远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热爱人民，他二十多年来努力的虽是“用笔管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及进步文化事业呼喊倡导的工作”（引自《对国事的呼吁》），未能有机会到工农兵中间去，但通过他的“笔管”他做到经常地联系了广大知识青年，联系了广大的人民。韬奋同志办的是大众的刊物，他处处顾到一般大众读者

的需要。他也曾这样说过，他编这种刊物“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引自《经历》）他在他所写的文章里，说出了人民懂得的话，喊出了人民要喊的声音，特别难能可贵的他处理读者来信的高度负责精神。在他编《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的时候，他每天收到读者来信平均一百封左右，他感到看信复信“是一件有兴味的工作，是一种责任”，他“用全副精神答复”，他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虽然我们人民报纸的群众工作，已经和“生活”时代有所不同，但韬奋同志这种为群众服务、对群众负责的精神，将永远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榜样。也正由于韬奋同志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真诚地为人民服务，他以一个民主主义者走上战场，而终于达到共产主义者的前列。

对于我们文化工作者韬奋同志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也是很值得敬佩的。和韬奋同志熟识的朋友都晓得韬奋同志编刊物，办报纸，确是做到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的，他不仅力求内容的精彩和充实，选择文稿极为严格，而且也毫不忽略版面生动和活泼。他常常深夜在印刷所工作，有时还亲自校对，他尽力做到不让刊物错一个字，更不让刊物的出版迟一天。他开办书店，参加民主爱国运动，同样表现出这种惊人的负责精神，这是他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表现，这也正是他感人最深的地方。

韬奋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但他献身的人民民主事业，正在发扬光大，他的精神更将永垂不朽。让我们以学习韬奋同志经常地联系群众、对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我们的文化工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来纪念这位不朽的中国人民大众的朋友和战士吧！

1954年7月

忆聂耳

听到一个新作的歌曲而感到不满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聂耳。看到一个衒学的“音乐家”搬弄一套“理论”，而企图把音乐弄成神秘莫测的贵族艺术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聂耳。碰到一个“死抱住音乐”，而只怪听众不懂他的“艺术”的“天才音乐家”的时候，我又常常想起聂耳。聂耳是一个不自命为天才的天才，一个不将音乐当作法宝来吓人的作曲者，也是一个不卖理论而实际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真理的艺术工作者。

我常常逗起回忆，一回忆的时候就使人更觉得这损失的难以补偿，人们说，他是这次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初的号手，我却以为他所起的作用还要更本质一点，他在我们中华民族衰颓的干涸了的血管里面注射了适量的樟脑针和葡萄糖，而这强心和滋养的作用一直持久地延续到现在。

他替新中国的音乐运动开拓了一条正确的路，这是一条民众音乐的路，不是“音乐贵族”们的“贵族音乐”的路，只要中国革命是人民大众的革命而不是少数贵族的革命，只要我们创造中的新中国是一个劳动人民作主的新中国，那么一切企图和时代逆行的“音乐理论”必然的会到它们应该去的地方去的，聂耳在中国民族的心中永生，撼树的蜉蝣将会自渐于自己的愚昧与渺小！

1939年

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悼孙寒冰先生

孙寒冰先生的死，我的感觉是好像在喧嚣叻嚷的杂音里面，突如的少去了一个洪亮壮大的声音。在全中国向往真理，欢喜讲真话，听真话的人，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

提起孙先生，人们就会想起《文摘》，《文摘》这本小小的杂志，抗战以来在报导国际真实，善导全国舆论这一点上尽了如何伟大的力量，我只能说一句用惯了的话，无法可以估量。尤其是去年九月欧战开始之后，对国际问题说一句真话，就会被人用卑劣的心思来猜测，对第二次欧战性质的讨论，对苏联出兵波兰，对苏芬战争，被有作用的外国通讯社弄模糊了心窍的人，一时差不多完全拒否了对于真实消息的摄取，对于这种不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而从殖民地宗主国的立场谈话的人，我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在言论界作了相当孤独的斗争，而在这中间，“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和改善世界的诚”的《文摘》，变成我们渴求真理的读者的友军。孙先生是一个温厚的学者，知名的教授，过去曾以“十教授”宣言的原故，也许曾被许多人认为和政府非常接近，可是当他勇敢地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站出来“介绍”世界真实的时候，连他也免不了许多无谓的攻击，《文摘》六十八、九期，《编者几句话》里说“有人要求少登关于苏联的文章，因为中国人只爱听中国话”，甚至于有读者向我抗议：“不要为苏联宣传”。这一切都表示了虽则在这大时代里，讲真话还是一件如何困难的事情，被封建的毒菌和帝国主义的鸦片损坏了脑筋的人，对真理还是如何的避忌与恐惧啊。

但是，“具有了追求真理的热和改善世界的诚”的人，是不会在这黑暗前面屈服的，在前面引用过的《编者话》里面，有沉痛而婉曲地说：

“我们选择文章，除了能够代表一定之言之以外，凡是分析实际情势的，我们决不因作者是世界名人而作选择标准，我们必须另有可靠的事实作他们的意见的后盾。即以苏芬战争而论，现在战事已经结束，欧战也终于扩大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这些铁的事实已足够证明《文摘》对这个事件的看法的正确，我们有充分的可靠的材料足以暴露这次战争的内幕，但其中有涉及我国友邦之处，在我国现在的国策下，是不能刊载的。在只能从报纸上得到路透、哈瓦斯、合众社的消息的读者，自然会发生上述的疑问。我们请求读者信任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

“在只能从报纸得到路透、哈瓦斯、合众社的消息的读者”对真实消息发生怀疑，这一点我们只该“知道责任的重大”，但是，几世纪来受了根深蒂固的殖民地主人思想的毒，而有意地不爱听真话和不准别人讲真话的人，我们感到的却半是愤怒，半是怜悯！“中国人只爱听中国话”，这一句话讲得不错，但是有多少人在讲中国话？有多少人能讲中国话，有多少人敢讲中国话，今天还是一个疑问。寡闻的我，觉得被当作“中国话”而“爱听”着的，只是殖民地宗主国主子传话人所讲的“殖民地中国话”而已！

一个宏亮勇敢他讲真的“中国话”的人，突如的从喧嚣叻嚷的杂音中消失了！纪念说真话的人，最好的仪式应该是今后自己听真话，讲真话，——第一是不要强迫别人讲奴隶擅长的假话！

为中国剧坛祝福——祝洪深先生五十生辰

今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中国新戏剧运动主要奠基者洪深先生的五十岁生日。

今天，战时陪都正迎着雾季剧运的高潮，抗战以来，新的戏剧也已经名符其实地形成了全文化运动中的最前列的队伍，发挥了最伟大的力量。中国话剧运动历史虽则还是很短，但它所走的却是一条很艰险的道路，因此在今天，看一看全国剧运的蓬勃，就使我们特别感到了过去二十五年来在寂寞中辛苦耕耘的前驱者的劳苦。

数到今天，为着中国的话剧（以及电影）的成长，洪深先生已经辛劳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年月了。他创作，他介绍，他译述，他为新的话剧培育了千百有为的干部，今天洪深先生著述等身，桃李竞秀，我们在此衷心地祝贺他长期的耕耘劳苦所获得的丰收。

尽管说五十岁还只是上寿的一半，但在中国话剧界，除出欧阳予倩先生之外，他是最年长的一个了，可是，和他接触的人，却永远感觉他还年轻。敢说，敢写，敢做，不稀罕留美戏剧专家、大学教授这些一部分人常常拿来炫人的“身份”。他从不自命清高。他也从不和现实世界的主潮隔绝，他斗争，他颠陨，但他从不懊悔失败，从不放过新的斗争。抗战前夕，为着团结抗战，他兴奋得像一团烈火，在庐山会议中，他是大学教授里最敢发言的一个，卢沟桥的炮声一响，他也是首先抛弃了大学教授的荣职，而投身戏剧宣传队的一个。翌年春，汪精卫逆迹渐著，举世侧目，在汉口某一次文化界茶话会中，他又是首先面对面地反对汪逆，痛击妥协分裂阴谋的一个。不是对国家民族有最高度的爱，谁愿冒这样的危难？谁肯做这样的傻事？洪深先生的热情、的勇敢、的关切民族国家的运命，在同时代人的文化工作者中，可以说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个。

他从不离开时代，从不离开社会，从不把自己和国家民族的运命隔绝，他永远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同忧喜，因此，从他的著作，从他写的剧本和电影，乃至从他的工作态度，他是一个彻底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他一定是有所为而写，有所感而写，为一个当前的问题而写，他将艺术当作工具，当作药方，当作街头演说的另一种方式，所以他的作品常常有一个不能隐晦的主题，一定“有几句要对观众和读者讲的话”，因此也就非常功利，功利到使雅高之士感到庸俗。——“置身于人民之中”的艺术工作者用“庸俗”的艺术来报效了国家，参加了抗战，用不恤在泥泞中打滚，在荆棘中潜行的精神，替中国新戏剧运动踏平了一条道路，建立了一个永远用艺术来服务于人民的传统，而清高的艺术家，遗世而独立的教授作家们呢？除出每一次都不放弃暴露他们自己的虚伪和愚蠢的机会之外，他们做了些什么？留下了些什么？

洪深先生的作品是雅俗共赏，洪深先生的为人是清浊兼容，他从无可欣赏之中发现他的欣赏，他从不能满足之中获得他的满足。他爱诡辩，他用诡辩来安慰自己，来激励他人，这性格使他安贫，使他乐观，使他不怕挫折，使他保持年青的热情，来继续他的工作。

中国戏剧界有一个值得夸耀的传统，这就是永远不渝的团结精神。洪深先生桃李满剧坛，交游遍天下，在今天，让我们来为中国剧坛祝福，将洪深先生当作戏剧界大同团结的一个主要的系带。

1942年12月31日

悼念田汉

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老朋友们见面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活下来就是胜利。”这是对的。活下来，才能看到林彪、“四人帮”的覆灭；活下来，才能看到新长征的开始。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走正路，人有人品，艺有作品，那么，即使人死了，也不会像林彪、“四人帮”所说的那样“永世不得翻身”。最近，党中央给被戴了四十三年“四条汉子”的帽子，被打成“三反分子”，而终于在十一年前离开了我们的田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开了规格很高的追悼会，吊者近二千人，当沈雁冰同志宣读悼词的时候，许多人流了热泪，这种情况不就说明，田汉同志虽则死了，但他还是胜利了。

“五四”之后不久，我就看到郭沫若、宗白华、田汉三人合作的《三叶集》上田汉写的文章。两年以后，一九二三年，我在日本念书，翻译了一本有关戏剧创作的小册子。由于上海没有熟人，就寄给他介绍出版，但一直没有回信。过了一些时候，我回到上海，到日晖里去看他，他根本忘记了这件事，说没有，记不清楚了。我以为一定是寄丢了。可是不久，我在书店里看到了已经出版的这本书。到良友图书公司去一问，在他们的本子上明明写着：此稿由田汉介绍，翻译者所在不明。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往，这件事也很能表现田汉的性格。

我和田汉的再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四年。那也是暑假时，我回到上海去看他，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把我一把抓住，让我坐在一张藤椅子上，说：“别动，要拍电影。”原来，这时他正在和一个俄国人合作，拍一部叫《到民间去》的电影。我去找他，正好成了送上门来的临时演员。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上银幕。自此以后来往多了，也通过信。在我心目中，田汉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作家，特别是他写的那些剧本，如《获虎之夜》，使我很受教育。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我回到上海，搞了两年工人运动，和他没有来往，但也看过一次南国社演出的戏。一九二九年冬，开始筹备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蒋光慈同志提出邀田汉作为发起人。当时有人是反对的。但经过讨论，许多人说，田汉他不单单是一个人，在他的南国社周围，有一大批人，而且其中不少是革命的。这样，就由蒋光慈去征求他的同意。他非常高兴地参加了“左联”，当了“左联”的发起人，而且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在这前后，我和冯乃超、沈叶沉、石凌鹤等组织了一个“上海艺术剧社”，演出了一次话剧。当时，我们这些人中除去叶沉之外，几乎全是外行，而戏又的确演得不好，因此，当我知道彩排那天发了请帖给田汉、洪深、应云卫等人时，我非常担心，怕会受到不好听的批评。但是，看完戏之后，出乎意料的是不仅田汉，包括洪深、应云卫，都一致对我们表示鼓励。田汉并对南国社的一些朋友说：你们看看，他们搞得比我们好。这件事使我得到很深的印象。从一九二九年起，田汉不仅参加了进步的文艺活动，而且参加了进步的政治活动。他参加了“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了“互济社”。当时，蒋光慈正在和南国社的一位女演员吴似鸿谈恋爱，三天两头到南国社去，光慈又是一个善谈的人，因此，他跟田汉就每天谈到半夜三更，谈苏联的事，谈马雅可夫斯基，谈中国的革命，谈中国的话剧运动等等。不久，也就是一九三一年冬（据我的记忆），光慈告诉我，田汉已经决定申请入党。请记住，

三一年这一个年头，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而田汉，就是在这一个年头申请入党的。同时他还发表了长达数十万言的自我检讨，对过去的生活、思想、作品作了深刻的自我解剖。田汉当时已是文艺界知名之士，敢于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在“四人帮”时期有一些人写了不少很不光彩的东西，而直至今日还不敢作一点自我批判，甚至还在大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

田汉是一个有高度革命精神的爱国主义者，是一个英勇的革命家。但是，在革命队伍中，他却是一个很有特性的，也许可以说很不平常的人物。他最突出的特点，或者说是个性，我说叫作“无我”，他根本不考虑自己。不管他写书、演戏、办杂志、搞剧团，甚至于请客吃饭，在他心目中从来不考虑到钱的问题。有了钱，比如一本书出版了，拿到一点版税，就大伙用；用完了，没钱了，就大家掏腰包，买大饼油条过日子。有人说他们是法国的波希米亚式的文人，有人说他们是原始共产主义者。解放前，田汉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有人要他帮助，他无不乐意替他们出力。大概在一九三四年，有一天我正在他家里，一个朋友被捕，因此和他牵累的人被迫要搬家，没有钱，向他来告急。田汉想了一想，就说：“你等着，我去想办法。”不久，他拿来了五十块钱交给这个同志，说：“有了，够了吗？”原来是他的一个朋友、南开大学教授张蓬春正在计划陪梅兰芳到美国去，他就同张借了这笔钱。这就是一个例子。他不考虑自己，不考虑到社会上的一些必须要注意的事情，也常常会出一些所谓奇事、怪事，因此有人说他不懂得人情世故。在话剧界，“田汉请客”这句话，已经成为一句大家通行的歇后语了。比如，他身无分文可以邀许多人一起到菜馆去吃饭，吃了之后无法付账，就大家掏腰包来解决。有的时候，甚至于凑不够钱，留下几个人质，分头去找钱来付账。你说他有意这样做吗？根本不是的。他从来就没有考虑到请客吃饭要花钱这一件事。所以，“田汉请客”的下半句就是“得自己带钱！”

假如说有天才的话，那么，我认为田汉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诗才敏捷，这是谁都知道的。他可以随时写出一首非常精彩的诗来。写剧本也是如此。常常在一个晚上吃饭的时候，或者闲聊的时候，谈起某一个问題，一下他就说：几天之后你们来拿剧本。当然，他约的期限是常常不准确的。但是，他的确已经准备好了，并且想好了这个戏的主题、思想、人物、个性等等。他常常替演员写剧本，这在我也觉得是很难能的事情。有些演员找到他说：“老大，我好久没有戏了，请你给我写个剧本。”他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这样的事情很多，后来甚至成了一笔账，写在他的一块小木板上：某某上某某戏等等。甚至于在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搞艺华公司时，他可以为一位大力士专门写一个剧本。这种事情在戴白手套的有洁癖的知识分子中，是很难想象得到的，也是很难有这种本领的。

“五四”运动以后，文艺界分了两派，一种叫做新文艺派，一种叫做旧文艺派。既有新和旧，也有洋和中的问题，因此，在每一个艺术领域里面，都常常发生这种新旧、中外之争。例如美术界有西洋画和中国画，音乐界有洋嗓子和上嗓子的问題等等。有时甚至为这种问題闹得很不愉快。但是我总觉得在戏剧界，话剧和戏曲这方面，从来没有不团结的问題，应该说是团结得比较好的一个艺术部门。理由何在呢？我想主要是由于我们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即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他们三个人一方面都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创始者；而同时，他们又对于中国戏曲有比较深刻的研究、造诣和爱好。因此在话剧界与戏曲界之间就团结得比较好，争论也比较少。合作得是

很好的。

我小时候也看过草台戏，也陪着母亲去看过一、二次京剧，但是，对于中国戏曲完全不懂。特别是我在“五四运动之后，受了“把线装书丢进茅屎坑”的影响之后，对于京戏、地方戏一律采取不看、甚至歧视的态度。我还对人说过：听到大锣大鼓就感到头痛。可是，三十年代以后，田汉不止一次拉我去看京戏，说：多看春就懂了，懂了就欢喜了，但是，直到全国解放，我除了在四川、桂林一段时期，对于桂剧、川剧比较爱好以外，京剧、昆曲这样的戏，我是看了就会打瞌睡的。我的这种思想情况，田汉当然知道的。但他没有和我深谈过。到了全国解放，有一次他到上海来，就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知道全国有几个后剧团？全国有多少京剧团和地方戏剧团？我一时答不上来。他说：这个问题现在你应该仔细想一想了。我们都是提倡话剧的。话剧当然在对当前的教育意义上讲，作用比戏曲大，但是，我们这支队伍还是太小，我们的技巧也还很差。而京剧、地方戏的影响是大得多，这一句话使我想起了——一九四九年七月我离开北京到上海时，周恩来同志对我讲的那一段话，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对我说，你到上海，一定得先到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他们那里去登门拜访，不要请他们到机关里来谈话。因为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搞话剧的人大得多。我后来开始在这方面思想有了一点解放，这件事，他的这一段话，对我说来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田汉还有一个优良的特点，这就是紧密地和群众联系在一起，和他们同呼吸、共患难。不用说南国社时期以及左翼时期那种吃大锅饭，一起过困难日子的时候了，就是在解放以后，他当了艺术局长，当了剧协主席之后，还是不论对哪一个剧种，哪一位演员，或者剧团里的哪一种人，他都一视同仁，把他们当作兄弟姐妹，因此，没有一个人把他当作一个首长或者官来看待，而把他当作是一个敬爱的领导。一九五七年鸣放，他就是为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和为民请命这两个问题而挨到批判的。现在想来，他的主张完全是对的，他把每一个演员都当作自己的亲人、兄弟、姐妹，替他们着想，考虑他们的问题，而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他们的上司。这一点是有目共睹，谁也不能否认的。这恐怕也就是有这么多人参加他的追悼会，而听到悼词同时禁不住流下眼泪的原故吧。

人，总是有缺点有错误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田汉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他的自由主义（我说的自由主义不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性的自由主义，而是也许可以叫做过于积极的自由主义，就是不应该他去做的事情，他去做了；应该请示的，不请示，而先斩后奏等等，这类事，在他说来是很多的），但是，尽管如此，有自由主义和其他毛病，但田汉同志的大节是无愧的。在这儿我要说一说他在南京演戏的事情。一九三五年二月，江苏省委被破坏，阳翰笙、田汉同时被捕。最早被关押在龙华国民党监狱，和强盗、绑匪、小偷关在一起。几天之后，林维中同志带着田野去探望，他托林维中带回一张小纸条，要她交给我和孙师毅，纸上写了一首七律：

生平一掬忧时泪，
此日从容作楚囚。
安用螺纹留十指，
早将鸿爪付千秋。
娇儿且喜传书字，

剧盗何妨共枕头。
目断风云天际恶，
手扶铁槛使人愁。

这诗说明了他的心境和气节，我和师毅看了都感到非常宽慰和感动。不久，他就被送到南京去了。到了南京以后，由徐悲鸿、宗白华等同志保释，被软禁在南京。这件事现在已经搞清楚，我就不必多说了。那时正是华北事件的时候，他一出监狱就忍不住拿起笔来写戏，一连写了《械斗》、《回春之曲》等等，并派人到上海来邀演员到南京去帮他演出。这件事现在看来，最少应该说是一次自由主义，或者说严重一点，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因为他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过，就这样做了，尽管演的戏还是爱国主义的。由于他这么一演，在南京的报上又大为宣传，说国民党的某人去看了等等，于是上海就有一批人表示不满，特别是有人向鲁迅去说：田汉转向了，在南京大演其戏。我记得，在一九三六年春，有一次在内山书店碰到鲁迅时，他也对我表示过对这件事的不满，因此，我和周扬同志商量后，派一位姓曹的同志带口信到南京去（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写信是不方便的），劝他今后不要再演戏了。上海对他这种演出意见很多。后来这位同志回到上海后对我说：已经把意见告诉了田汉，他问这是谁的意见？曹答：这是周扬和夏衍商量后托我传达的。他就说：那么，我今后不演了。但是接着他又说：这件事我还是想不通。因为我写的戏就是为着抗战、爱国，没有坏处。而且，特别是在南京这个地方，没有人敢于演这样的戏，我有机会能够演，我就演了。既然组织上不同意，那么，今后就不演了。意思很明白，就是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他是有保留的。从这件事情来看，说明尽管他当时是入党不过两年的新党员，他还是懂得服从组织意见的。

田汉同志的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不仅是揭、批、查运动的一大胜利，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近几年来不少大学中文系都在编写或者编辑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和作家小传之类的小册子。有不少同志写信来问我，说田汉的问题不解决，不仅现代话剧史不能写，现代文学史也很难写。因为中国的话剧运动离开田汉是没有方法写的。现在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中国古来就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说法，也许由于这个原故，现在传开了“在批判会上无好人，在追悼会上无坏人”的说法。也许也就是由于这个原故，在我们中国的文苑中，有短篇、长篇、报告文学、戏剧、电影、涛歌、小品等等，偏偏没有看到过一部传记文学，特别是解放以后，这也许是因为不肯在传记中写上他要写的那些人的缺点或者错误以至于怪痛之类的情况吧，而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有些特点、甚至于有些缺点、短处，为什么不能写呢？为什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角度来完整地描写一个人呢？这是我再三想不通的一件事情。记得四十年代，洪深同志五十大寿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庆祝洪深五十寿辰的文章，我既写了他的爱国主义、民主思想，以及他的敢于斗争的一些英勇事迹，同时也写了他的一些缺点，甚至于严重的缺点，我还讲过他为人情浊不分这一句话。但是文章发表后，一般反映还好。特别是洪深还专门写了信给我，说只有你敢于能够说到我的本质，讲出了我的缺点、弱点叫卜常高兴等等。因此，我想，在今天的情况之下，在“三不主义”的情况之下，在我们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写人物的时代，是不是可以推广一下传记文学这一个品种呢？有人说不行，写传记，写古代的也许

好一些，写现代人，他们的子孙、朋友还在，可能会打官司。那倒也许可能的。那么，难道只能让中国文苑里面永远缺乏这一个品种吗？

1979年9月

忆阿英同志

一种强烈的时代思潮，一个划时代的政治运动，都会引导或者驱使一批青年人走上新的道路，而当他们走上新路的时候，也可能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也就是某种外因对他们潜在的内因起作用，使他们决定各种不同的工作。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阿英（钱杏邨）同志。他，就是使我此后半个世纪从事文化工作——特别是戏剧、电影工作的重要因素。

我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工的，学工，可能是从小就受到了“工业救国”这种思潮的影响，中学快毕业，被“五四”运动的狂潮卷了进去，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吸引我参加学生运动。办同人杂志，写些短文章，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可是一九二一年去日本，“工业救国”这个思想依旧支配着我，我还是考进了工科大学。二十年代初，日本正是左翼运动的全盛时代，先是读克鲁泡特金的书，后来又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认识了松本治一郎和大山郁夫两位先生，对“工业救国”的想法开始怀疑了，我参加了日本进步学生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一九二三年，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进九州大学，只不过是取得“官费”的手段，尽管似懂非懂地读了一点马列主义的书，可是在当时，主要支配我行动的还是“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个口号。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西山会议派砸烂了左派的国民党驻日总支部，我被列入了“通辑”名单，被迫回国，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秋天，我被编入中共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很巧，我参加的那个小组的组长就是钱杏邨同志，小组成员除我之外，又全是太阳社的作家，其中有孟超、戴平万、有时洪灵菲、童长荣也来参加。我们都住在杨树浦附近一带的工人区，搞的主要是工人运动。我当时入党才几个月，而杏邨同志则是一九二六年入党，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安徽领导过学生运动，在武汉搞过工会工作，认识许多党内高级干部的“老资格”。他那时住在下海庙，我住在唐山路，相隔一箭之遥。他写文章很泼辣，可是，他没有当时有些左翼青年那股霸气，所以不久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尽管我留日时期，曾向《语丝》、《创造周报》投过稿，认识郭沫若，回国之后又认识了鲁迅、创造社的郑伯奇、李初梨、冯乃超，但是我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都没有“社友”关系，一九二八年那场革命文学论战，我没有参加。因此，一九二九年冬，党中央决定革命文艺工作者联合起来，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把我从街道支部调出来参加筹备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很惊奇，我问杏邨同志为什么要我这个不曾写过一篇作品的非文艺工作者参加，他回答说，这是他和洪灵菲提出的，因为你认识各方面的人，又没有参与一九二八年的那次论争。我以非作家的身份参加“左联”，这就是我毕生从事文艺工作的起点。

我开始搞电影，学习写电影剧本，也是杏邨同志把我“拉”进去的。“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他来找我，说以《孤儿救祖记》等伦理片起家的明星电影公司要改变作风，请几个“进步作家”当编剧顾问，由他建议，由郑伯奇、他和我三人参加，我和他一起去请了当时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得到组织同意，我们三人在明星公司当了三年顾问，写了一些电影剧本，并参与了联华、艺华、电通等电影公司的工作，不久组成了党的电影小组。据我记忆，杏邨同志写电影剧本，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一九三五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救亡运动席卷全国，而在这一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上海文艺界也有少数人以“左”的面貌出现，反对联合抗日，甚至到“西安事变”前后，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公然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毛主席亲自领导、周副主席坚决执行的伟大的战略决策。这时，杏邨同志奋然而起，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耐心说服一些不明事理和受欺骗的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了规模空前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同志了身从日本回国。杏邨同志当了郭老的得力助手，和我们一起，创办了《救亡日报》。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餐地跑前线、写报道，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上海沦陷前夕，在周副主席直接领导下，上海进步文化工作者一部分人赴延安，去敌后，一部分人组织“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等等，到前线和大后方进行动员、服务、宣传工作。当然，在沦陷后的上海——这个有几百万爱国人民的“孤岛”，也必须有一批坚强的战士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坚持战斗。杏邨同志，还有梅益、于伶同志等，英勇地担当了这一“在荆棘里潜行，在泥泞中苦战”的任务，他办书店，出刊物，并以惊人的精力，用魏如晦的笔名写了《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等八个宣传爱国主义、发扬民族气节的话剧剧本。八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汪伪刽子手和蒋介石特务的层层包围中度过这八年，坚韧地奋斗八年，其艰难困苦，是不难想象的。这一时期我奔走在广州、桂林、香港、重庆，每想起在孤岛奋战的旧友，常常夜不成寐，我曾写过一个剧本《心防》，借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佩和忧煎。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在九月初赶回上海，才知道他已于一九四一年冬到苏北解放区去了。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我从香港回到北平，再次和他见面，而这次见面，却又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我于五月五日到北平，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要我和许涤新等同志尽快到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总部报到，随军进入上海，并指定我负责接管上海文化机构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十四日清晨离京南下。可是十三日傍晚，正当我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接到周副主席的通知，要我晚九时到中南海开会。当我准时赶到会场的时候，意外地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周扬、阿英等同志。周副主席对大家说，全国解放的日子快要到了，现在就得准备好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化艺术大军的会师问题，团结问题。他听了大家的情况汇报，然后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全国解放后党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具体方针，他说：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工作者，是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一支强大的部队，必须把大会师、大团结工作做好。中央决定，今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全国文学艺术界的代表大会，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包括现在海外文艺工作者的统一组织，现在该开始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次会议从十时一直开到黎明。最后，周副主席对周扬、沙可夫同志说，解放区——主要是西北、华北、东北、中原各解放区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由你们负责联系；对我说，上海、西南、广东、香港和海外的文艺工作者（这时他特别关切地问到当时还在美国的老舍同志），由你负责；又对阿英同志说，上海、新四军所在地区的作家、艺术家你都熟悉，现在就可以开一个可以参加会议的入选名单。周副主席着重指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面越广越好，必须包括戏曲、曲艺界的代表人物。他对我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

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话剧演员大得多。他加重语气对大家说：只要不是汉奸、特务、反共的顽固分子，即使在旧社会沾染了坏习惯，政治上有污点的人，只要他们今后愿意为人民服务，拥护新政府，都要团结他们，让他们到北平来开会。临别时，还和大家一起照了相，可惜，这张照片在十年前被抄走了。

第一次文代会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召开，那时，正是接管上海文教机关工作最紧张的时刻，我不能参加这次盛会，好在杏郊同志都有详细的日记。

杏邨同志是一个对人谦和，律己谨严的人。他平易近人，热情诚恳。他善于在各种不同的处境中团结朋友，打击敌人。因此，不论在上海，在江淮、盐阜，在烟台，在大连，在天津，都有一大批文艺、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团结在他的周围，共同战斗。也正由于他善于团结人，乐于助人，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都把他看成最可信赖的朋友。因此，在上海沦陷后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他能始终和各阶层人民群众保持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也正由于他的这种优良品质，他才能在刀丛中保存了方志敏同志的遗稿和其他革命文物，出版了黄镇同志的《长征画集》（原题《西行漫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做别人不能做的事，这是杏邨同志一贯的“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从二十年代起，杏郊同志战斗、工作、写作了五十年，“著述丰富，达七十余种，包括文学研究论文、杂文、文艺史、小说、剧本等。”其实，这只是一个估计数字。解放后他曾和我说过，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在上海时期，用各种笔名写的杂文、速写、歌词、唱本，以及未定稿的作品，和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九年在新的四军时期写的论文，有的散失了，有的来不及整理，都未包括在内。我粗略统计过，在抗日战争时期，剧本写得最多的一是郭沫若，二是钱杏邨，在全国解放后，剧本写得最多的是老舍。“文化大革命”前，就曾有人不以为然地把他们三位称之为“多产作家”，我曾说，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揭露独夫民贼汪精卫、蒋介石，写得多，不是对民族、国家贡献更大么？为了歌颂新社会，教育人民不要忘记过去，写得多，不是对新社会、新制度贡献得更大么！当然，说“多产”，也带有多而不精的意思，那么，据我所知，杏郊同志写作品，也不是草率成章，一挥而就的。记得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妄图“反攻大陆”的时候，我曾问他是否可以把《海国英雄》改名《郑成功传》，重新上演？他说，那个剧本是在成了“孤岛”之后的上海上演的，当时的环境使我不能不写得比较隐晦，加上有些历史事实，也还得进一步核实。这件事说明，杏邨同志的写作，首先是紧密的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为革命服务的，其次，他的写作态度，是认真严肃的。

特别使我感佩的，是他留下了他在新四军时期用蝇头小楷工整地记录下来的一部完整的日记。这不仅是一部近代文学史上的主贵资料，而且，从这部日记，也正说明了杏邨同志治学处事的严谨。

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阿英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一年了。他和我是“世纪同龄人”，共过忧患，同过欢乐。去年今日，当我向他遗体告别的时刻，悲痛之中，也暗自替他庆幸，因为他经过顽强的斗争，没有死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之前，而死于历史给林彪、“四人帮”作了判决之后，他不仅看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看到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他在重病中终于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及其大小余党强加于他的一切诬陷之词，党和人民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他历尽艰险，奋斗了五十年，他，

可以含笑地安息了。

1978年6月

于伶小论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闭上眼，仿佛可以看见一条漫长而险阻的道路上，一个怯弱，可又是那般悲壮的求真和求美者的姿态。颠跪，挫折，无情的嘲笑，一时的迷失，荆棘刺伤他的肌肤，崎岖磨损他的脚底！可是他摸索着，行进，没有丝毫的反悔。历史吝啬了他应该得到的积蓄和遗产，但是在殉道的求神者，也许过多的行囊反而是他累赘的负担。他选择了的是一条怎样的路子，我们善良而谦逊的作剧者是明白地意识到而且是作为骄矜的：

“……自己既是爱定了演剧这迷人的武器的艺术——决心学习写戏编剧，失败了可以重来，跌伤了我会支撑的。因为自己还年轻，自信有着充分的勇气来接受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武器只有在锻炼与使用中才能具备与发挥其战斗刀的。”

——给 Y·S·（《花溅泪》代序）

怯弱，多感，疾病和贫穷老是紧缠了他，先天的具备了旧时代儒生的谦让与息事宁人的心情。而后天的环境与教养，偏又使他养成了知识分子的洁癖，接触到这位善良的作者和诵读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要是这位作者早生这么一世纪，那么他也许可以是一个恬淡飘逸，倘佯山水和歌啸林泉的隐遁之士吧；早生这么二三十年，那么也许可以是一个佯狂歌哭用诗酒来排遣他“国民孤愤”的南社侍人吧！再说，要是他少年易感的时代不接触到“五卅”，一九二七，“九·一八”，“一二·九”，那一浪猛于一浪的时代的怒潮，他所处的环境不是北平，一个有着“五四”革命传统的地方，他所私淑的只是唐诗，定庵诗和梦窗词，而更找不出一些新的支柱来作为他灵魂的依傍，那么也许，他可以是一个“忠贞”于“艺术”的“驾”，而决不会那般悲壮地“再度生涯潜地下”吧！

“自己爱定了演剧这迷人的武器”之后，“学剧九年”在我们这位多感的诗人已经是一连串困苦的争斗，从感伤的哈孟雷特到悲壮的堂·吉河德，这中间不是没有脉络可以追迹的，最触目、最感人，也是我们这位作家所最值得使人珍贵的，是他洋溢着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使他同情弱者，人道主义使他憎恶强暴，人道主义使他带着不愉快的心情来正视现实，也是人道主义，使他从现实社会的矛盾苦恼，怀疑追索而走向了学习一种可以解决这一切苦恼和矛盾的理论。于是，一个诚实而单纯的青年求神者，发现了新的神，发现了他灵魂的新的支撑点了。因为他是敏感的知识人，所以他珍视理性；因为他是朴质的人道主义者，所以他开始了对真理的热烈的追寻；更因为他处身于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他亲自目击着和身受着内内外外的，精神和物质的对于人性的真和美的迫害和版杀，于是他把自己爱定了的艺术作为武器，而开始不计成败地战斗了。

一位值得尊敬的批评者和剧作家李健吾先生，在《夜上海与深渊》一文中接触到对于我们这位作家“最有影响于他制作的物质和精神的作用”，举出了四点，就是：

“第一：贫弱的身体。

第二：诗情的心灵。

第三：锐敏的感受。

第四：乐观的信仰。”

于是他说：“这未一点，或许是于伶先生在最恶劣的心情和最困难的环境之下，能给以不断的创作的坚强的支柱”。我同意这个观察，信仰使他乐观，使他挣扎，使他废而再立，伤而再起。但是，使他今天，最少在今天，支持这乐观的信仰的，还是由于他的同情，他的人道主义，换句话讲，信仰成为了他肉体 and 灵魂的支柱，而这支柱的着力点，依旧是知识人的善良，多感，和人道主义。

由于他的出身，由于他的教养，由于他生来退婴的心情限制了他热情的奔放，而只能默默地在内心烧的的个性。更由于他从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走向殉教般的革命者的径路。由于他目前担当的工作和接受的生活，我们今天正不必替作者讳饰，他获得了的世界观今天依然还只是他灵魂深处的一根有力的“支柱”。世界观使他脆弱的时候得到支援，世界观使他颓丧的时候得到补强，但，支柱终于还不是灵魂的本体。

在这苦难的中国，在这苦难的当代，尽管不能和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同时代人比拟，但是把中国知识人的遭际，和过着牲畜一般生活的中国人民大众较量起来，终于还是属于得天独厚的部分。于是，由于生活，由于在现实社会中的遭际，真真处于社会底层的勤劳大众和知识人之间，在对事象的观察，在内心迸发的要求，就有了不相同的方向，前者喊出来的是“我要”，而后者感觉到的却是“我有责任”，和“我要对得住良心”！对于这种感情的表达，我们的作者自己是说得很清楚的：

“为了戏剧，为了自己爱定了的演剧艺术，我愿意而月决定了出生入死出死人生地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尤其是 孤岛受难的戏剧运动里面！我将不计毁誉，不论成败，但求尽我心，竭我力，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合作的志同道合者，对得起戏剧艺术者的本份与良心！”《女儿国》序（《雪中废话》第十四页）

我们没有权利和必要来要求一个知识阶级的作者违背自己的良心和感情而急速地去迎合另一种人群的口号，我们也毫没有企图过低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和理性。对于我们论及的这位作者，恰恰相反，我们要求的正是要有更深和更广的人道主义，和更有机地和自己感情融合了的理智。只有具备着全副心肠的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作家，才能不沉溺于自己狭隘的情操，才能使自己眼、心、脑看到感到和想到更广泛的地方，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和世界人，而全心全意为着受难者群的遭际而歌哭，而争斗。也只如此，才能把自己坚定起来，不会在挫败的时候“怯战”，不会在寂寞的时候伤感。更进一步，也只有如此，才能溶化理论成为自己的血肉，浸润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汇合同时代人的苦痛为自己的苦痛，才使他自己的灵魂壮健起来，能够巍然独立，再不需要“理论”这一根机械的外在的支柱！

也许我们已经化费了过多的篇幅于空疏的绪论，但，在我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我们从善良恬淡的“读书人”由于理智的掖导而未成熟地走向了人生残酷之战场的文艺工作者，理与情的未能浑然合致，也许正是一件普遍存在而不很自觉的现象。在我们这一辈的知识阶级，在性质上，“理”本来

是“情”的推力(push)，而在自然界，电压(voltage)先导电流(current)也正是应有的事情。可是，我们在此不能忘记，电力(power)是电压与电流之“积”，而决不是电压与电流之“和”，所以艺术作品感人的力量，应该是理与情的浑然的一致，而决不是情加理或者理加情所能做到的事了。现在，假如某一特定阶段的一个作者在他作品中所能发散的感人力量是一个定数，而我们在这限度之内要有更多的光，更多的热，那么很明白，问题不是放任他的情的泛滥，相反，在这儿应该强化和更强化他理的强度和压力了。具体一点说，就是更深的思考，更广的感受，更真挚地关心全人类的命运，和更严肃的斗争与生活。

在我们论及的这位善良的作者，情与理的未能达到融和是一个容易发现的现象，——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直到今天，他理论上的认识依然还是他的灵魂的一根外在的支柱。因此，在他短时期内辛苦制作了的许多作品中，因为在他灵魂深处还留着这么一点小小的企图合致而终于未曾合致的乖离，所以发于情者大都为珠玉，而急于理者大部为赘瘤。我们在此已经不需追溯尤兢时代的作品，从《夜光杯》到《江南三唱》、《血洒晴空》，就是在他大踏步地走向了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后的《夜上海》、《大明英烈传》，我们也能容易地发现，作者常常委屈他的人物，不使他从他们特定的身分、地位、环境和某一特定的时代氛围中行为、讲话，和得到归结，而常常借用他们，而由自己来代替他们说理。当然，这常常表现于作者与戏剧搏斗最剧烈的场合，不能胜之以情，乃图胜之以理。这也许是转形期内的必然的现象吧。

对于这位自谦为“学剧九年”的作者，不幸得很，即使是较为亲密的朋辈，也已经很少能够知道他初期的作品。但是，从尤兢（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到于伶（一九三七——），无可否认的他有了一个飞跃的——值得刮目的成就。看了《夜上海》（一九三九）和《大明英烈传》（一九四一）之后，再去回溯一下《汉好的子孙》（一九三五）和《夜光杯》（一九三六），这是一个如何显著的进展啊，从性急的呼喊到切实的申诉，从拙直的说明到细致的描写，从感情的投掷到情绪的渗透，很奇妙，一个笔名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竟象征了这位作者的再出发和新生，当然，这进展是不能用奇妙这两个字来解释的，第一，从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六，作者获得了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未能充分溶解与消化，而这一个时期也正是焦躁和窒闷的时代；第二，一九三八以后，使他蛰居在上海，责任和良心使他负起了“孤岛”剧运最艰苦的工作，而一股情势又逼他学习了“沉默，肯定，确信，坚持”和“站稳岗位，保蓄力量，稳扎稳打，埋头苦干”的作风和气派。

把一个具有知识的洁癖和善良人的息事宁人之心情的作者抛掷在“沦陷了的上海”这泥泞的战场上作战，这是一件残酷的，可是在他创作生活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一方面上海磨折了他，上海也孳乳了他。他学会了战斗，接触了“浅俗”。他懂得了千万上海市民的心，他真实地从浅俗的材料中去提炼惊心动魄的气韵，使他完成了一种“诗与俗的化合”的风格。使他写下了令人不能忘记的迂回曲折地传达了上海五百万市民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意志的作品。但是另一面，由于要在上海这环境中创建一个同时兼备“小剧场”性的戏剧的质，和“大剧场”性的观众的量的剧场，为着要在商业竞争极度的强烈的“娱乐”市场上使新的戏剧能够占有一个继续性的地位，我们的剧作者也不能不“为营业，为观众着想”，而助长了他在作品中放任那种种“涉

笔成趣，涉笔成刺”（孤岛市民同时需要着趣和刺的）的“繁花茂叶”的滋长。《夜上海》第四幕的云姑与冯风这线索的发展，《大明英烈传》第四幕的两头蛇这一角色的出现，都是一方面为了迎合上海这特殊的环境，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抑制对于恶的谩骂，和对于笔墨之游戏的适例。要一棵大树高而且直地成长，生长期内是需要删剪繁枝茂叶的。在此，对于结构的更紧密的把握，和对于成趣的题材的无情的割爱，为着作者更大的成就，也许在技术上是当前重要的问题。

求神者求得了他的神，摸索者找到了他的路，而在本质上，我们的作家又正是前途灿烂的弥琢弥珍的浑金与璞玉，让我们祝福他，更热情的斗争，更诚挚的生活，更艰苦的磨练，他，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成就来激励润泽滋养我们这民族的心的！

妄言多罪。这算是备忘录式的试论。

1941.7.香港。

《长夜行人·于伶传》代序

我同于伶同志最初相识是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他从北平调到上海左翼剧联工作之时，至今已近六十个年头了。他一生几个重要时期，除去早期剧联北平分盟那两年我不清楚以外，其余在上海、香港、重庆和抗战胜利后及解放后的上海，这几段，我都同他在一起，或长或短，患难相依，甘苦与共，是老朋友、老伙伴、老战友了。再过两三个月，他就满八十五周岁，我则已过九十，都已到垂暮之年。然而回首前尘影事，六十年陈迹依然历历在目。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戏剧运动，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他奉命于危难之际，带领一批同志坚持“孤岛”的戏剧岗位，苦斗四年；“皖南事变”后撤退到香港；太平洋战起，香港沦陷，他经东江游击区转到桂林；后来又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到重庆继续从事戏剧运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工作了三年，国共和谈破裂，他又经香港到北京，参加南下大军，接管上海文化事业，并且不遗余力地参加创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一九五五年以后，风云突起，我们两人都被“潘汉年冤案”株连。我因为已调到北京中央文化部，写个材料就算完事；他在上海则遭到柯庆施、张春桥一帮人的打击，“罢官”靠边十年之久。“文革”中，又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坐了九年监狱，受尽摧残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给他平反，尽管老骥伏枥，尚有千里壮志，但毕竟无复有当年的精力和豪气了，风风雨雨，平白地使一位有抱负、有能力、有才华的党员戏剧家，闲白了少年头！

我一直以为，于伶与其说是一位顶果累累的剧作家，毋宁说是一位毕生献身于革命文艺运动的老战士、组织家和社会活动家。很多时候，他充当幕后人物、无名英雄的角色。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戏剧运动是很艰难也很辛苦的，党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拿出多少钱做文艺事业的经费。搞话剧更是既赔钱又受气，还要冒坐牢杀头的危险。而于伶总是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将许多杂事都担当起来。他工作出色，尤善于“打乱仗”。他又能广泛地同文化界许多上层人士、著名的戏剧家、电影家、教授学者以及社会名流打交道、交朋友、取得他们的帮助，将他们吸引和团结到革命、进步的旗帜下，成为共产党的知心朋友。二三十年间，在生活和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可信赖的、可爱的戏剧电影队伍。在这些方面，于伶的贡献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要发展，永远需要一大批埋头苦干、不什名利、任劳任怨、不尚空谈的实干家，也永远需要能以平等态度待人、能以身作则、甘于作幕后人物和无名英雄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作为骨干，任何事业都不会成功。

于伶的一生，伴随着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以至整个革命运动从艰难创业到发展壮大的坎坷曲折的历程。他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样，经受了几十年风霜雷电、血火刀剑的考验，流过汗，流过泪；追求过、挣扎过、痛苦过、欢乐过。然而，他们上下求索，九死不悔，始终朝着既定的目标迈出坚实的步伐，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在香港写过一篇《于伶小论》，开头说：“一闭上眼，仿佛可以看见一条漫长而险阻的道路上，一个怯弱、可又是那么悲壮的求真和求美者的姿态，颠跪、挫跌、无情的嘲笑、一时的迷失，荆棘刺伤他的肌肤，崎岖磨损他的脚底！可是他摸索着，行进，没有丝毫的反悔。”那是刚刚进入中年的于伶形象。三年后在重庆，郭沫若同志赠他诗中有一句：“长夜行人路不迷”，可以说是于伶一生的写照了。

十年前，《于伶戏剧电影散论》出版时，我说过这样几句话：“我没有调查过，现在三四十岁的戏剧工作者中间，有多少人知道王国维、焦循；有多少人知道欧阳予倩、洪深；有多少人知道春柳社、南国社？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不知是不是也可以说：忘记或者不想了解祖国历史，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懂或者不想懂中国现代戏剧史，不了解二三十年代、抗战时期、‘孤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业余剧人’（当时，除了极少数国民党办的剧团之外，戏剧界几乎全是‘业余剧人’）的艰苦，要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国戏剧的传统和风气，我看也是困难的。”现在，我想再补充几句：今天的戏剧电影工作者，有多少人知道田汉、阿英、于伶、宋之的、司徒慧敏、应云卫、赵铭彝、石凌鹤、王尘无、陈白尘……的战绩呢？没有他们的血汗，披荆斩棘，开辟蒿莱，何来我们的今天？我们在开拓新的路程走向未来时，怎能忘记或者不了解前人的脚印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支持《长夜行人·于伶传》的写作和出版。这不只是于伶一个人的传记。这里面是我们许多人的影子，也有我们许多人的笑声和泪痕。今天的戏剧电影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朋友，都需要这样的传记。本书作者袁鹰是我的一位忘年交，我最早认识他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文艺青年，在姚苏风、冯亦代主持的《世界晨报》当编辑。上海解放后在《解放日报》，以后在北京《人民日报》，我们一直有往来，如今他也是鬓发苍苍、渐入老境了。他写这本书以前，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一开始就表示支持。

我还说过：写于伶的重点，应该放在“孤岛”时期和解放初期这两段。看来，他是接受了我的意见的。

我五十年前的那篇《于伶小论》，是在香港那特殊的环境中写的，本有许多言不尽意之处，多年来却常常被研究中国戏剧史和评论于伶剧作的朋友们所引用，使我常感歉疚，于伶和袁鹰都不止一次对我说：“那么你就再写一篇‘大论’如何？”从道理和私交上说，似乎都责无旁贷。但以我目前的体力和视力，已经力不从心，写“大论”谈何容易！如今只能趁《于伶传》出版的机会，写几句比“小论”还要“小”的话，想来于伶和作者都能予以谅解的吧？遥望江南，不尽依依。

1991年寒冬于北京

《欧阳予倩文集》代序

今年5月，是欧阳予倩同志百岁冥诞，为了纪念这位戏剧界的元老和中国话剧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央戏剧学院编纂的《欧阳予倩文集》六卷，即将由广西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值得庆幸的事情。

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按年龄，欧阳今年一百岁，洪深九十五岁，田汉九十岁。欧阳予倩出生那一年光绪帝载泥亲政，张之洞呈请筹建京汉铁路，广东建了第一个兵工厂，洋务运动开始，洪深出世那一年，发生了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覆灭，翌年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求和，缔结了辱国的马关条约。田汉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的时刻。欧阳和洪深都出生于宦宦之家，而田汉则是一个道地的农家子弟。门第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的童年都处身在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时代，都亲身受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爱国图存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欧阳予倩于一九〇九年赴日本留学，下一年就碰上了日本文部省“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目睹了陈天华投海自杀的悲剧。一九一七年他参加了曾孝谷等发起的春柳社，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端，但这出戏是外国小说的改编，写的是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问题，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则最早是一九一五年洪深写的《卖梨人》、一九一六年写的《贫民惨剧》，和差不多同时欧阳予倩写的《运动力》，这些剧本都演出在“五四”运动之前，那时候，按田汉的说法，他们都还是“使酒纵马，豪气凌云，疾恶如仇，高喊炸弹炸弹的艺术青年”，可是中国话剧一开始就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就关怀到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生活，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传统。

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覆天翻的时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段苦闷、彷徨、探索和挫折的过程，但是历史安排得很巧，一九二二年，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这三位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在上海汇合了，忧国忧民、反对不合理的；日社会、要为平民鸣不平，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要为戏剧事业而奋斗终身。他们之间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就不那么平坦了。他们都有过不同的幻想和尝试，也有过不同的成功和失败，他们三位自从一九二二年缔交之后，一直合作得很好，很久，可以说是生死患难之交，但是，在话剧运动和创作实践中，他们之间也不是没有分歧和争论。从一九三〇年田汉、洪深加入了“左联”和“剧联”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予倩和田、洪之间就不止一次发生过面红耳赤的争论，正如田汉所说：“予倩和我与洪深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回溯一下予倩和我的关系，完全不合作的时候是没有的，他到过英、法，两人苏联，而且参加了第一届苏联戏剧节，他很容易用欧洲和平时期的技术水平来要求我们的抗战演剧和革命戏剧，他常常批评我们的话剧演员不会说话，这话说中了要害，为了提高我们话剧的艺术水平，完全应该加强演员们在语言方面的基本训练，但是他却把技术问题绝对化了。……当时我们许多戏剧工作者都是因为要革命、要抗战而搞上戏剧的，换句话说，多半是‘半踏出家’，很少是戏剧学校出身的，过度强调正规训练，就不能不引起矛盾。”从这种分歧出发，就形成了一场当时出现在重庆和桂林的所谓“磨光派”和“突击派”的论争。予倩强调艺术，强调基本功；田汉则强调任务，强调为革命和抗战而突击；洪深呢，我看是介于两者之间，

他是美国戏剧教育家贝克的入门弟子，他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他一方面坚持写剧本要有章法，排戏要有程序，但由于他是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所以他有时搞“突击”，比田汉还要勇敢，他可以三天五天赶写一个剧本，可以临时上台，串演一个角色。抗战前夕的《盐鱼主义》，是我逼着他在一个晚上赶出来的，一九四二年的《黄白丹青》，是他要我给他写了一个故事梗概，然后大笔一挥，不到三天就写出来的。在思想上，爱祖国、争民主这条红线把他们绑在一条大道上，但在艺术实践上，赶任务和求质量——也就是搞突击和重磨光又使他们不断地发生争论和分歧，现在看来，问题是已经是很清楚了，说到底，这也就是二十年代以来直到现在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任何一个艺术家在政治与艺术之间有一点偏倚是难免的，对此，田汉后来在替予倩的文集作序的时候说得很诚恳：“我们从来不是轻视技巧的，但我们更多地看重政治任务所在，所以不借日以继夜地把戏剧突击出来，因此我们被称为“突击派”，而予倩的艺术观则代表着所谓“磨光派”，谁不愿把自己的艺术磨得更光一点呢？只是我们不主张为磨光而磨光，我们是主张在突击中磨光的。……我们和予倩虽则在桂林的一家三教咖啡馆楼上为艺术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我们的观点显然慢慢的接近了，我们的矛盾很自然地解决了。”欧阳谨严，田汉豪放，洪深则是“雅俗共赏，清浊难分”。这样三位各具个性和特点的戏剧家“既合作又不合作”了几十年，这就是一部中国话剧的创业史。

戏剧在中国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而后剧（易卜生模式）则从春柳社算起，也还只有八十年的历史，引进一种崭新的外国艺术样式而要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然要经过一个探索、尝试、融化——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与旧、创新与传统之间的撞击和斗争，文学方面有新诗与格律诗的斗争，美术界有西洋画与国画之争，音乐界有西乐与国乐、乃至洋嗓子与土嗓子之争，这种中与西、新与旧的斗争，甚至或明或暗地持续到建国四十年后的今天。和其他艺术相比，中国传统戏剧（京剧、昆曲和各种地方戏）的潜力最大，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最深，可是值得我们惊奇的是，回顾一下话剧从引进到现在这八十年的历史，传统戏剧和话剧界之间，却很少有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话剧运动的这三位奠基人——欧阳、洪深、田汉都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戏剧有根深的造诣和理解，予倩不仅学过和演过京剧，二十年代就和梅兰芳齐名，有北梅南欧之誉。田汉在幼学就对湘剧和京剧有兴趣，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办艺术大学和“南国社”时，就结识了周信芳、高百岁，二七年办“鱼龙会”，曾约周信芳、高百岁和唐槐秋等联合演出了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洪深曾说过，他从小就爱看京戏，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曾和赵景深教授研究过昆曲，参加了“南国社”之后，就和周信芳有了深厚的友谊，戏剧界可能还记得，解放初期，他在怀仁堂和梅兰芳、周信芳同台客串过一台京戏。由于此，整个话剧界不论从南到北，从欧阳、田、洪到曹禺、焦菊隐、马彦祥、吴祖光，直到现在，不仅没有人反对过传统，而且一直和京剧、地方戏工作者相互借鉴、团结合作的，不反传统并不等于保守和泥古，他们都因为革新京剧和地方戏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必多说了。

予倩同志治学谨严，同时又谦虚好学，我感动地读过一篇他晚年的自述：

“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我是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我自己肯定我一直为此奋斗了一生。我当过演员，当过导演，写过剧本，搞过研究工作，搞过话剧、歌剧、地方戏，这一切都是为了运动。有错误那是水平所限，但我一生为戏剧运动没有退缩过。过去曾和田汉、洪深同志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这是在运动中常有的事。在那个环境中就是闯，乱闯，在总的方向上我没有妥协过。在广东一段，从我的作品可以看出来，那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向往民主。在广西我所排的戏完全为了抗战，我自己写的戏，也是为了抗战。”

欧阳予倩同志为中国戏剧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是名符其实的戏剧大师，优秀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电影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毕生从事戏剧教育，早年在南通办过伶工学校，在广东办过戏剧研究所，在桂林办过广西艺术馆，解放以后他创办和主持了中央戏剧学院。他重视戏剧的基础教育，曾亲自制定形体教材，亲自为学生示范排演，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为新中国造就了大批戏剧人才。他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革命事业，对戏剧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给后辈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怀念袁牧之同志

今年是袁牧之同志八十寿辰，但是，他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为进步的戏剧电影事业辛勤地工作了近半个世纪，他在晚年又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值得庆幸的他是在一九七八年去世的，他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他盼到了改革开放的曙光，党和人民确认了他对话剧电影事业所作出的劳绩。

一九二八年，我就看过他在辛酉剧社演出的话剧，当时他已经是一位有名的演员了。辛酉剧社是朱穰丞同志主持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话剧团体，他们提倡“难剧运动”——就是演一般人认为难演的话剧。他们演过契诃夫、戈果里的话剧，他们重视表演艺术，强调从实践中提高，因此当时也有人说他们是“为艺术而艺术”，可是到一九二九年，朱穰丞和袁牧之同志在思想、政治上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九三一年他们同时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从这时候起他就全心全意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一九三一年，朱穰丞同志毅然抛弃了美满的家庭，秘密地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小剧场工作。因此袁牧之同志也不止一次向我提出，希望能到苏联去学习。三十年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一九三二年以后，革命话剧不能在剧场演出了，他就不顾危险，经常到学校和工厂去作巡回演出。一九三三年党领导的电影小组成立之后，他和郑君里、金焰、白杨、赵丹等同志先后参加了进步电影工作，他主演了《生死同心》、《桃李劫》、《马路天使》、《风云儿女》等影片，解放后，成为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抗日战争开始，在上海的戏剧电影工作者大部分都参加了“抗敌演剧队”和“战地服务团”，而袁牧之同志则得到了潘汉年同志的同意，悄然地去了延安。接着他参加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拍摄了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一九四〇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这部纪录片的后期工作，他到了苏联。这时朱穰丞同志已在苏联大清洗中牺牲，又碰上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艰难地渡过了五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回到东北解放区，他是解放区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全国解放前夕，我才在北平和他重新见面。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第一任电影局局长，为新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袁牧之同志是一位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艺术大师，他重视表演艺术，严于律己，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我清楚地记得，他看了《风云儿女》样片之后，和司徒慧敏一起来找我，对于他自己的表演深感不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完全重拍是不可能的，我们和摄制组商量之后，只能作了部分的重拍和剪辑。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最伟大的变革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牧之同志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艰辛跋涉，为了探索一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而奋斗终生。一九五二年他离开了电影局之后，病魔一直缠扰着他，文化部还接到过他的病危的报告，但是在“文革”前夕，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给我看了一份已经写了几十万字的电影剧本。他还是孜孜不倦地在写一部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当时就有人说他“不合时宜”，“自不量力”，但他那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对我还是记忆犹新。

我因病不能参加今天的集会，讲这几句话，聊表我对这位一起工作过几十年的老战友的怀念和哀思。

想起了费正清先生

正在我们慨叹着美国自由主义者的软弱，抗拒不住好战分子的挑战的时候，真是很愉快地读到了费正清博士发表在《大西洋》杂志上的长文。尽管有许多自称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在顽固分子发动的反苏反共浪潮里面随波逐浪，失掉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可是美国知识分子之中终于也还有费正清博士这样的人在勇敢地奋斗，我修正了我过去几个礼拜来的想法，美国好战分子的叫嚣终于压制不了美国人民的声音，中国苦难的人民还是可以在理智清明的美国知识分子中间听到了正义的叫声。

费正清这个名字，不仅在“清华学园”，在西南联大，就是在抗战中的整个大后方知识人中间，应该是不生疏的。战时重庆有两位精通华文华语的“费博士”，一位是苏大使馆的参事，以翻译《楚辞》著名的费德林，另一位就是桃李满中国的费正清了。讲起这两个人谁都会有一种惊异的感觉：来自俄罗斯的费德林竟是如此的潇洒倜傥，而来自新大陆的费正清却是如此的木讷真纯！

战时陪都我们结识过不少的美国的“知名之士”，譬如美国的名剧评家《纽约时报》特派记者爱金生，费博士的前任美国新闻处处长华兹，这两位都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名剧评家，都是同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是照我个人的印象，爱金生炫学而傲慢，华兹世故而圆滑，换句话，他们两位都对中国的同情，可是每次谈话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的同情都似乎是一种怜悯与赐予，至于费正清先生——特别是他的太太费慰梅女士，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悲欢苦乐，就不是外在和外来的赐予，而完完全全是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一种 Fellow Feeling 了，从这机微的地方出发，爱金生不就和费正清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了吗？爱金生在中国问题上可以发挥他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怜悯，记得“联合政府”这个名称，似乎还是他首先向毛泽东先生建议的，可是在苏联问题上，他不就不自觉地当了美国好战派的傀儡，充任了反苏战线的一个可怜的吉诃德式的英雄了吗？

我曾经有两个机会欢送过他，一次在重庆，一次在上海，在重庆的时候，他说，我希望再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状况可以改善一点，可是当他再来中国而终于辞掉了他的“官职”而回去当教授的时候，当郭沫若先生举起杯子来说：“我们希望阻止中国和平民主的美国军队早一点回去，我们希望帮助中国和平民主的费正清先生早一点回来”的时候，在他永远浮着笑容的脸上不也有一点黯然了吗？他说：“四海之内，皆朋友也，请中国的朋友们相信，林肯、杰佛逊和罗斯福的精神，在美国人民的心中是永生的。”是的，在这次麦迪生广场，在这次费正清的论文，我们又从美国人民之中看见了美国自由主义者的高贵传统了。我读完了费正清的论文就勾起了一联串他在重庆和上海时候的追忆，也就想起了一个风骨嶙嶙，颇有一些中国文人性格的美国友人的风貌。健斗吧，费博士，你常常说“德不孤，必有邻”，中国人民在苦难的奋斗中，已经从你的文章中感到了“四海之内皆朋友”的温暖了。

1946年10月4日

追念与告慰

日子真是过得大快，要不是韵漪同声的来信提醒，我简直不能相信贤江同志的逝世已经过了十八年了！十八年前我们几个朋友瞒着人偷偷的到明德里他的寓所去瞻拜他装在白木匣子中的骨灰的情景，不还像眼前的事么？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的党失去了这么一个忠贞的同志，全中国的进步青年失去了这么一位坚毅的导师，的确已经十八年了。在今天，除出四十岁以上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之外，也许熟悉和知道杨贤江这个光辉的名字的人已经不大多了。但是我敢于说，由贤江同志奠定了初基的人民教育事业，已经由他的后死者发扬光大，而他在二十年前写下的《新教育大纲》，到今天也依旧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本不朽的著作（记得去秋在香港《文汇报》上看见有一位读者登报征求李浩吾著的所有著作，我便从旧书摊上买了这本书送他，而这位不知道李浩吾就是杨贤江的读者回信告诉我说：要没有这本书的启发，他是不可能下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的），贤江同志的躯体死了，贤江同志的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思想依旧永存在中国文教工作者的心中。一粒麦种死了，大地上就可以收获到无数粒麦子。十八年前在最黑暗的时期“赍志以歿”了的贤江同志，作为一个决心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在今天应该是无遗憾了。

就个人讲，我和贤江同志应该说没有太深的私交，虽则在中学时代就曾通过信，后来也曾在他编辑的杂志上写过文章，可是认识他却一直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这一年四月中旬我回到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门前工人纠察队的血迹还没有清扫。在当时满天都是乌云，碰到的同年辈的知识分子朋友不是孤愤暴躁，就是悲观消极，和这些朋友们谈论时事，似乎除去孤注一掷和消极等待之外，中国革命已经再没有明确的出路了。直到这一年盛夏我在一家小书店的编辑室中遇见贤江同志的时候，我才从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中间，发现了一种能够在最险恶的环境中认清中国革命的光明远景，坚持对党的信仰和忠贞，既不焦躁又不悲观的坚韧踏实的品质。他讲得不多，谈到一些在困难中退婴却步的朋友他也只淡淡的付之一笑。可是即使在他极简短的谈话中，使我们明确地感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一切反动派加之于我们的暴压，必然的会在全人民的反击前面失败。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我从他的这种安详镇定的态度中，深切地感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与庄严。这一深刻的印象，直到十八年后的今日，在我也还是异常明晰的。

贤江同志逝世之后，经过了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在公言，中国人民在我党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克服了无数次的危难，打退了无数次内外敌人的封锁、围剿与压迫，终于走上了全国即将解放的境地；在私言，贤江同志的遗孤由于韵俯同志含辛茹苦的抚育教养，也一个个都成了解放战争中的峥嵘的战士，那么我们相信，当我们今天在你墓前告慰的时候，你也应该欣然色喜了吧。

原载 1949 年 8 月 9 日《解放日报》

回忆杨贤江同志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寄居在虹口有恒路一号绍敦电机公司的楼上。这家公司的主人蔡叔厚，是我的中学同学。他当时还是独身，也还没有参加革命组织，但他的楼上却住满了“四·一二”之后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人。我住进去之前，住在那里的已经有在广州和沈雁冰同志一起编辑过革命刊物的张秋人同志，和杨贤江同志一家（杨贤江同志、他的夫人姚韵滴同志，和我们大家都叫他“妞妞”的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大家都是浙江人，在反对蒋介石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但是性格作风上却有很大的区别。秋人是耿直的人，经常大声地议论时政，对我和蔡叔厚这些还没有入党的人，也毫不掩饰他的观点，而杨贤江同志则“循规蹈矩”、沉默寡言，除了大清早用两个铁哑铃锻炼身体，整天读书写作，偶尔逗弄一下孩子之外，简直像个“道学先生”。可是每天晚上，当店铺关了门，我和蔡叔厚的朋友们在楼下聊天、吃宵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我们都不认识的人来找他，而且会一直谈到深夜。有一天，一个来找他的人一进门就认识了张秋人，经过介绍，才知道他就是当时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李求实。由于他的堂兄李国琛（人一）是我在日本时的好友，也由于那时我和蔡叔厚都已经入了党，所以他就告诉我，杨贤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学生运动负责实际工作，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青年部长。这一段话真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不论在性格、言行乃至日常生活，杨贤江同志实在和当时的共产党人太不一样了。

1927年夏秋之交，正是一个大革命的转折时期。一方面，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上海的几家大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一大“‘xxx’脱离共产党的声明”的广告，国民党反动派和青红帮联合起来，利用他们的宣传工具，大肆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妻共产；而另一方面，在大革命中由于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的愤怒，党内滋长了一种“左”倾的急性情绪，不少人唯恐自己不“左”，不仅在口头上大言壮语，连生活上也蓄长头发，系红领带，实际上把自己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因此，在这种极“左”的气氛中，杨贤江同志就表现出了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他几乎可以说足不出户，准时准刻地锻炼身体，有计划地读书、写作。那么，他是不是少做了对党的工作呢？1949年李一氓同志在一篇《追念杨贤江同志》的文章中说：“他律己甚严，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那样穷困，从不看见他发一些牢骚，有什么一点意见。党的工作，总是尽一切力量去做，甚至于把自己的为生活而写作的工作停下来。当时在地下工作下，假如分配什么文字工作，总是他首先交卷，并且按月自动交纳党费。这在今天来讲，组织观念，艰苦生活，杨贤江同志无愧为前辈的典型”。这不是一氓同志一个人的看法，而是贤江同志所有旧友新交的共同评价。他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勤修苦练”这句老话。他懂得英、日两国外文，据他自己说，他的日文是在夏丐尊先生的指导下自己学会的。他讲得不太流利，但他翻译的日文书籍却很准确流畅。他能阅读英文书报。但是每天清晨，总有一段时间独自高声朗读英语。他平易近人，而又有点“木讷近仁”的风格，所以很少和人辩论或者“喜怒形于颜色”。记得1927年秋天，正在汪精卫正式宣布反共之后，张秋人同志拿着一张登满了“脱党启事”的报纸，指指点点地对贤江同志说：某几个人我早就知道他们是投机分子，他们脱党并不稀奇。可是，他指着一个人

人的名字，怒气冲冲他说，这个人我把他看作好人，现在也做出这种事来，贤江同志只是淡淡的一笑，停了一回，低声他说：“让所有的投机分子离开，有什么坏处？”据我卧忆，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秋人同志就在杭州被捕牺牲。因此，他的这句话，对我这个新党员来说，印象就格外深刻。

据贤江同志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朱文叔先生说，1917年毕业的时候，他是一个“全优的模范学生”。他入了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典范。他的为人治学，他的夫人姚韵漪同志曾用“精密、睿智、坚韧、沉着、恳挚、切实”这十二个字来表达他的品质，我认为这是十分恰当的。我认识他的那一年他才三十二岁，在这样的青年时代，不仅政治上成熟坚贞，在生活上又是如此认真严肃，这在当时的朋辈中，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郑振铎同志家里闲聊，谈到贤江时，周子同先生忽发奇论，说在杨贤江身上，可以看到朱舜水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奇妙结合。这句话我想了很久。贤江同志是余姚人，恰好是朱舜水的故乡。那么从他幼年到“五四”运动前后，受一点朱舜水学说的影响，或者说在立身治学方面他吸收了一些朱舜水思想中的可取之处，如认真负责，谨严不苟等等，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我在他编辑的《学生杂志》上读过他的许多文章，特别感兴趣的是他署名或不署名的“通讯”、“答问”之类，正说明了他对广大青年读者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抗战中有一次我问邹韬奋同志，你办《生活杂志》有什么“诀窍”，他回答说，第一是抓社论，更重要的是写“答读者问”。他还说，社论可以请志同道合的人写，而通讯和答问则是非自己执笔不可。从韬奋的话中我想起了贤江同志，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紧密联系群众这一点上，他们两个是完全一致的。

贤江同志一家什么时候离开绍敦公司去日本，我已经说不清楚了。我和他朝夕相处，大概不足一年时间。他去日本，一则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追捕，另一原因是蔡叔厚入党后，由于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又有“小孟尝”之称，所以在广州暴动之后，有不少“流亡者”都住在他家里。

1928年初，这家公司成了闸北区委的联络站。不久，蔡调到特科工作，我们这些人挤在一起显然是不可能了，贤江去了日本，我搬到了沪东塘山路。

1930年，蔡叔厚又从特科调到了国际远东情报局。这样，过去的朋友借他的地方联系的机会也没有了，贤江在日本只呆了很短一段时期，回来后住在长洪路明德里，组织上曾要我通知他，绍敦公司这个地方不能去了。他听了有点惊奇，我也不能对他作任何解释。

据蔡叔厚同志后来和我说，当他知道贤江得了肾癌之后，他才通过朱文映先生，去探望过他一次。我和他之间，也就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李一氓同志把他的骨灰瓶带回上海，安葬在永安公墓的时候，我们几个旧友和同志才在经子渊先生写的“杨贤江墓”四个大字的墓碑前面向他挥泪告别。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今天的青年，包括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者的人，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杨贤江这个名字了。因此，在他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里举行一次纪念会，重新印行一些他的著作，特别是我党最早用马列主义思想来研究教育工作的名著《新教育大纲》（当时用的是李浩吾的笔名），让今天的青年人知道六十多年来青年运动走过来的艰辛道路，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和风格，奋发图强，振兴中华，都是有深刻的意义的。所以，我希望教育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和青年们，重视杨贤江同志革命精神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宣传。

原载 1981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

杨度同志二三事

读了王冶秋同志的《难忘的记忆》，我想起了杨度同志的一些往事。

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而是一九二九年秋，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经潘汉年同志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他当时住在上海旧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小洋房里，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哲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

关于李大钊同志牺牲前后的经过，他也和我讲过，大致和陶菊隐先生所著《六君子传》的记述相同，即他从汪大燮口中知道了张作霖已派便衣军警包围了俄国兵营，准备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的消息，当晚就要国民党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通知中共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由于有人不相信张作霖会冒跟外交使团冲突的危险，推迟了撤退时间，以致李大钊等三十五人被捕。杨度同志和章士钊先生等奔走营救，无效。李大钊同志等二十人被处绞刑。这件事抗战时期我在香港问过当事人胡鄂公先生，所述也和杨度同志的自述相符。杨度同志入党的事，逐渐为外人所知，有人说他投机。他曾对我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近代史家谈到杨度时，都说他傲慢自大，是个“知过不改”的人，特别是在袁世凯死后，他还对新闻记者说：“宁受审判，不能认错。”但是，最少在他晚年，他倒很善于自我解剖。他对我说过：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他在上海住的房子是杜月笙送的。他虽自称卖字画为生，但实际上他的生活是杜月笙供应的，因此上海小报上都说是杜月笙的徒弟，但他不承认。他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哲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而是“清客”。这句话含有自嘲的意思，但我认为是可信的。解放后也有人说，在“杜公馆”他的地位和章士钊先生相似，但据我所知，杨度同志晚年生活简朴，不挥霍，无嗜好，也不为杜出谋划策，因此，杨、章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杨度同志在军阀、官僚、政客中，度过了大半生，一旦觉悟，可以反戈一击。但是，他的道路是崎岖的，在思想作风等方面，还是有许多矛盾的，例如，他入了党，还相信佛教，写过一部篇幅很大的研究佛理的书，有时，还和我谈过所谓“禅悦”之类的问题；又如，他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不

必说像我这样年轻的联络员，谈起周恩来同志，他是十分敬佩的，但也还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习之难改也如此。

周恩来同志对我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他，解放后当我告诉他杨度同志的女儿杨云慧同志回国后，已在电影厂工作，周总理很高兴，说：她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读了王冶秋同志的文章，知道总理病重期间，还想起杨度同志，让后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现在，知道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产党者少，因此，跟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有实事求是他说明事实、表扬他的晚节的责任。

1978年8月

续《杨度同志二三事》

今年是杨度同志逝世五十五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6月下旬隆重举行杨度墓重建落成仪式，上海市政协和杨云慧同志要我写一点纪念杨度同志的文章，年老体衰，又值北京盛暑，只能记述一些我所知道的有关杨度同志的往事以应命。

本世纪初，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在东京组织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清政府对此惶恐不安，通过驻日使馆与日本文部省合谋，于1905年冬发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用责令退学和遣送出境的手段，来“取缔”“性行不良”的（实际上指的是参加革命运动的）中国留学生。于是当时任“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的杨度，就召集东京和外地的各省同乡会的负责人开会，发表宣言，向文部省提出严重抗议，并向驻日使馆递交了“学生公禀”。在“公禀”上签名的除杨度外，还有林长民、张继、蒋方震、章士钊、胡玻等。当时在实践女校上学的秋谨，也以“全体留日女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抗议活动。12月6日，留日学生总会号召集体罢课，日本报上又发表了辱华文章，说留学生的罢课是“清国人特有的卑劣放纵之性情所促成”。为了抗议这一辱华事件，同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天华写了《绝命书》，寄给杨度，愤而投海自杀。杨度把这篇《绝命书》交给黄兴，黄兴写了“一人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位下不能仰”的跋文，不久就在日本和上海相继发表。陈天华之死激怒了全体留日学生，秋谨首先与实践女校同学十余人集体退学，接着就有二千几百位留学生分批回国。但是正在集体归国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留学生中也出现了一个反对派，他们组织了“维持留学界同志会”。接着又经驻日使馆策划，又组成了“日华学生会”，这个会成立那一天，居然有大隈伯爵、青木子爵等人参加；在反对退学归国的留学生中有一个“知名人物”，这就是汪精卫。这事件的经过详见日本人实藤惠秀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有中译本，我是去年才读到的。

关于杨度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事，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小报上就透露过，我猜想，认识他的人也可能已经察觉到了。杨度同志逝世，马叙伦先生送了一副挽联，后来搜集在马先生的《石屋余渾》中，联云：“功罪且无论，自有文章惊海内；霸王成往迹，我倾河海哭先生”，在当时，应该说是很难得的。

1947年在香港，宋云彬同志和我谈起这副对联，问我杨哲子晚年是不是加入过共产党？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我们就作了肯定的回答。云彬同志联想到沈玄庐、周作人等人的晚年失节，写了一篇《杨哲子的晚盖》，他的结论是，“人不怕顽固，只怕顽固而不化，只要能够化，一旦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不但自己心安理得，以往的过错也就被掩盖了。故昔人有言曰：彼将恶始而美终，以晚盖者也。”这篇文章曾在《华商报》或别的刊物上发表过，现已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宋云彬杂文集》。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也可以顿悟而来一次飞跃；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他心安理得地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说。

1986年6月24日

缅怀我们的先驱者

1986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五周年，借此机会和故乡青年谈谈我们浙江建党史上的几位先驱人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在这之前的1919年，北京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学生运动。“五四”的热潮席卷全国，杭州学生奋起响应。六月初，就组成了浙江学生联合会，同年十月，一部分进步学生出版了《双十》周刊（后改名为《浙江新潮》）。这个刊物公开声明它的“旨趣”是“改造社会”和“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主张“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这就说明，在这场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中，已经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在闪动了。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北京大学，浙江学生运动和《浙江新潮》的重心则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北大的校长是绍兴人蔡元培，浙一师的校长是上虞人经亨颐。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蔡、经两位先生都是广招天下贤士，为科学、民主开路的大教育家，他们实行教育改革，创导学生自治，哺育了一代革命青年。在浙江，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杨贤江、宣中华、俞秀松、施存统……都是“浙一师”的学生。

在二十年代初，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齐名的民主革命的坚强堡垒，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车次九先生都在“浙一师”任教。《浙江新潮》这份刊物，就是在经亨颐、陈望道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参加《浙江新潮》的只有二十几个二十岁左右的中学生，这份刊物也只出了四期，就因为施存统写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而被禁止出版，但是这一小小的刊物却对浙江乃至江南一带的共产主义运动播下了一颗种子。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双十》出版之后，俞秀松和宣中华就成了这个小刊物的领导人。俞秀松是诸暨人，比我大一岁，但比我们这些人老练得多，最少可以说，他和宣中华两个，已经不单是反帝的爱国主义者，而是明显地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斗士了。《浙江新潮》被禁，和由“非孝”而引起的“浙一师风潮”之后，陈望道、宣中华、俞秀松相继到了上海。

1920年8月，为了准备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和另一个浙江人沈雁冰（茅盾）参加了这个小组，俞秀松则因年纪最轻（当时二十一岁），就担任了少共组织的第一任书记。下一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中华被派到浙江建党，俞秀松则在同年4月，到苏联去参加第三次国际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

俞秀松在苏联受到了王明一伙的排挤和迫害，1938年回国，在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壮烈牺牲。宣中华则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不久被国民党军阀杀害。

在“五四”运动之前，在浙江第一师范毕业的杨贤江（柳岛生，余姚人），也是浙江最早的共产党人。二十年代初，他和胡愈之、沈雁冰一起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主编的《学生杂志》，对大革命前后的学生运动，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和我一起避居在上海虹口蔡叔厚主办的绍敦电机公司，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学生运动，1932年积劳成疾，赴日本就医时不幸逝世。当时和我们住在—

起的，还有一位浙江最早的共产党员张秋人同志；在大革命时期，他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并在广州主编党的刊物《政治周报》，1927年回到上海，宣中华同志牺牲后，1928年8月奉命赴浙江重建省委，到杭州不久，被一个反动的黄埔军校学生发现，于翌年2月壮烈牺牲。蔡叔厚也是192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革”前因潘汉年事件株连被迫害致死。

大家知道，1921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是在嘉兴的南湖举行的。

1922年，为了讨论和决定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而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是在杭州西湖举行的。加上在建党之前和建党初期，我们浙江已经有了宣中华、张秋人、杨贤江、俞秀松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在他们周围，又已经团结了不少有初步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因此，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共产主义思想在浙江已经有了很广泛的影响。

经过了六十五年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有四千多万党员的成熟的大党了，我们不能忘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这句成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会时，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十二人，他们代表的只不过是全国各地的五十多名党员。

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全党也只得有一百九十五名党员。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到1927年4月在武汉举行的“五大”，党员人数增加到五万七千九百多人。从“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我们党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十七年，“四·一二”大屠杀，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建党二十八周年那一年——1949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创业艰难百战多”，我们走过弯路，“吃过大亏”，无数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我们党还是百折不挠，一次又一次的凭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创造了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从建党到今天，六十五年过去了，1986年，我们要“团结奋斗，再展宏图”，我们要勇敢而慎重地进行第二次大革命。我们要记住，在建党的那一年，我们党只有五十多个党员，星火燎原，从五十多人到四千多万人，从幼稚到成熟，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们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因此，在纪念建党六十五周年的时候，怀念和学习创业时期的先驱者——学习他们的大无畏精神，继承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理想，是八十年代青年的光荣责任。

1986年初

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论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这就是7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革命，和接着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巨人，——这个时代也的确产生了一批思想、学识、才艺上卓绝的巨人，——在知识界，胡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巨人。

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经杨贤江同志的介绍，认识了愈之同志。初次见面，谈得不多。不久他就逃亡到法国去了。这一年我刚入党，年少气盛。一次和贤江同志闲谈，认为当时愈之是《东方杂志》实际上的主编，在危难时刻他不该离开这个岗位，贤江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从书架上找出一份同年4月14日的《商报》，低声说：“你看看这篇‘抗议信’，这是‘四·一二’那一天晚上愈之起草的。”这是一篇掷地有金石声的檄文：“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无此横暴，‘五卅’惨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这封抗议信是写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的，签名者7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琢、冯次行、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当时，主山路上的血迹未干，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刻，公开发表这样一封抗议信来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罪行，的确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也由于刽子手陈群查明了这封抗议信是愈之起草的而要加以暗害，他才听从了郑振铎的劝告，离开了上海。这件事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当时愈之还没有入党。记得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曾和我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愈之同志在法国耽了三年，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进步运动。我还听说过，巴金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也是经过愈之介绍的。

1930年他经过德国、波兰到了苏联，1931年2月回到上海，正碰上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遇难之后不久，一方面白色恐怖严重，另一方面又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全盛时期，愈之巧妙地运用他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哄动了知识界，一年之内重印了五版，鲁迅先生写过：“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大约是10月下旬，我在内山书店遇到夏丏尊先生，他约我到开明书店去吃饭。这是相隔四年之后再次和愈之见面，同席的都是开明书店同人，有叶圣陶、章锡琛、吴觉农、徐调罕、宋去彬等。当时愈之已经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了。当时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把东

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而西欧和美国还处在经济大萧条之中，席间谈到国事，难免会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而愈之却非常敏锐地指出罗斯福的“新政”已初见成效，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日益加剧，所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苏政策。他不断地抽烟，低声细语他说，日本侵略东北，最终的目的在于进攻苏联，所以我们应该和苏联复交，争取苏联的援助，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预见到东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的远见卓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淞沪战争之后，我和愈之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有时在吴觉农家里，有时在开明书店。我参加了电影工作之后，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明星电影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和周剑云约我和钱杏邨、郑伯奇写剧本的事。他很有兴趣地问我，他们知不知道你们的政治背景，我坦然他说：正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左联”的人，所以才要我们帮他们出主意，写剧本的；他忽然高兴起来，对我说，你们做得对，这就说明不当权的资本家也可以在爱国抗日的前提下合作的，当然他们的进步是有限度的。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愈之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到兴趣和高兴呢，因为这件事正好证明了他早已预见到的一种即将到来的新的形势，这就是：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争取到反日反蒋这方面来的事实。“九·一八”之后，人民群众普遍地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王明“左”倾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形势，还在提“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和“武装保卫苏联”这一类不切实际的口号——也就在这个时期，“左联”发动了一场反对第三种人的论争。因此愈之在《东方杂志》和《生活周刊》上发表的主张争取广大群众，联合抗日的文章，也被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刊上对他进行点名批评——1931年10月的《红旗月报》第23期《满洲事变中各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政府》一文中，居然把愈之看作是第三党改组派的人物。值得钦佩的是，愈之并没有被错误的批评吓倒，他还是不断地发表文章，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民族资本家开始对国民党不满，国民党内部也有“不愿做奴隶的人”；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就证明了这一论点。而这一场淞沪战争，又得到了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这一切也就说明了当政的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我还记得他不止一次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甘心让日本独吞中国，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也将逐渐显露。在三十年代初期王明路线占上风时期，在进步文化界能有这种实事求是的远见卓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通过张志让先生认识了国民党中的“亲苏派”孙科，接着担任了法国在远东唯一的通讯社“哈瓦斯社”，的中文部编辑主任，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如路易·艾黎、史沫特莱、伊罗生等。这样，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发挥他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如椽的笔力，写出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旺盛的工作能力，1933年秋，中国共产党吸收他为特别党员，参加了特科工作。特科归党中央直接领导，和地下党不发生任何联系，所以他的入党连我们这些人也是不知道的。这一年冬，国民党特务组织“电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了艺华电影公司和良友图

书公司，我们打算组织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向当局提出抗议，我拿了这个名单和蔡叔厚商量。蔡叔厚对我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看胡愈之还是不列名为好，让他超脱一点，可能更有好处。叔厚是愈之的好友，先在中央特科，后来转到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所以他的这一提醒，我曾猜想到愈之可能另有其他的任务。

从1933年到1935年2月，党在上海地下组织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损失重大。过去常说，王明“左”倾路线使红军损失了90%，地下党损失了100%。事实上，单说上海，尽管中央上海局和江苏省委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党组织并没有全被消灭，工会（马纯古等）、青年团（陈国栋等）、文委（周扬等）、特科（王学文等）也还在人自力战，继续工作，特别是和地下党有关系的外围组织，却正利用了民族矛盾上升的机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运动。在这严峻时刻，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人，永远也不能忘记愈之同志所作出的难以估计的巨大的贡献。愈之晚年写的《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一些党员，已都处于人自力战的状态，工作十分困难。这一年里，我除继续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外，还努力多方联络有志反蒋抗日的人士，力图在文化界首先能酝酿组织起一个抗日救亡的团体，以便在万马齐喑的形势下，救亡运动能有新的兴起。同时，我也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生活书店的业务，以扩大这一块宣传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继1933年创刊的《文学》杂志后，在1934年9月，又创办了《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刊物，1933年还创刊了《妇女生活》。这些刊物大都是我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这是近代革命史、文化史上的一项影响深远的贡献。这个时期，在上海新建了三家进步书店，即“读书生活”、“新知”和“生活书店”。前两家是地下党人徐雪寒、黄洛峰办的，生活书店则是邹韬奋在愈之同志的支持和筹划下办起来的。这几家书店出了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这个时期由这几家书店冒着风险出版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现在形势变了，要联合抗日，单凭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出书和办杂志，首先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和他们的接受水平，“一定要心平气和他说理，切不可居高临下地训人”。当他筹备出版《世界知识》的时候，他单独约我谈话，他说：“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登台之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现在急需要有一本专门介绍和评论国际知识的杂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他要我在创刊号上写文章。我就用韦或的笔名，写了一篇论美国电影的文章。叶圣陶先生说过愈之同志的四个长处，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二是他的组织能力，三是他的博爱精神，四是他的友爱情谊，这是对愈之立身行事的最真切的评价。圣陶先生说：“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杂志和书刊，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建树事业之多，能比得上他的似乎少见。”不仅生活书店和它刊行的许多杂志是他“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更应该说，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的救国会，抗战初期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以及《南侨日报》等等，也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精心策划、组织起来的。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1937年冬，京沪沦陷之后，他奋不顾身地留在上海，组织人力物力，迅速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接着又奔走呼

号，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鲁迅全集》。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以及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真可以说是无可伦比的。

1934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巨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是当之无愧的。

1989年1月12日

（本文是为胡愈之纪念文集《胡愈之印象记》所写的代序·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忆夏丏尊先生

今年6月15日，是夏丏尊先生一百岁冥诞。今年4月，又正是他逝世四十周年。

提到夏丏尊先生，很自然地会想起开明书店，会想起《中学生》杂志，会想起他翻译的《爱的教育》，会想起他和叶圣陶先生合著的《文心》。他为青年一代的语文教育和进步出版事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了几十年，但是由于他的恬淡朴质、不求闻达，所以在当代青年中，知道这位甘为孺子牛的长者的人，已经不大多了。从1909年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起，相继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春晖中学、立达学园、暨南大学、南屏女子中学，从事教育工作，言教身传，真可以说是杉淅满天下。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和他共事过的人，想起他，就会有一股敬爱的暖流涌上心头。

丏尊先生比我大十四岁。“五四”运动那一年，我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念书，他是经亨颐先生主持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员兼“舍监”。受到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浙一师和杭州几个学校的青年人凑合起来，办了一份叫《浙江新潮》的周刊，他和陈望道、刘大白先生都是这个小刊物的支持者。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经过俞秀松和汪馥泉的介绍，在贡院前的浙一师的宿舍和他第一次见面。他鼓励我们，要我们像北大学生一样地去闯破沉闷的空气。可是不久之后，因为施存统（复亮）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一篇《非孝》，就“闯”了一场大祸。在封建宗法统治的旧社会，非孝当然是大逆大道，而这篇文章，却又是经过丏尊先生审阅过的，一个小刊物引起了一场大风浪，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浙一师风潮”。当时，学校中的“舍监”，相当于后来的政工干部，它的职务是；临督和管理学生的思想行为。因此，丏尊先生以“舍监”的身份而同意学生发表《非孝》那样的文章，无疑就成了顽固派所说的“奇闻怪事”，而在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的这一行动就成了我们精神上的支柱。

“浙一师风潮”之后，丏尊先生被迫离校，应易培基、匡互生先生之邀，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一年后，回到上虞白马湖，在春晖中学、浙江省立四中工作了。四年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最受欢迎的一本书《爱的教育》，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这本书在抗战前再版了三十多次，和他写的《文章作法》、《文心》一样，都在青少年和教育工作者之间有很大的影响。

1925年后，丏尊先生在上海定居，一面教书，一面写作，先是在暨南大学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后应章锡琛先生之邀，任开明书店编辑所长。经历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的艰困时期，他团结了大批爱国、进步、正直的文化工作者、教育家、科学家，拥有一支不亚于商务、中华的著译家队伍：叶圣陶、茅盾、胡愈之、巴金、朱光潜、朱自清、丰子恺、陈之佛、谢六逸、费鸿年……真可以说群贤毕集，胜友如云。在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三十年代，在他主持下，开明书店出版了大量进步的中外名著，发行了《一般》、《中学生》、《新女性》、《新少年》、《月报》等刊物，哺育了一代青年。他在教育、出版史上的功绩，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丏尊先生在文化、教育、出版界辛勤工作了四十年。这四十年，也正是新中国诞生之前的最黑暗的时期，他爱国，他向往科学与民主，按他的气质来说，他是一个质朴恬淡的知识分子，尽管“五四”之前他就和鲁迅一起参

加过“木瓜之役”，支持过“浙一师风潮”，但他没有参加过实际的政治运动；可是，在正直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反抗与暴压之间，他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鲜明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浙一师的学生，浙江最早的共产党员宣中华、叶天底惨遭杀害，他多方营救无效，就愤笔写了一副对联，“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抗战前夕，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郭沫若和我请他撰稿，他毫不迟疑地当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委员，写了文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占，日本人想利用他在文化界的声望，一再派人请他“出山”，都遭到他的毅然拒绝。因此，1943年冬，他曾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

1937年上海沦陷后，丐尊先生因年老多病而留在上海，靠笔耕和教书维持生活。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抗战后期，先生一家的生活非常艰苦，有时，他只能“吃扁担饭”（即每天只吃两餐）；但是，他还是关怀着留在孤岛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介绍他们到南屏女中去教书，或者邀请他们翻译一些当时可以出版的书籍，来获得一点稿费。丐尊先生去世之后，有一次，周予同老先生和我说：丐翁的一生，可以用“爱国、爱人民、爱青年”这三句话来概括。我说，读他的文章，看他的待人和处世，他的爱心之深，真可以说是“菩萨心肠”。本世纪初，他在日本留学时期，李叔同（弘一法师）是他的知心好友，又在两级师范学堂共事多年，情同手足。他很欣赏《维摩诘经》，还曾对我说过：“无垢称”（身心无垢）是读书人应有的精神境界。丐尊先生在思想上受过释家的影响，但他既不逃禅，更不出世，他的心是与国家的命运和现实的人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丐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但是遗爱在人间，他的道德文章，永远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榜样。

1986年4月

怀念章锡琛先生

1989年，是章锡琛先生的百岁冥诞，也是他逝世二十周年。锡琛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闯将，从1912年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东方杂志》编辑起，1921年任《妇女杂志》主编，1926年创办《新女性》杂志，同年与胡愈之、吴觉农先生一起创立“开明书店”。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出版总署调查研究司司长，辛勤地为编辑、出版工作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他晚年的境遇是非常惨淡的。

1957年他被误划“右派”，“‘文革’”开始后又受到了更残酷的打击，七十八岁高龄的他被“勒令”劳动，终于1969年6月含冤去世。那时我还身处囹圄，连抚棺一恸的机会也没有！

1985年10月，为纪念开明书店创办六十周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写过一篇短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提到章锡琛先生，解放后一般人都把他看作是书店的‘资方代理人’，1957年他还受到过不公正的批斗，但是我们这些和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个有胆识，有才干的出版家，他还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读了章士骞先生的《章锡琛先生传略》，才觉得锡琛先生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士。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他以“妇女问题研究会”代表的名义参加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奔走呼号，站在斗争的前列。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上海的工人、店员和知识分子惨遭屠杀。在这严重关头，他和胡愈之、郑振铎、李石岑、吴觉农、周子同一起，联名给国民党中央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写信，抗议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并把这封信的全文在《商报》上公开发表。对这件事，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和我谈起过，认为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式下令查禁“反动”书籍一百四十九种，举凡鲁迅等人的著作一律禁止印行和出售；禁书名单中涉及的作家共二十八人，即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柔石、丁玲、胡也频、周起应、华汉、冯雪峰、钱杏邨、巴金、高语罕、蒋光慈等。这就使几十家出版进步书刊的中小书店濒于破产。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锡琛先生又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衔，联合二十几家书店两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他又和夏丏尊先生联名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立即“解除禁令”。这样，国民党当局才放宽了禁书“尺度”，允许一部分禁书“改正后重印”。

从1927年第一次国共分裂一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整整十年的文化“围剿”。在这白色恐怖笼罩大地的时刻，锡琛先生编杂志、开书店，无私无畏，默默无闻地做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工作。在当时的险峻情况下，他还做了别人不肯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

1935年瞿秋白同志在长汀遇难，鲁迅先生编了秋白的遗作《海上述林》，一时没有一家印刷厂敢于承印，吴觉农先生把这件事告诉了丏尊和锡琛先生；锡琛二话没说，毅然答允在他经营的美成公司秘密排字制版。这样的事，假如吴觉农先生不在《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一文中提到，恐怕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锡琛先生所作不为人所知之事，当然还不止此，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著作权暂行法”，是他拟定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中

国出版”这一条目，也是他撰写的。

1946年开明书店创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叶圣陶先生在“纪念碑词”中写道：“书林张一年，及今二十岁，欣兹初度辰，镂金联同辈，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弗欲锐，惟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这几句诗真实地表达了“开明人”的心声，也正好说明了锡深先生为人行事的风格。他正直、善良、勇敢，同时又很谦虚，他在讲到开明书店的店史的时候说：“虽然人家说开明是我创办的，但实在是许多朋友所促成，并不是我有意要办书店，那时主张办书店最力的是胡愈之、吴觉农两位先生，尽力帮助创办的是钱经字、郑振铎诸先生，至于开明这个店名，则是孙伏园先生取的，第一块招牌也是孙先生写的。”这是他“朴实无华”、功不归己的美德，但这也和当时的客观形势相关，圣陶先生所说的“思不出其位”和“求进弗欲锐”，开明书店也有一条办店精神，这就是“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和“不投机，不冒险，正正经经地出好书”。大家知道，三十年代初是文化界“左”倾思想盛行的时候，所以“思不出其位”和“求进弗欲锐”，以及不投机、不冒险，一方面表示了开明同人的实事求是，不趋时、不盲从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正是凭着这个宗旨，开明书店和它出版的刊物能够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围剿”和八年抗战时期的风雨而正大光明、鞠躬尽瘁地为民族、为国家、为一代青年作出巨大的贡献。圣陶、丐尊、锡琛先生和大部分开明同人都是共产党员，在全国解放之前，他们也不曾参加过任何革命团体，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工作，始终是和党保持着一致的。胡绳同志在《我和〈中学生〉》一文中有一段话说明了这个问题：“1946年内战爆发，恩来同志安排上海工作，他要我们把出版界和杂志分成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三类，第一线像《文萃》那样的杂志，是很快就会被国民党查禁的；第二线是一些还可以维持一个时期，但到了某一时期，也有被禁止的危险；《中学生》和开明书店属于第三线，应该尽可能维持下去。恩来同志这个安排，我和叶圣老谈过，请他尽力维持开明书店，维持《中学生》；在国民党统治越来越严酷的情况下，《中学生》可以多登一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文章，这可以在青年中起促使他们进步的作用。”圣陶、锡琛先生完全同意了恩来同志的安排，甘居三线，“求进弗欲锐”，使开明书店和《中学生》杂志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

《中学生》创刊于上海，在抗日战争中停刊了一段时期，1939年才在桂林复刊，由锡琛先生的弟弟章锡珊和宋云彬先生主持。

当时我在桂林《救亡日报》工作，还记得“复刊词”上有一段使我十分感动的话：

“旧的炸毁了，新的建造起来了，一千个一万个被战争毁灭了，十万个万万个却从瓦砾中重建起来。只怕信念不坚，不愁事业不成。《中学生》杂志抱了这种坚定的信念在西南抗战根据地宣告复刊。在复刊之始，我们愿意和中学生诸君共相勸励：

‘第一是努力追求文化与智慧，用文化和智慧的光辉，消灭世界上的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

第二是民族利益超过一切，牺牲一切个人利益，时刻准备为救国救民而奋斗；

第三是学习、工作、生活打成一片，生活是为工作，为工作而学习，而且从工作中学习。’”

这是近四十年前的话了，现在重读，不是也还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共相勩勉”么？

大家知道锡琛先生是一位有才干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者，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作家。二十年代他就是“文学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他不仅在《新女性》、《一般》和《中学生》等杂志上写过不少好文章，他还认真严肃地校注过《马氏文通》、《助字辨略》。即使在1957年后的坎坷岁月中，他还是以一贯认真负责的精神，在校阅标点本《二十四史》等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27年，吴觉农先生介绍我和锡琛先生见面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青年。可能是觉农对于我当时处境的关怀，也可能他们是无话不谈的患难之交，所以觉农在介绍我的经历时，毫不介意他说出了我和蔡叔厚、张秋人的关系。那是在“四·一二事件”之后不久，杨虎、陈群在上海杀人如麻的时候，暴露一个初次见面的青年人的政治面貌，对我说来显然是会感到惶惑的。可是完全出于我的意外，锡琛、丐尊先生丝毫没有芥蒂，爽快地决定要我给开明书店译书，丐尊先生要我译本问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论》，锡琛先生当时正热心于妇女解放运动，又把翻译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的任务交给了我。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几天之后，锡琛先生又对我说，现在的稿费微薄，单靠译书是不能养家活口的，我介绍你到立达学园去教书。“我已经和匡互生先生说好了。”

这一年冬，我译完了《妇女与社会主义》，锡琛先生认真地校阅了一遍，还给我写了一篇“付印题记”，其中有一段话：“本书的付印，朋友中颇有恐怕发生意外，加以阻止的。因为本年各处正处于反共反赤呼声的高潮，这样的好意，固然不能视为过虑，但我敢信现在的政府似乎决不会比德皇统治下的政府更专制，所以终于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决心把这本书出版了。”

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他敢于决心出这本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和写这篇“题记”，这需要有何等的胸怀，何等的勇气！

写到这里，我只能凄然搁笔。锡琛先生这样一位正直、善良、朴实无华，为了“正正经经地出好书”，“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而付出了毕生心血的人，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十年浩劫中含冤去世，迄今快要二十年了！这样的事不该再有，我想也不会再有了。

1987年9月

难忘的开明书店

1926年，夏丏尊、章锡琛先生在上海创办开明书店，日子过得飞快，迄今已近六十年了。

我是1928年春夏之交，经吴觉农同志的介绍，和开明书店发生关系的。丏尊先生是我的师长，早在“五四”时期就受过他的教诲；章锡琛、徐调孚、顾均正、刘薰宇、钱君匋、索非先生，则是在我替开明书店译书和在《一般》、《新女性》杂志撰稿时才认识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上海推行残酷的文化“围剿”、进步书店“南强”、“大江”、“春野”相继受到查禁和封闭，独有开明书店却能坚持“不投机、不冒险，正正经经出好书”的方针；得到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支持而保存下来，稳步发展，成为规模仅次于“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店的名副其实的“开明”的书店。

开明书店的开明之处，在于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正直的文化工作者、教育家、科学家，拥有一支不亚于“商务”、“中华”的译著、编辑队伍，叶圣陶、胡愈之、茅盾、王统照、巴金、谢六逸、陈之佛、钱歌川、费鸿年、胡学勤……真可以说是群贤毕集，胜友如云。它出版了大量中外名著，发行了《一般》、《新女性》、《中学生》等进步刊物。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三十年代，开明书店以它丰富多彩的书刊，哺育了年轻一代。丏尊、圣陶等先生的功绩，在中国出版史上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开明书店的宗旨是“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特点是认真和负责。出书，办杂志，从组稿、审读、定稿、排印、校勘、装帧、出版发行，始终贯彻着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举一个小的例子，他们对校对这一关抓得很紧，所以开明书店出版的书，很少有误植和衍漏。我给开明翻译过几本大部头书，如《欧洲文艺思潮论》、《妇女与社会主义》，待印之前译者不必看清样，出版之后，几十万字中很难找出一个错字。记得我译的高尔基的《母亲》（1929年大江版）被查禁，丏尊先生决定把书名《母亲》改为《母》，把译著者的名字“沈端先”改为“孙瑞光”，由开明书店重印。照例，这只要按“大江版”重排付印就是了，可是丏尊先生还是请人先校对一遍，除校出了一些误植之外，又对译文中一些不够通顺的字句，作了仔细修改，最后再请调率先生征求我的同意。我当时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前辈出版家的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实在使我太感动了。

开明书店认认真真地为读者服务，同时也真心诚意地为著者译者服务。从三十年代到全国解放，我一直靠稿费和版税糊口。在整个抗战时期，我离开上海之后，留在上海的家属的生活费用，主要的依靠是开明书店的版税，1945年9月，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孤岛历尽艰辛的丏尊先生正在病中。我去探望他，不等我说完感谢的话，他就喘着气说：“不用说这些，大家都有困难，你们走了之后，留在上海的人就得守住开明这个摊子，总算撑过来了……一直在挂念你们，知道雁冰、圣陶、愈之他们都平安，我们就安心了。”他消瘦得厉害，讲话很吃力，不敢多打扰他，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不止一个人对我说，在孤岛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凡是留在上海的“开明同人”，不论有没有在开明出过书，都经常收到丏尊、锡琛先生送来的三块、五块银币的周济。在那种“大家都有困难”的“乱世”，说“相濡以沫”也好，说人情、道义也好，这种出版家与著译者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提到章锡琛先生，解放后一般人都把他看作是“资方代理人”，1957年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但我们这些和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个有才干，有胆识的出版家，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开明书店出版过《新女性》杂志，我翻译的厚厚的两大本德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就是他指定要求赶译出来的。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式下令，查禁鲁迅、茅盾、郭沫若、陈望道等二十八人译著的“反动书籍”一百四十九种，还加强了对书店和出版社的控制。几十家出版进步书刊的中小书店濒于破产。这时锡琛先生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头，上海二十几家书店联名，两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丐尊、锡琛先生还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解除禁令”。这样，国民党才“放宽”了禁书“尺度”，允许一部分书籍“删改后重新出版”，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刻，开明书店的这一义举，现代出版史上也应该大书一笔的。

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版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也不必讳言，出版界也出现了一种乱出书，出坏书的不正之风。出版工作负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庄严的责任，因此，在纪念开明书店创业六十周年的时候，强调一下认真、负责、出版工作为读者服务的“开明精神”，不仅对出版界，对整个文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

1965年10月15日

哭杨潮

清早起来翻开报，一个黑边新闻闯入眼来：“名记者杨潮（即羊枣）突在狱逝世！”杨潮死了，我不忍相信，可是，我早知道他现在所处的境遇，是随时都有“突然逝世”的可能性的！

四十几岁，有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斗志，杨潮是不该早死的，可是这不是噩梦而是事实，在号称民主国家的中国，杨潮是被罪恶的黑手活生生的捏死了。

我清清楚楚地能够想起他声音笑貌，慢吞吞的谈话声音，在长象牙烟嘴上一支又一支地点着卷烟的那温文的神态，和感情激动时，成了习惯的口角上的痉挛，这一切，都不能再看到了，他的学识，他的热情，他的趣味，他的探索精神，和他不管一切地用全生命来拼撞的斗争态度，一切一切，都随着这短短的几十个字的新闻报导而逝去了！

长江知道了这个消息没有？愈之呢，乔木呢，还有远在纽约的杨刚呢？你的四哥死了，活生生的，被人虐待死了，为了什么？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为了中国民主，他战死在他的岗位上，在这天将破晓的时候。

我记得认识杨潮在一九三一年，见过一两次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直到后来参加“左联”的工作、我们见面和谈话的机会才频数起来，很快，我们之间发生了一种强烈的友情。在当时，热情有余的许多青年文艺工作者里面，他的存在是特殊的，他有广博的学识，丰富的人生经验，有主张，有脾气，肯做事也能做事，他没有特定的一个政治关系，但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不计成败的斗争精神，从他的出身，经历，和他当时的生活来说，毋宁说他是不能和我们一路的，他是一个独往独来的自由主义者，他嗜爱美好的生活，欢喜读各种各样的书，交结各种各样的朋友，爱辩论，感情激动的时候就和最好的朋友吵架，可是不一刻他就说几句自嘲的话，笑着和他的对手和解了。他有丰富的趣味，他养热带鱼，一个时候把上海所有的关于热带鱼的洋书都搜买起来，使上海专业热带鱼的中外商人也不能不向他请教。他养鸟，把他霞飞路汾阳坊的前后楼几乎变成了城隍庙的鸟店。有一次他要送我一对英国芙蓉，送了之后又把养这种鸟的知识传授给我，怕我听过忘记，边讲边写，累得我惶恐不安，可是，他并没有溺于这些趣味，他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是可怕的，说做就做，做不通的时候就一个人想，从书里去求解决，最后是找了人吵架和争论！……在我短短的十几年交游中，这样丰富，这样热情，这样有强烈的个性，而依旧能孜孜兀兀地在实践中求真理的朋友，实在并不多，而像他这样一个人，就在四十几岁的壮年，白白地被法西斯恶魔作践死了！

我记起抗战开始时候的他的那种兴奋，他跑腿，写文章，计划帮别人接洽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忙得连喂鸟的时间也全交给他太太了，一直到上海失守，我走的那一天，问他“你怎办？”他不加思索他说：“留在上海。”我一点也不替他担心，我相信他的决定是对的，他有充分的社会关系，他熟悉上海，他懂得黑夜里走路，他是可以照顾自己和帮助别人的。这样，他在上海活跃了三年，在一家外国通讯社做事，替几家抗战的报纸写评论，帮助戏剧界的朋友们办剧场，他忙，但是他很愉快。

一九四一年，我们又在香港见面了，那时候他是《星岛日报》的军事记者，他的评论是南中国青年人最爱读的读物之一，在湾仔附近的一家小楼上，

他再没有鱼和鸟，有的只是成橱成堆的关于军事、政治、经济的洋书杂志，和贴满了墙壁的画着红蓝铅笔的地图了。

这一年是最紧张的一年，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了，我们见面的时候就谈战局，一直抱着乐观的他，当纳粹攻下维那兹马的时候，他骤然焦虑起来，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用红笔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旁边是一张地图，许久之后才对我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过了这个地方，就——”他停了话，想了好久，才说：“时代变了，武器变了，战争的形势也变了……”又是一阵沉默，他那种忧心忡忡的情状，我此刻清楚地可以记得出来。莫斯科危急了，苏联政府一部分东迁，一天晚上为了莫斯科之战的估计和乔木争吵起来，六七个人的讨论变成他们两个人的激辩，结果是逼得乔木用“上吊”来打赌莫斯科的命运，这情景是当天参加的人都还记得起吧，可是今天，再没有韬奋，再没有杨潮了！

我们在香港沦陷之后分手，大家到了桂林、重庆，他却转到福建去了，对于他，大家是放心的，他一定安全，他一定会有事做，而且一定做得好，果然他当了《大刚报》的编辑、他继续写他的文章，一个时候，没有消息，不多久他的文章又在福建的报上发现了。从这个时候起，他不再露锋芒，他做研究性的工作，他是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聘他去的，可是，莫须有的罪名竟落在他头上，莫名其妙的被捕，不明不自的关进了集中营，我们闻讯之后，向各方探讯，有的说没有捕，有的说捕了又逃出来了，有的说立刻就会释放，拖到战争胜利，凭常识想，他说该可以出来了吧，可是，我到上海遇见曹聚仁先生，知道他还押在杭州，罪名是和好党文化人来往，被作为政治犯而塞进牢里去了，十月十日“双十会谈纪要”发表，国民党政府同意了释放政治犯，我们的心松了一下，可是，他一直没有释放的消息，再三个月之后，受了外国的压力之后又宣布了一次诺言，这次可不能再赖了吧，谁知道，天啊，就为了这一诺言，他“突然”死了！他死得好冤枉啊！死在国民党政府的诺言，死在为了灭口，我在这一瞬间感到了死一般的痛苦，我忧虑到现在还关在集中营里的千千万万爱国犯人的安全了！这是什么日子，这是什么世界啊！

杨潮死了，一个最优秀最有才能最富正义的新闻记者和政论家死了，死了一个就少了一个，我为国家民族痛哭这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可是，争民主的战士是永远死不完的，杨潮啊，你倒下了，但成千成万的人会继续走完你的道路，而终于达到那预定的目的的。

1945年2月

忆达夫

今年8月，是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作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被日本法西斯分子杀害的四十周年。在8月29日——达夫在巴雅公务“失踪”这个日子，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朋友们举行纪念集会，不单是为了追念这位爱国主义的作家和诗人，更重要的是三十年代以来，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对郁达夫的为人和他的作品，有过不少偏颇的、很不公正的评论。因此，和达夫相知的、共过患难的人，有责任为这位舍己助人、为国捐躯的人杰，作出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

我是1928年春，在上海由孙百刚、章克标介绍，和达夫认识的，但是郁达夫这个名字，早在1921年对我就有了根深的印象。这一年10月，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庆祝“双十节”，在神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举行集会，请了一位在日本被称为“宪政之神”的政治家尾崎行雄作报告，尾崎在讲话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清国”，并对当时军阀混战中的中国讲了一些不友好的话。郁达夫就在听众席上站起身来，打断了尾崎的演讲；义正词严地提出了反驳，终于迫使尾崎承认了错误，当场道了歉。尾崎行雄是日本政界的“大人物”，在国际上也颇有声望（现在美国华盛顿每年4月要举行一次樱花节，这批樱花就是尾崎当东京市长时赠送给美国的），一个年轻的东京帝大的留学生，驳倒了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地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畑叮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的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1928年，我在上海沪东区搞工人运动，和文艺无关。我曾和他谈到过郭沫若和田汉，但他从来没有提起他和创造社之间的矛盾，至于他登报声明脱离创造社的事，那是直到下一年有一次陶晶孙和我闲聊时才知道的。这一年盛夏，我在开明书店遇到他，在座的有夏丏尊、章雪村、方光焘。丏尊先生谈到我翻译的谷崎润一郎、金子洋文等人的小说，达夫问我：你译的书在金屋书店出版，创造社的人没有批评你？我说没有，我既不属于创造社，也不属于太阳社。他有点感到意外，这时我才对他说，听陶晶孙说，你退出创造社，郭沫若是很难过的。陶晶孙还说，像出版部那种事务工作，本来是不必烦劳你去做。达夫很快就说，那是一件小事，我不过赔了一千多块冤枉钱，闹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反对我的《广州事情》那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的意思，我在广州就和成仿吾谈论过的。我看他有点激动，就不再讲下去了。事隔半个多世纪，最近我才找到《广州事情》重读了一遍，感觉到这篇文章正好是表现了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作家的预见和卓识。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中，他清醒地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隐患，他提醒大家“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准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应该说，他的观点，和同年鲁迅在中山大学的讲话是一致的。

关于达夫和“左联”的关系，我看到过的有关文史资料和回忆文章中，也有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记载。

1930年2月下旬，“左联”筹备组草拟发起人名单时，对郁达夫应否列名的问题，确曾有过不同意见，有人（郑伯奇、钱杏邨）赞成，也有人反对，当时我不了解文艺界内情，也没有坚持。后来冯乃超和我拿了这个名字向鲁

迅征求意见，鲁迅就问：你们问过郁达夫没有？为什么下列他的名字？于是我们就在发起人名单上加上了达夫的名字，并决定由我去征求他的同意。大概在2月下旬的一个雨天，我和陶晶孙一起去看他，他病卧在床上，我简单地把筹备成立“左联”的事告诉了他，并让他看了发起人名单。他就说：你们要我参加，就参加吧，不过我正在“冬眠”，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事实上，他不久前还当过“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他没有“冬眠”，更没有“意气消沉”。

谈到达夫和“左联”的关系，还有一个直到现在还弄不清楚的问题，那就是郑伯奇1962年9月问写的《左联回忆散记》中所记的“左联”通过了把郁达夫除名的决议。这篇文章发表在1982年第1期的《新文学史料》上，当时我没有注意，直到今年3、4月间郁风和我谈起这件事时，我才找出这篇文章看了一遍，这篇回忆中对于“左联”在会员大会上通过“请他（郁达夫）退出”的情况叙述得很详细，但这件事发生于哪年哪月，却没有具体说明，而只说是在“左联”成立之后的“初期”。“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初期”，那应该是在1930年或1931年之间，当时我是“左联”的执行委员，说我对这样一件大事毫无印象，是不大可能的。更使我不解的是“左联”成立初期的党团书记是冯乃超，不久后接替乃超的是冯雪峰，以及当时和达夫经常有来往的阿英，乃至郑伯奇本人，在“文革”以前的二十多年中，都没有和我谈起过这件事。“左联”初期（到1933年达夫迁居杭州之前），我和他不时见面，他迁居杭州后，每次到上海，也常常来找我，而他也从来没有提到这个问题。现在，乃超、雪峰、伯奇都不在了，已经没有核对的可能。近几个月来，我问过几位研究“左联”史实的朋友，据说冯雪峰在六十年代也曾讲过，说“左联”会员大会通过这个决议时只有他和柔石等四个人反对。柔石是在1931年2月殉难的，那么这件事应该是在1930年的5月之后，因为5月以前“左联”召开的三次会员大会，我都参加了的，我还自信我的记忆力不会坏到连这样一件大事也会忘记到一干二净的程度。当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发生这样的事也是有可能的。当时是“左”倾思想统治时期，既有教条主义，又有宗派情绪，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田汉因为不参加乃至参加“飞行集会”而受到过不止一次的警告。蒋光慈则因为写了《丽莎的哀怨》而被开除党籍。那么，即使“左联”开除了郁达夫的盟籍，也只能说达夫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执行“左”倾路线，而不能把这件事认为达夫就“颓废、消沉”。事实俱在，在三十年代国民党进行文化“围剿”，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刻，他没有退出“自由运动大同盟”；继续为“互济会”工作；后来还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发起的“人权保障大同盟”。谁都知道，这些都是共产党支持的革命团体。

达夫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了比较一致的评论，但是，许多文章都说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家，我认为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全恰当。

1923年他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他写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也许可以说是文坛上最先出现的描写中国工人阶级的作品。

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和他交往较多的朋友中既有周作人、徐志摩、林语堂、汪静之（达夫还和我说过，邵询美是一位很好的诗人）；但也不能不看到当时他和鲁迅、郭沫若、陶晶孙、郑伯奇、钱杏邨有着真挚不渝

的友谊。现在人们一提起徐志摩，就说成是资产阶级诗人，甚至给他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这也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徐志摩和史沫特莱的关系了，我和徐志摩只见过一次，那恰好是在史沫特莱家里，他们谈得很脱熟，而且还颇有感慨地谈到了当时的时事。

我最早读到的达夫的小说是《沉沦》。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说：“他（达夫）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我完全有同感。对于他的作品，说真话，我最喜欢的倒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散文和旧体诗。我这个人对新诗有偏见（除戴望舒、艾青外，新诗我看得很少），在新文艺家写的旧体诗中，我认为鲁迅、郁达夫和田汉可称三绝。他的诗明显地受到黄仲则、龚自珍的影响，但不少评论家只看到他清丽凄婉的一面，这也是不全面的。正如鲁迅论陶渊明诗时所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夭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尚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三十年代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他大量的文艺作品中有一点偏颇乃至败笔，对任何人都是难免的。只看到他飘逸婉的诗，而不提他晚年所写的激昂慷慨的政论文章，显然是有欠公允的。

1938年初夏，在武汉郭沫若家里我见过他最后一面，那时轰炸频繁，连叙旧的时间也没有。很快，我赶回广州，不久，他就到新加坡去了。直到抗战胜利，我从重庆回到上海，才从胡愈之给“文协”的报告中知道他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在苏门答腊遭到日本宪兵的绑劫而“失踪”。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写了四百多篇抗日救亡的杂文、政论，星洲沦陷，他隐姓埋名地过了三年多流亡生活。在那种艰苦复杂的情况下，他一天也没有忘记多难的祖国，对抗日反法西斯战争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这最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精诚。在险恶恐怖的环境中，他对祖国和正义战争充满信心，正如他诗中所说：“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至于在他生命最后时刻临危不惧，舍己为人，慷慨就义的事迹，不仅胡愈之、汪金丁、张楚垠等和他共过危难的战友们写出了回忆，还有日本朋友铃木正夫所写的关于达夫殉难前后的调查报告，都已经用大量事实作出了定论。但正如郁风在《关于郁达夫海外文集》（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中所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对于达夫悲剧性的一生及其贡献，还没有全面的定论，特别是对于他去海外以后的七年，不但一般读者知之甚少，连当时文艺界也几乎无人过问。对于一个作家的盖棺论定，晚节是很重要的。想到像他那样一个赤裸裸来去的率真的作家，如果不能以他全部的本来面目留存在文学史上，将是最大的遗憾。”达夫殉国已经四十周年，现在应该是消除这种遗憾的时候了。

1946年秋冬之际，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达夫在苏门答腊殉难之后，决定要我去新加坡，了解当时还流散在南洋各地的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及向海外侨领传达第二次国共分裂之后的党的方针政策。我于1947年2月到新加坡。当我和陈嘉庚先生谈到新加坡弃守后他们的流亡生活时，他对我说：那时候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侨领。同年5月初，一

位马来亚共产党的负责人和我谈话，也说这位“赵老板”（赵廉——即郁达夫）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些事都可以说明，张楚现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和汪金丁在《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中所记述的，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他不拘小节，这是人所周知的；但是对于大节，他是宁死不屈的。二三十年代，他和周作人过从甚密，张资平则与他同是创造社的发起人，可是，当他知道周、张降敌时，他的态度是斩钉截铁的。他正直、天真，但又倔强、任性，不通世故，不懂权术。对爱情，对知心朋友，特别是对祖国，他有一股痴情。痴情就是至情，痴这个字没有贬义，“绝代风流绝代痴”这句诗，对于达夫是恰切的。

达夫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前年，我重访富阳，双烈亭正在修建。而今，在他心爱的祖国开始腾飞的时候，几十位中外学者将聚合在富春江上子陵台畔，对他的悲剧生涯和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研讨，达夫有知，可以展颜一笑了。

1985年8月29日

一位被遗忘了的先行者——怀念“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同志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念起现在很少为人知道的童长荣同志。

童长荣同志是太阳社成员，“左联”发起人之一。但“左联”成立不久，党中央派他去东北工作，从此他和左翼文艺界的战友们就失去了联系。

一九三九年在桂林的时候，李克农同志告诉我长荣同志在东北遇难，但不清楚具体情况。

一九七七年，骆宾基同志一次与我闲谈，偶然提到长荣同志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他那里才知道，长荣同志到东北后，在“抗联”工作，抱病率领游击队跟日伪作战，歼灭了大量敌顽，在战地壮烈牺牲。据说，在“抗联”中对他最熟悉的是李延禄同志。那时李正在医院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手术，不便惊动他。这个“悬念”就这样一直挂在我的心上。

很巧，前几天我到北京医院看病，碰到了李延禄同志。我们素不相识。经医生介绍，我们在候诊室作了一段谈话：

“听说你在写东北‘抗联’的回忆，写完了没有？”

“写了一部分，身体不好，还没有写完。”

“我早想向你打听一个朋友的事情，就是童长荣同志。他是你的部下吧？”

“不，不，他是我的领导。”

“我看了一些关于‘抗联’的材料，也曾问过冯仲云同志，他们对童长荣同志的情况都不了解。”

“那是因为他到东北以后改了名字，我们都叫他‘老张’，代号是张麻子，知道他叫童长荣的很少。”

“据我的记忆，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不久，他就到东北去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东北的？”

“长荣同志是一九三三年中共满洲省委四月大破坏后不久从上海到东北的。”

“他在东北担任过些什么工作？”

“先在满洲省委负责工人运动，‘九·一八’后，省委要他到吉林组织游击队，这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他一直在‘抗联’担任领导工作。”

“我很想知道他在‘抗联’的一些具体情况。”

“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虽然他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是作家，但是他没有架子，政策水平很高，同士兵和群众共甘苦，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件事，‘抗联’初期，我们做一些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当时写在墙上的大标语有‘彻底歼灭法西斯日寇’这样的口号，长荣同志看了，同大家商量说：应该把法西斯政府与被迫出来打仗的日本士兵区分开来。于是，他亲自用日文写了许多颜色不同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你记得离家的时候你母亲的眼泪吗？’‘你记得在车站和码头送别的时候你妻子的眼泪吗？’等等。长荣同志常说，一般的日本士兵多半是从农民、工人中征集来的，他们也是受害者，对他们要攻心，谩骂没有用，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感。”

我还想从李延禄同志那里听到关于长荣同志更多的情况，医生叫他去看病，谈话没有再继续。

我认识长荣同志，是在一九二五年。我们都参加了东京日本进步学生组

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偶然相识，以后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回到上海，他已经在上海党的某个区委机关工作了。他和蒋光慈、钱杏邨同志经常来往，因为他们都是安徽人。他有时也参加第三街道支部的小组会，他写过一些散文、短篇小说和诗，用笔名发表在太阳社的刊物上。我曾在蒋光慈那里，看到过他写的一部描写安徽农民生活的中篇小说的原稿。“左联”刚成立，他离开上海，接着光慈又病故，因此他这些手稿的下落就难以查考了。

李延禄同志告诉我，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了长荣同志。关于长荣同志在东北的情况，他和骆宾基同志有过长谈，并希望骆也能写点纪念回忆他的文字。我想，这些被遗忘了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先行者，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

“

“左联”六十年祭

岁月流逝，“左联”成立到现在，已过了整整一个甲子，六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真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杜甫：《赠卫八处士》）之感，参加过“左联”成立大会的人，在世者已屈指可数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化运动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最明显的就是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的文化大“围剿”。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围剿”就有反围剿，这就出现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等等，开始筹备于1929年秋，相继成立于1930年春夏之间。大家知道，在这之前，从1928年2月起，上海文艺界发生过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这时候一方面工农红军正进行着剧烈的反围剿的战争，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的大部分领导人已到莫斯科去参加党的六次代表大会，所以对文艺界的问题还排不上党的议事日程。党中央决定停止文化界的这场内部论争，组织一个共同对敌的团体，是在1929年9、10月之间，由于事情发生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文字资料不全，所以对筹备组织“左联”的具体情况，近代文学史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最近读了《周恩来年谱》，问题才得到了澄清。“在1928年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已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出现了某些裂痕，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了论战，回国后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中共中央抓文艺工作的开始”（《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版一七九页）。周恩来是1928年“11月上旬回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周恩来年谱》一四六页），当时，党正处在一个很困难的时期，既有陈独秀问题，又有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从《年谱》中可以看出，他回国后夜以继日地工作，所以直到1929年秋，才能安排时间来处理文化界的问题。但是，他在“左联”成立的几天之后，“3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离开上海，途经欧洲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年谱》一八页）。这之后，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就由李立三领导了。我们这些过来人都不会忘记，1929年是中国和世界近代史上的很不寻常的一年。在资本主义世界是经济大萧条爆发的一年；在苏联，则是有名的“大转折的一年”；在中国则是陈独秀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被开除出党的一年。为了反右，所以新成立的进步文化组织都命名为“左翼”。

六十年匆匆过去了，这六十年的道路是漫长而艰险的，从1928年到三十年代的前五年，是国际共运在世界范围蓬勃发展的年代。共产国际的“六大”也是在1928年召开的；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提出了所谓“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死亡已屈指可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正处于决战前夕”，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从政治上、技术上直接准备无产阶级起义”，“国内战争的旗帜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次大会上，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翟秋白，曾对殖民地革命问题和第三时期理论问题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在这种大气候中，同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他号召全国总暴动和命令工农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是“左联”成立之后三、四个月之间

的政治形势。马克思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意志的支配”（《马恩选集》第四卷三七三页）。“左联”初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支配下进行活动的；“左联”不断地号召它的盟员在上海闹市举行“飞行集会”，不计成败地赤膊上阵，就是这种盲动主义在文艺界的具体表现，但这也只是从5月到9月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到“8月上旬，（周恩来）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先后动身回国”（《周恩来年谱》一八四页），9月24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行动。但是三个月之后，1931年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调和主义”为名，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观点，而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柔石、冯铿、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就是在这场暴风骤雨中牺牲的，而冯乃超、董长荣、洪灵菲等诗人和作家，则是为了准备“全国总暴动”而调到外地去当职业革命家了。

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持续了四年之久，白区的左翼文化运动不可能不受这种“左”倾思想的影响。但是五烈士事件之后，情况有了一点改变，飞行集会、用“铁的纪律”命令盟员去散传单、写标语的事渐渐减少了，当然，更没有发生过反AB团那样的残酷斗争。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之后，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要求团结抗日。国统区的环境变了，人心变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王明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在周恩来主持下，党中央于1931年9月发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之前，决定了由瞿秋白领导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这样，由秋白建议，“左联”发表了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这个文件是先由冯雪峰写成初稿，经“文委”和各联讨论，茅盾写了二稿，最后由瞿秋白定稿的。正如茅盾在他的《回忆录——十二》所说：这个决议“分析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并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创作问题，理论斗争与批评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特别是一反过去忽视创作的倾向，强调了创作问题的重要性，就题材、方法、形式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但是也应该看到，这只是纠偏的开始，对“左联”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批判，歌特在党刊《斗争》上，发表文章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这是在一年之后的事了。

如前所说，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年代，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所谓“第三时期”的理论，“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正处于决战前夕”，这决定不仅影响到中国，也影响到了西欧、北美和日本。无产阶级很“左”，知识分子——包括西欧、美国、日本的知名作家也“左”倾了，因为当时苏联有一个“拉普”，日本有一个“纳普”，我还记得，1930年11月初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还批评过法国大作家巴比塞的“右倾”。“左联”初期的“左”，一是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二是我们这一些人都还年轻（“左联”、“社联”成立的那一年，鲁迅四十九岁，杜国库四十一岁，郑伯奇三十五岁，茅盾、郁达夫三十四岁，田汉三十二岁；党的领导人周恩来三十二岁，瞿秋白三十一岁），我们这些人年少气盛，不了解中国国情，又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左”风一来，就身不由主地卷进

去了。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左联”的工作和作风在1932年前后有了一定的改变，首先是国内外的形势变了，一·二八战争之后，民族矛盾上升，人民群众要求团结抗日，关门主义行不通了；其次是瞿秋白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他和鲁迅、茅盾亲密合作，以他的威望和睿智，开始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茅盾在回忆录中说：“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的确，没有他，要在王明路线时期扭转这个局面是不可能的，对此，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说明了当时“左联”内部的真实情况，他说：“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见《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三期）。当时茅盾是“左联”的行政书记，和党内外文艺界有广泛的接触，他是最了解“左联”和“文委”的真实情况的。茅盾文章中说“左联”后期开始摆脱了“左”的束缚，所以才能“蓬勃发展，四面出击”。具体的情况是：我们的作家可以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和其它报刊写文章了；“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上，也可以登非盟员的作品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开放”，作家有了用武之地，一大群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在这几年内初露头角。到1933年，我们甚至能像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作怪一样，可以在国民党办的《晨报》幅刊上去批判“软性电影”了。“左联”有前后期之分，其他联盟或先或后也有了明显的转变。比如“社联”，1930年成立的时候，盟员也是清一色的党员，但是领导党团的朱镜我、杜国庠、潘梓年等都是学者型的人，作风比较持重。特别是杜国庠当了党团书记之后，不仅和“农村经济研究会”、“国难教育社”等发生了联系，而且还团结了邓初民、张志让、毕云程等知名人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联”的盟员徐雪寒、黄洛峰创办了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由于有了自己的出版社，所以“‘社联’在左翼文化运动中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学习和运用”（许涤新《风狂霜峭录》，三联书店版六五页）。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都是在这个时期由“社联”的盟员翻译出版的。也是在1932年，瞿秋白同意了阿英、郑伯奇和我参加明星电影公司，下一年组成了党的“电影小组”；1933年，同意田汉通过“苏联之友社”和任光、张曙等组成了“音乐小组”。这就为波澜壮阔的“救亡歌咏运动”打下了基础，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文化大“围剿”也在日益加剧。瞿秋白于1934年1月离开上海，调往苏区，从1934年6月以后，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三次严重的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在1935年2月的第三次大破坏中，“文委”书记阳翰笙，“社联”书记杜国庠、许涤新，“剧联”书记田汉被捕。这之前，工农红军已开始长征。所以从这以后，上海地下党就被切断了和党中央的联系。当时国民党实行了严厉的新闻封锁，我们这些人只能在外文报刊上看到一些显然被歪曲了的红军长征的消息。我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在当时，我们的工作是很艰苦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是，一分为二，也未尝不可说，让一个未成年的人独立地担当起沉重的任务，的确也是一种锻炼和考

验。更进一层，我们当时所处的是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狂飙突起的时代。这就是‘何梅协定’之后，“一·二九”事件之前的那个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的时期，要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进行革命工作，形势逼着你非接触实际、深入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不可。这也就是逼着我们进一步抛弃教条主义、关门主义，投身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洪流中去了。”（《懒寻；日梦录》三联书店版二七七页。）

文化“围剿”在变本加厉，许多人被捕、被杀，但是形势比人强，革命文化运动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随着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兴起而蓬勃发展。在上海的三家进步书店——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和“社联”办的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创办了《世界知识》、《光明》、《文学》、《译文》、《新认识》、《妇女生活》等等发行量很大的杂志；“业余剧人协会”恢复了剧场演出；通过明星、联华、电通三家电影公司，摄制了许多进步电影；特别是在“音乐小组”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亡歌咏运动，《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唱遍了全国。革命文化不再局限于“左翼”，事实上已经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包括工人、学生、店员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战斗队伍。1935年10月，我们看到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我们组成了新的“文委”，调整了各联盟的工作。不久，史沫特莱转来了萧三的来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认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在路线、政策发生大转变的时候，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政策水平的不平衡，或者由于认识不一致而发生争论，看来也是难于避免的。直到1936年春夏之交，潘汉年、冯雪峰相继回到上海，经过茅盾、郑振铎、郑伯奇的努力，这一转变才达到目的。1936年9月同时发表在《文学》和《新认识》上的由鲁迅、郭沫若、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洪深、沈起予、茅盾、林语堂、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周瘦鹃、谢冰心、张天翼、傅东华、郑振铎、郑伯奇、黎烈文、赵家璧，丰子恺等二十一人联合署名的“文学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文艺界，终于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从“左联”成立到现在，六十年过去了。近年来，有人建议重写文学史。我认为对“左联”及左翼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应该实事求是，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它有夫误，但是在冲破反动派的“围剿”，宣传、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团结一代进步作家方面，还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做过正确的结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八·一三”之后，工农红军改编的十八集团军在上海设立了公开的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在他的统一安排下，上海文化界有人去了延安，有人参加了抗战演剧队、战地服务队，有人坚持、隐蔽在上海。

1938年2月，郭沫若、老舍等在武汉组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继续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而奋斗。从“左联”到“文协”，历时八年。在这八年中，文艺界有多少人被捕、失踪，有多少人在牢狱中、战

地上英勇牺牲，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统计；有人留下了姓名，有人连姓名也没有留下。他们为民族民主革命而成仁就义，他们是不朽的。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沿着他们的足迹奋勇前进！

1990年2月20日

纪念郑正秋先生

今年1月25日，是郑正秋先生的百岁冥诞。七十六年前的1913年，他在上海为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部短片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引进一种崭新的外国艺术，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先驱者们走过来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从引进、模仿、尝试到创新，正秋先生对新生的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铭记的。

我认识正秋先生是在1932年8月，在明星电影公司和他共事也只有短短的三年，但他是一位能自编自演的文明戏名角，以“言论老生”驰誉上海，则是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就知道了的。我在《懒寻旧梦录》中写过对他的第一印象：“张石川的魁梧和郑正秋的瘦小，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张石川有点老板气派，而郑正秋则不像文明戏演员，举止谈吐都像一个很有涵养的书生。”三十年代初，文明戏已经衰落，也的确演过许多低级庸俗的戏。因此，当时的新文艺工作者都对文明戏的庸俗无聊和宣扬封建伦理有强烈的反感，但是和我们同时参加明星公司的钱杏邨（阿英）却有不同见解，他是研究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专家，就在我们认识正秋先生之后不久，就一再对我说：对文明戏不要有偏见和成见，辛亥革命前后，文明戏是排满的、爱国的，是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寡妇守节、虐待婢女的，是为平民百姓鸣不平的。阿英告诉我，辛亥革命前，正秋先生就在于右任办的《民立报》上写文章，不仅提出过：“剧场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也”的主张，在表演艺术上，也是很有功力的。他编演过《秋瑾》、《革命痛史黄花岗》和《蔡愕脱险记》等等，都是紧密地为民主革命服务的。

1935年正秋先生去世之后，欧阳予倩先生也对我说过：郑正秋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员，作为文明戏的“言论老生”，他可以面对观众发表长篇“言论”，铿锵有力，娓娓动听，他能让全场观众鸦雀无声。

为了学习，我从明星公司调看了正秋先生自编自导的《孤儿救祖记》。接着，又在1934年春看了当时轰动影坛，在上海连续放映了六十天的《姊妹花》，这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一部划时期的杰作。记得洪深先生写过一篇影评，说《姊妹花》是一支冲破严冬冰雪的新苗，是一颗为国产电影扫清道路的炸弹（大意）。二三十年代美国电影垄断了中国市场，占发行量的百分之九十，当时的进步青年和“高级华人”是很少看国产影片的。《姊妹花》放映之初，也曾受到过左翼影评家的批评，但是不仅上座率和票房价值支持了它，一次由石凌鹤主持的座谈会上，还是对这部雅俗共赏的国产片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有人认为《姊妹花》和正秋先生以前拍的《盲孤女》比，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是正秋先生的一部新旧交替的作品，旧的伦理观念还没有清除，而新的社会意识则正在萌长，作者开始用穷人与富人的阶级观点，来说明善与恶、美与丑、高尚与卑劣的根源了。

也是为了学习，有一次我问他：要拍一部好电影，既要有意义，又要受观众欢迎，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编剧、导演，还是明星？他回答说：都重要，但是我的经验是，编剧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都要记住两点：“一是情理，二是分寸”。这几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启发很大，我不止一次反复地宣传过他的这一观点。

正秋先生出生于潮州的一个富商家庭，他父亲还给他捐过官，但他却深

深深地爱上了戏剧、电影，一生视富贵如浮云。他青年时期受过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但是他爱国，他同情弱小，他不断地追求进步。“九·一八”、“一·二九”之后，他的进步是很显著的，1933年10月，他参加过一次欢迎国际反帝大会代表的集会，田汉写的《影事追怀录》中有一段记载：“我曾怂恿严春棠作东道主，在新新公司酒楼举行过欢迎马莱、古久列的盛宴。……席间由严春棠、郑正秋、卜万苍致欢迎词，继由马莱爵士致答词，他首先说明此次来华之意义，然后谈到东西方被压迫民族怎样才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古久列（注：法国共产党作家，《人道报》主编）致词，他慷慨激昂地陈述全世界热爱和平，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之必要。……马莱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看到租界上的巡捕可以任意殴打黄包车夫，为什么黄包车夫不起来反抗，旁观者也熟视无睹？大家公举郑正秋作答。郑首先说明，由于清末以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才有今天的租界，在深重的内外压迫下，车夫们的生活很苦，但是中国人民也不是不反抗的，1925年的‘五卅’南京路事件，就是一个例子。马莱爵士对郑的回答表示满意，并表示回国后一定要向英国上议院提出抗议。”

这件事可以说明，到三十年代中叶，郑正秋先生已经不是他自称的改良主义者和中间派，也不只单是一个名演员、名导演，而是一个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了。不幸的是天不假年，《姊妹花》问世之后，不久他就溘然长逝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正秋先生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他为戏剧、电影事业艰辛地奋斗了几十年，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有过妥协，也有过突破，但是终其一生，他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是始终下变的。他乐于助人，乐于提拔新人，也是始终一贯的，中国电影界的两位杰出的导演蔡楚生和沈西等，都受到过正秋先生的青睐和帮助。我记得楚生同志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初到上海的时候为了糊口，在电影厂当杂工，当临时演员，后来知道正秋先生是他的同乡，就在一天深夜冒昧求见，对这位前辈但陈了自己对电影艺术的意见。完全出于意外，这一席话竟受到了正秋先生赞赏，慧眼识英雄，当晚就决定让他当了自己的助理导演。沈西等在艺术上是一个勇敢的探索者，而在人际关系上却被认为是“怪物”和“弱者”，要不是正秋先生的支持，在天一公司受过排斥的他，是不可能在明星公司当上独当一面的导演的。

正秋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可能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但我还要再说一遍：他对中国电影事业做出的贡献，将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铭记的。

1989年2月4日

关于关山月画展特辑

《文岗》出了半页中国画作家关山月先生的画展特辑，当天就听到了一些不很有意义的闲话，我们不相信艺道中人会这样偏狭，当时丝毫不曾介意，今天，我们又接到了一位署名“钝”字的《文岗》爱读者的来信，说这“是不该的，是一件可惜的事”，我们感谢这位读者的好意，但是对于“钝”先生的惋惜，却还是不敢苟同。

《救亡日报》是一张以巩固强化民族统一战线为任务的报纸，《文岗》是以巩固文化界统一战线为职志的副刊，所以只要对于抗战救亡多少有点裨益的文化工作，我们都不惜替他尽一点绵薄，对于新的如此，对于旧的也是如此，旧形式的诗，旧形式的画，旧形式的小说，……只要他还有读者（即使他已经在逐渐减少中），那么他就要在现阶段的人民文化生活中起相当的作用，因此，我们对于这些旧艺术形式的作家，尤其是那些已经不满于过去的作风，而开始走向新的方向摸索的人，特别要用友谊的态度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更进步。因为作风派别不同而先天的用一种嫌恶的态度来对付方才开始走向进步的人，现在似乎已经不是前进的文化工作者应有的事了。

关山月先生的画，在新的，进步的画家看来，当然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批评的地方，但是他并不拒绝别人的批评，他还亲自再三的对人说：“单讲好话对我没有好处，希望给我严正的批评”，所以我们以为将他的画介绍给观众，在精神上对作者给以鼓励，和对技术思想给作者以批评，不仅不背道而驰，而正是同时需要，记得去年关先生在香港开展览会，中国在倾向上最前进，在技巧上最优秀的新画家叶浅予、张光宇……诸先生，都帮了他很多的忙，光宇替他编的特刊，篇幅也许要比《救亡日报》的大上了几倍，这一种友谊的鼓励，我相信不仅消除了新旧画家间的隔膜，而且对关先生的前进作了一个有力的推动；在这里我必须提起就是当时新画家们一方面诚挚地替他帮忙，他方面却没有放弃了意识上和技术上的批评，只有这种坦白而诚恳的批评才能使过去不同于一个方向的作家接受，也是可以想象的事了。

在目下这样的国内外情势空前困难的时候，巩固团结应该是每个前进文化工作者的责任，那么对于一个刚从纯艺术的画室里跑出来，要跑一跑战地，描写一下战时人民生活的画家，难道不该给以应有的（即使是稍稍过度了一点的）鼓励？前进的人只应该有一种更大的责任，而并不能要求有更多的权利，前进文化工作者误认了自己的责任和地位，难道统一战线不应该前进者去统后进者，而该由后进者来统前进者吗？

我们不能同意“钝”先生一般的看法，但是我们极希望有余所亚先生所发表一般的批评，因为批评不妨严格，而心底和态度都要坦白和民主。

1939年

悼念西苓

在中国电影界人才寥落的时候，骤听到西苓的死讯，真是一件哀寂的事情，特别是战时需要新的干部来创造，而这有力的艺术武器还被支配在模仿横行，形式偏重的作风下面的现在。

中国有电影已经近三十年，而名符其实地可以说有了“中国电影”的那还是“九·一八”以后的事情，电影工作的重要，已经屡屡被提出了，而“新”的文化人始终视这一领域的工作为畏途，戴白手套的“艺术家”望着这一被脏手捏着的武器摇头，对于企图从这脏手里面夺回这一武器的人们，暗中报之以轻蔑和恶意的冷笑。在旧人的排挤和新人的鄙视之下，极少数不怕齷齪和不相信这一领域真是齷齪到底的“文化人”，突入了当时被叫做“黑暗圈”的电影场，在生活的泥泞中打滚，在恶意的荆棘中潜行，使中国电影能够在十年中追上了二十年来的落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的辛酸与苦战，在今天恐怕只有极少数当时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理解了，这极少数的中间，西苓是最初冲入这个圈子，而又是在这圈子里遭受了最大限度的虐使与排挤的一个。

我认识西苓在一九二三，距今是十八年了，从他的西京美术学生时代，经过“艺术剧社”，“中华艺大”，“明星影片公司”，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一瞬的“一贯”大公演，除出他在桂林的一个短时期之外，工作上有了不断的关联，因为相处日久，幸也许不幸，我知道了更多别人所不易知道的他的性癖和弱点。他在戏剧电影界的短短的十载生涯，是充满了斗争和矛盾的历史。在荆棘的道路上，他是一个勇敢的斗士，但同时他更是一个彻底的弱者，为了达成一个目的，他可以忍受有洁癖的文化人所绝对不能忍受的羞辱，但是他可以毫无抵抗地，接受足以使他整个计划，陷于无法完成之让步。他常常苦笑，这苦笑表示他的顽强，但同时也正表示他懦弱。他酷爱卓别林，而本质上却是一个甘地主义的信徒。他的艺术是一种以柔胜刚，以弱胜强的使刚者强者看了自己觉得不好意思的苦笑，而他的人生哲学却是一种潜藏在不抵抗之深底的顽强的抵抗。

在泥泞中，他走了十年，也从这泥泞中，他生产了中国电影艺术上也许在一个短时期之内不会被人忘记的珠玉般的作品，从《上海二十四小时》、《船家女》到《十字街头》，这是一个飞跃，可是当他用不抵抗和妥协累积起来的“地位”好容易草奠基础的时候，运命的恶戏便不容情的将他从世界上夺去了。

不单是为了友情，在戏剧电影界寥落的时候，一个真正酷爱电影的“熟练工”的逝去，总觉得是一件难以排遣使人哀寂的事情。

1942年

悼沈振黄

去冬黔桂边境战事紧急，千万灾民死亡载道的时候，我从报上看到了振黄坠车惨死的消息。我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我还一直希望着这消息的可能不是事实。但，不幸的消息，终于一次又一次地被证实了，我在文协理事会上听到荃麟兄的报告，那已经是事隔一月，敌人退出黔境，人们庆幸着自己的侥幸不死，而又在苟安中睡眠下去的时候了。

我不知这该用什么话来形容当时的心境。讲不尽的黔桂流亡线上的悲惨故事，紧压着每个人的心，我觉得在千千万万个无辜的人民蝼蚁般的无声地死去的时候，在整个民族被扔掷在悲哀的大海里的时候，为着一个相知的朋友的死亡而哭泣，而申诉，对于振黄这样一个为着尽一个人的责任，为着使他的同胞免于死亡而自己心安理得地死去了的人，似乎是一种近乎冒渎的事了。直到看见曼其带着三个饿病得不成人形的孩子逃到重庆，我一直把个人的对故人的哀感深藏在心的深处了。

我不想用炫耀的字句来赞扬振黄在绘画乃至文化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平常的人，他从来不想把自己的位置安置在平常人之上，他安于平常人的工作，他死了，他尽了一个平常人的责任。我认识他在抗战之前，在当时许许多多激昂慷慨的人群中，他没有给我不平常的印象。抗战开始，他要我把他介绍给钱亦石先生领导的“战地服务队”，他的态度是平静到一点点“慷慨从军”的痕迹都没有的。几年之后，我在东江碰到他，在桂林碰到他，在香港碰到他，最后一次是我从香港逃回的时候碰到他，不必替他们讳饰，他的工作环境是不如人意的，也许应该说，一种外在的压力，正在一天天的增加，但他从没有谈到这些他心安理得地工作，画画，教书，管庶务，跑腿。一起从上海出来的一群人分散的分散，疲倦的疲倦，忧郁的忧郁了，可是，在他，好像觉得一个人是应该受难，应该吃苦，应该愉快地承受这一切不如人意的磨难的。忘却自己，不管自己的所谓“前程”，为抗战，为人民，为了那一点，用力多而效率低的工作，他把一个平常人的全心全力倾注到这人民的事业里面去了，他的死，在旁人看来是壮烈，是太可怜，可是在他，也许并不觉得这样吧，因为，从他参加社会活动以来，在人生的旅途中，他也是一直地“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别人”，而甘心情愿地自己爬坐在既不舒服而又危险的车顶上的！

死亡又从我阵营里夺去了一个心甘情愿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的青年朋友，我想起了钱亦石，想起了王河天，想起了一直和他一起默默地工作过来的许多朋友，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走的路，他们遗下来的岗位，是会有更多的人来承继的。……

1945年4月

郑振铎同志的一生

我国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访问阿富汗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文化代表团团长，十月十六日途经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现将郑振铎副部长的生平简介于后，以示悼念。

郑振铎同志福建长乐人，一八九八年生于浙江的温州，出身于穷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依靠亲友们的帮助，一九一七年到北京求学，进了铁路管理学校。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编《新社会》杂志。不久，这个杂志被北洋军阀查禁，他又和沈雁冰等发起“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一九二一年赴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创办最早的儿童读物《儿童世界》。一九二二年起，主编《小说月报》，同时，在上海大学任教，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与叶圣陶等主编《公理日报》，并被选为商务印书馆工会代表，参加了实际斗争，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振铎同志避居英国，在欧洲游历一年，一九三一年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及燕京大学教授。此后四年中，主编过《文学》及《文学季刊》，写成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册，并以西谛、郭源新等笔名，写下了许多学术性的文章和写成了《桂公塘》等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同时，为生活书店编《世界文库》。在这个时期，振铎同志积极参加反帝反法西斯活动，对左翼文艺界给了许多帮助。一九三七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沦陷之后，他与胡愈之同志等组织“复社”，刊印进步书籍，并编著了《中国版画史图录》五辑二十四册。抗日战争胜利后，振铎同志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反共政策，曾主编《民主》（周刊），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和恶势力进行了斗争。一九四七年《民主》周刊为反动派禁止出版。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共中央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一九四九年初由上海秘密赴香港，再由香港到达初解放的北京。同年四月，到捷克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七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第一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的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九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一九五二年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一九五三年九月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及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一九五四年六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同年九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年底，被选为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七年七月，又担任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访问印度尼西亚，同年赴捷克和苏联讲学。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富汗、阿联访问，不幸在中途因飞机失事殉难。

郑振铎同志是热烈的爱国者，也是坚决地为民主与和平而斗争的战士，他是优秀的作家、文学史研究家、严肃的文物工作者，也是我国首屈一指的藏书家。他的一生横亘着新旧两个时代，在黑暗而困难的日子里，他没有退缩，没有迷路，他热烈地追求光明，他终于找到了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他已经是满六十岁的人了，但是，不论是治学或者从政，他的干劲、务实精神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振铎同志的遇难，是我国文化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也是国际和平事业的

重大损失。但是，他的牺牲决不是没有代价，他牺牲在为和平、友谊和文化交流而工作的人民外交的岗位上，他的牺牲是光荣的。

振铎同志，你安息吧！后死的人，将勇敢地担当起你未完成的工作。

1958年11月

一个最有才能的党员艺术家去世了——悼程砚秋同志

要写几句悼念的话，可是拿起笔来，我茫然了。

程砚秋同志去世了，这件事，直到现在我好像还不能置信。十天前他还在给上海京剧院的演员们说戏，一礼拜前他还约我和他谈谈访欧讲学的事情，五天之前，我还把一位青年演员给我的信转给了他，这个青年演员决心“立雪程门”，要我给她再作一次介绍……

我和砚秋同志算不上老朋友，我们之间的交游也不算太密切，但是他的性格和品质，却在我心上留下了一个极深刻的印象。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绝没有旧社会梨园行的旧习气，一方面虚心好学，在政治上、艺术上力求进步，另一方面不论对人对事，都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有主张，也有脾气。在小问题上有时候他显得相当孤耿，可是在大问题上他却恩怨分明，无所顾虑。我曾经说过，同样是知识分子、艺术家，洋学堂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比从旧社会煎熬过来的艺人们更难于改造，这主要是因为对新旧社会之不同，艺人们有着比较深刻的体会和比较。解放以来，砚秋同志讲话不多，在公共场合从不突出自己，可是他却身体力行，切切实实地用他不倦的工作，来表示了对新社会和共产党的热爱。去年，当我告诉他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他入党的时候，五十几岁的人显得像少年人一样的腼腆，紧握着我的手说：“这太高兴了，我一定要以更多的工作来报答。”

不幸的是正当他找到了正确的归宿的时候，正当他的艺术到达了圆熟境地的时候，正当他能够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要把他的艺术传授给下一代的时候，正当文学艺术界轰轰烈烈地全面大跃进的时候，他突然倒下了。在送殓的时候看到和他同年辈的、和年轻演员们的眼泪，真觉得这损失实在太沉重了。

砚秋同志去世了，一个最有才能的党员艺术家去世了，死一个就少了一个，我为中国戏剧界痛悼这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当然，流泪是补偿不了这个损失的，后死者应该挑起他放下了的担子，学习他的榜样，整理和发扬他丢下了的艺术财富。我们要有一支既红又专、真正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文艺队伍，而这支队伍正在逐渐的形成壮大，它雄壮的脚步、声音，已经越来越响亮了。

砚秋同志应该没有遗憾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光明的今日。也已经看到了更光明的明天。

1958年3月

《章汉夫文集》代序

今年7月，龚普生同志来访，告诉我汉夫同志的文集已经编定，即将出版，并要我写一篇短文，作为这本文集的代序。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拿起笔来就感到心酸，这位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士，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而离开人世，迄今已经十四年了。他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2年去世的，要是他能看到“天安门事件”，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革命”，该多好啊！

汉夫同志是1933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从广东调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从1934年6月到1935年2月，上海地下党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他在1934年10月第二次大破坏时被捕入狱。这一段时期我们同在上海，但没有见面的机会。汉夫同志的父亲谢仁冰先生是一位开明的工商业家，经过许多周折，花了几十两黄金，才把他“保释”出来，可是他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了当时负责“社联”工作的钱亦石同志。

1935年10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说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时刻，一方面上海地下党惨遭破坏，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工农红军正在长征，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了《何梅协定》，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组织起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已经冲破了原来的“左翼”圈子，反对内战，抗日救国的口号。已经把成千上万的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爱国人士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的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所以这一年10月下旬，我在周扬同志家里第一次见到汉夫同志的时候，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动员群众，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以及重新组建“文委”的问题。汉夫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的1927年在美国入党的，他了解国际形势，有党务工作的经验，所以临时“文委”组成之后，他就和乔木、周扬同志一起，领导“文委”所属各文化社团，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团结群众，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汉夫参加“文委”的1935年秋到1937年9月全面抗战，这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大转折时期，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要让广大的群众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得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正是在这个危急关头，汉夫同志夜以继日，笔不停挥，在《读书生活》、《世界知识》、《自修大学》、《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写了大量的国际述评和政论。他的文章发表时用过许多笔名，“汉夫”只是他的笔名之一。所以现在编辑他的文集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据我所知，搜集在这本文集里的，可能还不足他实际写的文章的三分之一。这里还可以讲一件鲜为人知的逸事：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大家都叫他“老谢”，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之间，很少有人叫真名真姓的。所以直到1936年初，我也只知道他的笔名叫汉夫。有一次，他对我说，广州有一份托派办的小刊物，有一个人写文章也用汉夫署名，所以这个笔名不能用了。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你在《读书生活》上用这个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已经有了许多读者，不如加一个姓吧。于是我就在汉夫这个笔名前面加了一个“章”字。这样他就姓了章，党内外通行，知道他姓谢的反而很少了。直到这位“章汉夫”成为新中国闻名海外的、杰出的外交家为止。

我和汉夫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抗战前在上海两年，抗战胜利后在香港

两年。但是由于他和我曾同在“文委”工作过，所以十年浩劫中我的事株连到他，他的事也株连到我。在那时，逼供我最凶的有两个专案组，一是“周扬专案组”，另一个就是“章汉夫专案组”。“追查”的重点，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解散“左联”，为什么要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回答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容易的，解散“左联”是根据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提国防文学的根据是我们看到“八一宣言”。到今天，是非曲直应该是很清楚了。可是，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79年9月，党中央为汉夫同志平反昭雪的前后，居然还有人窃窃私议，说什么“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所以“周扬一伙”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为了让现在的青年人知道一点历史的真相，写到这里，我想推荐大家读一读吴玉章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见1978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八位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孔原、高自立、滕代远、饶漱石、沈之生），主持《救国时报》的先是李立三，后是吴玉章。“八一宣言”是由代表团共同商议，经过七天的反复讨论，写成初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经季米特洛夫最后定稿的。假如这个宣言也能说是“右倾”，那么，我们对1939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又能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芦沟桥的炮声打响，恩来同志就决定汉夫和潘梓年、许涤新等同志筹备出版《新华日报》，我则留在上海，协助郭沫若同志主编《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他转移到武汉，我则随《救亡日报》同仁到了广州。这之后，直到1942年，我们才在重庆见面。这五年中，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只在1938年4月，我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时和他见过一面。抗战初期大家都很忙，大家也都很兴奋，可是那一次他却向我诉了苦。对这件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提到过，他当时感到最困难的是来自“王明的刁难和挑剔”，“每天早上都提心吊胆，一个标题，一句话他认为不妥，就会挨骂”。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他从来就没有顺从过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回到重庆。他就要我给《新华日报》幅刊写稿，这就是后来成了专栏的“司马牛杂感”。我在国统区和香港办了几年报，一方面自以为懂得了一点读者心理，想写一点不落套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犯自由主义的错误。所以1943年《新华日报》小整风，汉夫作为党报总编辑，就得为我和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在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有错误的杂文负责。好在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我们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

1944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筹备组建联合国，汉夫作为董必武同志的助手，到美国去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制定联合国宪章的大会。这样，我就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秋我回到上海，先是办《建国日报》，后来又和姚溱、方行等同志办《消息》半月刊。但这两份报刊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了，于是我只能到别的报刊上写杂文，打游击。记得汉夫是1946年春回到上海的，大家都忙，只在马思南路的“周公馆”会晤过一次。眼看《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没有可能了，恩来同志就派他到香港去复刊《华商报》。同年10月，国共谈判即将破裂，恩来同志要我到新加坡去，向海外侨胞传达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方针政策，我途经香港时，《华商报》、《群众》和英文《中国文摘》

都已出版，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所以南方分局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通过陈嘉庚先生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为香港进步文化界筹款”。汉夫当时是南方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我在新加坡耽了七个月，筹集了三万多元叻币，于1947年回到香港，再一次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给我在《群众》上辟了一个专栏，先是“茶亭杂话”，后来又改为“蜗楼随笔”，一直写到1948年底。这些类似杂文的政论和时事述评，都是汉夫逼着我写的，或者是他出了题目要我写的。同年冬，中央调汉夫回解放区，担任外事工作，我再一次接替了他的工作，任香港工委书记。翌年4月底，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回到北平，乔冠华接替了我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同在上海军管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汉夫分管外事，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调到北京，当了外交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一直到“文革”为止。解放初期，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不多，汉夫就成了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再没有时间写文章了。所以这本文集里搜集到的最后一篇《在历史的转折点》，是1948年8月发表在香港《群众》上的。

我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工作了五年，1955年调到北京，在文化部也分管外事工作。因此和汉夫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岁，正值盛年，但我却觉得他有点劳累，性格似乎也有点变了。过去在上海、重庆、香港，他不仅文章写得生动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风度，又富幽默感。但当他作了外交官之后，也许是由于“外事工作授权不多”吧，他连对过去的老熟人也就不再谈笑风生，随便开玩笑。他兢兢业业地工作，陈家康讲怪话，说汉夫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陈毅同志则夸他是外交部的好“当家”。

1957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么问题？”他摇了摇头，一言不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对我“保密”？这个疑团直到十年浩劫中看了“章汉夫专案组”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交代”的是：三十年代汉夫保释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好！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庄舞剑，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汉夫比我小五岁，他却在十四年前就被迫害去世了。他只留下了这么一本文集。今天，还有多少事要他这样的人来做，有多少文章要他这样的人来写啊，我写不下去了，仰天长叹，呜呼！

1986年10月

风雨故人情——《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

读陈海云、司徒伟智的《廖沫沙的风雨岁月》，许多往事涌上心来，感慨万千，竟日不能自制。

时光流逝，从二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年代，这又是一个晨光初展的年代；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这又是一个英豪辈出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代，这又是一个积习难移的年代，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民族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无数仁人志士，无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付出了血、泪和生命的代价，前赴后继，九死无悔地经历了这一漫长而艰险的路程。在这一代勇敢而缺乏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中，廖沫沙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才华出众的杂文家和新闻工作者，他顽强地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他也被贫穷、疾病、“左”风折磨了半个多世纪。

1933年，我在上海田汉同志家里认识了他。当时他还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我知道他是“左联”盟员，知道他经常在报刊上写稿。由于当时我在电影界工作，和他相知不深，也没有工作上的联系，所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写了一篇杂文而“惹了一场大祸”的事，也全不知道。在那个夜色如磐的日子里，即使在同志之间，也是很少谈到私事的，所以他的家世、阅历、乃至参加“飞行集会”而被捕等等，我也一无所知。直到1939年他参加了桂林《救亡日报》，从田汉和周立波同志的介绍才知道了一点他入党前后的经历。他给《救亡日报》写了许多文章，杂文、政论、小品，什么都写，而且写得很好，很有文采。《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全社只有二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青年作家，其中有林林、司马文森、周钢鸣、华嘉、陈紫秋等等，他们都能写，也写得很多。但那时是“书生办报”，能写政论的人不多，所以这张报上的社论、时事述评、今日话题之类，几乎都由我一个人“包办”了，沫沙来了，我就有了依靠。当桂林的话剧团体逼着我写剧本、和到香港去为《救亡日报》筹款时，我就很放心地请他代笔。这时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吃惊，他写的几篇军事论文忽然被黄琪翔将军看中了，一定要请他去当少校秘书，到前线去工作了半年多。当然，他和我一样，在战争时期办报，只不过是读了一点《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支的《战争论》之类，写一点“纸上谈兵”的政论而已。但从这件事也可以说明，他中国文学的根底扎实，读书联系实际，当时才三十几岁的廖沫沙，已经不只是一个作家、杂文家，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党的宣传工作者了。

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算太久，第一次是1939年到1941年在桂林《救亡日报》，第二次是1941年在香港《华商报》，第三次是1946年到1949年一起在香港工作。在桂林，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个人间接接触较多，不知不觉地就成了知音和知心的朋友。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多才多艺，文采斐然；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他诚实皎洁，平易旷达，特别是他的那种任劳任怨、无私无畏、从不考虑到个人的得失的品格。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提到过长沙《抗战日报》的“一位同事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而发生了一件母子自杀的悲剧”，这里所说的“母子”就是沫沙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这一悲惨事件给沫沙的心灵和身体以极深的创伤，很久还不能排遣”，但是他在《救亡日报》时期，却从不谈到过这场悲剧。他真的是化悲痛为力量，依旧是勤奋地工作，笔不停挥，写了大量的杂文和政论。《救亡日报》是一个青年人的群体，我年纪最大，也不过四千岁，睡

地铺，吃大锅饭，大家都“国尔忘家”。这正如这本书中所说：“报社的工作是繁忙的，生活是清苦的，但是，惟有在这里，他才感到是朝气蓬勃，精神焕发，重新感到自己与整个革命事业连成一体。”1941年元旦，他在《救亡日报》白面山的印刷厂奋笔写了一副春联：“大块文章救中国，一行消息报新春”。可是新春之后，却迎来了一场风暴，皖南事件爆发了。由于我们拒绝登载中央社发的那条诬蔑新四军的消息，国民党肯定要对《救亡日报》下毒手了，南方局决定要我尽快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我就把《救亡日报》被禁后的一切善后事宜交给了沫沙、林林和张敏思，于除夕那一天离开了桂林。他们临危不惧，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善后疏散工作。直到3月初报社正式被封之后，才率领了二十几位社员，分头经广州湾到了香港。

按照南方分局和廖承志同志的安排，我们很快创办了香港《华商报》，林林和张敏思去了菲律宾，沫沙则留在香港，担任了《华商报》的编辑主任。和战时的内地比，香港可以说是一个浮华世界，但是，沫沙是一个内向的人，在香港他除了写作，就是读书，既不游山玩水，也不看电影、戏剧。偶尔忙里偷闲，我约他和胡希明、乔冠华到《华商报》附近的一家北方餐馆“海景楼”去喝几杯酒。他酒量不大，我更是滴酒不沾，而乔胡两位却都是酒豪。所以在这种场合，他和我也只是敬陪末座，默默地欣赏他们的酒后狂言而已。

1941年的《华商报》只办了八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们再一次在战乱中分手。他和韬奋、茅盾、胡绳等经东江游击区，我则和金中华、蔡楚生等经澳门、台山，于1942年4、5月间先后回到重庆。

我办了五六年报，对新闻工作发生了兴趣。所以回到重庆，就希望能在《新华日报》工作，可是恩来同志却说：“你可以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但主要的还是要以公开合法的身分，搞上层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而沫沙一到重庆，恩来同志就让他进了《新华日报》。直到1944年冬，我搬到化龙桥接替章汉夫的工作，才又有见面的机会。四十年代中后期，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刻，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三年解放战争，我和他有时天各一方，有时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大家都忙，很少有静下心来谈心的机会。我和他都在《华商报》、《群众》和其他刊物大写政论、杂文，每天都写，笔不停挥，自己也觉得写得非常欢畅。在数量上他写的不比我多，但他除了杂文、政论之外，还写了几篇很出色的《故事新编》，如《陈胜起义》、《鹿马传》、《曹操剖柑》等等。

1949年4月，我离开香港回到北平，随军南下迎接上海解放，我们又分别了五年。

1955年我调到文化部，这时候他在北京市委。“隔行如隔山”，同在北京，相聚的机会也不多，但他的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笔名，我还是一看就知道的。十年浩劫中，“四人帮”之流常常骂我们这些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奋斗、而工作，心心相印，这一点倒是说对了的。

我在文化部管电影和外事工作，也偶尔写一些杂文随笔之类，但和以前比，可以说写的少得多了。

1962年《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陈笑雨同志来访，说他们要辟一个杂文专栏，目的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进知识”，并说这个专栏叫《长短录》，是沫沙拟定的。于是我欣然地“入了伙”，前后写了六七篇。当时，正在“三年困难时期”，报刊上的文风很坏，假大空、党八股猖獗，

特别是 1957 年之后不断地批斗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开始抬头，使我更感到愚昧无知不仅是建设之大敌、文明之大敌，而且是民主法制的大敌。我不察世风，不自量力，又想用杂文这一武器，来做一点匡正时弊、增进知识的工作。结果呢，谁也想不到，这个有沫沙参加的《长短录》后来竟被说成是与《三家村札记》齐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当然，沫沙是“三家村”中的一家，又写过一篇《有鬼无害论》，惹了一场大祸，遭受了八、九年的牢狱之灾，往者已矣，这些事说来伤心，不多讲了。

我和他前后一起工作了半个世纪，可以说是风雨同舟。“少年子弟江湖老”，沫沙也已经快八十岁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些人居然大难不死，终于看到了大地春回，得到了为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勉尽微力的机会。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廖沫沙的风雨岁月》的出版，祝愿他老当益壮，继续用他的如椽之笔，为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1985 年岁暮

之的不朽——《宋之的选集》代序

在电视屏幕上看《话说长江》系列片放映到重庆那一段时，解说员说：“重庆多雾，故有‘雾重庆’之称。”这句话使我心头一怔，想起了我的一个最亲近、最有才华、最敬爱的挚友，他就是宋之的（汝昭）同志。可能是那位解说员不知道“雾重庆”这个名称的出典，其实把“雾重庆”作为国民党陪都的代称，它的起源是由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重庆上演的宋之的的杰作《雾重庆》。这里所说的雾，指的不是自然界的气象，而是当时笼罩着重庆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这一年的冬天，正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酝酿时期。

我认识之的是在一九三四年春天。开完了一次“影评小组”的谈话会之后，陈鲤庭、于伶、之的和我四个人沿着四川路东行，他忽然提议由他作东请大家喝一杯咖啡。在一家小咖啡馆坐定之后，他天真地问于伶：“我们在北平参加了‘苞莉芭剧社，是不是等于参加了共产党？”于伶笑了，对他说“苞莉芭”是北平剧联的一个外围组织，连上海的剧联也不一定都是共产党的组织。他点了点头说：“那对了，我没有说谎。那次包打听抓住了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时，我大声回答：‘不是！’”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所以他的那种又天真、又勇敢的话，使我永远记在心。

大约有两年时光，我和他经常见面，很快地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那时我在搞电影工作，他又是影评小组的长期执笔者。他下笔快，真可以说“倚马可待”。常常看了电影出来，花十来分钟就把影评写出来了。三三年到三五年这三年，我计算不出他究竟写了多少战斗性的文章。当然，不止写影评，写剧评，也写小说、写剧本。三四年冬他去了西北一趟，写了多少我不知道，反正三五年一回上海，可以说聂绀弩主编的《动向》和鲁思主编的《影谭》上，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他用各种笔名写的文章。最少我记得他在《动向》上写过一篇连载长篇。他和我有一种共同的习癖，从不“敝帚自珍”，文章写了交出就算完成了任务。这就造成了他的爱女宋时为他搜编文选造成了不少困难。一九三五年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年，可是奇怪的是这一年也是被叫做“杂志年”的一年——其实，这也是不奇怪的，华北事变起来了，民族矛盾激化了，英美法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对抗日救亡这一点也不敢正面出来反对了。这一年，新杂志、新书店确实增加了不少，——生活、新知、读书三家进步书店，《中流》、《光明》、《世界知识》、《奔流》、《妇女生活》……等等，记得都是在三五年前后出世的。当时我和洪深、沙汀、沈起予在编《光明》半月刊，凡是我向他约稿，他总是“随传随到”没有二话。他的名作《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和多幕剧《武则天》也是在这时候脱稿的。

“八一三”上海抗战，我和他先后离开了上海。他随马彦祥的救亡演剧第一队经南京、武汉到西北为抗战宣传服务；我则到广州、桂林办报，三年不通音讯，直到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之后，他和一大批理论、文艺界人士，奉周恩来同志之命，从重庆撤退到香港。再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名叫海景楼的小饭馆，同席者有廖承志、我、于伶、章砥（记得还有戴浩、虞静子）。廖承志给我们的指示是赶快办一个剧团。首先是掀起一个抗日演剧高潮，这样也可以让重庆撤退到香港来的文艺界有事可做。我们很快地组织了“旅港剧人协会”，演出了《雾重庆》、《马门教授》、《北京人》。他写剧本、做

团结统战工作、当舞台监督，可以说够忙的了，可是就在这个时期，他还在《华商报》、《大众生活》和其他报刊上针对敌寇汪伪以及一切“与抗战无关”论者写了大量投枪、匕首式的杂文短论，这些文章大都是在《华商报》的那间烟雾弥漫的小会客室里写的，当时给进步报刊写文章是不给稿费的，有时夜深了，陪他到附近小酒店去喝两盅白干，他就十分满意了。

这样忙碌而愉快的日子过得很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环境迫使我们再一次远走高飞。他随东江游击队北撤，经老隆、曲江到了桂林。我和蔡楚生、金仲华、金山、司徒慧敏等人经澳门、台山、柳州也到了桂林。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热烈地欢迎了我们，热闹了一阵，再分头回到了重庆。我记得在雾重庆的六月，他十分严肃地问我：“够格了吧，我要求入党。”我热情地表示了欢迎。可是我把这个要求告诉徐冰的时候，出乎意外地遭到了恩来同志的反对。恩来同志严肃地说，我们正需要像他那样的非党布尔塞维克，他和张道藩同台演过戏，可以当面开玩笑，潘公展也认识他，黑名单上还没有他的名字，让他在党外工作有效得多。然后对我说：告诉他，我周某人一直把他看作同志。但在这个时候还要他当“民主人士”。当我和徐冰把这个决定告诉他的时候，这位铁铮铮的汉子的眼睛红润了，这之后还有一件事，当我们从香港回到重庆的时候，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二次反共高潮已经过去了，张道藩为了卖好，由他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出面，聘请了几位由港回渝的文化人为该会理事，每月只送车马费一百元。聘书发出来了，人数不少，宋之的和我都在内。当我向组织上请示的时候，恩来同志的指示是“党员一律退聘，非党人员可以完全由他们自己作主，拿钱当委员可以，用他们的钱，做我们的事，不吃亏”。这又是一个考验。我把这个指示通知他时，他毫不迟疑地说：“周公把我看作同志，我要以这个身份要求自己。”

我们又和于伶、金山、司徒慧敏组织了一个“中国艺术剧社”，一起工作了四年。他、于伶和我合作的《戏剧春秋》，他的《春寒》都是这段时间写的。正如恩来同志所预料，为了审查剧本，为了组织作家协会， he 可以和鲁觉吾、潘公展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是民主人士，国民党对他是不能不留点“面子”。

重庆四年，时间不算太久，但是他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把这些事都写下来肯定会觉得太罗嗦了。但，还有一件事不能不写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回到上海，不久就接到陈毅同志经刘晓同志转给梅益和我的一份电报，内容是苏北急需大批文化工作者去工作，要阿英和我带一批作家、记者、专家……尽速前往。阿英要去，是早已确定的了，我则正在筹备复刊《救亡日报》，不能走。四六年春，之的到上海后，知道了这个消息，抢先向我报名，非去不可。我和梅益都表示同意。这时，他猛然把两只大手按在我的肩上，附着我的耳朵说：“三三年以前的事你不知道，这之后一直到今天，我在白区的工作，好的坏的，你都得给我作个鉴定！”这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党的无限忠诚，这也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

从他魁梧的身体到他刚直的性格，他真可以说是一个燕赵豪侠之士，待人宽厚，律己甚严。三十年代在上海，四十年代在重庆，我们都在泥泞和荆棘中作战，我想，用“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对他是完全适用的。四四年冬天，有一次，老舍约我和他到姚蓬子开的书店去吃饭。舍子和之的都是酒豪，喝了几杯之后，大家就不免高谈阔论起来。当蓬子指着书架上的一些“正中书局”出版的书籍对老舍说：“这种书是摆一年也卖不掉的，可是不

摆着又有什么办法？”老舍用他特有的幽默刺了他一下，于是姚蓬子恼羞成怒，反唇相讥，几乎要翻脸。我看看身边的之的，他却似乎听而不闻，只管自酌自饮，我觉得很奇怪。饭后出门的时候，之的悄悄地对我说：“如何？我这个人还是粗中有细的。这种场合，老舍刺他一下，比你打他一拳更难受。”

在一条路上一同工作、斗争了二十多年，唯一遗憾的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他突然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千里以外的昆明参加西南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除了向王苹同志发了一份唁电之外，连拊棺一恸也不可得，这实在是太怆痛了。

假如他今年还活着，也还只有六十九岁，以他的精力、生活、健笔，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该有多少作品可以留给后世啊！

动了感情，就没法再论述他的作品了，但这些都是大时代留下来的一个个磨灭不了的足印，它们是会永存在人们心里的。

1983年11月15日

忆健吾——《李健吾文集·戏剧卷》代序

健吾猝然去世，已经快两年了，但他的名字在我记忆中闪过的时候，总觉得这不是事实。

人世间的事，有许多是很难解释的。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路上，我认识过、共事过的人，少说也有几百乃至上千，随着岁月的流逝，多数人还记得，也有不少人连名字也记不起了；或明或暗地和我较量过的人，大致还记得，而不少和我合作过、乃至感情上很融洽的人，倒反而渐渐淡忘了。奇怪的是健吾这个人和我没有共过事，往来也不算太多，可是提起他，心里会感到温暖，一股深挚的敬爱之情会涌上心来。

我认识他很晚，尽管三十年代中期，我就是他的读者。抗战时期我一直在所谓大后方，他却上海这个极端艰险的地方，自告奋勇地当了我的“著作人权益代理”。也就是这种义勇行为感动了我，所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第一个要探访的就是他。当时他住在西摩路，大概我也只去过两三次，抗战刚胜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却真可以说一见如故。我读过他的《这不过是春天》和《咀华集》；他看过和评论过我所有的习作和戏作，其中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化生活》上的那篇长达一万四千字的《评〈上海屋檐下〉》，对我的那篇不大成熟的试作既有过誉的肯定，又有搔到痒处的批评，由于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所以当他谈到《心防》和《法西斯细菌》的时候，我就说：“我写剧本是半路出家，您写评论则是科班出身。”这样，初次见面就发生了“争论”，他说：“你写了十几个剧本还说是‘试作’，那么我写评论更是‘试论’了。”我反问：“那么你的本行是什么？”他说他的专业是翻译和研究法国文学，接着很认真地问我：“那么你的专业呢？”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本行是新闻记者，写剧本是我的副业。”显然，这种“争论”彼此之间都有一点自谦的意思，所以几个回合之后他就作了结论：“我们还是同行，都可以说是杂家。”于是我说：“我承认，在这么一个时代，杂一点也不坏，但你的杂比我高明得多了。”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如此坦率，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主要是他的几位知交也都是我的师友，例如在上海和他合编《文艺复兴》的郑振铎，以及那时还在重庆的马宗融等等。当我提到在黑暗的时期还是笑口常开的乐观主义者“马大哥”的时候，他有点意外地问我：“你怎么认识他的？我正在惦念着这位马大哥。”我说：“他是天官府郭者家的常客，又是‘中国艺术剧社’的热心的支持者，他是赵慧深介绍给我的。”这样，从赵慧深谈到了《雷雨》中的繁漪，又谈到了我二十年前就认识的、会在大学讲台上唱昆曲的赵景深，这样一谈，初交就成了老友，我忽然想起了叶圣陶先生的《赠李健吾》诗：“当年沪上承初访，执手如故互不拘。”四十年后还是如在目前的那次初见，就是这种“互不拘”的情景。

读健吾的剧本《这不过是春天》也好，《梁允达》、《云彩霞》也好，谁都会感觉到，剧作者是一个熟知人情世故的人，可是在生活中，他却却是那样的天真、坦率，有时竟天真到使我觉得他有点不合时宜。就在下一年，我在顾仲彝家里遇到他，在座的还有吴仞之。当时国民党开始发动了内战，上海人已经把抗战胜利叫做“惨胜”，国民党的“威望”在上海也已经一落千丈，可是，当吴仞之对国民党大员的“劫收”表示愤慨时，健吾忽然说：“我父亲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以我是血缘的国民党。”仞之和仲彝

都哑然无语。你说他完全不关心政治吗，肯定不是，在艰苦的孤岛岁月中，他是抗日、团结、民主的坚强斗士；说他对国民党有感情么，也完全不是，在四十年代他写的文章中，对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是爱憎分明、词严义正的。

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所以他尊重知识，他钦佩有真知的见的人。我问他：要了解西方文学应读些什么，他毫不思索地说：“最好是细读亚里斯多德和狄德罗。”我后来读了一些，但我的毛病是粗，只是浏览而没有“细”读。我问他：“在当代文艺家中你佩服的是谁？”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就是钱钟书。”我认识钱钟书和杨绛，是他给我介绍的。提到这件事，还记起一段插话，那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人民日报》文艺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健吾发言，谈到文艺理论和美学，他又一次推崇了钱钟书的学识，记得话是从宋词研究说起的，健吾显得有点激动。散会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赞钱钟书，我捧杨绛，谈当代剧作家而不提杨绛，是不公道的。”

全国解放后，我在上海忙于打杂，和他来往不多，连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我也不知道，直到上面所说的那次座谈会上才见面。回忆起来，从一九五五年到“文革”的十年中，我和他见面不过四、五次，而每次相遇又都是在开会的时候，所以也相互知道太平无事就是了，因为从五七年以后，我就交了“华盖”运，不止一次有人告诉我，健吾一直在为我担忧，怕出什么乱子。

我们在一九六六年以后的遭遇，那是众所周知，不必多说了。可是，像他这样一位不求闻达，埋头做学问的人，居然也下放到河南息县去劳动改造！我们再次相见，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何其芳的追悼会上，那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做出“结论”，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还拄着双拐，这是我“文革”以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人们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而他却从人群中挤出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凝视了一会之后，只说了一句：“见到你，太高兴了！”他依旧是那样豪放、爽朗，丝毫不把我当作“不可接触的人”。我鼻子有点发酸，这种友谊实在是太可贵了。

不久，大概在一九八一年，我偶然在《陕西戏剧》上看到他的新作《一棍子打出个媳妇来》，单看题目就知道是一出喜剧，更使我高兴的是长期的折腾没有挫折他的勇气，他还是那样乐观，他还是那样勤恳！

健吾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讲一句套话，这种损失是难于弥补的。每次在报刊上读到空对空的文艺评论，就禁不住想起他，我们真需要能写出刘西渭的《咀华集》那样的文艺评论家。

正像一个演员死在舞台上一样，他是在每天写作的书桌上放下笔，而磕然长逝的，工作了五十年，写作了半个多世纪，千千万万的读者不会忘记他，他也该安息了。

1984年7月

悼秦似

“人生自古谁无死”，有生就有死，这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但是，一个共过患难的朋友突然去世，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许多事可做和能做的人死了，就难免会有出自内心的悲痛。一九八六年三月，聂绀弩同志去世，闻讯之时真有一种“痛彻乾坤此一悲”之感，这位和我有过半个世纪以上交谊的一代才人的长逝，于私于公，都是难以补偿的损失，但他一九七八年从山西监狱获释回到北京之后，就一直身患重病，八五年春节前我去看望他时，他已经病人膏肓，扭曲着身体躺在床上，连讲话也困难了，他强作微笑对我说：“不行了，可是还有一篇文章没有写完。”告别的时候和他握手，他的手冰凉，一点气力也没有，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此这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周颖同志打电话把这一噩耗告诉我的时候，只说：“今天清晨老聂去世了，告诉你一下，请你不要难过。”语气是平静的，显然她也早已有了思想准备。就在四月七日我到八宝山殡仪馆向绀弩遗体告别的时候，在大门口碰到秦似，尽管面带愁容，但看来身体还是很硬朗的，我对他说：“四年在桂林办《野草》的五个人，现在只剩下我和你两个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话：“过几天我来看你。”谁能料到，他再也不能来看我了！

五天之后，周颖告诉我：“秦似病了，开头很严重，后来吃了几服中药，很见效，明天就回广西，要我转告诉你，这次不能来看你了。”我放了心，编《野草》的五个人中他最年轻，总不会走在我的前面吧。

实在太意外了，七月上旬，突然接到陈翰新同志的一份电报，六个字：“秦似病危，特告。”第二天，又收到一份她的加急电：“秦似逝世。”这样，《野草》同人只剩下我一个了。

从一九三九年起，我在桂林办《救亡日报》，全社只有二十几个人，经费短缺，来稿一律不付稿费，但当时桂林是大后方的“文化城”，愿义务捐稿的人不少，由于这是一张四开小报，篇幅有限，所以超过二千字的文章，即使写得很好，往往也只能割爱，因此，孟超就向我建议，是否可以办一份以杂文为主的杂志，这件事酝酿了好久，主要的难题是办杂志得有一个专职的编辑，孟超很积极，写杂文也很出色，但他自己说散漫惯了，不能静下心来当编辑，于是我才想起了秦似，他是本地人，没有固定的职业，经常给《救亡日报》写稿，有一股朝气，所以一谈，他就欣然同意了。“野草社”是一个松散的同人社，一共五个人，即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秦似和我，这五个人中云彬年纪最大，时年四十三岁，其次是我，正四十岁，钳弯比我小三岁，也才三十七岁，再其次是孟超，而秦似则还是二十刚出头的“小青年”，新生之犊，什么困难也不怕，所以第一次碰头会上我们把组稿、跑印刷厂、联系发行之类的具体工作都推给他的时候，他也勇敢地挑起了这个担子。

云彬、绀弩、孟超，我在二、三十年代初就认识了，都是写杂文的好手，只有秦似，是因为他经常向《救亡日报》投稿，还写信给我对副刊的版面提意见，我在报上登启事约他见面，他从桂南某一个小县到桂林来才认识的，我们一见如故，这样他就成了《野草》这份小刊物的台柱。最近我又读了一遍他写的《野草月刊发刊词》，更觉得这样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出自一个二十二岁青年人 之手，实在是很难得的。

一九四一年是一个四海翻腾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德、日、

意法西斯气焰嚣张，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汪精卫投降日本，搞了个傀儡政府，与此呼应，重庆、昆明的亲法西斯分子又办了一份《战国策》，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说什么：“权力意志伸张，强者行动，弱者服从。”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写杂文的题材实在是太多了，绀弩和云彬早在三十年代就写过不少可以传世的杂文，孟超和我虽然也写过一些，但不能和他们两位相比，至于秦似，他开头是写诗的，抗战之后才写杂文，算是一个新手，但是面对可斥、可骂、可笑在世态，大家就有了一个用杂文来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战斗的共同意志。我们五个人写文章也没有具体的分工，宋云彬是史学和文字学家，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气节感，他写的《谈气节》、《检陶、贬庚、呵周》（陶渊明、庾子山、周作人）等等，今天读来还是掷地有金石声的名文；绀弩读过许多古籍，留学过苏联，可以说是博古通今，他三十年代在《自由谈》写杂文，仿鲁迅笔法，可以乱真，他在《野草》上写得最多，也最精采，他为《野草》写的《韩康的药店》更是传诵一时；孟超是杂家，写过小说，剧本，但他在《野草》上写的则都是针贬时事的杂文；我当时主编《救亡日报》，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论，所以除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散文《旧家的火葬》外，可能是写得最少的一个；而最年轻的秦似，则既管杂事，又写文章，几乎每期都写，他扭住《战国策》的那批“名教授”们不放，穷追猛打，一批到底。

一九四一年春发生了皖南事变，我被迫离开桂林，到了香港，但《野草》还是继续出版，秦似在文革后的一九七八年写过一篇《回忆野草》，他说：“尽管雨横风狂，波浪翻滚，这棵小草还是压不住的，依然是屹立在一片败墙倒屋之中。”他坚持下来，直到一九四二年秋，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为止。《野草》停刊了四年，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一九四六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我们五个人又因工作关系先后在香港不期而遇，于是这个小刊物又以丛刊的形式在香港复刊，这在香港也是唯一份杂文刊物，当时，又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时期，人民解放军转守为攻，势如破竹，反动派一方面依靠“美援”作困兽之斗，官僚财阀们则“下野”、“出洋”，垂死之前大发国难财，《野草》同人就以打落水狗的精神，对这些魔鬼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野草》丛刊在港出了十二期，终于遭到港英当局的封禁。这段时期秦似除了负责《野草》的编辑之外，还在《华商报》副刊上撰稿，后来还在《文汇报》担任一个专栏的编辑。到一九四九年春，他才离开香港，到华南解放区去工作，当时我是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的书记，我为他写了给方方和尹林单的介绍信，他临行前的那种欢欣振奋之情，在我心中还是记忆犹新。

全国解放前后，《野草》同人相继离开了香港，宋云彬走得最早，他是参加了“民盟”的代表会议之后就去了华北解放区，我于四九年五月回到北平，接着就随“四野”大军南下，回到上海，绀弩走得较晚，大概是为了参加同年七月初第一次文代会才回到北平的。但是由于他当时是香港《文汇报》的主笔，所以不久又回到了香港，从此五个人各奔东西，大家都忙，互不通问，秦似在广东当了《南方日报》的编辑，这是这一年冬天我从一则新华社的消息中才知道的。这之后过了两年，周钢鸣告诉我，说解放初期他和秦似在广州正工作得很上劲，可是张云逸同志因为他们都是广西人，用组织命令把他们调到了广西，可是回到老家，倒反而工作很不顺手，问我是不是可以让他回上海工作？我不了解他所说的“不顺手”的原因，没有给他回信。

一九五七年后，参加过《野草》的五个人都交上了华盖运，宋云彬、聂绀弩都被划成了“右派”，我两次成了“重点帮助对象”，但因得到陈毅同志的“保护”，幸免于难。五八年冬我到桂林，才知道在五七年的那场风暴中，秦似也曾“在党报上公开批判”，受到了“撤销行政职务”和降级处分。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暴中，云彬在浙江任省文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由于他秉性耿直，又是浙江本地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某些领导人歧视知识分子和随意破坏文物讲了一些“不入耳之言”，就和当时任浙江省长的沙文汉同时被黜，罪名是“地方主义分子”。秦似是广西人，是不是也有“地方主义”思想呢？我后来看了一些批判他的文章，才知道给他戴的不是“地方主义”而是一顶“没有在解放区受过锻炼”的“香港派”的帽子！这之后他改了行，当了讲师，很少写文章了，我和他见过几次，他没有向我表示过一点内心的委曲，还是很乐观，工作也很积极，直到一九八一年我看到他写的一篇谈李商隐《锦瑟》的文章，才隐约地察知了他一直不愿告人的隐痛。这篇文章中说：“李商隐在《锦瑟》里，到底‘自伤’，些什么呢？这是比较易于明白的，李商隐一生处于牛李两党的封建势力派系斗争的夹缝之中，在政治上一直感到失望和苦闷，他的‘自伤’正在于此。”文章中还引用了《一瓢诗话》中的一段话：“《锦瑟》一篇，解者纷纷，总属臆见，余幼时读之，确有悟入，觅解人甚少，此侍全在起句‘无端’二字。通体妙处，俱从此出。”秦似在这里终于点了题，他说：“无端等于说没来由，也就是说有点莫名其妙。在这里，‘无端’是个双关语，作者伤叹自己白白活了快五十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无端”的事，实在太多，因无端而自伤自艾，白白地浪费年华的事，也实在太多了！读了他在八十年代写的这篇文章，我也“确有悟入”，只能掩卷长叹了。

今天，七月十日，正是秦似逝世的一周年，办《野草》的五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了，让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人来写这样的悼念文章，实在是太寂寞、太可悲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于北京

忆孟超

到烟台，听到胶东话，很自然地就想起了我的老朋友孟超。他是山东人，讲的是一口胶东话。

我认识他是一九二七年秋天在上海，国民党“清党”的那一年。我入党后和他编在一个小组，属于中共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同一小组的还有钱杏邨（阿英）、戴平万。他们当时属于“太阳社”，正忙于为“太阳社”写文章，办杂志，但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却是在杨树浦一带搞工人运动。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孟超却说他在大革命时期做过工会工作。我们不知深浅，最初是穿着长衫或西装去的，很快就碰了钉子。加上这一带的纺织工人不是宁（波）绍（兴）帮就是苏北帮，讲话就听不懂，再一看这种装束就不会把你当作他们的自己人。于是我们就在旧衣铺里各买了一套蓝布短衫裤，每次到杨树浦，就得先在我家里换上“工人装”。他不仅不会讲而且也听不懂南方话，所以每次去总要我替他当翻译，第一次就出师不利，一下子就闹了笑话，在一家工人们出入的小茶馆里，我用上海话和他们攀谈，他插进来，才讲了一两句话，一位黄包车夫就警惕地瞪圆了眼，几乎要动手打人了，我们只好赶快溜走。后来才知道，上海工部局的巡捕，大部分是山东人，工人把他看作了暗探。

一九二九年冬，我们都调出去做筹备“左联”的工作。我们还一起参加了郑伯奇、冯乃超、沈西苓等办的“上海艺术剧社”。记得一九三一年演出《西线无战事》，他还上台跑过“龙套”。

不久，他就是一次“飞行集会”中被捕了。那是在南京路河南路口，一个青年人散了一把传单，孟超从地上拣起一张来看，被巡捕抓住了，那张传单就成了他的罪证，好在没有“引渡”，在提篮桥关了些时候就被放出来了。

第二次和他一起工作，是在抗战中的一九三九年。我在桂林办《救亡日报》，他也“流亡”到了桂林，几乎天天晚上到报社来和我闲聊，依旧是“乡音无改”，讲得又多又快。我当时很忙，他却“闲来无事”，于是，我们就合办了一份杂文小刊物《野草》。不久前聂绀弩写了一篇悼念孟超的文章中说，在《野草》，他和孟超是“两厢伺候”的参将。这是客气话，实际上这份小刊物是五个人办的：聂绀弩、孟超是主将，写得最多，也最好，秦似管具体工作，宋云彬和我写的文章不多。三十年代。孟超不大写杂文，也不像办《野草》时那样勤快。此外他还在别的刊物上写了不少文章。

这之后，就是一九四八年，他忽然又到香港《华商报》来找我说要到解放区，于是就通过邵基麟，把他送到了华北解放区。

凡是杂文写多了的人都会“上瘾”，所以一九六二年《人民日报》文艺部主持人陈笑雨打算在第八版辟一个杂文专栏“长短录”时，我又推荐了他。他当然欣然同意，也写了不少，直到“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之后，《北京日报》的“三家村札记”垮台，这个“专栏”才告结束。当然这件事“文革”中也成了他的罪状。

从三十年代起，孟超写过剧评和影评，但在我记忆中，好像没有写过剧本。想不到正在黑云压城的时候，他写起剧本来，这就是《李慧娘》。对这件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知道此案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内情，在这儿有必要说一说。《李慧娘》“出笼”与《海瑞罢官》差不多同时。他和吴晗也很熟，可能吴晗破天荒第一次“写剧本”引起了他的创作冲动。写完

初稿，他送到我家里来要我提意见。一点不假，我真吃了一惊，第一次写昆曲能写得这样好——特别是唱词非常好，我佩服了，只提了一点技术上的小意见，但当时我在文化部，消息比他灵通，所以就问了一声：“这个剧本现在能上演吗？”“现在”这两个字，就意味着当时的政治气候。想不到这一问却使孟超高兴起来。他说，这是“康老”鼓励他写的。”康老”就是康生，他和孟超是小同乡，而且是当时的“五人小组”组长。康生要他写的，那么写成了之后有没有看过呢？孟超只说了四个字：“他说很好。”

这样，《李慧娘》就上演了，我也被拉去看了戏。看完后一位记者问我有什么意见，我也说了一句：“很好。”

不久，一九六四年“文联”整风，《李慧娘》就成了问题。真想不到，说这出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正是那位“康老”。因为我在答记者问时说了句“很好”，免不了也“追查”到我的身上，并举出了“铁证”。因为孟超在这个剧本后面写了一篇《跋》，其中有“以励生人”这么一句，“以励生人”那就是借古喻今，就是影射。我实在弄糊涂了，《李慧娘》中的反面人物贾似道是当朝宰相，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孟超会影射当时的“宰相”。就因为这个剧本，他在“文革”中被捕，差一点被整死。

胶东是文人荟萃之地，孟超当然是不该被遗忘的无产阶级的老一辈作家。《胶东文学》要我写稿，我想起了死了快十年的旧友，并借此机会替他讲几句公道话。

1984年8月15日

《未晚谈》代序

听说林放同志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即将出版，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前在《长江日报》看到一篇白雉山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迟了，总算来了》，这是作者得知林放同志的“第一本杂文集”出版而引起的感慨。他对“这位名噪文坛的杂文巨擘”，为什么在他垂暮之年才出“第一本杂文集”而“感慨系之”。他从资、从德、从才三方面来看林放的杂文，认为他的杂文集早该出版，而且不该只出一本。他说写杂文常常会触怒某些人，又不可能成为“畅销书”，所以“杂文之欲出版者难矣”。对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跨进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艺复兴，小说、诗歌、电影、报告文学的刊物数以千百计，而迄今还没有一本杂文的定期刊物。小说的印数可以超过六位数字，而杂文集，能印上一万册，也已经不容易了。但我还是认为文艺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以印数的多寡来估计的。回头来看看过去，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鲁迅的杂文不止一次遭到当局的禁售，还受到御用文人的围攻，但是，不论是在抨击凝固和僵化了的“国民性”，或者是在净化民族的心灵，鲁迅杂文的威力之大，影响之深，贡献之巨，在整个文化领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尽管道路坎坷，鲁迅杂文的光辉传统，还是由许多勇敢的杂文作者继承下来了，林放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宿将。他写了半个世纪的杂文，他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上的落后、愚昧、虚伪的世态，他反对“瞒和骗”；他主张“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我们如果检点检点每天说出去的话，也会发现确有许多话是白说了。真正‘无隐’的‘直言’实在不多。有时转着弯子的说话，有时说些违心的话……这不是骗人么？”（《世象杂谈》：《关于“说话”》）这是林放杂文的一贯的风格，他正视现实，对社会上的一切反动、落后的现象深恶痛绝；看到这些脓疮毒菌，他就有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激动。这也就是翟秋白论鲁迅杂文时所说的可贵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在，我们正处身在第二次革命的腾飞时代，社会制度变了，“世象”也在急骤地变化，所以林放同志在《世象杂谈》的前记中说：“这些文章多数是属于社会现象的评论。或是颂扬，或是批评，总之是就事立论，表示个人对于‘世象’的见解。”的确，读近年来林放的杂文，满腔热情地颂扬新人新事的文章是不少的，也可以说这是林放在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显著的突破。他颂扬了祖国的新生，他也颂扬了历尽劫波而还是自强不息的年青一代。他写这种文章完全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心，因此，他的颂扬文章也没有丝毫从俗媚世的“俗套”。当然，即使在今天，人世间也还没有“净土”，不仅在人们意识、习性中淤积了几千年的“残滓”还有重新泛起的可能，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遗风”也还没有彻底清扫。林放同志又是一个从旧垒中战斗过来的人，他也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贰臣逆子”，所以他对世象中的一切宗法迷信、萎靡苟且、唯上唯书、自欺欺人，以及奴隶相、市侩气等等，就特别敏感，抓住了就一批到底。

林放的杂文有他独特的风格，平易通畅、朴实精练，也就是言简意赅。读林放同志的杂文可以使人振奋，使人沉思，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我认识林放同志是在1944年读了他的《延安一月》之后。这一年正是第

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也就是黎明之前的最黑暗的时刻，要把延安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在被叫做“雾都”重庆的一家私营的《新民报》上连载，这就要有巨大的勇气和精湛的“技巧”。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

1945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潘样年、章汉夫和我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在艰难的年代辛勤地笔耕了半个多世纪，林放同志已值“垂暮之年”，但是他没有老，他继续在写，继续在为匡正时弊，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而奋斗。“瘦信文章”，多多益善，我衷心地希望能看到第三本、第四本林放杂文集的问世。

1985年7月25日

《战地萍踪》代序

今年8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岁月。

西方人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从1939年9月1日算起的，而我们中国遭到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则是早在八年前的1931年的9月18日就开始了。从“九·一八”到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陆诒同志在《战地萍踪》中说：“抗战前夕和抗战八年这个历史阶段，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有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单靠“大事记”和教科书是不够的。其一是争取到这一段“兴旺发达时期”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其二是从芦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这八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而这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合作”是曲折艰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要了解 and 总结“抗战八年”的真实历史，既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又要有身历其境者的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出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战地萍踪》这本书的出版，是值得向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推荐的。

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当时他们都还年轻，有的是勇气和干劲，他们深入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前线，从事战地采访；他们跑前线，也跑后方；他们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他们也采访过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蔡廷锴、吉星文；他们既迅速地报道了战况，也客观地评介了人物。我一直还记得1939年在桂林“国际新闻社”的一次集会上，一位青年记者要范长江同志在纪念册上题词，他写了“书生报国，笔耕不已”这八个字，这表达了广大的爱祖国、争民主的新闻记者的心声。遗憾的是范长江、孟秋江两位都在十年浩劫中含恨去世了。陆诒同志“历尽劫波”，还能在暮年“笔耕不已”，写出《战地萍踪》这本书来，把他的报国之心和他亲身经历过来的真实历史告诉青年一代，这就更觉得弥足珍贵了。

抗战八年，我也一直在做新闻工作。陆诒同志在《大公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给了我许多新鲜的信息和启示。

自从武汉弃守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于是大后方的一部分文化人就产生了一种“以党划线”的想法，“洪洞县里无好人”，“国民党全是顽固派”。陆诒的战地报道既尖锐地揭露了石友三、韩复榘、孙殿英，同时也恰如其分地表扬了吉星文、张自忠、卫立煌、傅作义。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在爱国救亡的号召下，不单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即使是中央军嫡系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思想行动，也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傅作义、卫立煌、韩练成，都是明显的例子。据我记忆，最早报道卫立煌谈“打仗一定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军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仗就打不赢”，就是陆诒的《卫立煌访问记》。记得他还写过一篇《张自忠和伤兵对话》，我曾把这篇文章介绍给《救亡日报》同仁，告诉大家，把国民党都看成顽固派是不对的，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是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

陆诒同志孜孜不倦地当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他朴质无华、勤奋勇敢。

在那个时期当战地记者，客观条件的艰难险恶，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从香港脱险归来，他也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度，翻过阿拉甘山，再经峻险的滇缅公路，比我后两个月才到达重庆。我给他看了蔡楚生画的《黄坤逃难图》，他也和我讲了他“手执缅刀”擦过缅北战场，“捡了一条命”回来的惊险故事。这真是杜甫诗中所说的“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情景。事隔四十多年，一回想还是记忆犹新。

我把《战地萍踪》推荐给广大读者，我相信读这本书，对于认识和总结八年抗战的历史，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都是有好处的。

1985年7月1日

忆谷柳——重印《虾球传》代序

一九三八年，我在广州《救亡日报》工作，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我们有可能和国民党军政人员接触。大约在三月初，《救亡日报》同人应余汉谋部的一位姓吴的团长的邀约，到广州附近的罗岗参观，吴团长是十九路军旧部，参加过淞沪战争，是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和新文艺的爱好者，他认识郭沫若同志，并读过茅盾、巴金的小说。我们在罗岗，参观了他的营地和一些名胜古迹，最后他要一位校级军官送我们回广州。当我们穿过挂果累累的梅林时，这位军官笑着说：“欢迎你们再来，这次时机不好，早几个月来可以看到著名的‘罗岗香雪’，迟几个月来可以吃到这里的特产——糯米糍荔枝，但现在只能请你们望梅止渴了。”这几句话，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他不像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军官，而像一个颇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当时我只听吴团长叫他黄秘书，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战争年代的日子是过得很快的。整十年之后，一九四七年秋，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给《华商报》编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一天，一个“陌生人”来访，他一见我就说：“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年前我在罗岗见过你。”他交给我一叠很厚的原稿，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题目是《春风秋雨》，作者的名字是黄谷柳，这时我才想起，他就是陪同我们参观罗岗的那位穿军装的文艺青年。

他对我讲了一段很不平凡的战时经历，他说，一九四三年他在重庆当一个小职员，知道我在《新华日报》，但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来找我是会有危险的。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接受了一个好朋友的劝告，他才甩脱了国民党对他的束缚，举家搬到了香港。我看着他那消瘦憔悴的神色，便问他：“在这儿生活很困难吧？”他点了点头说：“在这儿举目无亲，卖文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我拼命地写，向报刊投稿，但十篇中最多只能发表一两篇，不久前我下决心写了这部长篇，先请你看看，假如觉得还可以的话，在杂志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都可以。”当天晚上，我看完了第一章，就使我很惊奇，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东下层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特别是文字朴素、语言精炼。我决定把这个长篇在副刊上逐日连载。

几天后，我约他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餐室“海景楼”见面，我告诉他这个长篇可以在副刊上连载，但提出了一个对他说来是很苛刻的要求，就是要他按照报刊上连载小说的方式进行修改，每千把字成一小段并留有引人入胜的关节，他很高兴地同意了，说：“我正要向香港的那些章回小说家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

这部小说连载后立刻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每隔三五天送来一次经过细心修改的稿件，并常问我报社和读者有什么反映。这之后，见面的机会多了，我向他介绍了一些在香港的文艺界朋友，还常和他一起到海边散步，我才知道了他幼年坎坷的生活和战时从反动阵营挣脱出来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问他：“你生在越南，长在云南河口，为什么能那样熟悉广东下层社会的生活？”他乐呵呵地说：“那主要是因为生活穷困，做过苦力，当过兵，和穷人、烂仔、捞家经常打交道的缘故。”他的小说有独特的风格，这正是文如其人。他有顽强的性格，不怕困难，愿意和最穷困的人们交朋友。他告诉我，他曾为一个像小说中的主人公虾球那样的流浪儿打抱不平而遭到烂仔们的殴打。谷柳同情这些人，但又没有办法援助他们，这才迫使他开始寻找

解放穷人的真理。

一年多以后，他向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很明白，提出这个要求，他是经过反复的考虑的。他顾虑的首先是他常说的过去那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其次是他又有一点旧知识分子的洁癖，因为那时正是全国解放的前夕，在这时申请入党，怕有人说他是投机。我和周而复同志和他谈过几次，解除了他的顾虑，这样，他在北平解放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京解放后，我离开香港回北京，接着随军南下到了上海，而谷柳却毅然抛弃了他前程似锦的创作生涯，挑选了一个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他向党组织提出要求，为了配合大军南下解放西南，他决心到十万大山去打游击。此后四年我和他未通音问，只从朋友们的来信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他当了《南方日报》记者，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并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了军功。一九五三年他随志愿军凯旋回国，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时，我才和他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他虽两鬓微斑，但精神饱满，兴奋地和我谈，他正在酝酿写一部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问他为什么不把《虾球传》最后一部写完呢？他说：“很奇怪，对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兴趣了。我在朝鲜战场上，看到过不少新的英雄人物，我想通过他们来刻划亚洲巨人的兴起。”就这样，《虾球传》就成了未完成的杰作。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我五次到广州都没有遇到他，据朋友们说，由于工作劳累和心情上的压抑，他性格变得更沉郁了，但他还孜孜不倦地在写那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不幸的是这部小说修改定稿之日，正是林彪、“四人帮”肆虐之时，他受到冲击，被迫退休，连这部长篇——《和平哨兵》的原稿也只能付之一炬。好容易熬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正打算挺起身来重新工作的时候，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黄谷柳同志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一生是始终和劳动人民紧密联系的一生。他为人正直，不阿谀从俗，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生活上他不避艰险；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最困难的道路；在创作上敢于创新，又善于吸取传统和国外的经验。茅盾同志曾评价过他的作品，说他的作品能“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而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个评语是很恰当的。

谷柳同志离开我们两年了，知道他的《虾球传》重新出版，我感到高兴，但又不自觉地陷入沉思：要是在过去的岁月中能有十年、八年安定团结的局面，让黄谷柳那样的作家都能够心情舒畅地挥动他们的彩笔，那么在新中国的艺苑中能出现怎样奇花争艳的景象呵！

现在，周天寒彻过去了，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希望在新时期的新长征中能有千百个黄谷柳式的作家来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

1978年12月于广州

记吴觉农同志

读发表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星期特写上的“当代茶圣”。许多往事涌上心头，这位“茶圣”吴觉农是我相知已逾六十年的老友，他为“振兴中国茶叶事业奋斗了整整七十个春秋”，青年时代他就对茶叶入了迷，为振兴茶业奔走呼号，著书立论，直到九十高龄，还孜孜不倦地在写他的《茶经述评》，书还没有出版，不少日本“茶道”研究者就一再向我打听，希望先读为快，所以陆定一同志称这本书是“二十世纪的新茶经”，“是茶叶科学的里程碑”，绝不是过誉之词。

提起吴觉农，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茶叶和茶业，大家都知道他是当今最年长的茶叶专家，但是现在，他同时还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份子这件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早年毕业于浙江第一中学，和我同是教育家谢乃绩先生的学生，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俞秀松、杨贤江、宣中华、张秋人……都是他共过患难的挚友。二十年代初，我在日本读书时认识了他，一九二七年回到上海，由于夏丏尊、叶圣陶、胡愈之都是他的同乡师友，所以我替开明书店译书，也经过他的介绍。当时开明书店出过一个月刊《新女性》，他是热心的支持者和撰稿人，我在《新女性》写稿和翻译培培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也是夏丏尊和他推荐的。

最近一期《人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共产党人蔡叔厚的“共产党内的奇人异士”，这位在白色恐怖下以绍敦公司“老板”的身份，舍身忘我，掩护和救济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被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负责人认为应该得到列宁勋章的蔡叔厚，也是他的生死之交。我回国后就住在绍敦公司。蔡叔厚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入党，这家公司就成为中共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交通联络站，也成了各地流亡到上海的共产党人的集散地，杨贤江、张秋人住在这家公司的楼上，他替中央苏区采办过军用物资，还和李强一起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培训了一批收发报人员，廖承志、匡亚明、徐冰、潘汉年、郑汉先都是这家公司的常客，当时日本共产党的负责人佐野学经过上海去海参威，在上海的住宿、交通也是他一手承办的。从三三年到三五年春，中共地下党遭到过三次大破坏，由于叛徒告密，“蔡老板”成了国民党特务监视和追捕的目标，但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吴觉农一直和他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直到一九七一年蔡叔厚在“文革”中遭到“四人帮”迫害，病死狱中为止，这种肝胆相照的革命友谊，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觉农是浙江上虞人，有一股浙东人特有的倔性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农业部副部长，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但是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名利得失，依然保持着书生本色。他比我大四岁，今年已经九十高龄，和他一见面，话题总是离不开茶叶，谈中国茶园的种植面积，出口数量，乃至茶叶的科学研究，但对于他过去做过的工作，他和共产党人的交游，却是很少谈到的。值得高兴的是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人陈宣昭身体健康，头脑清楚，几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一个儿子在国家体委工作，一个儿子在国外当大使，我祝愿他健康长寿，继续为振兴茶业作出贡献。

1986年11月25日

我与“茶圣”

“茶圣”吴觉农，是我相知已逾六十年的老友。他为振兴中国茶叶事业奋斗了整整七十个春秋。他青年时代就为振兴茶业奔走呼号，著书立说，直到九十高龄，还孜孜不倦地写他的《茶经述评》。书还没有出版，几位日本“茶道”研究者就一再向我打听，希望能先读为快。陆定一同志说这本书是“二十世纪的新茶经”，“是茶叶科学的里程碑”，绝不是过誉之词。

吴觉农是当今最年长的茶叶专家，他同时还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早年毕业于浙江第一中学，和我都是老教育家谢乃绩先生的学生，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俞秀松、杨贤江、张秋人……都是他共过患难的挚友。二十年代初，我在日本读书时认识了他。

由于夏丏尊、叶圣陶、胡愈之都是他的同乡师友，所以我替开明书店译书，也经过他的介绍。当时开明书店出过一个月刊《新女性》，他是热心的支持者和撰稿人。我在《新女性》写稿和翻译培培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也是夏丏尊和他推荐的。

最近一期《人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早期共产党人蔡叔厚的《共产党内的奇人异士》。这位在白色恐怖下以绍敦电机公司“老板”身份，掩护和周济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负责人认为应该得到列宁勋章的蔡叔厚，也是他的生死之交。

1927年，我从日本回国，就住在绍敦公司。蔡叔厚在大革命失败后入党，这家公司就成为中共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交通联络站，也成了各地流亡到上海的共产党人的集散地。他替中央苏区采办过军用物资，还和李强一起，建立了一个中央苏区联络的秘密电台，培训了一批收发报人员。从1933年到1935年春，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过三次大破坏。由于叛徒告密，“蔡老板”成了国民党特务监视和追捕的目标。但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吴觉农一直和他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这种肝胆相照的革命友谊，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觉农是浙江上虞人，有一股浙东人特有的倔性子。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当过农业部副部长、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但是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名利得失，依然保持着书生本色。他比我大四岁，今年已经九十高龄。和他一见面，话题依旧是离不开茶叶，谈中国茶园的种植面积，出口数量，乃至茶叶的科学研究。对他过去做过的革命工作，他和共产党人的交往，却是很少谈到。值得高兴的是，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人陈宣昭今年八十五岁，身体健朗、思想清晰，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一个在国家体委工作，一个在国外当大使。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安度晚年。

1987年1月4日

怀念应云卫

今年是应云卫同志诞辰 90 周年，他比我小一点，但他却已经去世 27 年了。我认识应云卫是在 1929 年，到他去世的 1967 年，我们相交近 40 年。

应云卫是中国话剧运动先驱者之一。在 20 年代，他开始搞话剧运动时，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虞洽卿办的一个轮船公司的副经理。当时他有着优裕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本来是可以过一愉快舒适生活的，但他偏偏迷上了话剧，不仅是爱上而是迷上，他为话剧运动奋斗了一生。可以说，他为了戏剧什么都牺牲了。为了戏剧运动，含辛茹苦，典当借债。在旧社会，白色恐怖情况下，为了演出新戏，向剧场的老板、向戏剧检查的国民党官吏磕头作揖，也是为了推动话剧运动的发展。

二十年代初，他在上海组织戏剧协社（业余剧团），不惜倾家荡产，还不得不到处借债。以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声誉，本来可以不必干这种事的，他的穷，他的困难，为的是什么？这在今天的年青人看来是难以理解，难以想象的。有一次他来找我，说是要借钱，让我介绍××人，这个人现在还在香港，是个银行家。我看他手上戴着个金刚钻戒指，我就对他说：“你把它卖了不就行了。”他说：“不能卖，我现在借钱就靠这个钻石戒指，假如我这个戒指没有了，别人就会说，老应不行了，连金刚钻戒指都卖掉了。所以非戴着这个东西才能借到钱。”他对我讲，“我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做坏事不行，做好事也不容易。”云卫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搞戏剧运动的。

另外，对剧作家也是不好对付的，因为各有各的脾气，但云卫能够对付得很好。老实讲，我有几个剧本都是他逼出来的，如《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以及《复活》，都是被他逼出来的，说实在的，我是被他的行动感动了。

1942 年夏天，我住在天官府郭老家的楼上，重庆的夏天，天气热得不得了，我就开着房门睡在地上。半夜 12 点我正睡得挺香，突然一个人倒在我的身上，吓了我一大跳，打开电灯一看，原来是云卫。他说：“今年雾季没有戏演了，你非给我写不可。”逼我 8 月底交稿。他就坐在地上走，我感动了，一口答应写，8 月底一定交稿。但我对他说：“我写出来能不能检查通过，没有把握。”他说：“国民党检查的事，我有办法对付。”《法西斯细菌》写完后，我把剧本交给云卫，他看也没有看，拿了就走，对我说：“我保证，最好的演员，最好的导演，把这戏演好。”我说：“你剧本没有看，怎么晓得通得过通不过呢？”他说：“你放心，我有办法。”当时新闻检查官叫卢觉吾，这个人也是怪人，他是国民党 C.C 方面的人，是戏剧检查处处长，他也想当个剧作家。云卫告诉我：“如果剧本通不过，我只要和他咬咬耳朵：你将来写个戏，我给你演，保证演好，这样就行了。”他用这样的办法剧本竟然通过了。

现在讲戏德，那时不像现在，搞戏剧谈何容易，困难重重，有来自国民党的压迫，而戏剧界内部的问题也很多。所以，五十年前的 1944 年，云卫 40 岁的时候，在重庆，我们在张骏祥领导的中青剧社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座谈会，庆祝他 40 岁生日。同时，一些人写了些文章在报上发表，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那时，宋之的忽然想起，光写篇文章，开个小会不行，我们来写个剧本，就拿应云卫为主角，来庆祝他 40 岁的生日。于是，我、宋之的、于伶 3 人合写了一个《戏剧春秋》，其中的陆宪揆，当然是虚构的人物，但是或多

或少地写的是应云卫，当然写了他为戏剧运动而牺牲，甘冒一切困难，敢于承担一切重任，来搞戏剧运动的一面；也写了他旧社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有的旧的烙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他一生乐观主义。他的乐观主义是应云卫所特有的。当然，《戏剧春秋》里的陆宪揆，我们没有写好，但多少地反映了老一辈戏剧工作者走过来的道路，这是很不容易的。

云卫这个人总是笑口常开，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困难似的，实际上他将所有的困难都咽在肚子里，也从不对人讲，因之也有人对他产生很多误解，他也往往一笑了之，从不解释争辩。在重庆演戏，常有特务找麻烦，有时还有生命危险。但云卫都能对付，他真是三教九流都不在话下。我们这些人无法对付，但他能对付。对付这些为什么？求情、借债、磕头作揖，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话剧运动。但话剧运动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我看没有什么好处，只有吃苦受累。他也不怎么爱出名，无名无利可图，他确有这么一种劲头，为话剧运动献出毕生的精力和生命。这样的人，居然国民党没有把他害死，“四人帮”竟然把他迫害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现在我们讲改革，讲创新，现在是信息时代，要了解各方面的人，懂得各方面的情况，懂得怎样来对付。像云卫这样的人，死去太可惜了！特别是他在各种不同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善于克服种种困难的组织领导才能、对戏剧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实在应该在中国戏剧史、话剧史上大书特书，要学习他这种毕生含辛茹苦，敢于承担一切艰难，为戏剧运动而奋斗终身的精神！

（原载 1994 年 9 月 27 日《解放日报》）

追念章泯

同志们，今天大家一起集会纪念章泯同志诞生八十周年，逝世十周年。时间过得很快，他 1975 年去世时，我还在秦城监狱，等我这年七月间回到家里的时候，才知道他已不在人间了。连抚棺一哭的机会也没有，深觉遗憾。

我跟章泯同志相识是在 1933 年，那时候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他原在北平搞戏剧运动受到迫害，才不得不离开北平转移到上海工作的。

大家知道，章泯同志在二十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在北平参加过戏剧运动的事实，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之前他就曾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在北平从事过 C.Y 的工作，也就是共青团的工作。这是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听陈毅同志对我讲的。在一次集会上陈市长见到章泯同志，他就问我：“这一位是不是谢韵心啊？”我说：“是。”他说：“那他是我的老熟人了！”在北平，那时候陈毅同志在中国大学，他说：“那时候我领导共青团的工作，他是当时北平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章泯同志在上海的时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搞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最厉害的时期。1931 年他参加“左翼剧联”，不久之后。临时中央和江苏省委被破坏，赵铭彝被捕，他就跟于伶、张庚同志一起主持“左翼剧联”的实际工作，一直到抗战开始。

正像阳翰空同志刚才说的一样，他导演了许多好戏。他在那种极端困难和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一天离开过他的理论研究工作。他是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人之一。可以说，早在二十年代，他已经研究和介绍过苏联梅那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了。他毕生从事理论工作，并且一贯努力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是一个戏剧理论家，在介绍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他还善于把理论和中国话剧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他从来不空谈什么理论。

大家知道，中国的话剧运动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现在回想起来，中国话剧运动中最薄弱的一环，是理论工作。中国虽然办有戏剧学校，但是介绍过来的绝大部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戏剧理论。章泯同志一方面介绍外国的进步戏剧理论，同时又认真地学习中国自己的戏剧传统。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

抗战开始，他和于伶、张庚同志一起，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他自己也从书斋走向战地，他勤奋地写作、教书，同时也不断地、热情地从事战时的戏剧宣传工作。

1941 年皖南事变以后，他从重庆撤退到香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演出了反法西斯名剧《马门教授》等剧。

章泯同志有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不说空话，干实事、做切切实实的工作。可以说是任劳任怨、不争名利地埋头苦干。他是一个性格上很严肃的人，不论写剧本或排戏，都是一丝不苟，从不在困难面前退却一步，他的为人平易、可亲，待人平等，可是，对闹人事纠纷，排戏不严肃的人，他却常常会大发脾气。

解放后，章泯同志参加了电影学院的筹建工作，后来又主持了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国电影，在三十年代，虽然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作出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电影艺术的理论工作、教育工作方面还很缺乏经验。章泯同志接受、承担电影学院的工作，要是没有很大的勇气是不行的。他为电影学院

奠定基础，同钟敬之等同志一起为电影学院做了许多工作。可是现在许多人也许还不知道他是原电影学院的院长。这与他不讲空话，专做实事，切切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做工作这种品质有关。我们现在纪念他，我以为应该联系到当前电影界、戏剧界的实际情况，来学习他这种诚诚恳恳、不为名利、不讲空话专做实事的这一高贵的共产党员的品质。他留下来的许多论著、剧本和翻译，我想应该由电影家协会、戏剧家协会联合起来，把它们编辑成书出版，作为今后学习研究的需要。我希望这件事，能够早日实现。

（在章泯同志诞生八十周年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悼金山同志

7月7日凌晨，赵寻同志在电话中以悲枪的声音告诉我，金山同志去世了。这实在太突然了，前三天，他还在我家里长谈摄制电视系列片的具体计划。一位相知和一起工作了五十年的同志的去世，悲痛是无可言喻的，那一天我正小病卧床，很自然地想起了辛稼轩的词：“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

我认识他时，他是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他爱好戏剧，对演技颇有抱负。中国的进步话剧是在“文化围剿”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有光荣的传统，但也有一个显著的弱点，这就是我们过多地重视剧本的“情节”，过少地注意演员的技巧。他演过活报剧，参加过蓝衣剧社，也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但是在当时，他是少数孜孜不倦、入迷地探索演技艺术的话剧演员。“演戏易，演人难”这句话，他不知和我讲过多少遍，他一生中塑造的古今中外的典型形象，如屈原、李鸿章、保尔·柯察金、万尼亚、施洋等等，都是使人难于忘却的。

他是一个好演员、好导演、精干的社会活动家。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数十年的工作中，他也有缺点，他也犯过错误，但正如他自己常说的一样，他不止一次有过“残酷的自我斗争”。他勤奋、认真，这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他纪律性强，一切服从组织。事例是很多的，抗战开始，他已经是“名演员”了，和他同年辈的人都当了救亡演剧队队长，而组织上却要他参加以洪深为队长的救亡二队，我怕他有情绪，约他谈话，他爽朗他说：“你放心，我可以发誓，一切尊重洪老夫子”。

1938年在武汉，他要求去延安，当时我们正在做桂系的统战工作，恩来同志把洪深留在第三厅，要他和王莹带队到五战区去演出，然后利用桂系的关系，到南洋一带去做宣传、统战和筹款工作。

1939年他回到桂林，把“二队”改名“新中国剧团”，自己改名赵洵，去了新加坡，临走的前夕和我谈到深夜。我只记得他说的一句话，当他送洗星海、田方去延安的时候，“二队”不少人都流下了眼泪。抗战胜利后，他秘密地到上海找我，沉默了好久之后对我说，“我要跟国民党的文教接管组去东北接管‘满映’”，我很吃惊，问他这是你的个人的冒险，还是组织上的命令？他不作回答，只说：“这件事一传开，朋友们肯定要骂……要骂我金山是叛徒的，……你只听着，千万不要替我辩解”。他接管了满映，拍了《松花江上》。更奇怪的是1949年春，蒋王朝垮台前夕，他以“清华电影公司经理”身份到香港找我，告诉我，他将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这一次不像去东北那样神秘了，他告诉我，这是“奉命行事”，而且“没有危险”。他在“和谈”中立了功，这是徐冰告诉我的。

他在《往事》（见1982年7月12日《人民日报》）一文说，恩来同志委托李克农同志打电报给我，说“金山同志可能重返文艺界”，这是他记错了，事实是1949年5月我从北京去丹阳三野总部时，克农同志问过我，“金山今后还能不能回文艺界”，我说可以。就在差不多同时，恩来同志要齐燕铭同志通知我，要我为金山在上海安排工作，我表示欢迎，可是不久廖承志同志要他去当了“青艺”副院长，他就没有到上海。

人，总是要死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遗憾的是他比我小十一岁，

还有许多事要他做，他走得大早了。可是，在文艺界辛勤工作了五十年，他也该休息了。在中国话剧，电影史上，金山这个名字，是不会被忘记的。

1982年7月12日

不能忘却的纪念

王莹同志的两本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和《宝姑》，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和广大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这是王莹同志的遗著。

作者的亲属和小说编辑要求我写个序言，我当然不能推卸，这是我应当履行的义务。

我认识王莹同志是在一九二八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之后。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革命的低潮时期。上海挤满了各革命地区被迫出亡的革命人物：有斗争中的幸存者，逃亡者，老老少少，各式各样。其中有不少是女青年，留着还存有剪刀痕迹的短发，大睁着稚气的眼睛，带着发自内心的炽热的革命激情，散发着随时都准备为革命冲锋陷阵和牺牲生命的浪漫气质。这正是“五四”运动的狂飙时期培养出来的新女性的一种典型，现在从某些老革命大姐和女知识分子身上还常常能够见到。

王莹就是这些女青年中的一个。她的特点是人虽显得老练，但其实年纪还轻。完全没有革命低潮时期常见的那种悲观消极情绪，而是热情积极的。另外就是对革命文艺的深切爱好。

正是由于后面这一特点，王莹和我有了工作上的关联，并比较接近。当时左翼力量正在电影和戏剧界展开工作，王莹在这方面显现了她的才能。她接连主演了好几部进步电影和话剧，成了通常所谓的电影明星。这个称号和所带来的名声，地位和物质享受，曾经腐蚀过不少年轻有为的女演员，毁灭她们的高尚理想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间。但是王莹是受过严酷考验的革命者，能够抵拦住物质的诱惑。这在王莹和我的接近中，我能深刻地感受到。王莹每次和我谈话，总是提出革命面临的问题，并寻求答案。这显现出来王莹魂牵梦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王莹曾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受到反动派的追捕和迫害，而始终保持了节操，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倔强。后来，王莹愤懑地呼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的口号，曾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她也并不因此而表示丝毫的妥协；随即离开上海，出走日本。

一九三五年王莹从日本回国参加电通公司拍摄《自由神》影片，参加业余剧人协会，抗战开始参加洪深领导的救亡演剧二队，热情地投身于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作出了为人称道的成绩。

我再见到王莹，是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之后。我和范长江、金仲华、司徒慧敏诸同志从香港取道澳门返回重庆，其中就有刚从南洋宣传抗战到达香港的王莹在内。她化装成一个村妇与我们同行。虽然岁月无情地给这个昔日的少女增添了老成和持重。但她的革命热情仍然丝毫不减当年，言谈笑语间依旧闪现着她昔日的兴彩。

返回重庆后不久，就听说她和谢和虚同志到美国去了。王莹一去十三年，这期间祖国解放了。大家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兴奋和忙碌，我也不例外。忙到连怀念远方战友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心想，到了该回来的时候，王莹当然是会回来的。

王莹夫妇回国是一九五四年底，是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的。一九五六年她被分配在当时的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即后来的北影编辑处作编剧。她们夫妇来看过我，但是来去匆匆，我们深谈不够，我对她的关心也不够，这真是十分遗憾。

王莹夫妇走上工作岗位没有多久，她的丈夫谢和质同志，一个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北大荒劳改去了。王莹在香山乡下租了几间住房，从城区搬走，再不进城，极少见到，一九六一年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在香山邀集电影界举行宴会，发现王莹没有参加，临时派人接她与会。见她意态消沉，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默默地不发一言。当时我对她的情况竟然全不了解，此后，也再难得见到她了。

十年浩劫开始，我立即失去了自由，无暇他顾。待到漫长的九年之后我重新得到了自由，才知道王莹早已于一九七四年死于狱中。她的死讯并使谢和质同志神经失常，入安定医院多方治疗才得痊愈。并且还知道，王莹罹罪于我的同一专案，并且有一阵还与我关押于同一监狱，虽然我完全不可能知道，但她是为我吃了苦的。每想到这里，我总是十分难过。

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就爱好文学，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细腻，叙事委婉多姿。我相信她的小说一定能得到知音者的赏识。

这两部小说共近六十万字，而且还有多种异稿和修改稿。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演员王莹又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这样的同志是不应当忘却，也不能忘却的。

于是便写了这篇类似序言的文字，以作纪念！

1980年春于北京

赞颂我的“老大姐”

冰心同志和我同庚，都出生于一九〇一年秋季，但她比我大二十天，所以她一直叫我“小老弟”，这样，我也相应地叫她“老大姐”。

我认识她是在全国解放之后，但很早之前就读过她的作品。我曾两次和她一起出国，一次去印度，一次去埃及，每次一到我们的大使馆，从大使、参赞，到工作人员，大部分也都说：“我在小学念书时就读过您的《寄小读者》。”这不是恭维，而是她辛勤劳动的成果。试想一下，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漫长而动乱的六十年，她笔不停挥，全心全意地为儿童和青少年服务，单就这一点，在中国文艺界已经够得上说难能可贵的了，更使人惊奇的是在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垮台之后，她已经年逾古稀，除了担任了人大、文联、妇联等等许多繁重的社会活动之外，在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还连续获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我不想用“人瑞”这个带封建性的字眼，但是这样永远年轻、不知疲倦的文艺工作者，不论中国外国，总是为数不多的吧。

认真、谦逊、勤奋、顽强……这些都是她的特点。可是就在顽强这一点上，真有点使我既钦佩而又担心。她八十岁的那一年夏天，患了一次小中风，右半身偏瘫了。她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精神配合治疗，战胜了这场疾病。那年秋天我和巴金同志一起去看她，真是一个奇迹，她的病已经好了百分之九十，不仅能走，能讲——讲得很流利，而且还能用右手写文章，特别是我们去探望她时，她有点兴奋，也可能是自己“炫耀”吧，她特别表现得动作敏捷。当时巴金和我都劝她要服老、节劳。当然，她表面上接受了我们的劝告，可是她仍是辛勤地劳动，不久，她又摔了一跤，跌断了左胯骨。我自己，也是在“文革”中折断了胯骨的，一九七六年我到上海诊视，一位热心的医生劝我做手术，我正深为行动不便而感到苦恼，于是就同意了医生的建议，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罗瑞卿同志因腿部做手术而逝世的消息，于是组织上和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冒险”，因此便放弃了做手术的念头，但冰心同志却比我顽强得多了。她一进医院，就不顾她老伴和儿女们的劝说，坚决主张开刀，结果是“吉人天相”，当我再次到医院去看她的时候，她居然又迅速康复，准备出院了！八十一岁的人能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实在是太令人感佩了。

除了上面谈到她的特点之外，我还应该加上渊博和机智。由于她的天禀和勤奋，她不仅是文艺上的全才，而且是一个难得的社会活动家，特别是在对外活动方面的成就。她博古通今，英语讲得很流利，记得一九五三年我和她一起参加以了西林同志为团长的中印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在那次活动中她这方面的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有一次，我们访问泰戈尔的故居，在欢迎的茶会上，因为她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所以丁老和我都推她即席讲话，她先用英语背诵了两首泰戈尔的诗，然后简洁地介绍了泰戈尔对中国的友谊和他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次是我们在尼赫鲁官邸吃午餐，席间冰心同志和尼赫鲁的女儿、现任印度总理甘地夫人的谈话，使我这个干了多年外事工作的人感到佩服。她那种不亢不卑，既有幽默，又有节制的风度，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可以和她比拟的。

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文坛的巨匠茅盾同志去世不久。郭老去世之后，文艺界出生于十九世纪的人已经不多了，值得庆慰的是八十六岁高龄的圣陶同志和我的这位老大姐还是精神抖擞地挥舞他们的彩笔。经

过长期的内战外战，数不清的运动，特别是空前而一定会：“绝后”的十年浩劫之后，为我国三亿儿童服务的作家实在太少了。儿童读物、歌曲、戏剧、电影实在太少了。为此，我衷心地再一次劝告我的老大姐能在两次大病之后，带病延年，节劳服老，再为少年儿童们服务十年、二十年，一直服务到二十一世纪。

1981年初夏于北京

小丁今年七十五——《丁聪漫画系列》代序

小丁就是了聪同志，这在文化新闻界是众所周知的，上了年纪的人叫他小丁，和他同辈的乃至比他年轻的人也叫他小丁，他自己在作品上署名也是小丁。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有许多进步的画家，那时他的确是小字辈，张光宇、叶浅予都比他大一辈，他叫张光宇的夫人“张家姆妈”，这是他自己定的格。

我认识小丁是在一九三二年，我在明星电影公司当编剧，结识了一些美术界的朋友，是胡考呢还是光宇介绍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他当时已经在漫画界初露锋芒，用工笔画漫画，是他的首创，这对我印象很深，一位他的好友对我说：这是遗传，因为他的父亲丁悚，是清末民初驰誉江南的工笔画家。

我和小丁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则是在抗战之后。从抗战到全国解放，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也是小丁画得最勤的时期，他是艺术家而不是社会活动家，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洞察时弊的眼，漫画和杂文一样，是匕首式的武器，小丁就用他的妙手，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可悲、可叹、可笑的现象，作了形象的曝光和调侃，似浅实深，小中见大，每一幅画都会使读者得到会心的苦笑，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一针见血。

小丁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不公正待遇，流放北大荒的时候，他也还是笑口常开，很少看到他愁眉苦脸，他助人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报刊请他画画、设计封面、画人物头像，几乎可以说有求必应，《读书》杂志上的篇头人像，都是他的手笔。

屈指算来，他从事漫画工作已经跨过半个世纪了，他用妙笔给这不平凡的时代留下了记录。我非常高兴知道《丁聪漫画系列》即将出版，因为从这些画中不仅可以看到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也可以看到画家的风格和人品。我欢喜这样的人，欢喜这样的画，写此数语，表一点朋友的心意。

1992年9月8日

《陈此生诗文选》代序

岁月流逝，陈此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此生同志和我相交近四十年，但在一起工作却只有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在桂林的两年，此后我就奔走于香港、新加坡、重庆、上海之间，很少有面晤的机会了，当然，我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我们也可以说是工作在一起的。四十年代初，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代，在国内，汪精卫叛国投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止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在国际，西欧列强对希特勒和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和《救亡日报》同人赤手空拳地从广东撤到桂林，奉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广西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公开合法的传媒据点。经李克农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李任仁先生，他在广西文化界有很高的威望，对《救亡日报》寄予了很大的同情，于是他就把沟通广西地方势力，联系桂林文化界的任务交给了此生同志。

此生同志和我同年，他比我大八个月，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也同样走过一条崎岖的道路，我们在少年时期都受过“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主要是爱国主义和要求自由民主。他和我一阵，都到过日本，住过上海的亭子间，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只是抗战之前我一直留在上海，而他则来往于广州、上海、桂林之间，由于此，他的许多朋友——如陈望道、邓初民、胡愈之、杨东药、陈汝棠、杜君慧……，也都是我的朋友。友谊是可贵的，患难中的友谊和支持，更使人终生难忘。

不久前看了一部名叫“桂林文化城”的电视片，看后我有一种感觉，这部影片主要是记录抗战之后桂林文化界的史事，但是，说得准确一点，桂林的进步文化运动，应该是早在一九三五年陈望道、施存统、马哲民、陈此生等同志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就开始了的，据杨东药同志告诉我，广西方面和救国会，也是一九三六年春，粤桂湘三省准备联合反蒋抗日的时候，是李任仁先生请陈此生同志到南宁去接上了关系的。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还不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而以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为首的救国会（民盟前身），则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威望和活动能力，因此，一九三六年初，广西地方势力得到救国会的支持，陈此生同志的功绩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只因为大批进步知识分子集合在桂林，桂林才会有“广西建设研究会”，才会有“广西建设干部学校”，才会容许《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青年记者学会》在广西得到公开合法的地位。此生同志是一个务实的人，是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他为党和进步文化界在广西地方势力之间穿针引线、铺路搭桥，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他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写学术论文，写政论，也写了不少精彩的杂文，但从来不以文学家自居；他交游广阔，认识马相伯、马君武、柳亚子、郭沫若都是他的知交，茅盾、田汉、宋云彬在桂林，也和他有根深的友谊，但是他“一空依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讨厌的是沽名钓誉，所以“你在报上（按：指《救亡日报》）千万别提我的名字”。在广西，他是最早拥护共产党，反对托派的人，从三十年代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白崇禧和广西地方势力向右转，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撤消，《救亡日报》遭到查封的时候，此生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李克农同志的嘱托，做了大量

鲜为人知的工作，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发起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又是民盟西南支部负责人之一，全国解放之后，他担任过广西省政府副主席，教育厅长、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他去世后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等等，这一切，在此生同志的《我的自述》和他的所有诗文中，都是“语焉不详”或者一笔带过的，因此，即使在那个困难时期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对于他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也是很难找到文字记录的。他的那种不求闻达、默默奉献的精神，他对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作出的业绩，历史是不会忘记，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陈此生诗文选》即将出版，此生同志的夫人盛此君同志要我写一篇序，我因病拖延了好久，今年八月十七日，是此生同志逝世十周年，我就写一点对此生同志的追慕和悼念之情，把这本选集介绍给广大的读者。

1991年7月5日

深深的怀念——《邓文钊传》代序

欣闻《邓文钊传》即将出版，算起来文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文钊在香港经商，那时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是爱国民主人士。他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团结抗日。由于他是一位不求闻达的实干家，所以抗战前夕他多次为八路军筹集款项，在香港购买医疗用品及制作冬季棉衣棉被等事迹，自己从来绝口不提。我认识文钊是在皖南事变之后，1941年春在香港，当时正值国内外局势发生剧烈变化：汪精卫叛国，日寇策动汪蒋合流，联合反共。而国民党则利用新闻封锁和邮检，使得香港和国外千万侨胞很难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桂林主编的《救亡日报》被查封。我奉恩来同志之命来到香港筹建一个对外宣传的报纸，便和正在香港的邹韬奋、范长江等商量，认为在香港办一份公开的报刊是十分必要的，可以通过这张报纸让海外千万侨胞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解放区的真相。

但按港英政府的规定，在香港出版报纸，不仅要交纳两千港元的押金，而且还要有一位在香港有声望的人士作为“督印人”，我们很快就想到了邓文钊先生。《华商报》这报名是廖承志同志决定的，因为在香港用“救亡”、“救国”等报名都不适当。香港是商业城市，而文钊的确从事过商业。当时在香港，国民党、汪精卫、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都有潜在势力，所以承担这份报纸的督印人要冒相当风险。四月间，我和范长江向邓文钊先生提出由他做督印人（董事长）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问我们是不是需要筹集一些资金，并颇有慷慨解囊之意，我说，现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将来有困难再请你帮忙。香港是个花花世界，要办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不容易。

《华商报》创刊初期，销路不到两千份。对此邓文钊先生曾委婉地对我们提出意见，要我们研究一下香港的所有大小报刊，意思是说，我们不一定入乡随俗，但在香港这地方办《新华日报》式的报纸是没有人看的。关于这一段往事，我在《懒寻；日梦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华商报》出版不久，同年十二月八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寇占领香港，当时移居香港的文化人士有数百人之多，因此组织这些人离开香港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务，这就是被称为《秘密大营救》的工作，文钊对此也给予了很大的资助。

抗日胜利后，我先到上海，后在南京梅园新村恩来办公室工作，46年冬，恩来同志要我经香港去新加坡，通过陈嘉庚先生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的文化人士（包括胡愈之、郁达夫等人）的情况，并为《华商报》复刊筹措经费。在香港我和文钊有过两次长谈。

1947年3月18日，我到达新加坡，那一天正是国民党占领延安的日子，因此我给自己便增加了向海外侨胞传达国内政治形势和内战真相，并为《华商报》等到了三万余元功币。大概在47年冬，我回到了香港，接到中央指示，要我留在香港和潘汉年、许涤新等人作准备接管上海和恢复出版《华商报》的工作。这样，在香港，我和文钊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华商报》复刊后，他仍担任董事长，他对全国解放充满信心，我介绍他认识了东江游击队的负责人方方、林平，并请他多了解广东的政治经济情况，为广东解放做准备。

我于1949年4月底离开香港到北京，准备接管上海，文钊则留在香港。

全国解放后，我一直在上海、北京工作，广东解放后，他回到了广州，五十年代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解放初期，党内外都有一股左的情绪，而广东又有地方主义的内耗，对文钊来说，他过去没有政治斗争和行政工作经验，所以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这以后，大家忙于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1956年我送一个出国艺术团到香港，在广州又有一次和他短暂的晤谈机会，我知道他处境的困难，但他仍是非常乐观，毫不介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我则在1964年文化部整风时，就成了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对象，因此文钊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的情况，我是在1975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才知道的，这样一个为党、为人民、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竟被迫害至死，教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愿这部《邓文钊传》去诬存真，展示传主追求光明、不断进步、忠诚为党的一生。更愿人们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努力坚持下去，使十年浩劫那样的灾难永不复现，使是非颠倒，无法无天的事情永远绝迹。

记《救亡日芋报》

一、上海创刊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我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最初是在上海、广州、桂林的《救亡日报》；皖南事变后，到香港和邹韬奋、范长江等同志一起创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我到重庆进了《新华日报》。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恢复了《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出了不久，都被国民党封闭；接着我去新加坡，参加了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南侨日报》；在那里干了半年，被当地政府“礼送出境”，重返香港，又参加了《华商报》的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奉调离开香港。这十二年的记者生涯，说来是十分坎坷的，其中《救亡日报》被国民党禁止出版，前后共两次；因为所在地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而发生的停刊事件也有两次。但是尽管环境艰难，国民党的文网严密，但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现在，先谈一点《救亡日报》的情况。

《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文救”）的机关报，每天出四开一张。这张报最初是打算由“上海文救”独立举办的。但是在筹备期间，发生了——也可以说终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这年七月下旬郭沫若同志从日本回到了上海，“文救”也成为有国民党人参加的统一战线团体，因此，这张报也就有了国民党人士参加。这中间的经过，现在只有很少人知道了。因为在郭沫若回到上海之前，也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宣布国共合作的消息之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虽然不敢对声势浩大的“上海文救”公开迫害，但是一直采取敌对态度，不予合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上海文救”在南市开会欢迎郭沫若归国的时候，上海市国民党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还纠集了一些流氓特务来进行捣乱。但不久周恩来同志在庐山和蒋介石谈定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案，继而在上海又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方面，最初是以潘公展为首，反对“上海文救”出机关报，这时候才被迫改变态度，企图挤进“上海文救”，对这张报纸插上一手。记得在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约我到郭沫若的寓所去谈话，去了之后，才知道郭、潘两人已经约好到浦东大楼（“上海文救”所在地）和潘公展谈判合作办《救亡日报》的事情。这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决定要我协助郭沫若办这一张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我们三人到了浦东大楼潘公展的办公室，寒暄了几句之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说，现在沫若先生回来了，那么这张报纸就请郭先生当社长。表面看来他似乎很慷慨，事实上这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也是“上海文救”主要负责人和群众所公推的，潘公展自己也知道无法抗拒，因此乐得表示一下慷慨。他接着说，既然是双方合作来办，那么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郭沫若表示同意，并立即根据我党的决定，提出我方由夏衍任总编辑。潘公展看来也已经有了准备，说他想请暨南大学教授樊仲云任总编辑，接着他又提了要汪波泉任编辑部主任，由周寒梅任经理，此外还派了一个叫张镛的当了干事。当时郭沫若和潘汉年对其他人事没有预先商定，因此说，我方的编辑主任、副经理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都由社长来决定。至于经费，因为国民党方面估计

这张报纸办不长，所以平常装得气派很大的潘公展，这时候吞吞吐吐他讲，他们先出五百元办起来再说。接着潘汉年表示，那么我们也出五百元。这就是国共合作办《救亡日报》的第一次商谈。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包括潘公展之流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官吏，还摸不透蒋介石对于国共合作的真正意图，所以当天尽管相互戒备，但是潘公展的态度显然有了一点变化。他在不久之前还派上海滑稽演员刘春山等一批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的大会，他本人对郭沫若连招呼都不打，可是这一次却似乎很客气了。最后他还说：就这样谈定了，以后如有经济、发行等困难，我们再谈；报社的事情，例如要哪些人当记者，哪些人管发行，都请郭先生决定，没有大大的事情，我就不参加讨论了。这样，除国民党派定的樊仲云等人之外，其余的编辑、记者以及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由郭沫若和我和“上海文救”宣传部协同决定。当时决定以钱杏邨（表面上由林林出面）对付汪馥泉，担任实际上的编辑主任；专业记者只有周钢鸣、彭启一和叶文津三人。其他则由“上海文救”的成员自动供稿。初办时，每天到社办公的，除上述几个人之外，还有姚潜修、郁风等人。特别要提出的是，胡愈之、郑振铎也以“文救”宣传委员的身份，也几乎每天来社参加工作。我们同意潘公展推荐的樊仲云、汪馥泉、周寒梅等人，也还有一些具体原因：樊仲云我过去认识，他和我的朋友吴觉农很熟，同时他不是潘公展的嫡系，也不是有经验的反共分子；至于汪馥泉，那是我中学同学，“五四”运动时，他也参加过《浙江新潮》的工作，他还在国共第一次分裂以后，在上海帮陈望道先生办过大江书铺，也替中间的一些杂志写过文章，这个人可以说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见解。因此，潘公展派这些人来参加《救亡日报》的工作，他也明白自己这边在版面和文字方面处于劣势，因此他就想通过亲信周寒梅、张镰从经济上、发行上做手脚，使这张报纸无法在上海生存下去。大家知道，当时上海有十多家大报，几十张小报，在这种情况下，出一张既无广告，又无小市民喜欢的猎奇新闻的报纸，要存在下去很不容易。因此，我们的作法是：一方面与潘公展合作，利用他的名义争取公开合法；一方面控制编辑大权，不让他们插手。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潘公展除了用周寒梅在发行、印刷方面捣些乱之外，在编辑、言论方面没有起任何作用。

这份报纸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创刊。当时全社不过十来个人，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写稿不取稿费，甚至于到报社办公的交通费也自己负担。我们的依靠，是当时参加“上海文救”的绝大部分进步文化工作者。所有当时在上海的知名进步人士，首先是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等等，此外，还有文学界、戏剧界、社会科学界、电影界的各方面人士，都替我们写稿，甚至自愿替我们奔走采访消息，有的还替我们跟报贩打交道，劝说他们帮助这份在上海很难打开局面的正派报纸。

当时正是沪战最激烈的时刻，在前线的几个国民党将领都是郭沫若在武汉北伐时期的相知。蒋介石的嫡系陈诚首先派人来访问郭社长，表示支持《救亡日报》，并订了二百份《救亡日报》到前线去散发，同时还似乎很诚恳地请郭社长替他组织三个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担任宣传慰劳和救济难民的工作。当时经组织上同意，郭沫若答应了他的要求，组织了以杜国庠等三人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每团二、三十人，成员完全由郭沫若决定。有一个团本来由我担任团长，但后来沪战告急，郭沫若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决定在上海沦陷后把《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出版，继续由我负责，因此让左洪涛代替

我担任了团长。在这个时期，田汉也从南京到了上海，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一到上海，就几乎每天带着他所熟悉的人慰问伤兵，救济难民，还同郭沫若和我不止一次到张发奎、罗卓英的司令部去劳军。他是一位酒豪，又是才思敏捷的诗人，一到这些司令部，酒罢纵谈之余，当场挥毫赋诗，来慰劳前线将士。回到上海，他还到大陆商场《救亡日报》的编辑部来写文章，写当天的报道，有一次国民党空军来轰炸停泊在黄浦江对面的日本“出云舰”，正值田汉在大陆商场我们编辑部。目击此举，他立即提笔写了一篇关于日本海军，特别是关于“出云舰”的详尽报道，得到了读者的很大好评。

国民党派到《救亡日报》的樊仲云几乎是不负责任的，只在出版后几天，每晚八九点钟到大陆商场的编辑部来走一走，就算完成了他的任务。很显然，他对抗战没有信心。汪葫泉倒是每天来办公，他要求供应他来回的车费，要求给他点香烟和茶叶等等，我们都破例满足了他的要求。至于周寒梅，那是个进行破坏的幕后人物。他每天早晨到报社一次，向报贩收报费，然后对我说，今天销了多少份，卖了多少钱，这样办下去，一千块钱肯定会很快赔完的等等，借此来对我们进行威胁。但是我们并不气馁，只是在出版了一个星期以后，因为周寒梅的破坏，担任出版、印刷、排字的工厂要求增加印刷费，为了换印刷所，停刊了七天，以后又继续出版。当时上海已经很危急了，日本军队包围了市区，直迫南市，我们的记者进出都很困难。这时候出于意料之外，也可以说是出于意料之中吧，两党筹措的一千元已经告罄。但由于得到了何香凝先生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我们没有再向潘公展要钱，而报纸仍然出版下去，这就使周寒梅对报纸失去了控制权，他要想继续担任向报贩收钱、向印刷所交钱的职务，就非得向潘公展要钱不可，而这是他办不到的。一九三七年九、十月，尽管被上海的外文报纸说成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但是这种合作，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除了前面讲过的经济问题以外，由于报头是郭沫若写的，下面又写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因此出版之后，不到两天，樊仲云就通过汪葫泉问我，是否应按“协议”在总编辑名字后面，再加上樊仲云的名字，这遭到了我的拒绝。因为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而且，汪葫泉也不敢公开把这件事情向郭社长提出，因此我们置之不理，他也没有办法。从此以后，樊仲云再也不到《救亡日报》来了。

在上海，《救亡日报》形式上和一般小报相同，但内容上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消息，而是专靠特写、评论、战地采访以及文艺作品为内容的报纸，要在上海这个地方站住脚，困难确实很多。上海的报贩组织是相当厉害的，它不卖你的报，它不替你发报，你就无法把报纸送到读者手里。最初，那个报贩头子对我们《救亡日报》是毫无兴趣的。我和汪葫泉第一次同他（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谈判，他简直不相信这张报纸能出一个星期；关于销数，他说能销到五百份已经很费劲了，但是，出乎报贩头子的意料，这张报纸一出版，由于坚持团结抗日的旗帜和方向，有精辟的战局分析和实际的战地采访，不讲假话，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人民群众，而且把日本占领上海后可能发生的祸害告诉大家，希望人民群众有一定的精神准备，因此，《救亡日报》尽管处境困难，每天仍能销到一千份以上，最多的时候能销到三千五百多份。《救亡日报》是在上海激战之际开办的，因此“上海文救”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郭沫若同志，天天忙得不可开交。那时，每天到报社办公的人，只有钱杏邨、林林、我以及三个固定的记者。当然，来我们这里义务帮

忙的人，还有很多。偶然有事要办，而人手不足，打个电话给“上海文救”，他们就会派人来帮忙。这个时期，汪蓝泉每天还来办公，也写点文章，没有什么反共的表现。到了上海沦陷的前夕，我们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主要是商量哪些人到广州去，以及到那样一个我们大半都感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地方去办报，应该做些什么准备，我们还定了谁去广州，谁留上海。当报纸要转移到广州去出版的决定一传开，几乎全报社的人都要求跟着一起去广州，但是《救亡日报》缺乏经费，到广州能不能办得起来，还没有确实的把握，所以只定了我、林林、周钢鸣、叶文津、彭启一等五、六个人去广州。有几位本来不算报社固定工作人员，而只是常来帮忙的人，像郁风、姚潜修等，也愿意跟我们到广州；当然还有些广东籍的文艺工作者，更乐意到广州继续为《救亡日报》帮忙。

不管怎样，《救亡日报》名义上还是国共合作的报纸。决定迁到广州，事先还得听听国民党方面的意见。于是我又去找了潘公展，把《救亡日报》的情况，以及我们准备在上海沦陷后，迁到广州去出版的事告诉了他。他带着很感意外的表情问：“到广州，怎么办？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报纸，到广州去出版？”我说：“是的。因为上海快沦陷了，但是我们团结抗日的目的没有达到，我们的宣传还要继续，我们认为广州是个比较适当的地方——是交通方便，接近香港；二是可以联系东南亚的华侨。”他听了没有发表意见，只说：“好吧，既然你们这样决定，那就这样办吧！”我说：“今后的经费呢？”他说：“现在上海市政府，连日常经费都发不出，我不能说出一个具体的办法。你们既然决定去广州，那就先办起来再说。有事情可以跟我联系。我可以要樊仲云、汪菠泉到广州去。”这是我们跟国民党方面关于《救亡日报》的最后一次交涉。

上海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沦陷，第二天，包括《救亡日报》在内，全上海的所有中文报纸，《申报》、《大公报》以及各种大报小报，全部停刊。能继续出版的，只有洋人办的外文报纸。市民既看不到报纸，又听不到广播，完全得不到任何新闻。汉奸、特务就乘机造谣，恐吓群众，并且大肆宣扬国民党即将投降的消息，这时候《救亡日报》把一部分器材、资料从大陆商场搬到一位朋友家里的小灶披间，暂时安顿下来，同时还在浦东大楼的“上海文救”宣传部，开了一次小会。参加者有郭沫若、钱杏郊和我，此外还有胡愈之、张志让、郑振铎、萨空了，其他的人我记不起来了。总的方针是稳住阵脚，除《救亡日报》迁穗，和已经离开上海的十个救亡演剧队、三个战地服务队之外，还得保留一支力量，准备在后来被叫做孤岛的上海继续宣传抗日。钱杏郊、孙冶方、于伶、梅益、姜椿芳等同志担任了这一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大约在十二月初，梅益和姜椿芳来和我商量，上海的老百姓急迫希望有一张中文报纸，以便知道一点战争情况，甚至出一张油印小报或者传单都可以。我们想到了过去在“电通制片公司”担任过总务工作的赵邦鏞，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熟悉上海各方面的社会情况的人，我和梅益找他商量，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日本虽则占领了上海，但租界依然存在，租界上的外文报纸依然出版，外国通讯社路透社、哈瓦斯社、塔斯社也还继续发稿，我们也还可以听到外国广播，所以我们可以出一张以选译外国通讯社消息为主的报纸。这个计划果然得到了各方面的支助，赵邦鏞和被禁止出版的《大公报》广告部主任丁君甸很熟，了也正因为报纸停刊、工人失业、广告无法刊出而

发愁，于是我们就请他给我们去拉一点广告，用广告费来作为我们办报的资本。上海中文报纸停止出版以后，广告商没有生意可做，所以丁君甸对此事也很积极。《大公报》的工人们正在闹失业，也很愿意帮我们出这一张报纸，于是我们借了《大公报》的印刷厂，借了一间房子作为编辑室，出了一张中外新闻史上未曾有过前例的报纸，这就是《译报》。《译报》在十二月上旬开张。它的内容是上海附近的战事消息，和全国抗日的战局的报道，所有文稿都是从外国通讯社翻译过来的，每一条消息都注明出处。同时上海还有两张英文报，一张俄文报，一张法文报，我们也从它们的战争报道里摘录一些在《译报》上发表。这是上海沦陷后唯一的中文报纸，因此一出版，不仅销路好，而且广告商要登广告的也很多。但是大约出刊十来天后，还是被工部局查封了（到一九三八年，梅益、姜椿芳、于伶、赵邦锦，又请了一个英国人作经理，作为“洋商”重新向工部局登记，继续出版，仍名《译报》，《译报》的实际负责人是梅益。我在上海沦陷初期，也每天到报社去帮他们翻译一些英文的消息。

这时，郭沫若已经离开上海经香港到了广州。经过他的努力，得到了当时在广东掌握军事实权的国民党将领余汉谋的支持，捐款毫洋二千元，作为《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的经费。我接到郭沫若发来的电报后，立即乘船经香港赴广州。《救亡日报》广州版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复刊。

二、广州十月

上海沦陷后，大批文化工作者和救亡青年都撤退到武汉和广州。而广州则又是一个对外——特别是对东南亚华侨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基地。为了争取《救亡日报》早日在广州出版，我们先派了一个由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于立群、彭启一、周钢鸣同志组成的先遣队先后到香港。这些人中，只有叶文津是广东人，他在香港有亲戚，因此，他是这个先遣队的主要联络人员。据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所述，他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离沪经港赴穗。我已记忆不起林林他们赴港的确切日期，但郭老到香港后第二天就遇到林林等人，因此他们动身的日期该在上海沦陷后不久。我大概是十二月十日和潘汉年同船到香港的，我们去见了廖承志，汉年留在香港，我于十五日到广州。

当时正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两党关系还比较融洽。特别是由于粤系军阀和蒋介石之间还有不少矛盾，因此郭老抵广州后就由一位前十九路军的团长吴履逊介绍，去拜访了余汉谋。余对《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表示欢迎，并捐助了毫洋（广东的地方货币，当时一毫洋折合国币七角）二千元作为开办费用（郭老在《洪波曲》中说：余汉谋答应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似为误记。因为假如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我们不至于在开办二三个月后就感到经费拮据了）。同时，通过郭老的关系，在长寿路（现名曙光路）找到了报社的办公地址。并经沫若的一位朋友、一位橡胶厂厂主陈辅国的帮助，在官禄路（现名观绿路）找到了一处宿舍，这样，《救亡日报》就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广州复刊。不久，应陈诚的电邀，郭老就和于立群同赴武汉。《洪波曲》中所说：在车站送行时，我曾对于立群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这是事实。因为上海抗战初期，于曾和我谈过要去延安学习，我同意了她的意见。后来情况改变，我察觉到郭老需要有她这样一位助手，就又同意了她留在武汉。

《救亡日报》当时没有印刷所，是委托一家当地报纸《国华报》印刷厂代印的；也没有发行机构，是委托《新华日报》驻穗发行所代办的。工作人员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之外，国民党方面派来的汪荫泉、张镰也相继到了广州。潘公展派的另一位总编辑樊仲云，则到了香港以后就停下来，为香港的国民党党报工作，一直没有到广州来。一九三九年后，他就偷偷回到上海，参加了汪伪组织。由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当时在广州对于大批涌到的“外江佬”是看不顺眼的），我们又吸收了一些广东籍的同志参加了报社的工作，其中有华嘉、陈子秋、谢加因、蔡冷枫等同志。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等同志也当了我们的义务记者。至于义务为我们撰稿的，那是很多的，我说得起来的就有：蒲凤、雷石榆、黄婴宁、林焕平等。我们还是照上海的办法，工作人员一律不支薪水，写文章不付稿费，每月只发五元的零用费（有人记得是三元）。和上海不同的是，对外地来的人由报社提供宿舍，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后来还有不少流亡到广州的人参加了报社的工作，如高顾、高汾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在马路上“拣”到了一个十来岁的名叫阿华的孤儿，作为报社的勤务员，他一直跟着报社到了桂林。

这里要补述一下，在经过香港时，廖承志曾转给我们一份周恩来发来的电报，指示两点：一、《救亡日报》必须争取公开合法，因此，社内的党组织不和当地党组织（广东省委）发生联系，也暂不吸收新党员，有事由我和十八集团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单线联系。有难于解决的问题，则可去港向廖承志或潘汉年同志请示；二、抗战后有不少在欧洲和美国的党员、爱国人士将回国参加工作，他们经过广州时，指定我以《救亡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和他们联系，有证明文件或我熟悉的，可根据他们的希望介绍到大后方或解放区；没有证明文件和我不熟悉的，则要他们去香港与廖承志同志联系。因为当时国共两党关系较好，所以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就派了蒲特（饶彰枫）同志以作家身份和《救亡日报》经常联系。

当时在广州有不少有名望的教授、文化工作者，现在记得起来的就有尚仲衣、钟敬文、姜君辰、左恭、孙大光、石辟澜、梁威林、左洪涛（在张发奎部当战地服务队的队长）等同志。因此，文化界经常有集会讨论问题的机会。这些同志也经常给《救亡日报》撰写评论和文艺作品。现在回想起来，由于我缺乏办报的经验，这时的《救亡日报》的版面还是和上海时期一样，没有什么改进。新闻性较弱，而以长篇的文章、文艺作品为主。这个问题，直到报社撤到桂林以后才有所察觉、进行改革。

《救亡日报》在广州时期，有值得一记的几件大事。一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廖承志、潘汉年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从香港到了广州，广州文化界，包括一些国民党人士在内，曾开过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廖承志发表了对时局的讲话，对当地的进步文化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二是同年四月下旬，我和叶文律一起到武汉向郭社长请示今后办报方针，我和郭老一起去见了周恩来。他对我们的工作作了很具体的指示，临别时，恩来说，你到了武汉，得去看一看王明，因为他是长江局的书记。于是，我在第二天到了王明的寓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王明。很奇怪的是，他和孟庆澎非常客气地像接待一位民主人士一样地接待了我，并给我看了许多他在莫斯科时期的照片。我向他请示《救亡日报》的工作，他说：一切按郭沫若的意见办，他没有什么意见。这也许可以说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我在武汉住了一个礼拜，记得“五一”节那天，苏联援助我们的空军和日本空军在武汉上空发生了一

场激烈的空战。我和两位《新华日报》的记者一起去看空战时炸毁的街道，看到有一位外国记者拿着手提摄影机在拍电影。经人介绍才知道他就是世界知名的“飞行的荷兰人”伊文思。从此之后，他就成了我的朋友。他当时用的那架手提摄影机。后来送给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也就是由徐肖冰带回延安，组成“延安电影团”的唯一的一架摄影机。第三，就是同年五月的广州大轰炸。在这之前，广州也经常发警报，敌机只在郊区投炸弹，但广州仍可以说是“升平世界”。说来也奇怪，这次日本空军来轰炸时，广州市面上照样人来人往，若无其事，因此损失就特别严重，市民被炸死者约数千人。我当时正在官禄路宿舍写稿，附近落下一颗炸弹，竟使写字台上的电灯泡撞到墙上而爆破。接着我们全社动员，去采访轰炸后的惨状。当时遍地都是被烧焦了的尸体，这是我毕生看到的最惨的情景。我曾给《新华日报》写过一篇报道：《广州在轰炸中》。由于这次轰炸，汪胡泉仓皇逃往香港，不久后，张铺也因贪污问题被揭发，而离开《救亡日报》。从此之后，这份报纸就没有一个国民党方面的人了。

在当时广州有大小报纸十多份，而《救亡日报》又是知识分子看的报纸，因此销路不广，二千元毫洋几个月后就赔蚀殆尽。这时，广东省长吴铁城的秘书黄祖耀（黄苗子，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和我相识的一位画家）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广州白报纸价格很高，因为这些纸从香港进口时要付一笔关税。你不妨用郭沫若代表的名义去见一次吴铁城，请求《救亡日报》所用纸张进口时予以免税，数量可以多报一些，然后把多余的纸张在市场上出售，就可以得到足够的经费。”我照计而行，果然得到了吴铁城的同意，这样我们就用出售多余白报纸的办法维持了报社的经济。

经过了大轰炸，广州老百姓深受家破人亡之惨，就开始大量地向香港、澳门撤走（当时从广州到港澳不需要任何手续和签证）。我记得有几家地方报纸也相继停刊。但是我们这张穷报，全体工作人员还是同心同德、坚持到底。十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进攻广东，由于没有认真的准备，白寇登岸后就长驱直入，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这些情况老百姓是都已知道了的，而可笑的是，国民党党政机关还在十月十日“国庆节”那天晚上组织群众举行了一次“祝捷”火炬游行。我们报社还接到通知，要求都去参加，我们的确派了一些记者去，但回来后，大家在编辑室相对无言。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能说战局危急的真话，也不能不报道火炬“祝捷”游行这一事实。从这之后，党政机关就开始在晚间悄悄撤退。不必说那些国民党官吏的家眷，他们是早在日寇登陆之后，就撤退到香港去了。大约在十月十五左右，我们曾约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商量，经过讨论，决定凡是有合法身份与职业，可以随同余汉谋司令部和省政府撤离者，都可以先撤到韶关一带。这样，尚仲衣、钟敬文、郁风、司马文森、黄新波等同志就参加了动员委员会，在沦陷前几天离开了广州。

提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可能现在四五十岁的人记忆都很淡薄了。可是，这对于亲身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却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救亡日报》在许多报纸相继停刊，连长堤一带的报贩都已很难找到的时候，还是坚持每天出版。我们动员了全体工作人员亲自上街卖报，直到二十一日日寇逼近广州东区时，我们散发了当天的报纸，一行十二人徒步离开了报社。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悲他的，也可以说是悲壮的，关于这一天的情况，很感谢李以庄同志给找到了一篇我所写的文章：《广州最后之日》，

读了以后，连这篇文章什么时候所写、发表在什么刊物，我自己也记忆不起来了。为了让今天的年青人知道广州过去有这么一场悲剧，就把这篇短文附在后面，作为“广州十月”的结尾吧。

三、广州最后之日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打给汉口郭社长的电报上还写着：“社友一部拟暂撤梧州，此问尚安，报决维持至最后一瞬。”

但是，就在这一天下午，在我托一个朋友带到香港去交给廖承志的一封信上，我却只能这样写了：

“看模样，广州的失陷已经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当局好像早已决心放弃这个中国仅有的富庶的城市了。警察无秩序地在驱逐市民，在仓皇地逃避了的市民后面，他们就从容地收拾了他们剩下的东西！对于战事，任何机关都守口如瓶地不发表一点消息，而一切公用机关，邮政、电报、银行，都已经自动地停止了工作。整个广州像被抛弃了的婴孩似的，再也没有人出来过问。‘保卫大广州’的口号也悄悄地从那些忙着搬家眷的人们嘴里咽下去了。我贪馋地想多看一眼这使我留恋了十个月的城市。”

这天晚上，广州文抗会发起的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还照常开会，还到了近百的革命青年。我心里想，一个礼拜乃至十天，总还可以支持吧，看改了十月二十日的报纸大样，带着夸示的心情再校读了一遍特派战地记者草明和胡危舟的战地通讯，回宿舍去睡了。自从日寇南犯以来，特派记者到前线去的只有《救亡日报》一家，草明、胡危舟和欧阳山三位从前线带回的文稿，也是在广州报纸上发表的最初的战地通信。

像患了急病而又无人过问的病人一样，二十日清晨广州的形势又急变了，报纸的印刷、发送都发生了问题，同业《国华报》，《越华报》，《环球报》都宣告自动停刊。我们开了一次社友的紧急会议，决定另觅印刷所继续出版，并且立刻动员将这一天无法邮递和发行的报纸无代价地分送给了西壕口黄沙车站一带的“难民”。

十点半，《中山日报》的唐遂九打电话给我，说情势紧急，敌人已经过了增城。我想弄清楚这消息是否可靠，打电话去问省府的黄祖耀，但是打了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接；接着，《申报》的陈凄雅从香港来，说要上前线去看一看，我们还设法让他能够顺便搭上蒲风、许介诸位当晚到增城去的卡车。广州的谣言一句来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对于增城失守的消息，谁也不敢也不愿相信。

写了二十一日社论，我直率地表示了一切愿意留守在广州的市民的愿望，我说：“假使当局认为广州需要守、可以守的话，那就应该给愿意留在广州，愿意参加保卫广州工作的人们和市民以一定的办法，至少，也该使他们能够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当局要维持广州的秩序；假使说广州已经不能守，不必守了，那么也应该明白表示，使几十万市民能够及早离开，能够及早毁弃一切可以资敌的财物！”哪里知道，连这点意见也没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了。

正午，一切消息隔绝，闷慌了。我到战区民众动员会去打听一下，遇见了钟天心先生、湛小岑先生，他们还很镇定地在布置办公室的桌椅；姜君辰兄伏在桌上写一个计划草案，门口，成群的青年在探问参加服务队的手续，

谁也没有一点惊惶的样子，我安了心，将增城失守的消息去问钟天心先生，他坚决他说：这是不可信的。

再到财厅前去走了一转，关门休业的店铺比前两天更多了，但是照常营业的也不少，我买了一些日用必需的东西。这，也就是我在广州市街最后的散步了。

回到报馆，淬然的遇到了前天已离开广州的《新华日报》分馆的张尔华（敏思），衣服上血迹犹新，脚肢了，他们的船在途中遇到轰炸，许多人受了伤，他的太太伤最重，满身是血，已经抬放在报馆营业部的那狭窄的走廊上了。接着，一下午尽是不祥的消息，某某地方丢了，某某大员失踪了，敌人离广州已经只有几十里……等等，中央社早已不发稿了，广州的晚报，一律停刊了，电讯断绝了，要发稿的时候，除了欧阳山的战地报告外，什么战事消息也没有，打电话问，什么地方都没有人接。没有消息，出什么报呢？再召集编辑部会议，决定了在二十一日之后，暂行停刊。黯然地写了一篇社论：《忍着眼泪和广州的市民暂别》。我们是不能用捏造的消息来欺骗读者和敷衍自己的，我们的休刊只为了“无法获得正确的消息”！我们备函将暂时休刊的经过，报告了一年来热心地帮助了我们的几位本报的顾问，但是送信的回来，大部分的机关，都已经迁走了。

我们作了必要的撤退准备，毁弃了可供敌人参考的一切通讯地址和文件，收拾了必要带走的的东西，并且决定：将二十一日报纸分送之后，于下午四时，西撤三水。

大样还没有送来，一切准备都完成了。对于《救亡日报》，万一广州沦陷之后，敌人总不致于轻轻放过的吧？我们利用空闲时间，在墙上遍写了对敌的宣传标语，编辑室正对面的墙上，林林用红黑两种墨水从容地写了一种套色的标语。我在整理残稿的时候，发现了一张大轰炸时的一群孩尸的照片，就把它贴在墙上，旁边用日文写着：“这是日本空军的，战绩，！你们也是有父母妻子的人，看了这照片有什么感想？为着人道，打倒使中日两国人民陷于不幸的日本法西斯军阀！”膳室墙上，又写了一条：“即使你们占了广州，占了武汉，我们的抗战还是不会终止的，你们打算打十年二十年的仗吗？”

一点钟看了十月二十一日的大样，好像了了一桩心事似的回到宿舍，闭上眼睛就睡了。

记不清什么时候，邻室有人在讲话：

“再听，再听，……”这是彭启一的声音。

“没有，去睡吧。”林林回答。

启一似乎有点不服气似地回到自己房里去了，但是不一刻，他又喊了：

“听，这不是炮声！林林！”

远雷似的炮声，大家都听到了，有风的时候，还夹杂着炒豆似的机关枪声音，这时候，我们才真正相信敌人已经近广州了。

我们决定了做紧急撤退的准备，启一到报馆去唤醒其它的社友。但是，不到三分钟，门礼来说，印刷所的工友接到工会的临时紧急通知，一律编队出发了。我们还想把二十一日已经组版的报纸印出，把版子拆下抬回报馆，但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印呢？

接着，是广州已经几个月不曾有过的夜间警报，警报未完，飞机已经在头上了，满街是汽车的鸣声，远远的火车的吼声，炮声，铁甲车碾地的那种

可怕的声音……全市漆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全社十二个人，只拿了些日用必需的东西，广州天气还很热，秋冬用的衣服也完全抛弃了，拿了些报馆重要的文件，不辨路径，决定了向西出发。这是广州夜间从来不曾有过的黑暗。要再看一眼我们居留了十个月的广州市容，也不可能了。

上午四时左右到了黄沙，伸手不见五指，一直到前面的哨兵大声喝叫为止，才发觉了我们已经闯进了正在撤退的一团机械化部队的中间，凭着向我们这一群盘问的哨兵的手电，我们才隐约地看见了四周全是装甲车、坦克、大炮。

除了在六二三路附近遭遇到一队伤兵之外，路上不曾遇到逃难的百姓，可怜他们都在梦中吧，想一想他们明天将遭受的悲惨，这是如何难堪的事啊。

前面是白茫茫的水，不渡过白鹅潭，还是没有法子可以到达石围塘的。但是一只渡船也没有，冒着冷风，声嘶力竭地喊着，谁也没有回答。一小时之后，好容易有一条船靠岸，但立刻被一个军官模样的汉子用武力劫去了。我们避开了他们，边走边叫，终于以平时十倍的价钱，雇了一艘小船，十二个人分两批，于五时左右渡过了河。

在石围塘车站遇到“锋社”的朋友们，他们早一天出发，在车站上已经等了一日一夜了。六点，最后的一批火车撤退，我们侥幸地挤上了车，但是开了不多一会，警报又响了，大家下了车，决定步行去三水。天已亮了，从老百姓的炊烟，东望广州，还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不多一刻，震耳的轰响连续地从背后传过来了。

这一天傍晚抵达三水，敌人的兽蹄也在这一天的下午踏进了大广州的东郊。

四、在桂林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我们《救亡日报》同人在战火纷飞中离开广州，经肇庆、柳州，于十一月七日晚到达桂林。当晚，我和林林就到桂北路二六号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找到了李克农。当时，《救亡日报》的社长郭沫若已由武汉撤退到长沙，广西政治情况又很复杂，因此，《救亡日报》复刊后的方针政策，以及筹备复刊必需的人力物力，都要尽快向郭社长和当时也在长沙的周恩来请示。于是，当即决定，由我第三天只身赴长沙。《救亡日报》同人（除了广州撤退到桂林的十二个人之外，已在广西探亲的周钢鸣也参加了）的住宿生活，一切由办事处用郭社长名义，通过在桂林的进步人士，妥善安排。根据克农的意见，为了争取“合法”，让“桂系”当局安心，要我在动身去长沙之前，先请刘仲容陪我去拜访了广西文化教育界元老李任仁先生，然后再由李任仁先生和我一起，对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和黄旭初，我们只谈了十来分钟，而李任仁先生则把我约到他家里，详细介绍了李、白、黄之间，和“桂系”同蒋介石之间的十分微妙的关系。其中我记得清楚的一点是：他问我郭沫若对“太子”派（孙科、梁寒操）的看法和态度，然后说，孙科想在广西插手，话讲得很漂亮，实际上他和C.C.关系很密切，因此李、白对他采取了“敬远”的态度，将来你们在桂林办报，我看他们也会对你们采取同样的态度的。这是我和任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但是谈得非常诚恳坦率。

我在十一月九日晚坐火车赴长沙，路上从北向南开的列车拥挤，不时停

车，直到十日下午才到长沙（郭者在《洪波曲》中说我于八日到长沙，是误记）。一下车，我很快地感到长沙的治安已经十分混乱，特别奇怪的一点，就是大街上有许多店家都已经在临街的门前筑上围墙，或者用木板把大门钉死；这种情况，在广州陷落之前我们也曾见过，所以很自然地感到国民党当局并没有“保卫”这个重要城市的决心。十一日上午，好不容易找到了郭社长和周恩来，他们对我的到来似乎既感宽慰又有点惊奇。恩来办公室里挤满了人，认识的、不认识的、穿军装的、西装笔挺的，各色人等都有。恩来和我握了握手，说：“对不起，等我十五分钟。”我就和人丛中唯一的熟朋友孙师毅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上相互谈了从广州撤退的遭际。等了十五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师毅建议一起去吃饭了，这时恩来才匆匆出来，就站在走廊上说：“我已经接到克农发来的电报，你们从广州出来的情况，大体也知道了；报纸决定在桂林复刊，很好，但是现在情况紧急，具体怎么办，现在还没有想好，沫若也很忙，你先休息一下，明天下午四、五点钟，到‘三厅’，再谈。”于是，师毅慷慨地要请我去吃湖南菜。可是一到大街，幻想就消灭了，大大小小的馆子都关了门。师毅还是不死心，说到“八角亭”去看看，结果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买了几个大饼充饥。第二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的日子，我按时到水风井三厅，恩来正忙着“紧急疏散”，来不及谈《救亡日报》的事了。他对我说：“你这次来得不巧，没有时间详谈，但也可以说来得正好，现在要交给你两个任务，一是给你一辆汽车，由你和孙师毅、马彦祥护送于立群、池田幸子去桂林，把她们俩安顿好之后，可以先和克农商量，自筹经费，尽快恢复《救亡日报》；第二，现在战事紧张，第三厅不能再和散在各地的抗敌演剧队联系，但考虑到《救亡日报》是公开合法的报纸，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各地演剧队由你和他们联系，如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可向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请示处理。”这样，我们就在暮色苍茫中离开长沙。当我们的那辆“老爷汽车”到达下摄司的时候，长沙就发生了大火，我们一行五人，于立群和池田幸子都是孕妇，池田还带了一只她最欢喜的花猫。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挤满了达官贵人和军官的家属，和“逃难”的大小车辆，真可以说“步履艰难”。我们在衡阳、冷水滩各休息了一日，记不起是十一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才到达桂林。这时，由于克农的协助，和林林等同志的努力，《救亡日报》同人已经找到了一处临时安顿的地方。但是，“人地生疏”而又赤手空拳的十几个人，要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办起一张报来，经费就成了一个首要的问题。八路军办事处不可能供给我们经费，即使有钱，办事处“津贴《救亡日报》”这句话一传出去，这张以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的报纸也就会被反动派叫成伪装党报。出路在哪儿？我和李克农商量了两天，决定“自力更生”，不向国民党和桂系伸手（那时据李任仁先生和杨东苑同志说，只要以郭沫若名义向李宗仁申请，一定数目的津贴是可能获得的）。我托克农给正在长沙处理善后工作的恩来打了个电报，提出复刊的具体工作由林林、周钢鸣积极筹备，我则立刻经广州湾赴香港，通过廖承志筹募经费。恩来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告诉我们有必要时，可以赴新加坡去向陈嘉庚先生求援。这样，我就不等郭沫若预定的十二月四日赶回桂林，就在十二月三日搭公路车南行。五日到广州湾（今湛江市），乘上一条不足两千吨的货轮，慢吞吞地在海上飘着，好不容易到十二月十二日才到了香港。这次到香港的筹款任务，出乎意外的顺利。原来恩来已经电告廖承志，要他尽力协助，所以他就很快地决定从海外

华侨捐赠的经费中，拨给了一千五百元港币。也正在这个时候，郭老派阳翰星、程步高到香港购买交通工具和国内缺乏的文化用品，从他们口中得知，恩来途经桂林去新四军时，曾和郭老见过李宗仁、白崇禧，谈到了《救亡日报》即将在桂林复刊，并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据说，桂方表示“欢迎”，而且答应了补助一笔经费作为开办费用。这件事对我说来是一个最好的消息，一是桂系表示“欢迎”，我们就和《广西日报》、《扫荡报》等有了同样公开合法的地位；二是我离开桂林之后，每天报上看到物价飞涨的消息，就一直在担心着桂林《救亡日报》同人的生活。有了这两笔捐款，复刊的可能就具备了，我就通过廖承志打电报给李克农转告林林，不要等我回来，最好能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复刊。这次旅程很短，据我当时写的一篇文章（《长途》）记载：我于十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又于一月十二日回到桂林，时间正好是一个月。

我回到桂林的那一天，正好是《救亡日报》桂林版出版的第二天，对这件事，在郭老写的《洪波曲》中似有误记。《洪波曲》中说，《救亡日报》在桂林于一月一日复刊，个别的同志在回忆中则说是一月三日复刊，但不久前经华嘉亲自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去查了；日报，才证实正确的复刊日期是一月十日。延期出版的原因，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敌机滥炸桂林市区，《救亡日报》暂时借住的房屋被炸，加上接洽印刷所等等关系，只得延迟了十天。

《救亡日报》为什么能在桂林出版？这还得追述一下我党和桂系的关系。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中间不能忘记周恩来在武汉时期对李、白二人作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一般人认为桂系只是李、白、黄（旭初）三个人为首的军阀集团，这看法是片面的。在李、白、黄之外，还有李济深、黄绍站，他们在桂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蒋介石也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时期，恩来就对白崇禧进行了诚挚而又坦率的“统战”工作。例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出版后，恩来亲自将这本书送给白崇禧，叶剑英也向白详尽地解释了这一著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白崇禧是一个自作聪明，以“小诸葛”自居的人，所以他曾商得李宗仁的同意，将这本书印发给桂系师长级干部阅读，然后又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报请蒋介石批准，遍发全军，作为“对日作战方针”。我讲到这里，还得追记一下不久前去世的刘仲容同志。他是留俄学生，早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夕，正是两广事变结束之后不久，仲容就奉恩来之命，从延安秘密来到南宁，通过他的留苏同学王公度（曾与托派有关，后来成了李、白的智囊）的关系，会见了李宗仁，传达了中共中央团结抗日的方针和我党愿意和桂系真诚团结的意愿。据仲容后来对我说，由于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时桂系站在蒋介石一边，所以当他第一次同李宗仁见面，提出这个问题时，李简直不敢相信，只是当时时局动荡，因此李宗仁一方面对他“以礼相待”，但同时又表示现在还谈不到这一类“十分敏感”的问题。可是不久之后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同意了合作抗日，李宗仁才把刘仲容视为上宾。当时，刘仲容和刘士衡都同我们在广西的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抗战开始后，二刘都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参议”。我从广州撤退到桂林，李克农安排李任仁先生陪我去见黄旭初，也是由刘仲容带我去见李任老的。由于以上的这种关系，加上桂系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的历史性隔阂，以及李、白对蒋介石蚕食广西这块地盘的戒

心，因此，在抗战初期，和其他蒋管区比较起来，广西不论在政治上、文化上，特别是对待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救亡青年”，态度都是比较开明。桂系对当时政局保持这种“八面玲珑”，以抗日、民主力号召的态度，所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的筹备工作尽管十分艰苦，总的说来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在太平路十二号找到了一所办公的地方，后来又在桂西路二十六号租借了一间很小的“营业部”，工作人员除了从广州撤退来的十二个人之外，逐渐吸收了不少从内地流亡到西南来的文化界人士和“救亡青年”，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我记得起来的有周钢鸣（他从创办时就是采访主任）、谢加因、华嘉、冯晖、乔章慷、萧聪、王仿子、薛传谋、林仰睜、高静、水声宏……等等。看这个名单就可以知道，没有一个懂得和能够管印刷、发行、以及经济开支的经理，于是经我向李克农呼吁之后，他介绍翁从六（毅夫）来当经理。说也奇怪，当克农把翁从六介绍给我的时候，我们两个都禁不住惊喜交集，原来我们是一九三一年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出版“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时的同事。翁从六是一个精明干练而又和蔼可亲的人，在社内除我之外，他比较年长，所以从此之后，报社除编辑工作之外，一切经济、对外交涉、以至全体同人的衣食住行……一切都由他管理，而且办得深得人心，使全社人员在一律吃大锅饭、不拿薪水稿费的情况下，团结一致、毫无怨言，一直坚持到报社被封闭为止。

周恩来要我办《救亡日报》的时候，就决定了我的工作重点是宣传和统战，因此，当报纸复刊之后，我就得分出一部分（也许可以说大部分）时间去做统战工作。当时的桂林，在大后方被叫做“文化城”。由于那时的桂系在政治上还算比较开明，所以蒋介石的复兴社，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 C.C.，孙科的“太子派”，宋美龄的“夫人派”……当然还有坚持与中共合作的进步组织，都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据点，于是有人说，当时的桂林（乃至广西）是一个“群雄割据”的局面。白崇禧是行营主任，但是他下面也不是清一色的桂系，例如行营政治部主任就是孙科系统一个颇有野心和善于权术的梁寒操。在文化方面，有两个不由桂系控制的机构，一是中央社广西分社，社长陈纯粹；二是新闻检查所，所长是一个姓周的前西北联大教授，自称和鲁迅先生是“近亲”的绍兴人，这两个机构及其负责人，都是由 C.C. 控制的，对《救亡日报》当然负有监视的任务。在报纸方面，当时除桂系的《广西日报》、“中立”的《大公报》之外，还有一张国民党军委会直属的以反共著名的《扫荡报》。早在《救亡日报》复刊之前，我就对黄旭初坦率地表明了态度，即我们赞赏和拥护广西当局的团结抗日、进步的立场，对广西内部政务，保持友好态度，也希望广西当局对《救亡日报》予以支持。因此，直到皖南事变之后我离开广西，我们同《广西日报》之间一直维持了友好的关系。中央社广西分社的社长陈纯粹，“五四”运动之后，曾参加过进步活动，是欧阳予倩的老友，在我看来是一个谨慎而又懦弱的人。我回桂林后向他作礼节性访问的时候，他首先说：我对郭先生很尊重，我保证对你们和对《广西》、《大公》、《扫荡》一视同仁。所以我和他也相处得很好，至于新闻检查所的那位周所长，情况就不同了，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他一方面对我表示十分友好，认同乡，叫我“乡长”；有时候在我们送审稿中作了删改之后，第二天甚至还要到我们报社来“解释”，说什么下面的检查员删改了，盖了印子，我不好坚持……等等，关于这位先生，我还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大概是一九三九年夏）他特意约我“饮茶”。他说，桂林过去有一

个浙江同乡会，有一座三进深的会馆，后来被别的机关占用了，他去看了一下，觉得房子修一下还可以用，可以安排七、八户人家。接着他又用“悲天悯人”的口吻说：现在浙江人流亡到这里来的很多（似乎他还举了宋云彬、张梓生等人的名字），大家挤在江东的草棚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会馆收回来，供同乡们居住呢？接着，他对我说：“你老兄带头，我们联名写一个报告给省政府，要求发回这个会馆。”当时桂林的确房荒严重，太平路十二号《救亡日报》的小会客室里，就常常有不速之客来睡地铺，他的那个主意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他向我（我在桂林的政治面貌，已是尽人皆知的了）提出这个问题，又要我带头签名申请，就使我感到意外。于是我就口答他说：“你的主意我赞成，但一定要由你带头，因为你是现职官员……”他谦辞了一番，表示这件事一定要办。可是从这之后，直到我离开桂林，不止一次遇到他，他却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对《扫荡报》，即使在各报记者聚会的时候，我总是让我们的记者保持警惕。因为，那时候一位《广西日报》的记者告诉过高灏、高汾，说《扫荡报》的一个女记者是军统特务，专门想从《救亡日报》探听在桂林的共产党人的情况。但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有一次在行营举行的“纪念周”之后，《扫荡报》的总编辑钟期森，竟约我单独谈话，而且单刀直入地说：“您不要把我和重庆的《扫荡报》联系起来，在桂林，我们两家的处境是差不多的，都是‘寄人篱下’，加上现在是抗日时期，我不会在版面上发表不利于团结的言论的。”这件事开始我感到惊奇，但再一想，他的话不一定全是假话。事后，他的确也一直对我们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在抗战时期，从敌对阵营中意外地伸出友谊的手来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至于《大公报》，当时的主持人王文彬先生，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他对我们诚恳坦率，有时候还告诉我们一些重庆的所谓“内幕”消息。这些事实说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它下面的各种派系，都不是铁板一块，都可以分化争取和我们合作（即使是一段时期之内）。现在不少人写回忆录或文艺作品，对国民党人、各军阀派系都一律写成“反动派”、“顽固分子”，我认为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一般说来把桂林叫做“文化城”，看来是可以当之无愧的。除了当时李、白、黄的态度比较开明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广西在我们到来之前，在文化、新闻、出版、文艺等方面，进步力量都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基础，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广西文化界元老李任仁先生为主任的一个颇有声势的“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会长是李宗仁，副会长是白崇禧、黄旭初，常委主任李任仁是白崇禧的老师，委员中包括了李四光、胡愈之、欧阳予倩、杨东莼、张志让、姜君辰、千家驹、范长江等知名人士，（《救亡日报》迁桂之后，我也接到了一份“聘书”，请我当了委员）。这个组织只出一份叫《广西建设》的杂志，不搞什么抛头露面的政治活动，但它实际不仅是桂系对外炫耀进步的一块金字招牌和各方政治势力联系的纽带，而且是李、白、黄的一个最有力的智囊集体。这个组织看起来“名士如林”，而实际主持大计的是李任仁、陈助先、陈此生等等，这些人在国民党看来都是不折不扣的李、白“嫡系”，只要蒋桂不正式撕破脸，CC也好，军统也好，要对这些人下毒手是不可能的。同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李、白集团通过这个机构支持了当时从外省迁来的进步组织和个人；必要时，也可以通过这个机构，和中共及其外围保持联系，当然，桂系在当时采取这种态度，也还有它“自卫”——也就是巩固和

壮大地方势力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宗仁以“礼贤下士”的姿态，聘请知名教育家杨东莼（中共秘密党员）当了广西建设干部学校的教务长，双方还订了“君子协定”：这个学校的教育方针、用人事，一律都由教务长决定。这样，在我党的支持下（为了加强这个学校，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还从《救亡日报》调去了周钢鸣、司马文森、蔡冷枫等同志到“干校”去任教），这个被叫做大后方“抗大”的广西干校，就在这一段时期里为桂系——也为各民主党派培养了许多骨干。

一九三九年之后，蒋介石的反共本性又逐渐显露，在所谓“大后方”的革命知识分子相继受到迫害，纷纷撤到桂林。于是，这个本来只有十来万人口的地方，真正成了人才荟萃的所在，除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新华日报》发行所和《救亡日报》之外，胡愈之、范长江、陈依菲（同生）等同志又办起了“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还有刘季平等同志办的“生活教育社”。杂志（副刊）、专业文艺团体，也如雨后春笋：文学方面，有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聂钳督、孟超、秦似、宋云彬等主编的《野草》，《广西日报》辟了一个文艺增刊《南方》，由艾青主编。据我回忆，到一九四一年，在桂林的文化界人士，除前面提到过的之外，文学方面的有茅盾、田汉、洪深、周立波、杨朔、胡风，美术方面有丰子悄、叶浅予、关山月，舞蹈方面有吴晓邦、戴爱莲、盛婕……音乐方面有张曙（他到桂林较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敌机轰炸中牺牲）、贺绿汀、林路等同志。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尽可能保持了《救亡日报》的公开合法地位，所以太平路十二号这个地方，很自然地成了各地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通讯联络、碰头和临时“落脚”的地方。当时，有人说我们这家报社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外地来人没地方住，就在“客厅”里睡地板，碰上吃饭的时间，一起吃大锅饭。当然，这些文艺工作者给《救亡日报》写文章，有时帮我们跑腿，也一律不给报酬。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一年春这家报纸被封，大家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在事隔近四十年的今天回忆起来，大家也觉得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和心情都十分痛快。

现在，让我回头来再谈谈这张从上海辗转迁徙到桂林的报纸。老实说，《救亡日报》从开办的那一天起，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杂牌军”，或者说“散兵游勇”。从郭老起，到编辑、记者……都是摇笔杆子的书生，没有一个人当过记者（当然，其中也有些人如阿英、凌鹤、王尘无等和报馆有过联系，如办过副刊，或在副刊上写点杂文之类），更不用说和印刷所、报贩打交道，以及管理收支帐目之类的事了。在上海时期，这一类事完全交给了国民党派来的周寒梅；在广州这些事主要也还由张镛管，直到张镛私卖白报纸事件发觉后，才勉强强地把发行权收回。可是到了现在，《救亡日报》已经完全和国民党划清了界线，局势暂时稳定，加上，我们要以一张四开小型报纸和《广西》、《大公》、《扫荡》、《力报》之间取得一个站住脚的地位，那么，整顿和改革版面，加强发行管理工作，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在经济方面，郭老离桂之前，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曾同意“每月”津贴二百元，但是实际上，除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领到了二百元之外，以后就用“拖”和“赖”的方法，不再支付了。我在香港筹来了一千五百元港币。郭沫若和三厅同人为了支持我们，在重庆上演了一出话剧——我在广州写的《一年间》，也给我们筹集了一点经费（这时，我已经把财权全部交给了翁从六，所以我说不出这笔钱的具体数目）。但是，当时报纸是委托三户印刷厂代印，

花费不少，报纸初创，销路不到二千，因此到了这一年夏季，就不得不用“征求长期订户”等办法来周转了。要报纸有销路，有特色，“以小胜大”，我不止一次向胡愈之、范长江等同志请教。研究的结果，总的意见，就是一定要改变在上海、广州出版时的那种既不像杂志，又不像报纸的形式，——那时主要的毛病是“书主办报”，不懂得办报的“基本规律”；具体的表现是：登长文章，发空议论，“有啥登啥”，靠“名人”的文章撑场面。除了第四版《文化岗位》是文艺副刊之外，一、二、三版内容混乱，有时一篇文章占了第一版，把当天的国内外重要新闻（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都挤到二、三版，甚至无法刊出。我们为了改革版面，社内开了几次不拘形式的民主会，大家出主意，对外还虚心听取所有有办报经验的同行（如《大公报》的王文彬——乃至《扫荡报》的钟期森）的意见。同时，还采取了一种社内外“每日评报”的制度，就是每天一早报纸印出来之后，先由我校看一遍，从版面安排，到新闻内容、形式、以及误植、衍文，一一用红笔批点，或者提出我个人看法，征求大家意见。我把这件事当作早餐前一项工作。批改后，把这份报纸贴在通道墙上，让每个社员都有“评报”的权利。据我回忆，大概到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间，这份小报的编辑发行、管理方面都有了一定改进。我们打破陈规，把当天国内外大事（主要是国民党中央社通发的新闻）简编成几百字到一千字；然后规定，每天一定要有一篇不超过一千二百字的“社论”。社论内容，从国际大事、抗战形势，一直到社会风气、人民生活。写社论基本上由我负责（我生病的时候廖沫沙代写，沫沙是在长沙出版的《抗战日报》被封后到桂林参加《救亡日报》的）。其他，二版主要登国内政情，广西和桂林的社会消息；四版除固定的《文化岗位》之外，有时也出音乐、戏剧、美术方面的专刊。此外，我们还利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关系，分别约请在桂林和外省、香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写文章。这种稿件都有针对性，也都是由报社根据时间变化，特约有专长卓见的作者写的，而且，为了引人注目，每篇文章的题目上面都加上一个“本报特稿”的标志。同时，由于当时国内外时局多变，中央社、塔斯社发的新闻稿中有些事件、人物、地名一般读者不了解，于是我们就办了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有气派，而其实只由两三个青年人（我记得最早负责这一工作的是于逢和易巩同志）主持的资料室，一有问题，第二天报上就可以看到简明介绍的“本报资料室特稿”。除此之外，我们还对报纸的文风作了一些改革，力求做到通俗易懂，反对教条八股，并革除了新闻报道中常用的一些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语汇，如“云”、“云云”之类。这些改革，都是通过“每日评报”的形式来进行的。当然，由于《救亡日报》在桂林只办了两年，所以要真正做到文风改革，是困难的。还有一件事，不久前胡愈之同志问我：“你是不是在桂林‘造’了两个新字？一个是‘垮’，一个是‘搞’。”我承认，这是我根据实际需要而试用的，但不久，这两个一般字典上没有的新字，就被其他报刊接受了。由于我们逐步进行了改革，特别是得到进步文化界人士的支持，《救亡日报》从两千份增加到三千份、五千份，销路扩大到湖南、江西、广东、四川乃至香港和南洋一带。

在这里应该一提的是：一九三九年冬，一方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抗战开始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特别是汪精卫公开叛国，打算建立傀儡政府，于是，在上海，这个被叫做“孤岛”的上海，我们的救亡抗敌工作更显得困难和复杂。为了加强上海地下工作，李克

农通知我，要调翁从六、彭启一两位同志到上海去工作（记得从“国际新闻社”也调走了两三位同志），同时，介绍《新华日报》负责发行经理工作的张尔华（敏思）接替《救亡日报》的经理。很巧的是翁从六和张尔华都是宁波人，而且同样的精明干练，这样，我们这支“杂牌军”经过辛苦经营，终于开始正规化了。对我自己来说，也在这时候开始，真心实意地爱上了新闻工作。第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搞文艺工作不如搞新闻工作痛快，不论是大的国际大事，或者小的社会现象，人民群众有意见，要讲话，要表扬，要抗议，我们当天晚上十一点钟以前写好社论，第二天清早就可以和读者见面，这是一个政治上、写作上、编报技术上的最好的锻炼机会；其次，在当时，办报是和恩来交付给我们的统战工作分不开的。而我这个人，在三十年代虽则也曾做过一些统战工作，但当时接触的人还都是上层知识分子、救亡青年，当时潘汉年要我和“九流三教”的人打交道，我还感到非常委屈，一位负责特科工作的同志还批评过我“戴了白手套休想搞革命”。但是到了桂林，担起了《救亡日报》这个担子之后，我的思想才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不仅被迫着不能不和中央社社长、新闻检查所所长、《扫荡报》总编辑打交道，而且还得做一些现在想来还是颇有兴趣的工作，举一个例，当时孙科、劝力子等在重庆办了一个“中苏文化协会”，这个组织实际上由左派人士负责（如王昆仑、张西曼、郁文哉、蒋燕等同志），做了一些介绍苏联的工作，因此，不少人提出，桂林也得成立一个“中苏文协”分会，对此，“孙科派”的行营政治部主任梁寒操一开始就认为分会会长非他莫属。因为一则他还打着“孙科派”的“亲苏”的招牌，二则他当时已经和C. C. 派拉上了关系，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表现很坏；于是，为了不让梁寒操掌握这个机构，我们几个人（当时，胡愈之、范长江、张志让、姜君辰、杨东药和我，经常每星期以聚餐为名，聚谈一次）决定了一个对策，就是由我去找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请她出面担任“中苏文协”广西分会会长。郭德洁一口答允，同时，对于我们打算办俄文训练班，翻译和出版苏联书籍等等计划，她都表示同意。她还主动对我说，“会址、经费等等由我负责，文化界我熟人不多，先请你和助先、此生先生商量再作决定，至于实际办事的人，那就由你和助先、此生先生去安排了。”这样，梁寒操就失去了一个他起初就认为唾手可得的“会长”职位。对这类事，在过去，我是绝对不肯干，也是不会干的。

在此期间，我还想起一件事来。就是越南的胡志明同志（当时叫阮爱国），被国民党软禁在桂林，由一个越南出生的中国特务陪（盯）着他，和他一起的只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越南姑娘。有时特务盯得不紧的时候，他常常派这位姑娘来看我，主要是打听一下解放区的消息，和借一些我们从八路军办事处拿来的《新华日报》和塔斯社的电稿，大约是一九四一年的一个夏天的晚上，胡志明独自来到太平路我的住处，见了我就说：“今天晚上‘侍候’我的那位先生（指中国特务）赴宴去了，所以我来看看你，并给你们写了一篇稿子。”文章不长，但我记得他以非常乐观的态度，分析了东南亚民族革命的形势和前景。我们初次见面，但谈得非常坦率，主要皇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表示了深刻的仇恨，他写的那篇文章，我故意请他再写了一个信封，装进一篇不用的稿子，投邮寄给我“亲收”，然后再把文章发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万一国民党派人来追查，我可以凭这个盖有邮戳的信封来对付。这件事经过了近二十年，一九五七年我率文化部代表团到河内去签订年度文化交流计划。到达河内的第二天傍晚，忽然得到通知，说要我晚上九时单独到

主席府“喝茶”。我准时去了，胡志明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的房间里接见了。他是国家主席，我是一个普通的代表团团长，所以尽管天气酷热，我还是匆忙刮了胡子，穿得整整齐齐去拜见，可是一进他的办公室，他却穿着中国式的短衫，赤脚穿着拖鞋，和我热烈拥抱。茶几上放着一盘水果，服务员开了两瓶汽水。我讲了几句礼节性的话之后，他立刻打断了我公式化的寒暄，开门见山他说，谈谈桂林的事吧，“我一直记得，我那篇文章你给了我五块钱稿费，五块钱，当时是很派用场的。”说罢，又紧握着我的手大笑起来，并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了我，——在这篇记事中我提起这件事，并非为了表示《救亡日报》有这样一件光荣的往事，而是想起今天的中越关系，真是不胜感叹而已。（附记：很巧，写到这里，我收到了黄文欢同志亲笔题名送给我的一本《黄文欢汉文诗抄》。）

到一九三九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八千大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同年，爱国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后来到桂林，参观了《救亡日报》。由于林林同志是闽南人，用家乡话向他介绍情况，使他特别感到亲切，当他知道我们白手起家，大家吃大锅饭，不拿薪水的时候，非常高兴，并一再问我们经济上还有什么困难。很明白，他表示愿意帮助我们，但是，也许那时倒是真的“穷过渡”吧，我们说，有七八千份销路，有一批支持我们的长期订户，有时候我们还得到桂林戏剧界的帮助，给我们“义演”筹款，所以我们可以支撑下去，事实上，在那一段时期，我们经济上确实没有太大的困难。我们想尽办法节流开源，例如把每天销剩的报纸积累起来，订成每月一册的“合订本”；把登在《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和香港《星岛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是金仲华同志）上的知名作家文章选辑出来，发刊了一种综合性的《十日文萃》，都有相当数量的销路。于是，在“站定”之后，我们就想到了“发展”的问题。继翁从六之后担任经理的张尔华，是一位理财能手，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救亡日报》要发展，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印刷厂。如前所述，我们的报纸，是委托冯玉祥将军主办的“三户图书印刷所”代排代印的。在当时来说，“时间”是办报的关键问题，托人代印，常常会发生矛盾。加上，这家印刷厂的铅字（特别是五号字）都已经老掉了牙，残缺不全，印在黄褐色的土报纸上更使读者难以辨认；而号称“文化城”的桂林，却还没有一副完整的可以铸字的铜模。于是我们就决定，由我再去一次香港，筹款买一副新的五号字铜模；其二是向当时在港的文化界友人（特别是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乔冠华等）约定了一批关于欧洲战事的“本报特稿”。这样，我们自铸了一副铅字，在漓江南岸的白面山找了一块荒地，搭了几间茅屋，招募了十来个流浪在桂林的印刷工人，吸收了几个救亡青年作为排字工的学徒。于是，从三八年八月开办以来，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印刷厂。

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环境，我们有意把报社、出版社（“文萃”和合订本的发行所）和印刷厂这个整体分成三个部门，出版社叫“南方出版社”，由萧聪任经理，印刷所则定名“建国印刷厂”，由张尔华任经理。同时为了避免轰炸，把夜班编辑部附设在印刷厂，由廖沫沙、林林分值夜班，校看清样。白面山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离城较远，步行要花四五十分钟时间。有时我在太平路写好社论，觉得要和沫沙商量，就得步行到白面山去定稿。这条路上几乎没有人烟，还得经过一块坟地。我不止一次在路上踢到一块既不像石块又不像树根的东西，擦亮火柴一看，原来是一个骷髅。当时我正好四十岁，

胆大包天，根本不把野鬼放在眼里。

从一九四一年春到同年十月，可以说是桂林这个“文化城”最繁盛的时节，但是也在这个表面看来似乎很平静的时期，一股暗流正在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由于昆仑山之战的失利，蒋桂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蒋介石撤销了以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广西的军队划归驻在柳州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同时，依旧是又打又拉，把白崇禧调到重庆去当了副总参谋长，并任命了李济深为军委会驻桂林办事处主任。只是由于李济深继续采取团结抗日的方针，张发奎和郭老在北伐时期就是“耆友”，所以桂林文化界的情况，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记得那时李克农还要我以“救亡日报郭沫若、夏衍”的名义，向张发奎发了一个贺电）。

可是到十月间，我就知道，散在西南各省的抗敌演剧队有被迫解散或集体入党（国民党）的消息，他们就推吕复同志为代表，到桂林来和我们研究对策。当时李克农告诉我，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要到来，必须“放弃和平观念”，作好应急准备。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我于一月二十二日，得到李克农的通知，知道了“事变”的简要消息，并要我立即告知《救亡日报》全体党员，作好应变准备。不久，预料中的事终于到来了。那一天中午，我接到那位向来对我很客气的新闻检查所周所长的电话，依旧用非常委婉的口气说：“本来想到贵社来面谈，怕别人碰到不便，所以请你原谅，今天发的中央社通讯稿，务请全文照登。”他用一种似乎很为难的口吻说：“这是中央党部的命令，全国报刊一律照办，我知道你们为难，但兄弟实在没有办法。”我立即给克农打电话，说：“方才我的同乡周老板送来一份很重的礼物，我们打算不收，你看怎样？”李只回答了一个“好”，然后补充了一句：“但得十分细心，能做得不伤情面最好。”所谓“礼物”，指的就是中央社统发的诬蔑新四军“叛变”的文稿。怎样才能做到“不伤情面”呢？我们经过仔细研究，决定把中央社发来的电稿全文付排，并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地位，然后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连同其他稿件一起“送审”，得到检查所在清样上盖上“审讫”的红色图章之后，在晚上打纸型时，再将这篇电稿抽掉，另登他稿。事情办得很周密，连社内也有许多人不知道。但是第二天出版后一定会发生问题，这是大家预料到的。果然，第二天清晨在桂林所有报摊和零售店都看不到《救亡日报》，原来国民党发现我们拒登这条消息后，放下令扣押了当天的全部报纸，而且“新检所”还用书面正式给了我们一个严重警告。这一天，除了太平路十二号附近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来往徘徊之外，没有什么动静。晚饭前后，我还在客厅里看编辑部的几位青年人在打乒乓，忽然，一个穿着棉大衣、把帽子压得很低的人走进来，在暗淡的灯光下还来不及认清是谁，他讲话了：“好悠闲啊，看打球。”听声音就知道，这是李克农同志。我和他进了我的卧室，他告诉我，南方局来了急电，说国民党中统就要在桂林下手，要我尽快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

这一通知，倒真的使我怔住了！《救亡日报》在桂林办了两年，有了发行所、印刷厂，连编辑部在内，总共已经是一个有四五十人的“小据点”了，我走，其他的人怎么办？”报纸还能否出下去？这都是立刻就得决定的问题。克农详细地把重庆来电的内容告诉了我，他说：“分几步走，第一步你先走，留下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但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看来也是保不住了，所以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

都得作好妥善的安排，他已经向南方局请示，建议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者（如广西干校的教职员），都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大明显者，也可以暂时留在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印刷厂工人、南方出版社职员除外）等到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克农还说：“这些事，都可以由我处理，明天，你得去找黄旭初，坦率地告诉他《救亡日报》当前的处境，并向他表示，为了‘好来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准许你买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我说，假如他避而不见，怎么办？李说：“这可以放心，我已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此刻来报社，还是任老用他的汽车送我来的。”

第二天一早，我去省政府看黄旭初，见面后寒暄了几句之后，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段很有趣的对话。

我说：“《救亡日报》在桂林出版，已经满两年了，按照郭沫若社长和我与黄主席的约定，这张报纸同广西省政府，同广西建设研究会，乃至同《广西日报》之间，关系一直很好……”

黄答：“唔，关系倒是……倒是……”

“但是，黄主席一定了解，目前局势起了变化，我再留在桂林，恐怕对李先生、黄先生都可能引起很难处理的麻烦……”

“这……局面嘛，倒是……”

“因此，根据‘好来好去’的原则，今天来向黄主席辞行，我打算几天之内，离开桂林……”

“几天之内？这个……”

“对，希望早走，为此，请黄主席给我代订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这个，（他一只手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电铃）倒是……”（一个副官进来了），他说，“给夏先生订一张到香港的飞机票，明天或者后天……”

我站起来告辞，这时候他才说了一句有内容的话：“时局是会好转的，那时候，欢迎你再来。”由于他除了最后一句话之外，都用“倒是”、“倒是”……来敷衍，所以以后提到这位黄主席，我便开玩笑地把他叫做“倒是”先生。

当天下午，刘仲容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拿钱到欧亚航空公司桂林办事处去取机票。动身的日期，我已经记不起了，但可以肯定，那一天正是农历除夕。我们匆忙地召开了社务会议，把已经调到广西干校的周钢鸣、司马文森等同志也请来了。除了说明一下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之外，主要讨论的是，哪些人可以留下，哪些人在报纸停刊后必须撤退的问题。好像有人写过回忆文章，说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拨了一笔经费，把《救亡日报》同人疏散到香港，这是不真实的。因为当天的会议上就作出决定，把已经初具规模的建国印刷厂的器材相机出让，用这笔钱作为疏散的经费。也有人回忆说，是陈劭先先生派汽车送我去机场的，这也出于讹传。在这里要提一下当时在桂林以工商界人士身份（汽车修理厂、三中烟草公司）为党工作的张云乔同志，他的工厂是我们党秘密地安置在桂林、由周恩来直接掌握的联络点，所以那天是云乔亲自驾汽车送我去机场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撤销之后，为了克农及其家属的安全撤退，云乔也尽了很大的力量。

我走之后，林林、张尔华一直坚持到报社正式被封闭为止，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大量善后工作。为了筹集一笔经费让大部同人撤退到香港，由张尔华主持，把由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建国印刷厂出售，当时，正在反

共高潮的最猛烈时期，把印刷厂出让给冯玉祥先生办的三户印刷厂，也会引起麻烦。所以尔华同志决定，形式上把印刷厂出让给张云乔，正式办了出售手续，然后，再由张云乔转售给广西干校的后天侠同志。三月初，办完了善后工作之后，《救亡日报》同人分两批撤退到香港。其中有廖沫沙、林林、张尔华、胡敏、陈紫秋、邹任洪、华嘉、高灏、高汾、张秀、何迅明、林汝璉、林仰崢、陈秉佳、高静等同志。

我是旧历除夕的傍晚离开桂林的，后来我写过一篇《别桂林》的随笔，开头有下记的一段文字：

“ 阴历除夕，我离开了呆了两年的桂林，那一天不仅寒冷，而且阴森，北风怒扫着在两广一带萌芽得很早的春草，这突然袭来的寒气也夺去了正在准备迎春者的轻快和欢欣。到飞机场的时候，彤云四合，暗到和黄昏一样，难道真正要下雪了吗？ ”

这几句话，是我到达香港之后不久写下的。因此，其中描述的情景，应该是真实无误的。

《救亡日报》桂林版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复刊，到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被禁止出版，一共出版了两年一个月十五天。“ 国际新闻社 ” 的范长江，在我走后不久也被迫离开了桂林。接着，邹韬奋由于蒋政府下令封闭了大后方所有的生活书店，愤然从重庆到了桂林，得到李任潮（济深）先生的协助，也安全飞抵香港。尽管白崇禧在皖南事变中当了“ 炮手 ”，但从整个形势看来，蒋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减，由于这种原因，留在桂林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并没有受到迫害。《救亡日报》被封后清理后事、疏散人员，也没有受到太多的阻难。三月中旬，桂林、张尔华等二十余人也平安撤退到了香港。

桂林这个地方我只呆了两年，但我对它的感情却特别深切。这种感情，在我前面提到过的《别桂林》一文中，有一段离别这个城市时的叙述：

“ 当时心情的黯淡是可以想见的。在桂林有着尊敬的战友和先辈，有着无数诚朴的热血青年，更有着两年多来筚路蓝缕、好不容易才奠定了基础的一个小小的文化堡垒——我们有了一张可以勉竭弩钝，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量的日报，一个规模很小的印刷厂，一个通讯社，一个出版部，两种有近万读者的期刊，和一个预期能在今春开工的造纸厂，……而这一切，都在一只无形的黑手的威胁下，在应该是‘ 友人 ’ 的敌视下，俨然宣告，这一切文化力量，再也不准为国家民族服务了。 ”

我们从广州到桂林的时候，只有赤手空拳的十二个人，而在两年后被迫停刊的时候，却有了一支近五十人的“ 队伍 ”；报纸、出版社、通讯社、期刊、印刷厂……都是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读者、爱国华侨和无酬地为我们撰稿的文化界人士的心血凝结起来的。在回忆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永远不能忘记在极度困难中支持过我们的朋友和同志，而这些朋友和同志中，有不少人，如杨东莼、田汉、司马文森、孟超……都已经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永远离开了我们。对我个人来说，在桂林的两年，是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人门时期。从这时开始，我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的武器。

(转载《白头记者话当年》一、二、三节，作者有增删)

新的跋涉

从1949年5月随军解放上海，到1955年7月调到国务院文化部，我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刚进城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与上海市委宣传部合为一套机构，我任副部长，部长是舒同。1950年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兼市政府文化局长），1952年夏，我又调华东局当宣传部副部长，当然也兼了许多挂名的职务——如华东文联主席、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等。上海是我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但是形势变了，工作变了，连“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我这个人适应性很强，前两者我都可以适应，而“身份”——从文人、记者、地下党员变成执政党的“高干”，也就是说做了“官”，这就使我感到了很不习惯。我们这些穷知识分子从来就讨厌“官”，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接触过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对他们的官架子、官腔有反感，当然那时我也只得想到，这是旧社会，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事，现在社会制度变了，在共产党执政的时候，官和民不仅是应该地位平等，而且当官的应该为人民服务。这种想法在党的文件中，在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得到了证实。上海解放之后不久，1949年6月7日，陈毅同志就在群众大会上反复强调了党的干部要紧密切联系群众，要认真认真地为人民服务这个问题，所以当我被任命为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的时候，并不觉得这就是做了官，身份和地位也会发生改变。我出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初，对旧社会的人际关系不能没有一定的了解，但现在看来，社会制度改变了，风俗习惯不一定会同步改变，你自己不觉得已经做了官，可是别人（包括下级和同级）都确切无疑地把你看作一个官了。解放初期，我对随身带一个警卫员，出门必须通知保卫处，被过去的熟朋友叫部长、局长，我实在感到不习惯，有过一些可笑可叹的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讲过，这里不重复了。

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市委领导是陈毅，市委分管统战文化工作的是潘汉年，他们一再要求我放手工作，有一些难办的事情也可以随时请示得到解决，工作很忙，但进行得都很顺利。调到华东局以后，情况就有一些变化，华东局书记是饶漱石，他对文化工作很少过问，宣传文化工作都由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负责。舒是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老干部，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地位相当高，但没有架子，还写一手不俗的何绍基体的书法，对我也很客气。但是他第一次到上海，不了解文化艺术界情况，所以我向他汇报或请示时，他总是说：上海的事，还是请陈毅同志拿主意，很少提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经过几年之后，我了解到他是一个纪律性很强，而生性懦弱的人。

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之后，华东局开会批饶，有不少人指责他是饶漱石的“嫡系”，这似乎有点过火。当时饶漱石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全国各大区的党委书记，一般都要野战军司令员兼任，而只有华东局党委书记，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所以舒同跟着饶走，看来也是时势造成的。舒同当华东局宣传部长，有一个很强的副部长班子，计有：冯定：匡亚明、刘顺元、沙文汉和我。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除了沙文汉和我是国统区的地下党之外，其他都在解放区和新四军工作过，有老区工作的经验，对文化艺术工作也都有一定的理解，所以从始至终（华东局1954年撤销）我们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当时约定的分工是由我分管文化和科技，而事实上，我主要力量只用在上海这一个地方，华东是一个大区，各省的情况我不了解，主要由匡亚明管。而上海这个科学技术界集中的地方，我也因为力不从心，所以经过请示了陈

毅、潘汉年之后，这方面的工作逐渐交给上海市委的李亚群同志负责。据我记忆，我只分别拜访了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如吴有训、茅以升、冯德培、周谷城、周仁等）和出席了几次科技界的集会。——只能说是做了一点统战工作。

解放后我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很忙，每天工作 10 小时到 12 小时，但是在陈老总和谭震林领导下（1954 年陈调北京任副总理后，谭震林同志任华东局书记），我可以尽心竭力地工作，没有犯大的错误。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也没有受到批评和指责。当然，1953 年华东局整风时，个别人说我对知识分子问题上右倾，但立即被谭震林制止了。在这里，我顺便要说说这位“谭老板”。解放前，我不认识他，但他任华东局书记后，第一次见面后就约我单独谈话，很坦率地对我说：他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深感没有文化知识之苦，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了，连文件上的一些名词也不了解，所以需要得到你们文化人的帮助。他说：自己要加紧学习，同时一定要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才能，为新中国服务。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记得是 1953 年）他接待一位国际友人，要我给他起草一份短短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总共不到八百个字，他看了说太长，要删到五百个字，改了之后他又要我念一遍给他听，说怕念错字。一位开国功臣、大区党委书记，对一个相识不久的知识分子干部能这样虚心坦率，我认为是难能可贵的。近年来，出版了不少老一辈革命家传记文学，但还没有人写谭震林传，这是一个遗憾。他 1958 年大跃进时犯过“左”的错误，但“四人帮”弄权时首先拍案而起，义正辞严地批评江青一伙的不也就是“二月逆流”中的谭震林么？在十年浩劫中，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他受到了最残酷的迫害，1978 年秋，和我一样打伤了腿的他，和我长谈了三个小时，至今还记得他说：“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脾气不好，意气用事，自己管不了自己，这是没文化的缘故。”解放后我认识了不少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点上谭震林同志是很突出的。

解放前，上海是人才荟萃的地方，闻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都集中在上海。有一次，在市委开会时潘汉年说：在文化科学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陈同生插话说：我看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是实际情况。也由于此，上海解放前后，陈毅就一再强调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和名流学者，我记得很清楚，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5 月 28 日，陈毅在市政府从赵祖康手中接过了旧市政府的印鉴，办完了接管任务之后，就对赵祖康说：你不革是旧市政府的代市长、工务局长，更重要的是你是一位专家，所以新的市政府不仅请你继续担任工务局长，还有许多市政建设方面的事希望得到你的协助。上海解放了，现在是专家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希望你放手工作。我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在座的周而复同志也许还是记忆犹新吧。这是大时代中的一个插曲，但这件事树立了新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个榜样。

解放初期我在上海文化界工作，主要是执行了陈毅同志的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我没有到过延安，也没有在解放区工作的经验，自问没有官架子，更没有“整人”的私心杂念。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颇有一点自我感觉良好，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之感，那么是不是一切顺当，没有阻碍和麻烦呢？当然不是。先是从一些小事情开始，有人背后讲怪话，说我对知识分子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后来拔高到“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兵的威风”。

这些小道消息从上海传到北京，又经过《文艺报》内部刊物反馈到上海，这是点了名的。所以胡风在著名的“三十万言书”中也提到过，意思是说上面要整夏衍在上海工作中的右倾错误。但也由于点了名，所以引起了陈毅同志的注意，他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说：上海执行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切措施都经过常委讨论批准，所以北京《文艺报》指名批判夏衍右倾是不对的。按理，夏衍是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文艺报》事先不经过市委，我已经给恩来同志打了电话，他也同意我的意见。以上这些事可以说是暗流，文化界以外的人是不会察觉到的。中央公开批评我，则是1951年的所谓“武训传事件”。这是新中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有许多具体情况连文艺界也蒙在鼓里，以后当另作说明。

1949年5月我从香港调回北京，恩来同志就一再指示，要作好文艺界的“会师”工作。所谓会师，指的是国统区（包括在国外的、在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和解放区文化工作者的团结合作。上海解放之前，我在丹阳第一次见到陈毅和潘汉年。我调到华东局以后，接替市委宣传部长职务的是谷牧同志，他是一个有素养、通情达理的人，在山东当过市长，在老区和新区都有行政管理工作的经验，所以总的说来，上海文化界的接管、改组、人事安排等等，都进行得相当顺畅，可以说在政策上没有犯大的错误。但是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文化人又都是非工农兵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思想上、政治上比较容易求得一致，而生活方式、知识水平、工作作风、行为习惯等等要适应一个模式，像统一思想那样同步统一，就比较难办了。解放初期我在上海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宣传、文化系统干部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问题。当时上海市文化系统干部主要是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和地下党及解放前就与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到过解放区的只有冯雪峰一个，华东局则大部分来自老区（包括新四军、山东及中央调来的干部——如后来成为“四人帮”重要骨干的马天水等），省局级干部中地下党人不多，但局处以下则地下党就占多数了。谈到文化素质，大致情况是：老区干部（包括新四军）来的不了解上海，不了解国统区斗争情况（主要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对国际形势也不大关心。使我吃惊的是，我在华东局宣传部时，有一位干部竟不知道上海有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知道“左联”、“社联”这些党领导的进步文化团体；而地下党干部则只知道延安是革命圣地，连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哪一年开的，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也讲不清楚，当然更不知道延安还有过那次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了，这种互不了解是客观现实造成的，主要是由于长达十多年的国民党的新闻和信息封锁。马克思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马恩选集》一卷43页）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风尚的影响，这是难于避免的事实。但在当时的上海，不论是老区的或地下党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的弱点，这就是知识面太窄，而又缺乏一点自知之明。我这里说的知识面太窄，主要指的是缺乏历史知识和科学常识。

1949年3月，党中央发过一个要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通知，我在丹阳的时候，也听说过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也都结合上海地下党编印的《上海概况》，花一周时间学习了这个决议。这是解放初期党中央颁发的一个很有远见的文件。它的主要内容是：“夺取全国胜利之后，就要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过去知道的事情，用惯了的办法，将会不用了，过去不知道的事情和不会做的事情正等待着我们去学习，所以号召全党、

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认真真地去学习从事城市工作必需的方法和知识。”

问题很明白，市委也抓得很紧，陈毅不止一次大会、小会上讲：“乡下人进了城”，要接管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务必改变“游击作风”，认真深入生活，了解城市，了解上海，特别要了解上海过去和现在，这是一个思想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应该说，市委对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周到的，据我的感觉，和北京比，上海的接管和整改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因为和老解放区的干部比，新口军来的干部比较地了解城市，了解上海。但是，从“谦虚谨慎”而又积极主动地学习新事物这个问题上，就不像我主观想象那么容易了。当时的情况是，解放区和部队转过来的干部纪律严明，艰苦朴素，也就是有纪律有组织。他们看不惯地下党（和进步文化人）的自由散漫，讲话随便——当然更看不惯上海这个半殖民地的“花花世界”。防腐蚀这个口号，我记得八九月间就提出来了，而地下党员和当地的文化人一方面佩服解放区干部的严谨作风，同时又觉得他们对人对事的态度过于呆板（如等级关系、党内外关系等等），有人私下对我说，某人过去是我的好朋友，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帮过他的忙，现在成了我的上司，要和他见面也困难了。这种相互“看不惯”的事是很多的，连我自己这个既是地下党、现在又当了“领导”的人也不例外，大家表面上和和气气，心里还是有些芥蒂。肯把这种心情坦率地向我直说的，就只有已故的章靳以同志一个，那是1950年的事，我很感动。他和我早已认识，但算不上熟朋友。他为了文化界的团结，和我说了真心话，于是我作了个决定：每星期五的晚7时，我在华东文联的一间会客厅，会见文化界人士，个别谈心，没有任何规定。大到国际国内形势，小到工作、生活问题，对文化领导的意见等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谈完就走。尽管这是试点，但的确也听到了不少开会时和办公室里很难知道的事情。有人说这是“讨好”群众，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洁癖，不愿和做了“官”的人有私人接触，所以我的这个试点（上海人说我摆“拆字摊”）只持续了一个多月。先是每次有四五个人来，后来渐渐少了——因为在社会大变动时期，找我的人谈及的大部分是政策性问题（谈私人问题的极少），这是早已明文公告了的。我只能结合当时实际，照本宣科，没有什么新意，有的问题我也无法作具体回答（如要求设置新机构、增加编制等等）。这件事是我未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请示，自作主张办的，有人说好，有人说歹，有人讲怪话，这也是难免的。

我在上海时期最得罪人的一件事，就是1952年我自作主张，对宣传部和文化局系统的处、科一级干部作了一次常识测验，以初中文化程度为标准，出了50道题，每题二分，全对者得100分，请他们不记名地解答。结果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得60分以上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只得三四十分，有一个还赌气交了白卷。事后想来，这也不值得惊奇，因为科员一级干部有许多是工农兵出身，不少人没有上过学，他们打过仗，立过功，有的在军中入党，入城后组织部门不能不给他们安排工作，于是就有一个内行和外行的问题。上海是远东一个大城市，文化系统有不少部门连原来的地下党人也从来没有涉猎过，如交响乐团、博物馆、图书馆、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所等等。对此，市委领导是早已认识到的，所以入城前后陈毅、潘汉年和孙冶方都明白交代过“先接后管”，不懂的事不要乱碰。从5月到9月，不少接管了的文化单位我们只派一个军代表，事实上是由原单位自己推选出一个领导班子（有的

仍叫临时管理委员会)来处理日常工作和本身业务。我记得6月中旬,陈毅和我分别拜访了徐森玉、沈尹默先生,向他们致意和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同时坦率地说,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文物、博物馆事业,但这方面我们完全是外行,所以希望他们放手工作,如有困难,我们当尽力协助。抗战时期,拥有大批文物古籍的收藏家都把上海租界看作“安全区”(我们也把一些有关党史的原始资料存放在上海银行的保险柜里)。对于文物、古籍的抢救、搜集和保护工作,解放前夕恩来同志曾委托郑振铎同志负责,但这时振铎去了欧洲。陈毅和徐森玉先生谈话时提到过李一氓、徐平羽(白丁,原姓王,是清朝扬州学派王念孙、王引之的后人,六十年代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文物)。但李一氓另有任务,徐平羽在南京工作,所以市委只派了方行同志和徐、沈两位先生联系。

除此之外,最累人的是我和于伶分管的电影方面的工作。当时上海有两家私营电影厂,一是“昆仑电影制片厂”,这是四十年代初就由党委托阳翰笙领导的唯一进步的制片厂,抗战胜利后拍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优秀影片。“文华”的经营者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较开明,导演、演员有许多来自抗战时期的“苦干剧团”,和国民党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仍采取了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的方针(当时上海电影百分之八十都是美国影片)。军管会很重视电影工作,接管班子除了于伶、地下党的徐韬、池宁之外,还加上了钟敬之、蔡赅。在地下党和进步电影工作者的配合下,接管工作很顺利,但一到秩序安定下来,各厂要恢复生产的时候,很快就发生了一个没有电影剧本的问题(当时就叫“剧本荒”)。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提出“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但在上海,熟悉工农兵的不会写电影剧本,会写电影剧本的不了解工农兵。我召开过几次创作会议,提到剧本问题就冷了场,几乎是束手无策。于是我大胆地提出了所谓“白开水”也可以的问题,这是从电影对国家、对人民有利、有害这个问题谈起的。我打了一个比方,以粮食为例,大米、面粉、奶、蛋、蔬菜,都有营养,必不可少;但茶、咖啡,没有营养,但也没有害处,还可以提神,我们也不反对。但中国人过去吃过鸦片,那是有害处的,我们一定要反对。我说,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这些话传到北京就走了样,说夏衍在上海不讲电影为工农兵,反而“提倡”不为人民服务的“白开水”电影。这是1950年,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私营资本还没有改造,私营电影公司还只能让它存在,还要求他们拍出影片来供应绝大部分被美国影片占领的市场,加上“昆仑”和“文华”的创作人员又都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和我们合作过,所以我至今还认为这样做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1950年我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了“电影文学研究所”(后改为电影剧本创作所),由我和章靳以、周而复任理事主席,陈鲤庭、田鲁任总干事,记得冯雪峰、柯灵、陈白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也的确培养了一批电影剧本作者;二是当“昆仑”和“文华”公司负责人向我要剧本而无法满的时候,我建议他们可以从新小说改编,这就是后来拍成电影而受到了批评、停映的《关连长》和《我们夫妇之间》。这两部片子都是经由“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的小说改编的;小说发表后,在全国文艺界都受到好评,于是我就向“文华”、“昆仑”表示“不妨一试”。这两部电影放映后,很受观众欢迎,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很快传来了来自北京方面的批评,“文华”摄制的《关连长》是杨

柳青改编，石挥导演并主演的，写的是解放上海前夕一场战争的故事，关连长为了不伤害一群小学生而作了自我牺牲，石挥演得很出色。在当时，这也是私营厂拍的第一部战争片，挨批的理由是“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的还提高到歪曲了解放军的形象。

《我们夫妇之间》小说原作者是肖也牧，昆仑制片厂出品，编剧、导演是郑君里，主演是赵丹、蒋天流。内容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李克和工农出身的妻子张英入城之后在工作和生活上发生的矛盾。君里着手改编的时候，我还要他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反映一下“过去熟悉的事情用不上了，过去不熟悉的东西在等着我们去学习”的方针，这也是“好心不得好报”，先是批判肖也牧，说他是“反映和宣传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接着就拿这部影片作为“批右”的重点。由于这两部片子都是我向“昆仑”、“文华”推荐的，于是，上海文艺领导右倾、“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抗拒工农兵路线等等罪名都落到了我的身上，也成了后来批判《武训传》的前奏。对这件事，我也得到了一点教训，我懂得了有些题材可以写小说，但不是小说都可以改编电影。理由很简单，领导上不一定看小说，而拍成电影，那就逃不过领导的关注了。因此1955年我调到文化部分管电影之后，包括我自己改编的电影，都是鲁迅、茅盾（当时他是文化部部长）的作品，这就比较保险了。当然，在“在劫难逃”的“文革”之前，批判我的文章，也首先是针对电影《林家铺子》。

总的说来，解放后我在上海工作约六年，主要是在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和对他们的态度——或者是政策问题上犯的 error，这一点我在那次“常识测验”之后就感觉到了，但我还是顽固不化，一是由于我这样做得到了陈毅的支持，二是我没有想到在上海这样做会引起北京方面如此强烈的反对。当然，在这个时期，上海也拍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电影，如《强扭的瓜不甜》、《姐妹们站起来》、《太平春》、《腐蚀》、《我这一辈子》等等，这里不多说了。

《武训传》事件始末

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现在文艺界 50 岁以上的人，大多数是知道的，中国电影史料——特别是《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电影》（上卷）有较详细的叙述。但这些只能说是“局外人言”，没有——当然也不可能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具体经过。这部影片是私营昆仑影业公司（当时还没有公私合营）1950 年出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是 1951 年 5 月 20 日。所以今年（1991 年，编者注）是《武训传》批判四十周年。

《武训传》的事说来话长，得从抗战末期的 1944 年的重庆说起。当时进步教育家陶行知送给当时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一的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孙瑜正为有拍片机会而没有剧本发愁，于是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大纲，据说还得到过当时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郭沫若的赞许（这是孙瑜后来和我说的，当时我在重庆分管统战工作，不管文艺方面的事）。这样，这部片子便在中央制片厂开拍。但不久，就因经费短缺而停拍，接着抗战胜利，孙瑜等人相继于 1946 年（或 1947 年）回到上海。那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再一次发动内战，于是进步文化工作者就不愿意再在国民政府办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史东山、孙瑜、赵丹等人都加入了昆仑制片厂。大概在 1949 年秋冬之间，昆仑公司老板任宗德和孙瑜、赵丹三人到文化局来找我（当时我是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长），大意是说：昆仑有人才，有资金，有厂棚可以拍片，但是缺少剧本，因此，他们向“中央”买下了《武训传》的摄制权，现在打算开拍了。因此，向我提了两条要求：一、昆仑向文化局请求贷款 3 亿元（折合人民币 3 万元）；二、要我审定及修改剧本。我都婉言拒绝了。第一，不仅文化局没有钱，连文管会也很穷，你们说这件事 7 月间曾得到过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的支持，这笔钱还是向政务院或文教委请求为好；第二件事，我坦率地说，我认为，“武训不足为训”（这件事后来孙瑜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对编导武训传的检讨》中提到过）。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必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拍这样一部影片。但是任宗德和孙瑜都坚持要拍，说大批导演、演员没有事做，政府又要我们恢复生产，只有这部片子才能让许多有能耐的电影工作者在事业上有所发挥。于是我就提议：你们既然已经向中央文教委员会备过案，最好是你们跑一趟北京。这样，贷款和审定剧本就可以由文教会决定。这样，任、孙二人就去了北京。很快，大约十几天之后，任宗德告诉我，事情办得很顺利，钱借到了，剧本送中宣部，也说没有问题，所以这部片子快开拍了，争取 1950 年上半年出片。又给我送来一张演员名单和赵丹的化妆照片。事已至此，我当然只能祝贺他们开拍大吉了。

当时我工作很忙，对这部影片何时拍完，也就顾不得了，但片子很长，拍了上下两集。赵丹很兴奋，不止一次对我说，这是他从影以来拍得最好的一部影片。

影片先送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审查。姚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于伶（市文化局副局长）都认为这是昆仑一部重点片，国家贷款拍的，最好还是清华东局宣传部和市委共同审查。我请示舒同，他表示同意了，说冯定、匡亚明等几位副部长都想“先睹为快”。于是就约定了试映的地点和时间，由我通知任宗德。因为在华东局机关放映，所以公司方面除孙瑜、赵丹

外，其他有关人员尽可能少去。由于影片大长，所以华东局和上海市负责人天刚黑就集合了。我准时到会，使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出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参加当晚审查的人不多，除华东局的领导外，上海市的只有姚溱、于伶、黄源、陆万美等。尽管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小道消息”，但是通过昆仑公司的人，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作了许多过高的评介，这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

这一年4月初，上海市委接到中央通知，要刘晓（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和我立即赴京，准备参加以林伯渠为团长、沈钧儒为副团长的中苏友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建国之后第一个访苏代表团。团员共25人，有工人、农民、部队（加上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代表）、青年、妇女等各方面的代表，也有竺可桢那样的大科学家，欧阳予倩那样的戏剧界元老，谭惕吾这样知名的民主党派人士。我和刘晓及上海市的工人代表陆阿狗等于4月10日到北京，原定刘晓任这个代表团的秘书长，但是到北京不久，记得是15日，刘晓忽然向林老报告，说全党要搞整党，上海要他留在上海主持这一工作，所以就由两位团长决定，由我任秘书长（代表团内还有一个临时党组，也由林老指定我为党组书记）。这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又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一是这是建国后第一个访苏民间代表团，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出国，没有外事经验；二是这个代表团来自五湖四海，有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又是第一次汇在一起出国访问，对内对外有一个团结问题，又有一个内外有别问题。加上两位团长都是高龄的长者，他们不可能管团内外的具体工作，所以我被安排在这个岗位上实在是力不胜任。我找了一位无党无派的科学家袁翰青为副秘书长，帮我做一些日常工作，这个代表团4月12日在北京集合，16日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赴莫斯科。在苏联访问了10天，后经中央电报通知，要组织一个以沈钧儒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德友好代表团，访问新成立的民主德国，因此从4月中旬到同年6月，我一直在国外。

《人民日报》批判《武训传》的事，是我从德国回国途中经莫斯科时，当时的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告诉我的。我记不起具体日期了，我回到北京，已经是6月下旬了，我记得很清楚，就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正在埋头写“出访总结”，周扬打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有事面谈。见面之后，既没有寒暄，也不问我访苏情况。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我说：我回国途中在戈宝权处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具体情况不了解，现在正在赶写出访总结，还来不及考虑这件事情。周扬接着就说，总结之类的事让别人去干，你赶快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对此我很意外，我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做检讨。我和周扬是老熟人，尽管他现在是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常务副部长，是顶头上司，但我还是敢于和他抬杠。我有点感情激

动，而周扬却非常平静。他说：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因为他事先没有考虑到这部片子的反动性而一再表示过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我正要讲话，周扬很严肃他说：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我想到了“只讲团结，不讲改造”的问题，想起了“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等等，于是我就说：好吧，明天写完出访总结，后来就回上海。这时周扬才露出了笑容，说这样就对了，现在我们是执政党，党员——特别是老党员要勇于负责，要你写检讨，主要是因为你是华东和上海的文艺界领导。

回到宿舍，我就托人买了下一天回上海的车票（当时还没有定期空运航班），同时也给恩来同志办公厅打了电话，说原定向他汇报访苏访德的事，因为有要事赶回上海，所以只能请他看书面总结了。意想不到，正在第二天下午收拾行装，准备赴车站的时刻，恩来同志亲自打来电话，要我当天到西华厅去，说除汇报外，还想和我谈其他问题。我只能说，一小时后我就要上火车回上海，所以只能请他电话中指示了。总理迟疑了一下之后说：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做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最后还让我方便时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饶漱石和舒同，这个电话使我放了心。我对总理说：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我当负主要责任。我回去后一定要公开做自我批评，还要对我在上海的领导工作进行一次检讨。总理又重复了一次对事不对人，要孙、赵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

回到上海，我先向饶漱石、舒同做了汇报（这时陈毅在南京），饶漱石面无表情，更不讲他对《武训传》的看法，只是听我说要公开做自我批评和写文章检讨时，点头表示同意。

我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约 100 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做了检讨，又把这次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在《人民日报》1951 年 8 月 26 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此文发表前夕，周扬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他还亲笔修改，有一段话是他写的。并说毛主席看了之后对他（周）说：“检讨了就好”，所以要你“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对我来说，这件事问题不大，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后还约我去谈话，在座的还有市教育局局长戴怕韬（他因为写文章捧过《武训传》，也受到了批评和做了公开检讨）。陈毅说：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指文化部电影局 5 月 23 日的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决定。由于此，上海只开过两次电影界的一百人左右的会，基本上没有搞运动。当然，《武训传》批判对电影界，对知识分子，

影响还是很大的，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都，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大锅饭”、“铁饭碗”的毛病，这时候已经看得出来了。

在这坠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周恩来同志对这一事件表示的宽广胸怀和负责态度。除了前面已经讲过的对孙瑜、赵丹的关怀之外，1952年3月，恩来同志到上海视察工作，在一次万人大会做报告的时候，他提到了《武训传》问题，他说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时，当孙瑜向他提出想拍《武训传》时，他只提了武训这个人的阶级出身问题，而没有予以制止。后来看了影片（和刘少奇一起看的）也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对此他负有责任。同时，他还说，孙瑜和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在解放前的困难时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所以这只是思想意识问题，千万不要追究个人政治责任。

《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个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文革”开始，上海首当其冲的是电影界，就是郑君里和赵丹。这些具体情况在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江青时，黄晨（郑君里夫人）揭露得很详细，当时报刊上也有记载，不详说了。

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6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10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吗？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钟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

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 40 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 年的反右派，1959 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 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1991 年秋 · 北京

后 记

我从来没有为爸爸编过集子，在姜德明同志的鼓励下，我试着来做这个工作。

按这套丛书的计划，这本书应该收集爸爸写人物的文章。这类文章，在他整个的创作中数量并不多，在这本书中，我一共收入了六十余篇。

这些文章有的是爸爸回忆或纪念他所尊重的老领导、老战友，如周恩来总理、陈毅、潘汉年等同志；有一些是记叙长期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甘共患难的朋友们，或写他们共同奋斗的经历，如写开明书店、“左联”以及《救亡日报》等等。另外我还收入了他生前最后写的几篇文章：《新的跋涉》、《（武训传）事件始末》等。

这些文章大多不太长，但涉及的人物很多，他们都是爸爸半个多世纪中的朋友，正如他在《风雨敌人情》一文中所写的：“这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年代，这又是一个晨光初展的年代，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这又是一个英豪辈出的年代……”如果把他笔下的这些杰出人物连贯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年代里的某一方面的缩影。

爸爸的朋友很多，他自己说过，和他来往过的，打过交道的人，可能超过一千。他说，他交友很广，什么样的朋友都有，可以说是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他经历丰富，工作时间长，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多，完全是可能的，但要成为朋友却不一定容易。他曾带着一些自豪的口气对我说过，××时期，党组织让他联系一些不太好对付的团结对象：如××脾气不好，××爱发牢骚，××喝了酒后要骂人等等，这样的事还不少，但他都很好地完成任务。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好朋友。我问他，你怎么会做得这么好？他笑着淡淡地说：“和他们真心交朋友，平等待人，尊重别人的长处嘛！”

爸爸和朋友交往，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包括对他的警卫员、司机都是这样，这就是他说的要尊重人。长期他身居领导地位，但丝毫没有改变他这种作风。“文革”后，已是高龄的他，却交了许多年轻朋友。当他们第一次去见他，心中总是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和自己年龄差一大截的长者交谈，可是当一见到他之后，他那亲切的握手，和霭的微笑，随和的交谈，使来者的紧张情绪都化为乌有。爸爸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路和惊人好的听力，和年轻人聊天，显得那样轻松自如，使人忘记了在他们面前已是一位九旬的老人。年轻人尊敬他，他也尊重年轻人。在思想上，可以说爸爸是紧跟时代步伐，从不落伍，永远年轻的。

他交朋友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人的关心，也可以说是很有点人情味。他曾说过，人嘛，当然是要讲人道，人情，人性的啦。他对朋友关怀和帮助，给他们温暖和鼓励，但又不失原则性。这是他在用他的方式在替党做工作，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好像是座无形的桥梁在沟通着党和群众的关系。

记得1960年我刚从苏联回国，对“右派分子”一无所知，可能被当时的宣传报道吓坏了，见到一些“右派”朋友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赶紧回避，最好别和他们说话。可爸爸却不然，当这些朋友难得从北大荒或外地回京时，他总抽空和他们见见面，谈谈话（当然，在那时可能还是要稍稍保点密的）。也许是他那份友情，那份关怀，温暖了他们的心，使得他们在困难中增加了信心和勇气，坚定地生活下去。

还有一件事：1966年“文革”初期，文化部当时的领导同志惨遭“四人帮”的迫害。寒冷的十二月份深夜，把他们从家里抓走，集中关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屋子里，平时就怕冷的爸爸，穿得还比较多，和他关在同屋的林默涵同志，大概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仓促地被造反派抓走，所以穿得非常单薄，冷得实在受不了，缩成一团。当时爸爸自己都被打成“黑帮”，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他脱下身上一件丝棉背心给默涵同志穿上。不久前，在一个集会上，我见到了默涵同志，他还向我提起这件事，但爸爸自己却很少谈起这类事情。

爸爸和他朋友们之间的故事，我只能谈一些片断，一些零星的回忆，爸爸在《怀念》这篇文章中写道：周总理不止一次对他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要和那些‘刺头’和爱顶撞的人交朋友，责备和训斥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只有交上了朋友，人家才能和你说真话……。”我想，总理这个教导，爸爸是认真听取了，也是认真做到了的，读者在这本《风雨故人情》的集子中可能也会感觉得到吧。

沈 宁

1996年6月19日于北京

